世界史

近代史编

下卷

【第二版】

主编 吴于廑 齐世荣

本卷主编 刘祚昌 王觉非

高等教育出版社



YZLI 0890085969

世界史

Shijieshi

近代史编

Jindaishi Bian

下卷

（第二版）

主编　吴于廑　齐世荣

本卷主编　刘祚昌　王觉非

宁波市鄞州区图书馆
藏书
YZLI

YZLI 0890085969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内容简介

本书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中的《近代史编》第二版的下卷，即全套教材中的第四卷。本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从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到1900年期间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展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并向垄断过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亚非拉国家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历史轨迹，通过纵横两个方面展示了具有真正意义的整体世界形成的过程。此次修订既保持了初版的基本体系，又吸取了我国世界史学界的研究和教学成果，并弥补了初版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使之更趋完善。

本书可供普通高等院校师生、专业工作者和社会读者学习、参考。

六卷本《世界史》是原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八五”期间国家重点书，初版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 近代史编. 下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 —2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
ISBN 978-7-04-027004-4

Ⅰ. ①世… Ⅱ. ①吴…②齐… Ⅲ. ①世界史：近代史-高等学校-教材 Ⅳ. ①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1324号

策划编辑 王方宪 张林 责任编辑 王方宪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余杨 责任校对 胡晓琪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经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5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次 2001年3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2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1.6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7004-00

目　　录

第四章　工业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第一国际 …… 1
第一节　英国工业革命 …… 1
一、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 …… 1
二、工业革命的过程 …… 4
第二节　工业革命的扩散 …… 6
一、法国工业革命 …… 7
二、美国工业革命 …… 9
三、德国工业革命 …… 12
四、俄国工业革命 …… 15
第三节　工人运动的发展·宪章运动 …… 17
一、工人运动的发展 …… 17
二、英国宪章运动的背景 …… 19
三、宪章运动的兴起·第一次请愿书 …… 22
四、全国宪章协会·第二次请愿书 …… 24
五、1848 年宪章运动 …… 27
六、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 …… 29
第四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 32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 32
二、第一国际 …… 41
三、巴黎公社 …… 50
第五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世界市场的形成 …… 62
第一节　欧美的民族民主运动·改革运动 …… 62
一、英国 1832、1867 年的改革 …… 62
二、俾斯麦与德国的统一 …… 74
三、意大利统一 …… 85
四、俄国 1861 年改革 …… 92
五、美国内战 …… 98
第二节　自由主义思潮 …… 109
一、从人权理论向自由主义的演变 …… 109
二、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学说 …… 112
三、边沁的功利主义和穆勒的自由学说 …… 113

四、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 116
五、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 117
第三节 日本明治维新 …… 119
一、明治维新的背景 …… 119
二、1867—1868 年的革命 …… 126
三、明治政府的建国三大政策 …… 130
四、近代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 132
第四节 资本主义入侵下的亚非拉诸国 …… 138
一、中国被打开大门 …… 138
二、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 …… 145
三、朝鲜危机与外国资本入侵 …… 147
四、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 …… 150
五、伊朗的衰落 …… 154
六、埃及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 158
七、资本主义入侵下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 162
八、资本主义入侵下的拉丁美洲诸国 …… 167
第六章 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世界连结成为整体 …… 174
第一节 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 …… 174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特点和影响 …… 174
二、1871—1900 年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 …… 178
三、垄断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 183
四、垄断组织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 188
第二节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向 …… 190
一、政治发展的趋向 …… 190
二、社会立法 …… 203
三、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 …… 215
四、欧美工人运动·第二国际 …… 223
五、1871—1900 年的国际关系 …… 233
六、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 246
第三节 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亚非拉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 258
一、亚洲诸国 …… 258
二、非洲 …… 276
三、拉丁美洲 …… 284
结束语 世界连结成为一个整体 …… 291
后记 …… 293

第四章 工业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第一国际

18 世纪后半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在它的影响下,欧美其他一些国家,也先后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千百年来,由于生产力低下而经常在饥寒交迫中忍受煎熬的人民,开始看到了苦难尽头的亮光。同时,工业革命在交通运输、通讯工具方面所引起的巨大变革,对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实际上超过了一般的政治革命。工业革命还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动,社会日益分裂,贫富悬殊,物欲横流,在闪闪发光的金钱面前,一切都黯然失色。在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不断进行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斗争,并形成了由科学社会主义指导的独立政党,它成为此后世界近代历史的重要篇章。

第一节 英国工业革命

一、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

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18 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学术界曾进行长期争论,有所谓“单因论”和“多因论”的不同。前者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由一种主要的因素造成的,后者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多种因素综合的力量的结果。另有所谓“革命论”和“进化论”的争论。“革命论”者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由一种剧烈的社会经济大变革在短时期内发生的,“进化论”者认为工业革命是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逐渐演变的过程。

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是英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同时它也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有关。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争论,以前有些学者认为它开始于 1760 年,还有其他许多不同说法,近年来,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开始于 18 世纪 80 年代。我们认为,把工业革命开始时间定在 18 世纪后半期比较稳妥。

在中世纪时期,英国由于羊毛工业的发展,引起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同时商品货币关系也深入农村。到 14 世纪末,英国的农奴制度已经瓦解,到 15 世纪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已经完成。当时英国的农民阶级基本上都是自耕农,早期的资产阶级即商人阶层利用企业方式经营农业的新式贵族也在形成。

同时,把社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的过程也在进行。而这个过程是与圈地运动相联系的。

所谓"圈地",就是把英国农村中早已存在的"敞田"①用栅栏圈围起来,撤去内部原来存在的疆界,在这片整块地段上从事养羊或耕种其他农作物。

到15世纪末,市场上羊毛价格上涨时,圈地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用以养羊。在17世纪革命发生之前,英国政府由于害怕圈地运动引起农民的反抗和起义,同时,也由于自耕农一向是英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和武装力量的主要来源,所以曾屡次颁布法律禁止圈地。到了17世纪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在刚刚夺取政权之际,对圈地抱着默许、纵容的态度。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就不但不禁止圈地,反而颁布法律来鼓励圈地的进行,使圈地运动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随着圈地运动的不断发展,大批农民从被圈占的土地上被赶走,他们丧失了生产资料后,被迫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就为以后新发展起来的工厂提供了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源泉。

对殖民地的侵略,在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本来在16世纪末叶之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垄断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殖民地,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订立协定,将整个世界殖民地的范围加以瓜分,英国的海上贸易只能主要靠走私和海盗行为。直到1588年英国在一次海战中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才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开辟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此后,英国在美洲、印度及非洲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地和商业采购站。

此后,英国在抢夺海上霸权和殖民扩张上又先后在17世纪和18世纪击败了荷兰和法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

英国殖民者不仅用一本万利的方式,而且常常是在"不垫支一文铜板"的情形下,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无情的掠夺。在英国的海外掠夺中,奴隶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8世纪末,每年从非洲运出的多达10万的黑奴中,大约有1/3是英国奴隶贩子经手的。1718年从非洲运到美洲的黑奴共10.5万人,其中3.8万人由英国奴隶贩子经手。英国殖民者不仅在英属殖民地,而且也在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从事贩奴勾当。根据1713年的乌特勒支条约,英国取得每年向西班牙属美洲殖民地运送4 800名黑奴的权利。由于当时盛行以走私的方式贩运奴隶,英国人贩运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奴隶人数远不止此数。现为英国重要的商业和船运业中心的利物浦,就是从奴隶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792年在利物浦从事贩运奴隶的船只达132艘之多。

---

① "敞田"是英国的一种古老的耕作制度,它按照土地的水利条件和土质肥质的不同,把土地分割为许多不同的条条块块。按平均的原则分配给不同的农民,当耕作时,各人耕种属于自己的地段,当农作物收获之后,各地段的疆界废除、"敞开"以供所有农户放牧牛羊或收割柴草。

英国国内市场的形成较早并且发展较快，以及行会制度比较薄弱，也对以后工业革命的发生产生一定影响。

在英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早就出现了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在16世纪，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显露出不同的特色，各地区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使各地的地方市场逐步向统一的民族市场发展。到了17、18世纪，随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大，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的增长对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影响。17世纪末，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1/4强。其中仅伦敦一个城市就有人口约50万人。其他的城市虽然人口都很少，但它们大多为一些小城镇围绕着。这样，众多的中、小城市为一些小城镇和乡村所围绕，成为一个个繁荣的工、商业中心。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在《不列颠岛旅行记》一书中写道，有一个小城市诺福克为许多小城镇和乡村包围，这些乡村"是如此之大和住满了人，使它们足以与其他地方的镇相比"。这样的中心布满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更多。因此，在18世纪时，英国人口虽少于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但是它的国内市场发展水平，在欧洲却是首屈一指的。

英国的行会制度比较薄弱，所以商品生产的自由竞争可以更顺利地发展。虽然在革命前工、商业中曾存在着垄断专卖权，妨碍工、商业的发展，但经过革命，这些垄断特权都取消了。有一些古老的工业部门，如羊毛制造业，行会的行规存在的时间比较久，但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这些行规已只剩下一些形式上的残迹。而那些新兴起来的工业部门，如棉纺织业，一开始就是在完全的自由竞争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自由竞争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

在英国工业发展方面，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即交通运输比较发达。英国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国内任何地区距离海岸线都没有超过120公里以上者。各地工业原料和商品都可通过海道运转各地。而且英国的一些大城市都设立在靠近沿海岸的河道上，使它们与其他各地的交通更加便利。同时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又进行了公路建筑和运河开凿，公路网遍布各地，几条运河贯穿全国。这对工、商业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

手工工场的发展对英国工业革命也起了很大作用。英国很早就有了羊毛制造业的手工工场，羊毛及羊毛制成品成为英国出口的大宗。16世纪时，在英国的东南部等地分散的手工工场到处都有。到了17世纪初，在许多城市和乡村，都有加工羊毛的呢绒业手工工场。当时英国各地不同品种的羊毛织成品已达数十种之多。

除了原有古老的羊毛手工工场外，到17世纪时，一个新的手工工场部门，即棉纺织业也已迅速发展起来。英国的地理气候，适宜于长纤维的优质棉花生长，而且棉纺织业作为一个新的工业部门，没有旧的行会的束缚，产品价格又较羊毛低廉，所以发展特别迅速。其他手工工场，如丝织业、麻织业，以及冶金业、采矿

业、沿海一些城市的造船业等手工工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手工工场的发展为大机器工业培养、训练出了所必需的工人基干队伍，又为它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和劳动形式以及工业技术。

首先，手工工场内细致的劳动分工，使每一个工人只专门从事一种简单的机械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简单、机械的劳动，使工人的肢体和技能只在单方面发展，渐渐降低了智力劳动的能力，从而促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虽然它使工人的劳动获得技术上、操作上的日益完善和熟练，但同时它使工人的劳动日益丧失其独立性而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这样的工人就是未来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

其次，手工工场中的劳动分工，导致了生产工具的专门化，每一种工具都只有一种特定的用途和性能。这就为以后的大机器的发明，创造了技术前提，因为机器实际上就是由简单的工具结合而成的。

最后，手工工场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也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先驱。

由此可见，手工工场的发展为从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生产，也就是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二、工业革命的过程

棉纺织业中的机器发明

在英国各个工业部门中，机器的最早采用，并不是在英国的传统工业羊毛手工工场中，而是在一个新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这是因为，虽然羊毛加工业是英国发展最早、最兴盛的工业，但是它作为一个古老的工业部门，旧的传统、老的行会行规等限制很多，给技术革新带来很多障碍。而棉纺织业在英国是一个年轻的工业部门，没有旧传统和行会的束缚，容易进行技术革新和开展竞争。同时，棉纺织品的价格比毛纺织产品便宜，市场需要量大，为满足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加产量，所以对技术革新的要求比较迫切。

英国原来并不生产棉花，这从英文“棉花”（cotton）一词含义的变化也反映出来。直到17世纪，cotton一词还是指英格兰北部的粗羊毛制成的呢绒。后来棉花从外国输入后，它才有了现代的词义。印度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国家，后来棉花种植从印度传到了地中海各国。在14世纪又传到了佛兰德斯。16世纪末，佛兰德斯的一些工人移居英国，才把棉纺织业传到了英国。到17世纪中叶，英国人在曼彻斯特建立了自己的棉纺织工业。以此以前，英国人穿的棉织品大都是从印度输入的印花布。这时英国人已有了自己的棉纺织工业，原棉也非来自东方，而是从新的棉花产地南美洲输入。南美的原棉先运到英国利物浦港口，然后转运到兰开夏郡。兰开夏的气候，其温度和湿度，都非常适合棉纺织工业。于是，英国人在这里开办的棉纺织手工工场不顾各种人为阻挠而迅速地发

展起来。为了防止外国商品的竞争,1700 年议会又颁布法令,严格禁止从印度、波斯、中国输入印花布。

棉织品受到英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市场需要量不断增长。为了提高生产率,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许多人都努力从事技术革新。1733 年,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一项重要的新技术,机械工和织工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在此之前,织工织布时,只是用手把梭子在经线之间掷来掷去。这样的方法,既费气力,又无法进一步加快速度。同时,在一个人将梭子掷来掷去时,织布的宽度不可能超过手臂的长度,所以如果要织较宽的织品,就需要两个或更多的工人。凯伊的飞梭改用手拉动绳子,使梭子在滑槽上来回滑动,既省力,又加快了速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760 年飞梭已被应用到纺织工业的各个部门,织布的速度因而提高了一倍。

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速度,纺纱却跟不上织布的需要,产生了供不应求的矛盾,妨碍了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1761 年"奖励工艺协会"发出文告,号召人们创造能加快纺纱速度的机器。1765 年,织布工兼木匠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轴纺纱机,它可以由一个人操作同时纺出 8 根纱线。哈格里夫斯用自己的女儿珍妮的名字来命名这部新的纺纱机。以后,"珍妮纺纱机"不断加以改进,不久它已能同时纺出 80 根纱线,各地纷纷采用,到了 80 年代末,英国全国已有"珍妮纺纱机"2 万架左右。在棉纺织业特别发达的兰开夏郡,"珍妮纺纱机"很快就代替了旧式的纺纱机。

1768 年,钟表匠凯伊在木匠海斯的协助下发明了水力传动的纺纱机,它比珍妮纺纱机更省力,效率更高。不过,水力纺纱机和"珍妮纺纱机"各有优缺点,前者纺出的纱比较精细,但不牢固,后者纺出的纱比较牢固,但比较粗糙。到 1779 年,工人塞缪尔·克伦普顿发明了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的水力纺纱机,这种机器纺出来的纱,既精细,又牢固。人们把这种机器称之为"骡机",因为它好像马和驴生出的、具有两者优点的骡子一样。

纺纱机经过不断改进,很快将纺纱的速度提高了 100 倍,这又使织布的速度显得落后了。于是提高织布的速度,又成为许多人不断探索的问题。1785 年,埃德蒙·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把织布的速度提高了 40 倍。

上述的纺织工业中的第一批发明,首先是应用到棉纺织业中的,以后又扩展到其他纺织业如羊毛、呢绒等工业部门中。

采煤业、冶铁业中的技术革新·瓦特的蒸汽机

纺织机发明以后,由于大量制造机器,对金属的需要量急剧增长。而当时英国铁产量有限,在 1720 年全国只有 60 个高炉,每年只能生产 1.7 万吨生铁。生铁不敷国内需要,质量也不如外国如瑞典等国的好,价格反而比瑞典的高。因而每年还要从瑞典、俄国、西

班牙和英国的美洲殖民地进口。如何改进英国本土的铁的生产并提高产量，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16 世纪时，炼铁是用土法吹炼的，到 17 世纪改为水力鼓风炉，效率提高了 5 至 10 倍，然而仍赶不上国内的需要。直到 1735 年亚伯拉罕·达比发明了新方法，即将生石灰掺到矿石中去，同时用煤作燃料，增加鼓风的力量，生铁的产量才迅速增加。1784 年亨利·科特发明了搅炼法，生铁可以炼成熟铁。在此之前炼钢的方法也已发明。从 80 年代起，冶金业和采煤业中的技术改造速度加快。有了充足的铁和钢以后，机器生产就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到了 18 世纪中叶，由于冶金业和采矿业的发展，大规模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造起来，但是这时的动力主要是利用河流里的水力。在这方面，有很多缺点，因为在英国水力资源并不丰富，只有在彭奈恩山脉和苏格兰—威尔士一带，才有河流湍急的地方，其余地区的河流流速缓慢，不足以作为工厂的动力。因此工厂都必须建立在河流湍急的偏僻的山谷等处，但这些地区交通不便，而且远离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所以，动力问题又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迫的问题。

本来，早在 1698 年托马斯·萨夫里已发明了蒸汽唧筒，用以抽干矿井里的水。1706 年铁匠纽科门也发明了一种蒸汽唧筒。但它们都还不能用来发动机器。作为发动机器的蒸汽发动机，是詹姆斯·瓦特发明的。

瓦特出生于苏格兰，曾到格拉斯哥大学当实验员。他好学善思，研究了多种学科。对古代文物、法学和美学都有丰富的知识。他生活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代，每一项新的技术革新，都受到他的密切注视。1765 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实验室里已发明了一种蒸汽机，不过，这个蒸汽机和纽科门的差不多。以后，瓦特又在新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提高蒸汽机的效能，终于发明了能用作发动机的“万能蒸汽机”。

1789 年瓦特得到了万能蒸汽机的专利权。这种机器很快就在全国广泛应用。除用在纱厂之外，还应用到冶金厂、面粉厂，并在后来应用到运输业中，导致了运输工具的改造。

有了蒸汽机作动力，只要有煤作燃料开动蒸汽机，就可根据需要建立工厂，不再受到河流的限制。由于英国煤的蕴藏量非常丰富，建立工厂十分方便。蒸汽机的广泛利用，使英国到处都建立起大工厂。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喷出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打破了原来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恬静——历史已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节　工业革命的扩散

到 19 世纪，工业革命逐渐地从英国这个工业革命发源地扩散到欧洲大陆，甚至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最初，工业革命的扩散面临各种障碍。首先，英国有

一项法律，禁止机器出口。其次，欧洲大陆上的各种情况不利于工业化：如政治分裂、农奴制度、政治动荡、革命和战争等等，都妨碍工业革命的进行。但是，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政局趋于稳定，英国上述那项法律也在 1825 年被废除。而且，英国工业家到 19 世纪 30 年代已积累了大量过剩资本，开始在欧洲大陆寻找投资场所，这不可避免地带动机器的出口。阻碍工业革命扩散的其他障碍也一个一个地消失了。因此，欧美诸国先后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下面分别介绍各国工业革命的过程及特点。

一、法国工业革命

法国本来就是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国家。18 世纪末的大革命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为法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向工厂制度的过渡扫清了道路。此外，法国是英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很容易受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因此，法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大陆国家。

早在 18 世纪后期，在法国的个别工业企业中就已经开始使用机器和蒸汽动力。但是，由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法国政局动荡不定，政权更迭频繁，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因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机器的采用陷入停顿。直到 1815 年拿破仑帝国倾覆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以及战争创伤的逐步恢复，法国的工业革命才真正大踏步地前进。

像英国一样，法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从轻工业开始的。自 19 世纪 20 年代起，机器和工厂制度首先在纺织业各部门中得到推广。到 1848 年革命前，全国的棉纺纱机已达 11.6 万台，丝织机达 9 万台，仅里昂一地就有丝织机 6 万台。大型棉纺织工厂多达 566 家，原棉消费量由 1830 年的 320 万公斤增加到 1846 年的 650 万公斤。毛纺织业和麻纺织业中也出现了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型工厂。机器的采用提高了生产效率，纺织品产量剧增，在法国出口商品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其中，毛纺织品已在国际市场上与英国展开竞争。制糖、造纸、印刷等工业部门也开始使用机器。蒸汽机的数量迅速增加。1820 年全国只有 39 台蒸汽机，到 1848 年增加到 5 200 台，总功率达到 6.5 万匹马力。

重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起步较迟，不过，在 19 世纪 30 至 40 年代，也开始采用某些新设备和新技术，如冶铁业中开始使用焦炭作燃料，替代了木炭，还出现了鼓风高炉，推广了搅炼法。1847 年，生铁产量达到 60 万吨，钢产量达到 1.3 万吨。煤产量由 1815 年的 88 万吨增加到 1848 年的 400 万吨。在金属加工业中，出现了汽锤、滚轧和切削机床，初步奠定了机器制造业的基础。铁路建筑也开始了。19 世纪 20 年代末，法国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到 40 年代末，铁路总长度接近 2 000 公里。

到19世纪中叶，法国工业生产在世界上占第二位，其工业总产值在1847年达到40亿法郎，相当于1827年的3倍。但是，与英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40年代初，法国的煤产量只及英国的1/12，生铁产量和铁路长度分别为英国的1/4。

50年代后，法国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其重心转向重工业。第二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诸如提供低息贷款和补助金、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资助铁路和港口建设、改善交通、兴办公共工程、鼓励外国投资、大量引进英国的人才与技术等，这些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工业的高涨。在50至60年代，焦炭炼铁法基本上普及，占冶铁业的92%。贝氏炼钢法和西门炼钢法被引进国内，并且得到迅速推广，使得钢铁产量大幅度增加。到1870年，生铁产量达到138万吨，钢产量达到10万吨，煤产量达到1 330万吨。蒸汽机的使用更加普遍，1869年时全国共有3.2万台，总功率达到32万匹马力，相当于20年前的5倍。铁路建筑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到1870年，铁路总长度接近1.8万公里，全国铁路网基本建成。

轻工业的发展继续保持着较高的速度，各种新发明和新机器不断涌现，如针织机、缝纫机和各种木材加工机器等相继应用于生产过程。越来越多的企业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这20年内，法国的工业总产值翻了两番。到60年代末，机器大生产已成为法国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至此，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法国的工业革命具有不同于英国的鲜明特点。首先，从资本原始积累方面看，法国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主要不是通过大规模圈地的暴力方式，而是通过租税盘剥进行的。尽管法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圈地现象，但其规模和影响远不能与英国相比。此外，对外殖民掠夺虽然也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之一，但由于法国在18世纪前半期在同英国的争霸战争中连遭失败，丧失了原有的大片殖民地，其殖民剥削的范围大大缩小，因而殖民掠夺对于原始资本积累的意义在法国也不像英国那样突出。

其次，从工业革命的进程看，小企业的长期和大量存在以及大企业的发展迟缓是法国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70年代初，即法国工业革命完成时，平均每家企业雇佣工人还不到3人，1 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100多家，而雇佣一二人的小企业多达数十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这种状况与法国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工业结构有密切关系。在法国，服饰业、高级化妆品和奢侈品制造业历来十分发达，直到19世纪末仍在法国工业体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860年时，仅巴黎一地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就有6.3万人。这类工业多以手工劳动为主，适合采用分散型的小企业形式，不宜集中，因而阻抑了大型企业的发展。

在工业结构中小企业大量存在的同时，法国农业中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优势。

法国的大多数农民在18世纪末的大革命中，都获得了一小块土地，以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汪洋大海般的小农阶级。按理说，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它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两极分化，导致地产日益集中，但是，由于十分猖獗的高利贷资本作祟，法国小农的分化极为缓慢。1881年时，占地1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仍占农民总数的90%以上。

此外，高利贷资本特别活跃是法国工业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早在封建统治时代，法国的高利贷就比较发达。革命后，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高利贷资本又获得进一步发展，几乎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19世纪中叶成立的几家大银行，主要是从事利息优厚的国债和证券交易，以及对外贷款等信贷投机活动，很少直接投资于工业企业。1869年，巴黎的交易所拥有307种有价证券，总数达330亿法郎，几乎超过当时法国工业总产值的两倍。

小企业的大量存在造成企业经营分散，阻碍了新机器、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小农经济把大批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影响了工业劳动力的供应，并且造成农业生产落后和农民的贫困，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发达的高利贷资本吸引了大量社会流动资金，从而减少了工业企业的投资；再加上煤、铁资源贫乏，能源短缺，交通业发展滞后，运费昂贵，造成工业成本较高，影响了法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上述种种不利因素，法国工业革命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就远不及英国，同时，在发展速度上也比不上同期的美国和德国。

二、美国工业革命

美国的工业革命几乎是与法国同时开始的。美国之所以较早发生工业革命，是由于国内外两方面都存在有利条件。就国内条件而言，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土地、森林、水力、矿产等资源都十分丰富，而且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为工业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旧的行会传统和习惯势力异常微弱，因而有利于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此外，通过第一次独立战争，美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就国外条件而言，美国远离动乱的欧洲，南北有弱国为邻，东西有两大洋保护，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使美国有可能长期保持和平安定局面，较少遭受战争破坏，有助于工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使美国有条件打着中立国的旗号，利用欧洲战争，坐收渔翁之利。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美国乘机发展了自己的航运业和海外贸易，攫取了大量财富。

美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金还有以下几个来源：第一，奴隶贸易。从事这种可耻贸易的主要是北部、中部商人，他们从中取得惊人利润。第二，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这主要是凭借暴力和欺骗手段实现的。第三，西部土地投机。美国有许多人（其中包括政客）靠它发了大财。第四，联邦政府偿还国债的政策。独

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及各州政府发行了大量公债,战后公债券贬值,持有公债券的劳动人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票面价格的1/10的低价出卖,购买者多为从事投机的富有的大商人及政客。后来联邦政府根据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建议,按票面价格偿还公债,于是,这些投机者转手之间发了大财。这些不义之财也转化为工业资本。

美国还有一个潜在的广阔的国内市场,那就是西部处女地,它不断地吸引着移民前往开垦,而西部的开发就意味着国内市场的扩大。

19世纪初,杰斐逊政府以低价从法国手中购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路易斯安那地区,这使美国版图增加一倍。19世纪40年代,美国又通过侵略战争从墨西哥抢来120万平方英里的辽阔土地。美国的领土扩张,不但意味着土地的增加,而且也带来了地上地下的无尽宝藏,这就使美国人在从事工业革命时,不愁没有能源和原材料。

外国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进美国,为美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据统计,1790—1860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达500万人。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其中不少人是熟练的手工业者,他们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工业的技术革新,如美国第一架水力纺纱机是英国移民制造出来的,无烟煤炼铁法是德国移民首先试验成功的。

这样,美国到19世纪前半期已完全具备了工业革命的条件。

1789年,塞缪尔·斯莱特仿制英国水力纺纱机成功,并在罗得艾兰建立美国第一家纺纱厂,从而揭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幕。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4)后,美国彻底摆脱了对英国的经济依赖,工业革命遂全面展开。在19世纪30—50年代,棉纺织业率先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随后,在毛纺织业、面粉业、食品业、制鞋业、服装和木材加工业等部门中,也普遍使用了机器,轻工业初步实现了机械化。

冶铁业也出现重大技术进步。从1834年起,先后采用了热风炉和无烟煤炼铁法,后又引进英国的搅炼法,生铁的产量和质量都明显提高。冶铁业的发展促进了采煤业的发展,蒸汽机在煤矿中普遍推广。1860年,全国煤产量达到1 820万吨,相当于1820年(30万吨)的60倍。

在美国工业革命初期,大部分机器是从英国购买来的,但是美国在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设备时,不是简单地照搬和模仿,而是加以创造性的改进,从而能迅速研制出更为先进的机器,这成为美国工业革命的一大特点。美国政府还较早地实行了专利制度。1790年美国第一届国会就通过了《专利法案》。1836年又制定了《专利法》,成立了专利局,使发明人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各项发明不断涌现,像轧棉机、造纸机、印刷机、缝纫机、收割机、电报机等发明都是出自美国人之手。此外,美国最先采用和推广了机器零部件的标准化生产方法,使一

些机器零件可以通用互换，从而降低了机器的生产成本。这些都是推动美国机器制造业迅速发展的有利因素。

到 19 世纪 50 年代末，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在美国主要工业部门中都已占主导地位，工业革命大体完成。不过，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当时，工厂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南部仍盛行种植园奴隶制，工业十分落后。西部的开发尚在进行中。

1861 年内战的爆发，一度给工业革命带来不利影响，如北方一部分棉纺织工厂因失去南方原料供应而陷入停工，但不久以后，北方工业便重新走向兴旺。林肯政府实行的战时通货膨胀政策，使资本家能够获取比平时更多的利润，因而有条件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战争还扩大了政府订货，其中，像武器装备、军服等军需物品要求有相同的式样和规格，只有机器生产才能满足这个要求，再加上战时劳动力的相对缺乏，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机器的发明和工业革命的进展。

内战的胜利消灭了南方奴隶制度，恢复和巩固了联邦的统一，扫除了阻碍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同时，内战摧毁了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势力，使资产阶级独掌了国家政权，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如实行保护关税，建立国民银行制度和统一币制，资助铁路建筑，大力支援农业，发展教育，增加智力投资，重视生产组织的合理化和科学管理等，这一切都推动了工业革命在广度上和深度上的进一步发展。北部的大量资金、技术和设备在内战后不断地流入南部各州，促进了南方农业的改造和工业的兴起。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工业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宣告完成。

与“西进运动”①密切联系、互相促进、同步发展，是美国工业革命所独具的特点。18 世纪末，当工业革命在东北部起步时，美国西进运动也刚刚开始。在美国政府的鼓动下，一批批的东部移民像洪水似地涌入西部地区，他们在美国军队的支援下，以驱逐和屠杀等方式，大规模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将印第安人不断向西驱赶，然后进行开发。一望无际的西部荒原逐步得到开发。最先的移民在西部拓荒种地，建立居民点，发展农业，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及日用工业品完全仰仗于东部，这就为东部制造业扩大了国内市场。反过来，西部新农业区的开辟，又为东部城市和工业人口提供了充足的粮食。特别是由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奇缺，加之西部的地理环境也适合机械化大农业生产，因此，西进运动推动美国农业较早地实现了机械化和产业化。从 1820 年马拉耘田机问世后，割草机、脱粒机、马拉收割机、小麦播种机、玉米栽种机、谷物捆扎机和其他各种

---

① 即美国东部居民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向西部地区扩张、移民和进行开发的运动，这个运动也是对印第安人进行的屠杀和掠夺，运动开始于18 世纪末，结束于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它使美国领土范围从大西洋沿岸扩展到太平洋沿岸。

搬运机械相继出现。其中,马拉收割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其效率比英国的收割机快两倍多。到1855年,全国共有这种收割机1万台。由于存在大片可供开拓的自由土地,西部农业从一开始就走向以家庭农场为主导形式的大农业发展道路,并随着拓疆活动的西移,农场规模渐次扩大。19世纪中叶以后,家庭农场纷纷向资本主义大农场过渡。大农场普遍采用企业化管理和集约化经营方式,使美国农业的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总之,在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方面,美国走在了其他各国的前面。

西部垦殖区在原料、市场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强烈地吸引着东部制造业逐步西移。自19世纪中叶起,食品加工、屠宰、罐头、木材加工、农机制造、煤炭、钢铁等工业陆续扩散到西部地区。随着西部工业的兴起,西进移民的开拓能力进一步增强,使西进洪流有可能向更荒僻的"远西部"涌进,从而把工业革命的浪潮进一步引向西部边远地区,直至太平洋沿岸。60年代以后,即工业革命大体完成后,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美国工业向西扩散的势头依然未减,结果导致工业中心逐渐西移。60年代前,大西洋沿岸各州生产的工业品约占全国的80%,到1890年降为58%,原来以农业为主的俄亥俄、印第安那、伊利诺斯等中西部各州发展成为新的工业中心。

受西进运动的影响,美国的交通运输业发展特别迅速。由于人口不断西迁和开发西部的需要,美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改善东西部的交通运输条件。19世纪20至30年代建成的伊利运河和俄亥俄—伊利运河,把密西西比河、五大湖和太平洋连接成一体。由政府投资修筑的坎伯兰大道于1852年竣工,又从陆上提供了一条沟通东西部的交通要道。更重要的是,从30年代起,在政府的鼓励和资助下,全国掀起修筑铁路的热潮,在几十年内便建成了横贯大陆的5条铁路干线。这样,一个以铁路为骨干的全国水陆运输网建成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加速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进程。

正是在西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先于法国、德国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工业强国。

三、德国工业革命

德国的工业革命晚于英、法、美三国,这主要因为德国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局面,以及16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再版"和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国内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影响了工业革命前提条件的形成。因此,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才真正踏上工业革命的道路。而且,在最初的20年内,德国工业革命进展缓慢。直到1848年革命后,德国工业革命才蓬勃开展起来。在50—60年代,开发新矿山、建设新工厂、修筑新铁路的投资热潮盛极一时。到60年代末,工厂制度已在各先进工业区占了主导地位。1871年普法战争后,国家实现了最后统

一，并从法国手里夺取了煤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还获得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这些都大大增强了德国的政治经济实力，进一步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到70年代末，德国工业革命终于宣告完成。

长期的政治分裂，使德国无力开拓海外殖民地，因此，德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来自对国内的掠夺，其主要方式是在解放农奴时向农民索取赎金。从1807年开始，以普鲁士为首的多数邦国逐步实行了农奴制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通过缴纳赎金或割让土地赎买与土地有关的封建义务。赎金额相当于农民常年地租额的25倍（后降为18倍），倘若割让土地，则为农民土地的1/3～1/2。通过这种改革，地主贵族攫取了大量赎金和土地，据统计，仅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就掠夺农民赎金10亿马克。贵族地主们除利用这笔赎金把原来的封建庄园逐步改造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外，还将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于工业，从而转化为工业资本。赎免了封建义务的农民，在获得了人身和择业自由的同时，开始了急剧的分化。除少数人上升为富农外，绝大多数人走向破产，沦为雇佣劳动者，因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德国还成立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集中社会上的游资，引导资金流入工业领域。此外，德国工业落后及工业利润丰厚也吸引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向德国投资。这样，通过多种渠道，大量资金投入德国工业，解决了工业革命缺少资金的问题。

国家的分裂使德国工业革命面临的市场问题特别尖锐，但是，这个问题通过关税同盟的建立得以缓解。1819年，普鲁士联合部分小邦成立了"北德意志关税同盟"。后来，又相继成立中德和南德关税同盟。1834年，这几个关税同盟联合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关税同盟包括18个邦，占德意志领土的2/3，同盟内部禁止设立关卡，实行免税贸易，采用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这就缩小了国家分裂状态的消极影响。同时，关税同盟对外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实行统一税率，并先后与英、荷、比等国签订了双方平等的商约，改变了德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当然，农奴的解放也扩大了国内市场。

与直到工业革命后期交通运输业才发生革命变革的英、法两国不同，在德国工业革命中，以铁路建筑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革命处于领先地位。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工业革命刚刚起步时，德国的第一条铁路——富尔特—纽伦堡铁路便建成通车了。从40年代起，铁路建筑业迅速发展，到1872年，全国铁路总长度达到22 426公里，超过了法国和英国。与此同时，德国还大力修筑公路，开凿运河，建设港口，发展内河航运和海上运输。1850—1870年间，德国的船舶吨位增长了80%。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变革。大规模的铁路修建给予采矿、冶金、煤炭和机器制造业以巨大推动，促使德国工业发展的重心较早地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1848至1875年，德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直超过轻工业，

生产资料的生产始终领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当然，这与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也有着密切关系。那时，普鲁士正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铁血政策"，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普鲁士政府大量订购军事物资，鼓励军火生产，因而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到 1870 年时，德国的煤产量达到3 400万吨，生铁产量 139 万吨，钢产量 17 万吨，分别比 1850 年增长了 4.1 倍、5.6 倍和 28 倍。机器制造厂在 1861 年时已达 300 家，雇佣工人近 10 万人。由于较早实现了工业重心的转移，德国迅速建立起雄厚的工业基础，保证了其他行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物资及装备能够得到及时而充足的供应，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全面发展，这一点成为德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

国家政权积极干预是德国工业革命的另一突出特点。为尽快摆脱落后局面，促进经济腾飞，德国各邦政府都充分发挥了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的作用，大力推进工业革命。其主要措施有：实行高关税政策，以保护民族工业；兴办国有企业，资助私营企业；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经验；招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组织成立科学研究团体，及时介绍国外新技术和科研新成果等。在国家干预方面，普鲁士堪称表率。早在工业革命准备时期，普鲁士政府就组织成立了技术委员会，颁布了《专利法》，还两次派遣工商局长鲍斯去英国参观学习。30 年代末，普鲁士政府制定了《铁路法》，以加强对铁路建设的统一规划、指导和监督。40 年代，由政府拨款设立了铁路基金，资助私人铁路公司。从 1848 年起，政府开始直接投资修建铁路，到 60 年代时，国有铁路已占普鲁士铁路总数的一半以上。进入 70 年代，普鲁士政府逐步收购私营铁路，不到 10 年，大部分私营铁路转为国有。德国其他各邦也先后效法普鲁士，实行了铁路国有化政策。普鲁士政府还通过国家银行的信贷政策和利率调整，影响或控制工业革命的进程，并直接投资兴办了许多国营煤矿和炼铁厂，如鲁尔煤田的煤矿几乎全部是由国家经营的。德国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政权的参与、指导和组织下完成的。

国家干预对于工业革命影响最为深远的还在于政府重视发挥智力作用，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大力促进新技术的开发研究。工业革命初期，德国一方面积极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努力发展教育，以尽快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1825 年，普鲁士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到 60 年代，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7.5%，基本实现了普及教育。与此同时，各邦政府还兴办了多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职工补习学校。在普通中学中，增设了自然科学课程。在高等学校中，贯彻教育、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针。这些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文盲率降低到欧美各国的最低水平，还培养出一大批像西门子那样集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于一身的优秀人才，获得了发电机、电炉、内燃发动机、电车、合成染料等一系列重大发明。到 70 年代末工业革命结束时，德国不仅在生产技术上消除了与英国的差距，而

且在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方面超过了英国，走在了世界前列。正是因为重视教育，重视发挥智力作用，所以，德国工业革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取得了远比英、法等国更大的成就。

四、俄国工业革命

19 世纪 30—40 年代，工业革命的浪潮越出了西欧，扩展到东欧的俄国。

俄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在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下艰难而缓慢地形成的。自 18 世纪以来，俄国的农奴制手工工场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日益发展，并且成为主要形式。到 19 世纪 50 年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多达 2 800 家，工场内还出现了精细的分工。同时，农村手工业也有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农村工业中心，如莫斯科周围是毛纺织业中心，弗拉基米尔省是棉纺织业中心。还出现了一批像伊凡诺夫村那样专门从事一种手工业的工业村。工场手工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共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国内技术基础。俄国工业革命初期的许多工厂主，如莫洛佐夫、普罗霍洛夫等，都出身于农民手工业者。

俄国工业革命的资本主要来自商业利润和对“边区殖民地”人民的掠夺。近代初期，俄国的国内外贸易都十分发达，除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商业中心外，在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还有大量的店铺和定期集市。1851 年，全国商人共计 18 万人，商业资本约为 9 亿卢布。大批发商多从事对外贸易，包买商、行商和“商农”则奔走于城乡各地，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运到城市和集市去卖，再把农民需要的货物运到农村出售。活跃的商业资本使全国在经济上融为一体，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全俄统一市场。许多商人利用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对农民进行掠夺式的盘剥，积累起巨额财富，其中，一部分人把所得财富投入工业生产，成为工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

自 18 世纪起，沙皇政府加紧对外扩张，先后吞并了黑海沿岸、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并且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这些地区构成俄国的“边区殖民地”，它们对于俄国工业革命前提条件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俄国工业落后，产品质量差，无力打入西欧国际市场，而农奴制又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因之，“边区殖民地”的开拓，为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同时，“边区殖民地”自然资源丰富，不仅为俄国工业革命提供了许多必要的原料，而且扩大了俄国商人的财源，因为他们可以出口这些原料，从中牟取厚利，从而加速了资本的积累。

政府的税收制度是俄国原始资本积累的另一手段。沙皇政府在征收商品税方面实行包税制，这就给承包商人提供了发财机会，如酒税承包商马芒托夫、班纳尔达克等人，都积累了上百万卢布的财产，他们后来都成为大公司的创办人。此外，政府自己也把一部分税款直接投资于国有企业和铁路建设，使其转化为工

业资本。政府还把一部分税收以国家贷款、津贴或“奖金”的形式资助给企业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私人资本积累的不足。

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是俄国工业革命的国际条件。19世纪前期，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法国、比利时的工业革命正在深入发展，它们的榜样和经验对于俄国工业技术的变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具备了上述各种条件，俄国还在农奴制的统治之下便开始了工业革命。

从19世纪40年代起，俄国首先在棉纺业中采用机器，建立工厂。到1861年，纺锭达到200万个。继纺纱业之后，织布业、毛纺织业、造纸业等也开始向工厂制过渡。然而，由于受农奴制度的束缚，60年代前俄国工业革命进展缓慢。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缴纳的巨额赎金为发展大工业增添了新的资金来源；获得解放的2 000多万农民为大工厂提供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扩大了国内市场。因此，在60—80年代，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大大加速。采用机器的大工厂在轻工业各部门中迅速取代了手工工场。在冶金业中，贝氏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得到推广。交通运输也发生革命变革，在国内大河上出现了汽船。铁路修建也加快了步伐，在1866—1880年间，新修铁路达1.85万俄里，还出现了石油、机器制造等新兴工业。总的说来，到19世纪80年代末，工厂制度在各主要工业部门中都已占主导地位，俄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因为俄国技术落后，资本积累不足，所以外国资本和技术在俄国工业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俄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俄国的许多大型企业从一开始创建便为外国银行家所操纵，重工业基本上为外国资本所控制。有不少企业是外国资本家直接投资开办的，如顿涅茨最大的冶金企业新俄罗斯公司是英国人约翰·尤兹创办的。在70—80年代，外国股份公司约有400家，其资本占俄国资本总额的1/3。到90年代，俄国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进一步加重。外资总额达到2亿卢布以上，约占俄国全部资本的1/2，在采矿和机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甚至高达70%和72%。机器设备大部分从外国引进，主要来自英国。1860年以前的30多年间，输入俄国的机器价值增长了73倍，仅1856—1860年的4年间就达到310万卢布。英国一家公司的驻俄代理人路德维希·努普是一个著名的掮客，经他手用英国资本在俄国共建了122个纺织厂，其中，由他直接经营的克兰霍姆工厂是俄国也是欧洲最大的棉纺织厂，因此，克兰霍姆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为“俄国境内的一块英国领土”。外资的大量引进虽然加快了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但也造成工业利润大批流向国外，这对本国的资本积累显然是不利的。

俄国工业革命的另一特点是发展极不平衡。在地理上，工业分布不均，绝大多数工业企业集中在欧俄地区，在东部和东南部边远地区，特别是在“边区殖民地”，直到工业革命结束时，仍保持着原来的农业社会形态，工业经济微不足道。

在时间上，起伏波动较大，高涨与低落交替出现，一会儿是“滥设公司”的狂潮（如60—70年代初），一会儿又陷入停滞与萧条（如1872—1877年间），缺乏持续、稳定的发展。在产业结构上，各行业发展不够协调，轻工业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发展迅速，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迟缓。交通运输业较为落后，全国铁路网到90年代末才基本建成，而且许多铁路干线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修建的，经济意义不大。某些重要工业部门，或者极为薄弱（如金属加工业），或者付诸阙如（如农机制造业）。农业机械化基本上还未起步。在工业内部，一方面建起了一批采用机器的大工厂，另一方面靠手工劳动的旧企业和农村手工业仍大量存在，甚至有所增加。在个别地区和行业中（如乌拉尔的冶金业中），长期保存着农奴制企业的残余。

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和技术落后是俄国工业革命的又一特点。由于俄国没有建立起发达的机器制造业，因而企业设备供应不足，更新缓慢。特别是政府长期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使本国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垄断地位，削弱了革新生产技术的内在动力。个别新发明即使出现，也难以及时应用和推广，如金属切削机床的发明在俄国被埋没了50年之久，直到西欧国家采用后，俄国才开始采用。另外，俄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资本家宁愿采取增加工人、实行多班制的办法来扩大生产，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俄国居多数，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加之俄国文化教育落后，国民文化水平和工人的劳动素质比较差，所以，俄国的工业生产效率虽比工业革命前有大幅度提高，但仍远远落后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棉纺织业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英国低1/2到2/3。乌拉尔地区14.2万工人每年生产的矿石、铁和钢，在比利时只用1.1万工人即可完成。

总之，俄国工业革命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不及西欧各国和美国。到1897年，俄国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5/6，工业总产值只占国民经济的41%。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依靠出口谷物换取国外工业品的农业国。

第三节　工人运动的发展·宪章运动

一、工人运动的发展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惊人的发展。以英国为例，从1770年到1840年，每个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提高20倍，因此，英国工业生产得以迅猛增长。英国原棉消耗量从1800年的5 200万磅，增加到1840年的45 590万磅。生铁产量

1720年为25 000吨,1840年增至139 640吨。煤产量1770年为260万吨,1836年增至3 000万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建成了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到19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

工业革命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由于采用机器进行生产,工厂越建越多,生产规模大了,工人人数多了,实现了大批生产。在手工工场时代,与手工工场并立的是行会手工业作坊。在工厂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手工工场和手工业作坊逐渐地被挤垮了。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终于取得了统治地位。

工厂制度的确立,完全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在手工工场时代,工人大都同农村保持一定的联系,在劳动之暇从事耕种。机器大工业完全割断了他们同农村的联系,剥夺了他们最后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现在,他们除了出卖劳动力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

工业革命的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无产阶级的形成。因为破产的手工业者都加入了无产阶级队伍。于是社会日益分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

工业革命不但产生了工人阶级,而且也给工人阶级带来苦难。在工厂里,工人变成了机器的简单的附属品,他们跟随着机器运转,而失去了劳动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因为工作单调乏味,很不利于工人的身心健康。机器的采用,也把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卷进劳动力市场。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21.9万工人中,13岁以下的儿童占4.9万,13岁至18岁的少年占6.6万,成年妇女占6.7万,由于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由于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源源不断地流入无产者的行列,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于是工厂主竭力压低工资。1810年英国纺织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为42先令6便士,1825年下降到25先令6便士。

在工人住宅区,房屋简陋,天空浓烟密布,街道狭窄拥挤。在英国,有的工人家庭祖孙三辈人挤在一间矮小的房屋里。兰开夏有的工人家"是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条腿的圆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有两条脏床单。"

因此,工人阶级被迫起来斗争。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斗争采取了破坏机器的斗争方式,这是因为当时工人觉悟很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造成灾难的根源不是机器,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破坏机器运动最早发生在英国,当时称作"卢德运动"。

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特别是觉悟的提高,工人开始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在英国,19世纪初就出现工人的组织,并且争取到工人的结社权利。到处都出现工会组织。工会领导了1825年开始的罢工斗争。

工人阶级还用武装斗争去反击资本家的剥削。在19世纪前半期最著名的

工人起义是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

里昂是法国丝织业中心,30年代初,这里的丝织工人已有9万人之多。工人受到资本家敲骨吸髓般的榨取,劳动繁重,工资微薄。1831年11月21日,工人开始罢工,到23日就发展为武装起义,武装工人控制了全城。起义坚持到12月3日,被政府军队镇压在血泊里。1834年里昂再次爆发了工人起义,结果又失败了。

西里西亚是德国的纺织业中心,是亚麻布的主要产地。这里的纺织工人一面受到厂主的日益加重的剥削,一面还须向封建地主缴纳所谓"纺织税"。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工人们饥寒交迫,不胜其苦。1844年6月4日,西里西亚纺织业重镇——彼得尔斯瓦尼达渥的织工们在企业主茨凡奇格尔的住宅窗下唱革命歌曲,遭到军警的毒打和逮捕。此事成了织工起义的导火线。翌日,愤怒的工人起来战斗,他们的武器不过是斧头和石块,因而敌不过前来镇压的政府军队。轰轰烈烈的起义也归于失败。

在19世纪前半期的工人运动中,表现出高度觉悟、高度组织的是英国宪章运动。

二、英国宪章运动的背景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的商业和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他们志得意满,进而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1832年议会改革,他们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登上了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在议会改革运动中支持了资产阶级,但是结果一无所得,政治上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1832年议会改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他们决定掀起一个争取工人选举权的运动。这是宪章运动的政治背景。

但是,工人阶级之发动宪章运动,也是英国工人阶级本身的阶级意识提高的结果。

工人阶级自发的阶级意识

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实践,工人阶级也逐渐自发地感觉到,大工业的一切生产过程和产品实际上都是他们的血汗结晶。所以自然地意识到自己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像大工业这样的大规模生产,工人靠单个的或少数人,永远也无法取得掌握这些大企业所有权的地位,工人如果想改善自己的地位,真正成为工业生产的主人,只有走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道路。但是在政治上,工人们还没有发展到形成自觉的要求和理论。在工人阶级的一家报纸《人民之声报》上的一篇文章(1831年元旦)中,工人宣布其政纲是:"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工人们是中间和上层阶级的支持者,他

们是生产过程中的神经和灵魂,因而又是国家的神经和灵魂。”但与此同时,此文又宣布工人将和自由资产阶级采取联合行动。

整个来看,这时工人阶级的觉悟表现为下列一些特点: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大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同时又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也认识到靠个人的努力无法在大工业制度下争得应有的物质改善和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提不出独立的纲领和目的,所以就只好跟着工业资产阶级走,常为资产阶级鼓动人心的宣传所迷惑。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斗争中,工人阶级就是跟随资产阶级后面行动的。

工人思想中的新因素

工人阶级为争取议会改革而斗争的过程中,有少数工人在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已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这表现在:有的工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从而提出不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而要开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伦敦“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的机关刊物《贫民卫报》上有一篇文章,就阐述过这样一种观点。这篇文章是匿名发表的。有人认为作者可能是一个纺织工,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该报主编布朗特尔·奥布莱恩。

工人阶级意识中的第二个新的因素是关于大罢工的思想。一部分工人认识到,工厂是由工人开动并进行生产的,如果工人一齐停止工作,对资产阶级和政府将是很大的威胁。在《贫民卫报》周围的工人中,有人在1832年出版的小册子中就发挥了这样的见解。

第三个新思想因素,是一部分工人开始从信任议会、依靠议会的思想中解放了出来,认为议会也是维护统治的工具,特别是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后,工人仍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使他们大为失望。在不满、愤怒之余,越来越多的工人认为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议会身上,也不能跟着资产阶级只为争取议会选举权而奋斗,而应该找一条工人阶级的独立道路。

以上这些关于阶级斗争、大罢工、摆脱议会民主的幻想等,都是工人阶级思想中的新因素,也是工人阶级从自发的斗争逐步萌发出自觉意识的表现。

1832—1834年的立法和政治斗争

围绕着议会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对英国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阶级是一次很好的政治教育。他们在激烈的斗争实践中,思考并了解到很多问题。有些工人及其领导人,开始试图从理论上来寻找有关现实政治问题的答案。原来工人中曾存在着一种自然权利的思想,即“适当的工作,应获得适当的工资”。但是经过1832—1834年几年之间的斗争,有些工人已认识到,在现存地主、资产阶级当权的制度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有一部分工人的报刊已发表一种论点,即阶级斗争是社会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在当时的工人报纸《先锋报》、《危机周报》中就登载了论述这种思想的文章。

1832年议会改革后，由于选举权的扩大，新当选的议员中，辉格派占了多数。当权的统治阶级一心一意为本阶级谋利。虽然新选出的议会在1833年也通过了一些改善工人状况的立法，如工厂法，禁止除丝织工业之外的纺织工业雇佣9岁以下的童工，从1835年起，13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9小时，禁止童工做夜工等。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议会仍然对工人采取敌对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它对待工会的态度和它在1834年制订的济贫法上。

自从1824年废除结社法令，1825年颁布了新的结社法后，工会运动蓬勃发展。特别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工人发现自己在改革运动中受骗了，所以就回过头来，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工人自己的组织上，工会运动发展更快。1834年2月正式成立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几乎包括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工人。会员人数很快就达到了50万人。工会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只有社会中真正有用的和有智慧的阶层，才能管理国家事务"。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进行镇压，将一些工会会员逮捕。有的地方的资产阶级也配合政府，对工会会员进行迫害，并威胁工人不准参加工会。1834年在多塞特郡，有6个农业工人被控在成立工会分会的仪式上，采用了不合法的宣誓誓词而被逮捕，并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这一案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工人纷纷集会表示抗议。在伦敦的一次抗议示威中，有10万群众参加。工人们对议会改革后的新政府的反工人的真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当时英国工人把辉格派称为"虚伪、阴险和扼杀自由的辉格派"。

1834年8月议会通过的新的济贫法，对刺激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起到很大作用。新的济贫法代替了1631年通过的，以后在1722年、1782年、1795年陆续补充的旧的济贫法。旧的济贫法，使资产阶级每年大约负担700万镑巨款，用这笔巨款对贫苦无告者施以救济，这样既增加资产阶级的负担，又影响工厂的劳动力来源。所以资产阶级力图改变这种规定。新的济贫法规定设立劳动院，领救济金的人必须到劳动院参加劳动才能领取。同时劳动院中的生活水平不能高于院外任何地区。领救济金的人到了劳动院以后，父、子、夫、妻等一家人都要分开居住。劳动院中的恶劣条件和监狱差不多，工人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新济贫法的起草人和这个法案以后的主要执行者艾德温·查德威克在谈到劳动院时说道："劳动院制度意味着一切救济金要通过劳动院，它的目的要使劳动院成为一个受约束的、令人生厌的地方……它使救济金管理人员成为最严厉的工头和懒人与游手好闲的人所碰到的最吝啬的出纳员，这样，穷人除了万不得已之外，不会来请求救济"。这样的劳动院，自然受到工人强烈反对。新济贫法首先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的农业地区实行，1837年又推行到北部。因之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新济贫法的骚动。许多劳动院被捣毁，有些执行新济贫法的人的房屋被焚烧。所以在英国大部分地区，新济贫法未能推行下去。

1837 年英国又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更趋恶化,不满情绪更为增长。工人们纷纷提出要求新的议会改革,反对新济贫法,要求 10 小时工作制,争取工会权利、出版自由等。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把全国工人的运动统一起来,并制订出一个各方面都同意的统一纲领。同时,工人通过以前的斗争已经认识到,当地主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机构的时候,他们的要求是无法实现的。工人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够争取工人的解放。

这样就产生了宪章运动。

三、宪章运动的兴起·第一次请愿书

"伦敦工人协会"的成立

1836 年 6 月,一批先进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木匠洛维特的领导下,组织了"伦敦工人协会"。其宗旨是:用一切合法手段废除统治阶级的各种反动立法,争取人民自由权利,使社会一切阶级处于平等地位,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该会于 1837 年 2 月 28 日在海滨的皇冠和铁锚酒家开会,提出了一个包括 6 点要求的请愿书,当场有3 000人签名表示赞成。5 月和 6 月间,"伦敦工人协会"的领导人和议会中的一些激进的议员在一起开会,大家同意根据 6 点要求起草一个文件,由洛维特负责执笔,这就是"人民宪章"。宪章交普莱斯及其他有关人员审阅后,于 1838 年 5 月 8 日公布。

与此同时,5 月间伯明翰的"政治联盟"也发表了它的关于议会改革的国民请愿书,内容除第五点外,几乎和上述 6 点要求完全相同。

"人民宪章"的 6 点要求是:(1)凡年满 21 岁,精神健全的男子(目前因犯罪而坐牢者除外),都有选举权。(2)无记名秘密投票,以保障选民可充分地自由运用其投票权。(3)议会议员不应有财产资格的限制,以便使各选区得以选举他们最爱戴的人。(4)议员应支付薪金,以便使当选议员的人能离开原来的职务,用全部精力为国家利益服务。(5)平均分配选举区。按照各地区选民的人数分配代表名额。(6)议会每年改选一次。

另外,"人民宪章"中也包含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如取消谷物法,保障企业家"应得之利润"等。不过,"人民宪章"的核心内容是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 1776 年已为激进派卡特莱特首先提出,以后又有科伯特等人不断为之斗争。而"人民宪章"和以前的要求所不同的是:它是由工人阶级独立提出来的,同时,对工人阶级来说,这 6 条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它实现社会改革的一种手段和第一个步骤。

不过,宪章派人士中对如何去实现这些要求,却没有明确的主张,以致后来在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上,产生了分歧。

1839 年宪章派的国民公会

人民宪章公布后，立刻引起各地工人的热烈响应。很多地方的工人召开大会表示对宪章的支持。当时，由于白天工人要上班劳动，所以就改在晚上开会。开会时熊熊的火炬照红了夜空。政府对此非常恐惧，于 1838 年 12 月下令禁止夜间的火炬游行和集会。

“人民宪章”公布后，宪章主义者就筹备召开了一次国民公会，所谓“国民公会”(Convention)，是 18 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所使用过的一个名词。在法国革命之后，英国的伦敦通讯会社、1817 年的汉普顿俱乐部都曾用过这个名词，尽管当时并没有人对国民公会的含义作过清楚的解释。不过，这个名词本身使人联想起过去的革命，人们知道这将是一种比现存的议会更为民主和更能代表人民的机构。至于这个机构究竟起什么具体作用，人们的理解却不一致。

1839 年 2 月 4 日，第一届宪章派的国民公会在伦敦召开了。与会者对国民公会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它只是一种会议，它的目的是团结一切宪章派的力量去争取议会通过“人民宪章”。另一种则认为国民公会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机构，它将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还有很多宪章派只把注意力放到促成国民公会的召开，至于它以后将起什么作用，要留待以后去解决。

国民公会中宪章派的分歧

由于对斗争和策略的意见分歧，宪章派中分为几个不同集团。通常将他们分为“道义派”和“物质力量派”，这样的称呼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可以将他们分为左、右翼和中间派。

左翼，也就是一般所称的“物质力量派”。这一派人主张，如果议会不采纳人民宪章的要求，就将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包括总罢工甚至武装起义。这派的主要领导人为布朗特尔·奥布莱恩和朱利安·哈尼。实际上，奥布莱恩的政治态度有时也发生动摇。只有哈尼是真正坚定的左派。哈尼(1817—1897)出身于一个水手家庭，当过印刷工，后为记者。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靠工人阶级自己去进行斗争；主张进行武装起义。他对“伦敦工人协会”中的一些领导人甚为不满，认为他们只宣传消极的顺从，不能完成工人斗争的使命。1838 年他与洛维特分裂，退出了“伦敦工人协会”，另与奥布莱恩等共同创立了“伦敦民主协会”，吸收低薪工人参加，并出版自己的报纸。

右翼，即通常所谓的“道义派”。这派人主张用和平地向议会递交请愿书的方式来争取实施宪章，达到自己的要求。这派的主要领导人是洛维特。另外，阿特乌德等人也支持这派的要求。

中间分子。这一批人忽而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忽而又主张用暴力的方式，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奥康诺说：“可能的话我们就采取和平方式，必要的话，我们就采取暴力。”

三派在会议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领导权掌握在洛维特等人手中，所以决定采取和平请愿的方式。

宪章派内部的分歧和宪章派的社会阶级成分比较复杂有一定的关系。在参加宪章派的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以里兹为中心的北部及中部的纺织工人。第二部分是高薪的熟练工人。第三部分是大工厂的工人。以上三部分人由于在生产体系中地位不同，组织性、战斗性及政治认识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及他们的领导人，对宪章运动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也各有不同的看法。

1839 年 5 月，在国民请愿书上签名者已达 20 万人。宪章派决定将请愿书递交给议会。6 月 14 日重达 50 公斤的请愿书被放在一个用彩旗装饰起来的长担架上抬到了议会。但是 7 月 12 日议会在讨论请愿书时，以 235 票对 46 票将其否决。消息传出，国民公会讨论对策，决定在 8 月 12 日举行总罢工以示抗议。各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示威。7 月 15—17 日，伯明翰的工人占领了该城。其余许多城市，也都要求采取行动。但是宪章派内部意见不统一，而且也缺乏充分准备。7 月 22 日奥布莱恩提议取消总罢工。接着国民公会休会。8 月底复会后，各派互相指责，未作出实际决定。9 月 14 日第一届国民公会宣告自行解散。

部分物质力量派在失望之际，成立了一个秘密集团，其中有南威尔士的代表约翰·福洛斯特、约克郡的彼得·布塞、北方各郡的代表约翰·泰勒。他们决定武装起义。11 月 3 日起义在新港爆发，由福洛斯特率领的数千矿工，在雨夜中袭击新港，以营救被囚禁在新港狱中的宪章派领袖亨利·文森特。但政府事先接到了叛徒的告密，将起义队伍击溃。福洛斯特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捕。福洛斯特被判死刑，后在各地群众抗议之下，改为流放。奥康诺和奥布莱恩也被判 18 个月徒刑，另有 450 名宪章派人士被捕。

新港起义是宪章运动中唯一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起义的失败，宣告宪章运动最初阶段的结束。

四、全国宪章协会·第二次请愿书

全国宪章协会的成立

宪章派的领导人鉴于前一阶段的失败原因之一是组织涣散，所以就着手调整并加强组织。1840 年春，全国各地的宪章派组织改组工作大致完成。许多宪章派组织着手选举代表到曼彻斯特，筹备全国性的组织。7 月 24 日全国 32 个城市和地区的代表在曼彻斯特通过决议，成立“全国宪章协会”。它规定，加入这个组织者必须填写志愿书，表示赞成宪章运动的原则，领取会员证，交纳会费，并参加所在地区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可以说，“全国宪章协会”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雏形。

曼彻斯特全国宪章协会建立后，各地也按照计划纷纷成立各地方的宪章协会。至1841年2月底，约有70个城市建立起约100多个宪章协会的分会。与此同时，以前的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像斯蒂芬斯、斯特基等退出了宪章运动，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全国宪章协会的宗旨。原来宪章运动中的右翼领导人洛维特也拒绝参加全国宪章协会。

宪章派与反谷物法同盟

当宪章派的国民公会1839年在伦敦开会的时候，反谷物法同盟也在伦敦召开它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反谷物法同盟是工业资产阶级针对抬高粮价、削弱工业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的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力主取消谷物进口税的组织。它主张自由贸易的放任政策，以降低工业原料的价格，实际上也企图引诱工人群众脱离宪章运动。1840年反谷物法同盟召开了200多次群众会议，递交了763件请愿书。他们宣传说，只要废除谷物法，就可以改善群众的生活。

宪章派的全国宪章协会同反谷物法同盟展开了斗争。全国宪章协会的领导人认为："废除谷物法并不错……当我们获得了宪章之后，我们一定要废除谷物法及其他一切不合理的法律。但是如果你们放弃要求宪章的活动，而去帮助那些自由贸易者，他们可不会帮助你们去争取宪章。"他们号召工人们不要再受反谷物法同盟这些"中产阶级"的欺骗。

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与宪章派运动同时分别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宪章运动中的右翼人士曾脱离宪章运动而转到反谷物法同盟方面去，直到1846年谷物法被取消为止。

第二次请愿书(1842年)

1840—1841年，在宪章派的全国范围的抗议和营救之下，被逮捕的宪章派领袖相继获释，宪章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1842年夏，宪章协会的会员已达到48 000人左右。

1842年春，宪章派提出了第二次请愿书。这次请愿书与第一次请愿书不同，它不仅提出了政治要求，而且也提出了社会经济要求，也就是"刀子和叉子"，即饭碗问题。其中提出了人民宪章中原有的6条要求，并列举了英国现存选举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指出现在的英国议会"仅仅代表某些党派，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的贫穷、痛苦和意愿则漠不关心"，此外还揭露了英国国内贫富悬殊的情况："女王陛下每天收入和个人用款164镑17先令10便士，而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每天每人的收入则不到4便士。"同时，请愿书中还指出工人阶级待遇低下，劳动时间"超出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及工厂里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它要求："选举权的、纸币的、机器的、土地的、出版物的、交通工具的、宗教信仰的"垄断权应取消，而垄断权的取消还不能使工人摆脱穷困，要使工人摆脱穷困，还必须使人民拥有一种能制止所有垄断和压迫的权力，也就是

政权。

在第二次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有330万人,它在1842年5月被送交议会。由于请愿书有6英里之长,必须切去一段之后,才能送进议会大厅,所以送到议会的只是文件的一部分。在议会讨论这个请愿书时,大多数议员反对,结果以49票赞成287票反对而被否决。议员马考莱在发言中表示反对请愿书中关于普选权的要求时说,普选权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威胁。这种说法,和1647年在普特尼辩论会上,克伦威尔反对平等派关于普选权的理由如出一辙。罗素勋爵也反对普选权,他的理由是:"我们的社会很复杂,财产的分配很不平均,如果议会由普选产生,就可能破坏或动摇那些在维护社会完整方面最有效的制度。"

1842年大罢工

议会对第二次请愿书的否决,引起了工人激烈的抗议,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从7月底到8月初,宪章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运动的中心是曼彻斯特。8月12日曼彻斯特工会在致兰开夏劳动者的呼吁书中,号召进行斗争,并且不能仅仅为了工资,而是要争取通过宪章。在许多工厂,工人实际上成了主人。

英国政府惊慌失措,8月12日任命惠灵顿公爵指挥武装部队,准备对工人进行镇压。8月15日内务大臣詹姆斯·格雷罕姆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表示严重不安。稍后,他在下院发言时说,1842年是痛苦的和可悲的一年,是危险最大的一年。

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是宪章派领导人始料未及的。宪章派领导人在临时召集起来的曼彻斯特会议中,虽然发表宣言,宣称赞成扩大和继续目前的斗争,直到人民宪章变成法案为止,但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有效的措施。包括奥康诺在内的宪章派领导人,害怕罢工可能发展成为起义。8月27日,奥康诺在《北极星》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北部工人进一步扩大罢工。

罢工的工人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终于在1842年9月遭到政府镇压。以庇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在英格兰逮捕了大约1 500人,其中约100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服劳役。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

1842年宪章派失败之后,一连数年间宪章运动处于低潮,这一方面是由于宪章派内部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和当时的整个客观环境有关。从英国工人运动和一般政治历史来看,4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已开始向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要求发展,但是宪章派的主要领导人却仍旧未摆脱原来的激进主义路线。英国整个的社会经济形势,已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稳定时期。1846年自由贸易派取得了胜利,谷物法被取消了;1847年在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之后,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的法案。30年前欧文主义者所争取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工业革命发展时期激烈的阶级

斗争,势将被相对稳定和繁荣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缓和的活动方式所代替。

在上述的环境下,当1842年第二次请愿书被否决连同总罢工也遭到失败之后,宪章派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况,这时只有少数左派人士在哈尼和琼斯的领导下,继续主张用激烈的手段进行斗争。1845年9月,他们与侨居伦敦的外国革命者一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民主派兄弟协会",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一切力量来实现宪章派的原则。但是大多数宪章派人士则认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强使议会接受宪章派的要求,只有暂时退却,进行长时期的宣传和准备。洛维特等人因而转到教育工作方面去了,另有一些宪章派人士参加了自由贸易运动,而奥康诺则试图另寻出路。

早在1843年,奥康诺提出了一个土地计划,企图用恢复小农制度的办法来解救失业的或在业的贫穷工人的困苦。1845年4月,宪章派集会于伦敦,会上通过了奥康诺的计划,决定成立一个土地合作协会,后改称"全国土地公司"。该组织的宗旨是:购买土地,使贫穷的工人在这块土地上定居,因为工人有土地可种,是摆脱资本家剥削的最好办法。但是该组织也提醒工人:必须迅速争取议会通过宪章,因为土地协会只能解决局部现实的问题,而实现宪章却能使这个土地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根据奥康诺的计划,1846年在里奇曼沃思附近的苍鹭门建立了奥康诺村,又购置了一些土地,使宪章派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刚开始时,这个计划受到许多工人,特别是那些刚刚从小生产者转变过来的工人的拥护,1846年9月,就有6 000人购买了约1万份股票;1847年11月,又有42 000人购买了股票,土地公司筹措到8万镑资金。但是由于管理不善,终于在1848年破产。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显然是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影响,而且反映了工业革命后大批丧失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的愿望。但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奥康诺村"的居民每人有自己一份土地,除了交一部分租金给土地公司外,其余都归自己所有。而欧文在王后林所建立的共产村,理论上是每个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分配。

五、1848年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的复兴

当奥康诺醉心于建立小农制的土地计划时,宪章派中的哈尼和琼斯仍在为他们原来的主张坚持斗争。1847年英国又发生了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实际工资降低,在这种环境下,宪章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奥康诺在这一年当选为议会议员,这是宪章派唯一的一次当选,它对宪章派争取在议会通过人民宪章的活动,起到了鼓舞的作用。1847年11月20日,《北极星》报上刊登了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致英国全国工人的呼吁书,号召工

人们在新拟订的请愿书上踊跃签名。在1847年11月和12月，许多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哈尼和琼斯以及其他一些宪章派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英国选举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下院的代表只代表贵族和资产阶级，而英国有6/7的成年男子却被剥夺了选举权。

在宪章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之际，1848年春，又传来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英国的宪章派和工人群众更为振奋。在1848年春，各地举行群众大会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到4月初，几乎每天都有上百次的群众大会。在新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达550万人，超过了前两次请愿书的签名人数。

第三次请愿书的基本内容包括下列一些原则：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民是一切政权的基础，工人应享有对劳动产品的权利。在议会中没有代表而必须向政府交纳赋税，这是暴政。只有实行工人和劳动阶级代表制订的法律，才能使国家的富源和经济资料，获得最完美的发展和最合理的管理。以上这些原则，应该变为国家的法律。

1848年4月10日游行示威的失败

1848年4月4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新的“国民公会”，有36座城市的47名代表参加。会上哈尼和琼斯主张武装起义，而奥康诺则认为只能用和平请愿的方式，双方意见不一，最后决定在4月10日组织示威游行，把请愿书递交议会，如果请愿书被议会否决，国民公会就将草拟一份致维多利亚女王的陈情书，要求将议会解散，并要坚持斗争，直到宪章成为法律为止。

各地宪章派响应4月10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号召，政府对此深感惊慌，一个贵族写道：“宪章派所引起的恐怖正在增长，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严重的行动。”英国政府为了镇压示威，于4月7日发布公告，加以恫吓，同时任命79岁的“铁公爵”惠灵顿统率大批军队集中于伦敦，这支军队包括12万正规军和15万名临时警察。

4月10日早晨，伦敦全城布满了军警。10点钟，以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为首的游行队伍开始行进，到达肯宁顿公地时，人数已达数万人。但在这个紧要关头，宪章派领导人下不了决心。伦敦警察局局长警告游行队伍不准到议会去，否则就要进行镇压。奥康诺在威胁面前表示屈服，他答应将游行队伍解散，仅由委员会用三辆马车装载着请愿书，将之送交议会。游行队伍失去领导，不知所措，随之解散。

1848年以后宪章运动的衰落

4月10日的游行示威失败之后，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英国北部工业地区。当年4、5月间，在兰开夏等地几乎每天都有群众集会，英国政府加强了镇压措施。6月间进行了大逮捕，琼斯等数十名宪章派领导人被捕入狱。就在这时，法国的6月起义和德国的1848年革命遭到失败，宪章运动遂走向衰落。这时资产

阶级也展开了反攻。在经济上,工人们以前斗争取得的一些成果都被取消了。以前的一些旧制度又恢复了起来。在工厂中,不论童工或女工,都实行 15 小时工作制,并实行实物工资。在政治上,政府取消了人民举行露天集会和递交请愿书的权利,如果要递交请愿书,人数不得超过 12 人,并且禁止阅读民主派的报纸。琼斯在《寄语人民》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讲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英国"在它的殖民地,太阳永远不落,可是在英国鲜血也永远流不干;在技术上它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技术的威力却被用来代替工人,使那些被迫失业的工人忍饥挨饿,家家工厂都比兵营更残酷,比监狱更痛苦,比战场更危险。"

宪章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它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六、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

宪章派的分裂

1848 年示威失败后,宪章派内部有些人认为工人阶级在当时的英国还不足以单独充当社会的推动力量,它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奥康诺也加入了这一派。但是也有一些宪章派人士坚持工人阶级的组织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与上述温和路线发生了严重分歧。

1849 年 12 月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代表。会上温和派占了上风,在新选出的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占了多数,他们推行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遭到宪章派内部其他一些人的反对,6 个温和分子自动退出了执行委员会。他们另外组织了一个"全国宪章同盟",并宣称,他们的新方针是:"促进与各种改革流派的友好和亲密关系。"

温和派的活动,引起伦敦以及爱丁堡、兰开夏郡、约克郡等地的宪章派的不满。1850 年 5、6 月间,上述各地的宪章派举行集会对温和派进行谴责。

1850 年 7 月,琼斯刑满出狱,他仍坚持原来的激进路线,并在英格兰、苏格兰各地 50 多个城市周游,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宪章派组织而努力。1851 年 3 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的国民公会。琼斯和哈尼都参加了。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纲领,纲领在序言中说:"国民公会所保持的意见是:如果政治变革不伴随着社会变革,那么这种政治变革将毫无结果。如果宪章运动不与社会科学相结合,那么宪章运动将会彻底失败。"纲领还提出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包括实行土地国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生产合作的原则,信贷事业国有化,废除国债等。另外还提出,全体公民都有权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海陆军实行民主化,每个公民都有携带武器从事军事活动的权利等。这个纲领与以前的宪章派纲领相比,在思想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它表明,宪章运动已发展到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它的基本要求,就是通过递交请愿书,实行选举改革,然后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宪章派的新报刊和“工人议会”

为了宣传1851年通过的新纲领，琼斯等宪章派领导人着手筹办新的机关刊物。同年，在琼斯发起之下，开始出版《寄语人民》杂志，同时在全国组织了代销网。到1852年1月时，《寄语人民》的销售量已达到了3 000份，并在58个城市中行销。接着琼斯又着手筹办新的机关报纸。琼斯对报纸的作用非常重视。他在《寄语人民》的一篇文章中说："对运动来说，第一个最重要的事乃是机关报。它是交流斗争经验，与地方党组织建立联系的工具；是动员、说服、解释、辩护和教育的工具；它是基本的联系环节，前进运动的旗帜和组织工具。"事实上，1851年《寄语人民》杂志出版后，宪章派中的激进分子已把它作为宪章派的机关报，而不再相信以前的机关报《北极星》了。除了《寄语人民》之外，1852年5月，琼斯等人又出版了《人民报》。这些报刊在出版过程中，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他们不但为之写稿，而且还曾帮助过它的编辑工作。

在琼斯等人的努力下，1854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宪章派的代表会议。会议宣布自己是"工人议会"。琼斯当选为会议主席，马克思被选为名誉代表。马克思虽然未参加这次会议，但给大会送去一封信，信中说："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①"工人议会"闭幕后，本来预定在当年内再召开一次，但未能开成。同时，自1853年以来，在各地广泛开展的罢工运动，到1854年5月时，也由于缺乏经费而逐渐平息。以后虽然琼斯等人还力图把宪章运动复兴起来，但未能成功。1858年《人民报》停刊，整个宪章运动也告终结。琼斯本人也放弃了原来宪章派的纲领，而走上了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合流的道路。

从1848年到1858年的宪章运动，是宪章运动走向衰落的阶段。不过，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比以前几个阶段的发展水平更高。而且，在工人运动史上，这一阶段的宪章运动正是40年代宪章运动同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国际之间的中间环节，两者之间是通过1848—1858年的宪章运动联接起来的。

宪章运动衰落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宪章运动的衰落，除了它本身存在的一些缺点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

宪章运动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的目标是要通过实行普选制，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像这样的形式和性质的运动，只有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代才可能发展。在30年代初到50年代，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如1832年议会改革的斗争，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斗争，1847年争取10小时工作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3页。

制的斗争,1849—1852 年资产阶级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展开的反攻等。在这样的条件下,宪章运动得以号召群众广泛开展斗争,使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发展。但是自从 1848 年以后,英国社会已开始发生变化,在以后的 20 年中,英国的经济走向高涨,减少了失业,工人生活得到改善。虽然也发生了 1857 年和 1866 年两次经济危机,但持续的时间比以前短,英国很快就从危机中恢复了过来。

其次,19 世纪中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了"世界工厂",产品行销全球,在国际市场上首屈一指。同时,英国又占领了广大的殖民地,如加拿大、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到 1850 年时,英国的殖民地已达 1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1.5 亿。此时的英国已具有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即广大的殖民地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就可以从殖民地剥削来的超额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改善熟练工人的生活。同时,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引起了英国人大批向这些地区移民。据统计,1851 年英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已达335 966人。1852 年上半年 6 个月中,移民人数更达到 365 992 人。其中有很多是工人或小生产者,这样就缓解了国内的紧张局势和矛盾。

另外,宪章运动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它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变革,在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去加以实现,而工人阶级本身也没有达到足以担当实现这些任务的水平。它缺乏组织性,没有统一的政党,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工人队伍中产业工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来自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或破产农民,他们留恋过去的小生产者地位,在斗争中不够坚定,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所吸引。而他们要对付的资产阶级,却正在发展之中,而且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和经济管理才能。在 1832 年议会改革之后,工业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新老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与工人阶级为敌。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英国历史及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的独立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在宪章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英国,他们同宪章派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并研究了他们的经验,这对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发生了重要影响。宪章派的斗争也为当时英国劳动人民争取到一些胜利,如 1846 年谷物法的废除,1847 年的 10 小时工作制等。而且,由于宪章运动声势浩大,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每当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为了避免宪章运动的重演,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另外,宪章运动失败后,数以千计的运动参加者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也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当中有些人迁居到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把民主思想的种子带到了这些地方,为这些地方民主运动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第四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及理论来源

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和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时代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针对新的实际进行的巨大的理论改造和划时代的理论创新。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已进入完成阶段，大工业在生产的各个部门普遍地建立起来，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工业革命的进展也十分迅速。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大工业开始在一些生产部门中建立起来，尽管手工工场和小手工业的生产仍然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比英国、法国落后。但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促进了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在19世纪30、40年代，工业的发展也很迅速。资本主义生产在英、法、德等国的迅速发展，使它固有的生产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大约每隔10年左右就爆发一次，并波及愈来愈多的国家，到1847年发展为世界性的危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给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一个被称为体现理性、将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制度，竟显得如此狰狞，这使人们深受震动，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固有矛盾的逐渐暴露，为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可能。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创造了社会经济的前提。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创造了阶级的、政治的前提。因为它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大批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生产资料逐渐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中。这样，“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尽管自由资本主义已有了相当发展，却远远没有消除原始积累时期打下的残暴烙印，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不断加强，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愈益猛烈。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连续爆发了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工人起义、1836至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仅仅为改善生活条件反对个别资本家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为争取政治权利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同时，这也表明无产阶级不仅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阶级，而且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和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要实现社会主义只有依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既迫切地要求革命理论的指导，又为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的需要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有史以来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则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直接的理论来源。

产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反映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它的主要代表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黑格尔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对辩证法作了重要的贡献。他认为整个世界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矛盾是发展的内在根源。这种辩证法思想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辩证运动的主体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绝对精神"。他的辩证法是为论证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服务的。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他认为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不依赖任何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人的意识和思想不过是物质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但他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在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部分，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及其唯心史观，创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威廉·配第创立，经过亚当·斯密的发展，到大卫·李嘉图完成。"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①奠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是他们的主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家财富的真正来源，错误地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制定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154页。

的政治经济学。

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种种弊病进行了分析，力图找出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他们对未来的理想社会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设想。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①空想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产阶级已成为历史发展伟大动力的历史新条件下，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理论。

此外，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有机体细胞结构"学说、"能量守恒及转化"学说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发展"学说，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用阶级斗争观点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等，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理论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莱茵省是当时德国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政治生活很活跃的地区。他的父亲是个自由主义的开明律师，充满着启蒙学派的精神。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树立起为人类幸福献身的崇高理想。1835年进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他的专业是法律，但却用更多的时间学习哲学和历史。柏林大学是黑格尔学派的中心，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组织"博士俱乐部"，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1841年大学毕业，不久就取得博士学位。这时，他在哲学观点上基本是唯心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立即投身于反对封建专制和争取民主的斗争。《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马克思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姿态，猛烈地抨击了普鲁士出版法和反动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他开始为自由主义的《莱茵报》撰稿，不久就被聘为该报的主编。在编辑工作中，马克思接触到下层人民的贫苦生活，了解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产生怀疑。他在发表于《莱茵报》的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公开地为政治上、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农民进行辩护，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并指出这种贫困状况是由官僚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整个国家制度又是由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决定的。这说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明马克思已突破了黑格尔关于国家的唯心主义学说,向唯物主义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一时期,他也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问题已“具有欧洲的意义”,“应该把它当做目前的重要问题”,进行“理论论证”。①

1843 年,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进行迫害,马克思被迫离职,迁居到克罗茨纳赫小镇。他带着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遇到的许多实际和理论问题,特别是国家问题,在书斋里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中,他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倒转过来,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的立场。1843 年 10 月,马克思为筹办《德法年鉴》杂志迁居巴黎。在那里,他直接接触到具有革命传统的法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这对马克思世界观的进一步转变起了重大作用。1844 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标志着他已最终地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了。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了政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的思想。马克思虽然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与作用,但又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一切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他进一步解决了由什么力量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第一次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作了精辟的论述。文章还指出:先进理论是群众斗争的精神武器,群众是能够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只有把群众的斗争和理论的批判结合起来,才能变革旧的制度。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就对经济问题发生了兴趣。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他进一步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恩格斯寄给《德法年鉴》的文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又给了他一个直接的启示。从 1844 年初,马克思开始研究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他综合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写下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此文中,马克思从“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脱离了劳动者,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者相对立。他们生产的财富越多就越贫穷,劳动成为劳动者的一种自我折磨,资本家则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产品,从而造成劳动者同资本家的对立的发展。异化劳动的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理论分析的萌芽形式。马克思还试图对社会作出全面的考察,他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31、130、134 页。

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这个表述已经包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论证,将共产主义运动置于经济的历史运动的基础之上,这就使社会主义开始具有了科学性质。因此,《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最初尝试,但它还是一部不很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 1820 年 11 月 28 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一个工厂主家庭。1837 年,由于父亲的坚持,他没有读完中学,就被送到巴门的商业营业所当办事员,一年后又被送到不来梅的一家贸易公司任职。但是,恩格斯对经商毫无兴趣,他利用空闲时间自修,如饥似渴地阅读论述宗教、哲学和政治问题的进步著作。他还仔细地观察了当地劳动者的生活,对他们的悲惨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同情。通过这些活动,恩格斯清算了自己从小受到的宗教教育,增强了对专制制度的憎恶,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841 年他到柏林服兵役,同时利用公余时间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在柏林期间,恩格斯曾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撰文驳斥普鲁士专制主义的代言人“基督教哲学家”谢林。1842 年他受到费尔巴哈著作的影响,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转向唯物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入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么恩格斯则是从研究英国社会状况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完成这一转变的。1842 年 11 月,恩格斯到英国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当职员。赴英途中,他曾与马克思作过短暂的初次会面。当时,处于工业革命完成阶段的英国刚刚经历了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冲击。资本主义生产的庞大规模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都使恩格斯感到惊讶。他抛弃了社交活动与宴会,把空闲时间用来调查和研究,经常深入工人住宅区,观察工人的贫困状况。恩格斯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宪章派活动家以及流亡英国的德国“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建立了联系,经常在晚上参加他们的一些公开的集会和讨论。同时,他系统地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无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能够为自己打通一条走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②

1843 年 11 月,恩格斯发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根据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传播的情况,指出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共产主义“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1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79 页。

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①这说明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接着,他为《德法年鉴》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指出竞争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它不断地引起危机,使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只有"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②在《德法年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他批判了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鼓吹的"崇拜英雄"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无产阶级是从事伟大民族事业的唯一有前途的阶级。这些著作表明恩格斯也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创立

1844 年 8 月,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回国途中,在巴黎第二次会见马克思。他们发现彼此在一切理论方面完全一致,从此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开始了共同系统地制定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理论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德国哲学思想体系"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来进行的。1844 年 9—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恩格斯回到巴门后,于 1845 年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同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1846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再次合作,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 年,马克思又写了《哲学的贫困》,并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全面地制定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初步创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1.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通过对一系列具体的哲学、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分析,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得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科学结论,"接近了"关于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在书中还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原理,论证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认识的基础、标准和目的。马克思把实践范畴作为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础,从而与以往的哲学划清了界线。恩格斯称这个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全面地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概括地说明:"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75、621 页。

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①作者还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生产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等等；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指出两者间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源；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自然历史过程，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2. 剩余价值学说的萌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他们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取得的进展，又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行变革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经过深入研究，马克思开始从劳动价值入手，探索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1844 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对劳动价值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在《神圣家族》中，他已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两年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开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初步原理，揭露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的剥削实质。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原理。他通过具体的事例证明，资本家所以能获得利润，是因为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了工人以工资形式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在这里，马克思还没有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更没有明确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对于确立剩余价值学说具有关键意义的基本概念。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两部著作证明，马克思当时"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②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思想，后来经过马克思长达 20 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完整的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

3. 社会主义从空想向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是"两个伟大的发现"。"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③《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已全面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也以萌芽的状态出现了。这就使社会主义在从空想向科学发展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0 页。

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还以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论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正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代替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一样，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也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历史的这种进步趋势，决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通过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解决。他们又提出：资本主义还造成了实现这一革命的社会力量，即革命的无产阶级。从这个阶级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共产主义学说，正是这个革命阶级的地位、利益和作用的理论表述。

马克思、恩格斯还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了科学预见，揭示了人类社会这一更高形态的基本特征。他们将共产主义称之为最高的、不受单个国家所限制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形式，称之为没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和旧式分工，因而使个人体力和智力都能得到真正全面的、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这种联合“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创立革命理论的同时，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确信，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仅需要革命理论指导，而且需要有一个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为了传播革命理论，他们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讯委员会很快就同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形成一个广泛的通讯网，彼此交换情报，讨论各国的共产主义宣传问题。为了建立革命的政党，他们十分重视对“正义者同盟”的争取。因为这个由德国的流亡者和工人建立的组织，在当时已发展成为有法、英、波兰和瑞士等国工人参加的国际性组织。但是，同盟的指导思想十分混乱，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对它的影响非常严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同当时流行的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蒲鲁东思想展开了斗争，使同盟中愈来愈多的成员和领导者接受了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并决定对同盟进行改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1月接受邀请参加了“正义者同盟”。接着，同盟中央发出“应该实行全面改组”的通告，宣布即将召开同盟的改组大会。

1847年6月，恩格斯出席在伦敦召开的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大会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实际上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由恩格斯和沃尔弗起草的新章程草案。这个章程草案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并规定同盟的目的是:"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①。

1847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同盟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都出席了。大会讨论并批准了同盟的新章程。这个章程将草案中关于同盟目的的条文修改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②大会还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宣言,即"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③这次大会表明,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具有国际性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已经建成了。

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着手完成起草宣言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写过两个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执笔写成《共产党宣言》,由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付印出版,于 1848 年 2 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④

《宣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⑤

《宣言》以这个基本思想为指导,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虽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1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7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8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2 页。

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已不再能适应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社会化的大生产必然要求消灭私有制,代之以与它相适应的公有制。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巨大的生产力,而且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个武器的人——现代工人阶级。现代工人阶级处于被奴役的最下层,又是大工业的产物,因而是现代社会中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肩负着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宣言》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

《宣言》作为党纲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目的和策略原则。《宣言》指出,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它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它的策略原则是,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但是它"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②

《宣言》还驳斥了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诬蔑,批判了形形色色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

《宣言》最后满怀信心地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③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完成。列宁在 1895 年指出:"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④

二、第一国际

五六十年代的工人运动

1848 年革命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的工业热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它的"黄金时代"。这时,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取得世界的工业霸权。1860 年,它的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 36%,英国成为向世界各地供应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4 页。

② 同上,第 306 页。

③ 同上,第 307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 页。

业品的“世界工厂”。法国工业革命的进展也比较迅速,在许多工矿企业中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被广泛利用,工业生产几乎增加了两倍。德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虽晚,但在五六十年代迅猛发展,在 20 年中工业生产大约翻了两番。美国的工业革命在北部地区已于 50 年代完成,内战结束后又逐渐在南部及其他地区兴起,仅 20 年工业生产就增加了将近 3 倍。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生产开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也随之形成。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已完全确立并开始形成为一个世界体系。

1848 年以后资本主义虽然进入经济繁荣的年代,但却摆脱不了它的基本矛盾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857 年,爆发了新的危机,它首先出现于英国,接着就蔓延到欧洲大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重新高涨起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到 19 世纪 60 年代,欧洲产业工人已达 874 万人,此外还有手工业工人 1 123.5 万人。在五六十年代,工业的发展虽然是史无前例的,但工人群众的贫困却没有相应的减轻。从 1857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又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这就引起了各国工人的反抗。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日益提高。1859 年,伦敦的建筑工人举行罢工,打破了宪章运动失败以来英国工人运动的长期沉寂。在这次罢工胜利的基础上,出现了各行业工人的联合组织——工联伦敦理事会。法国的工人运动从 60 年代初开始也重新活跃起来。在 1863 年立法团选举时,工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这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斗争。他们在 1864 年又迫使第二帝国取消了禁止工人结社的勒夏普利埃法。德国工人也争得建立工人组织的权利,于 1863 年 5 月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863 年初也建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形成的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日益带有国际性的特点。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当资产阶级采用从国外招雇廉价劳动力的办法来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时,工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和加强国际团结的必要性。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欧、美和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不仅激起了各国工人的深切同情,也使他们的国际团结思想进一步增强。1862 年夏伦敦举行世界博览会,300 多名法国工人代表前往参加,受到英国工会联合会的热情接待,双方就国际团结问题进行了商谈。1863 年 1 月 22 日,在伦敦召开支援波兰起义的群众大会,英国工联领袖奥哲尔代表工联写了告法国工人书,呼吁加强国际团结和建立国际工人组织,并邀请法国工人组织派代表到伦敦参加一次国际性会议,声援波兰人民的斗争。法国工人广泛地讨论了英国工人的呼吁书,热烈支持英国工人的倡议。总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日益增强,成为这个时期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为建立国际无产阶

级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准备了条件。

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居领导地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派别严重影响着工人运动。如英国的工联主义、德国的拉萨尔派以及流传于法国、西班牙、瑞士、比利时等国的蒲鲁东派和后来的巴枯宁派等等。为了适应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和团结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五六十年代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马克思在贫病交迫的困难条件下，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写出了一系列光辉著作。同时，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为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作出伟大贡献。1859年马克思把研究的初步成果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部书中，《资本论》的基本构思已大体形成。从1861年起，马克思开始撰写《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还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揭露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时，也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骨干作了巨大努力。他们竭尽全力在道义上、物质上帮助各国的工人领袖，并从理论上培养、提高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和英国宪章派左翼领袖哈尼、琼斯等密切联系，指导他们办好《人民报》；帮助德国流亡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等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干部问题上为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准备了条件。

第一国际的成立

1864年9月，在伦敦圣马丁教堂召开了声援波兰人民起义的国际性工人大会，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近2 000名工人代表参加。马克思接受大会筹备组织的盛情邀请，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根据法国工人代表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决议，选出21人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1866年底改称总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委员。10月初，临时中央委员举行会议，决定这个组织的名称为“国际工人协会”，并选出主席、总书记、财务委员及各国通讯书记，组成常务委员会。英国工联领导人奥哲尔当选为主席，马克思任德国通讯书记。但实际上，马克思一直被公认为国际的领袖，几乎国际所有的纲领性文件和决议草案，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或体现了他的思想。恩格斯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没有直接参加国际的领导，但他同马克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10月初举行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还选举了负责起草国际宣言和章程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也当选为委员。起草委员会中的意大利工人代表沃尔夫、法国工人代表律伯和英国工人代表韦斯顿先后提出了他们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草案。但内容杂乱无章，十分冗长，而且理论见解也模糊不清。马克思重新改写了《成立宣言》，并拟定一个新的《共同章程》，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在起草委员会顺利通过，11月1日又被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马克思起草这两份文件时,充分考虑到当时工人运动的水平和复杂情况,认为宣言的内容既要保持革命原则的纯洁性,又能争取在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工联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群众,这样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马克思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①他在《成立宣言》中肯定了工人阶级争取当前利益斗争的必要性,说明英国工人阶级争得10小时工作日立法是一次重大胜利,合作社运动也是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因为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② 为了取得解放斗争的成功,工人阶级不能只靠人数决定胜负,而“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不能“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③也就是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政党。宣言还指出:只有加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样,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作为结束。

《共同章程》阐明了国际的目的、任务、组织原则和组织结构。章程首先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④国际工人协会建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⑤章程规定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各支部或联合会选派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听取总委员会的报告,选举总委员会。在大会休会期间,由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指导国际各地组织和支部的活动。

《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为国际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表明国际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群众性革命组织。

促进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斗争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就积极在各国建立支部。在法国,1865年成立了国际的第一个支部——巴黎支部,全部会员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其领导人是托伦。随后,其他一些城市,如里昂、马赛、鲁昂、圣太田、卡恩等地也成立了国际的支部。到1867年,法国已有26个国际支部。在英国,从1865年起,一些工联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

③ 同上,第606~607页。

④ 同上,第609页。

⑤ 同上,第610页。

织和工人群众便陆续参加了国际。到同年9月下旬,国际已有1.4万名英国工人会员。此后,全国各地的一些工联组织又相继参加了国际,到1868年仅伦敦就大约有50个加入国际的工联。因此,英国的工联成为国际的主要群众基础和支柱。但是,英国工联的全国领导机构——伦敦工联理事会,为保持其独立性,拒绝将自己的名称改为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而只是宣布与国际"合作"。除工联外,在英国参加国际的还有争取国会选举改革的工人组织"全国改革同盟"以及一些合作团体。在德国,由于普鲁士和其他一些邦国禁止任何团体与国外其他组织发生联系,先进的工人只能以个人资格加入国际。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传播国际思想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在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也先后成立了一些国际的支部。

国际不仅致力于在各国建立支部,而且努力把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支持和参加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及一切进步运动。马克思强调要"实现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并且指出:"一般说来,这一问题包括国际协会的全部活动"。①

在第一国际时期,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基本斗争形式。对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人的罢工,国际都曾给予声援和支持,与资产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866年春,伦敦和爱丁堡的制衣工人举行大罢工时,资本家从德国、丹麦招募工人破坏罢工。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便呼吁德国工人拒绝前往,并劝说已到英国的外国工人回国,或帮助他们另找工作,对保证罢工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1866年10月,英国编筐工人举行罢工,资本家从荷兰、比利时招募工人进行破坏,国际又劝说并帮助这些人返回自己的国家。1867年2月,因为资本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巴黎3 000名铜器工人举行罢工。国际当即发表公开信,号召英国工人给予经济援助,英国许多工联组织慷慨地向法国工人提供贷款和捐款,使罢工得以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1867年3月,当伦敦火车司机罢工时,总委员会呼吁法国司机以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名义,拒绝英国资本家的招募,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使英国火车司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1868年4月,日内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国际日内瓦委员会组织5 000人的声援集会,总委员会也发动募捐给予经济支援,使罢工取得胜利。此外,总委员会对1868—1869年英国工人的罢工、1868年11月到1869年春瑞士巴塞尔织带工人的罢工、1868年12月法国棉纺织工人的罢工等,也都给予了声援与支持。由于得到国际的声援与支持,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从而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信心,增强了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的威望也日益提高。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4页。

总委员会也十分关心各国的民主运动，积极支持各国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60年代英国展开了争取选举法改革的群众运动。马克思认为：这一运动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它的胜利将进一步扫清封建残余，为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无产阶级在运动中也将进一步团结起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地位。因此，他和总委员会不但支持国际会员参加这个运动，而且也积极组织工人参加斗争。马克思还为无产阶级确定了在运动中应采取的策略：无产阶级在运动中应作为独立的阶级来行动，决不能充当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一定要提出普选权的要求。如果激进资产阶级公开承认无产阶级的普选权要求，就可以和他们建立同盟，但要不断揭露他们的妥协和叛卖。在国际会员的推动下，1865年建立了"全国改革同盟"，委员中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总委员会的代表(主要是英国工联领袖)各占一半。该同盟领导了群众性的选举改革运动，促进了1867年国会改革的进行。

第一国际成立后，对民族解放运动也非常重视。总委员会对1863—1864年波兰民族起义给予大力支持，曾于1864年、1865年、1866年三次发表声援波兰的决议，并从1865年起连续三年与波兰流亡者共同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在1867年1月22日的纪念会上，马克思亲自发表演说，痛斥了压迫波兰的各国政府，并提出一项决议案："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总委员会也很重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1867年在马克思主持下，总委员会对英国政府判处4名芬尼党成员死刑一事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坚决要求赦免爱尔兰革命者。

在国际内部反对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当第一国际建立时，马克思主义还只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在工人运动中尚未占统治地位。而"成立国际是为了用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①这就决定了在第一国际的内部，必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这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展开的。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或通过交换意见来实现的。

在国际活动的前期(1864—1868)，主要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蒲鲁东虽然于1865年1月逝世，但在国际前期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小资产阶级比较多的国家仍非常流行。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多数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发起人，在国际内也有很大的影响。蒲鲁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19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高涨时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页。

在竞争中被排挤而面临破产威胁的小资产阶级普遍幻想建立一个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从这种愿望出发,蒲鲁东提出一个建立所谓“自由”社会的改革方案。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贫富不均,是违反平等原则的,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制,是违反独立的。他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和建立一个综合“平等”和“独立”的、超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即所谓“自由”社会。它在社会经济方面是以“个人领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的社会。所谓“个人领有”,就是小私有制。蒲鲁东主张由“国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使无产者得以购置生产工具,成为小私有者,并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来代替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所谓“互助制”,就是把小生产者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作坊和小工厂,从而实现直接的、公平的产品交换。他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保证小生产者的独立和平等。然后,小生产者再用它的财力逐步购买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废除资本,就可以实现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美好世界。“自由”社会在政治方面,是一个“各人只管自己”、“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蒲鲁东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既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也反对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甚至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与服从”。同时,他还反对社会革命和任何政治斗争,反对罢工和工人成立工会,甚至反对妇女参加生产。

国际成立后,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拒绝接受马克思制定的基本路线,企图把他们的理论强加给国际,成为国际前期的主要危险,因而遭到了马克思和国际许多代表的批判。1866 年 9 月举行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在合作制、工会、罢工以及妇女劳动等问题上展开争论,蒲鲁东主义者的错误论点为多数代表所批驳。大会在《关于合作制》的决议中指出:合作运动只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之一,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在工会和罢工问题上,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成立工会组织可以加强工人的团结,以对抗资本家的进攻;工人举行罢工可以限制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工会和罢工都是必要的。但决议也指出:不要夸大工会的作用和罢工的意义,工会也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目的之内,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群众的解放。关于妇女劳动问题,大会承认妇女加入工业生产是进步现象,它增强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力量,同时也可以使妇女摆脱家庭事务圈子。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争取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日内瓦大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按照章程每年都举行代表大会。在国际前期召开的代表大会还有 1867 年瑞士洛桑大会、1868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会。在洛桑大会上,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争论特别激烈。大会提出了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交通邮电事业国有化的主张,但蒲鲁东主义者坚持要保存小土地私有制。

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就此作出最后的决议。在布鲁塞尔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又提出保存小土地所有制的主张，重新挑起争论。会前，马克思曾向总委员会作了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能保留小农所有制，因为它阻碍机器的采用和大生产的发展，所以实行土地公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马克思的观点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得到支持。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经济的发展将使土地公有成为社会的必需，国家应将土地、矿山和铁路交通交给社会共同使用。蒲鲁东主义者在大会上遭到彻底失败，并于会后开始发生分化。它的左翼（瓦尔兰等）逐渐倾向马克思主义，自称“集体主义者”。其右翼则日益削弱，他们在第一国际内的势力从此一蹶不振。

工联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也是总委员会直接依靠的惟一群众性组织，因此在国际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工联的领导人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是支持马克思的，但他们坚持工联主义，夸大工会的作用而忽视政治斗争，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而只热衷于争取所谓“公平工资”。马克思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和教育。1866 年 6 月，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肯定了成立工会及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性，但也指出不应夸大这种斗争的作用，因为它还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只是对它的结果进行斗争，从而无法根绝雇佣劳动制度。因此，必须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批判了工联领袖在爱尔兰问题上采取的沙文主义立场。

在第一国际的后期（1868—1876），在国际内部出现了以巴枯宁为首的“阴谋”集团。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又领导了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米·亚·巴枯宁（1814—1876）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原来是沙皇的军官，后来流亡到国外，参加了 1848 年德国革命。被捕后押回俄国，遭到长期监禁和流放。1861 年，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日本，经美国来到西欧。从 1865 年起巴枯宁侨居意大利，1867 年又迁往瑞士，在此期间他逐渐形成一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巴枯宁和蒲鲁东一样，也反对一切国家和否认任何权威，认为“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才是理想的、自由的社会。同时，他也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反对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巴枯宁主张用暴力立即消灭国家。他认为“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消灭国家之后资本便会自行消亡，劳动人民也就可以立刻得到解放”。但他鼓吹的暴力革命，不是依靠无产阶级进行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采取密谋策略，利用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进行的“暴动”，并幻想在 24 小时之间便一举消灭国家，“摧毁一切”，实现所谓“社会清算”。此外，他还鼓吹只要废除继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各阶级平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反映了丧失任何得救希望的、已经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情绪。它在经济比较落后的西欧国

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及法国的非工业区影响最大，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破产的小资产者极多。

巴枯宁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危害，不仅在于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还在于他所策划的分裂国际组织的阴谋活动。1868 年秋，巴枯宁组织了宗派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他要求总委员会允许这个同盟的整个组织加入国际。遭到拒绝后，他表面上接受总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宣布解散同盟，于 1869 年加入国际，但在暗地里却原封不动地把这个组织保存下来。巴枯宁指望依靠它在即将召开的巴塞尔大会上取得多数，然后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的手中。但他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遭到失败。1869 年巴塞尔大会的选举结果，巴枯宁分子没有一人被选入总委员会。

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分子在继承权问题上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巴枯宁分子认为，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因此，要求大会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写了《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指出继承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存社会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它是私有制的结果而不是起因。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在继承权方面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但它的伟大目标在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大会进行表决时，巴枯宁分子的提案因赞成票未超过半数，而没有被大会通过。这样，巴枯宁分子篡夺国际领导权和篡改国际宗旨的阴谋，均遭到失败。

第一国际的解散·历史意义

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巴黎公社。为了声援巴黎的无产阶级，国际总委员会曾多次派代表参加英国共和派召开的群众大会，促使他们通过支援巴黎公社革命的决议。总委员会还专门派委员赛拉叶到巴黎，与当地的国际组织及公社的领导人联系。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革命中也起了非常卓越的作用。公社被镇压后两天，总委员会又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法兰西内战》，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歌颂了巴黎工人的丰功伟绩，揭露了敌人的凶残。因此，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国际也进行了疯狂的迫害。法国政府在 1871 年 6 月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通知，号召共同“讨伐”第一国际；同年法国政府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对加入国际的人剥夺其公民权并处以监禁和罚款。德国政府于 1871 年 5 月 29 日以“叛国”罪判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年监禁。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也都对国际的支部和会员进行了迫害。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内部也有许多人背叛了国际。英国工联领袖、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等人宣布退出总委员会；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等人则公开投到反动政府的怀抱。总委员会谴责了他们的背叛行为，并把他们开除出国际。

巴枯宁分子也乘机加紧了分裂国际的活动。巴枯宁本人一面攻击公社革命是“犯罪行为”，是“蠢事”，一面企图利用他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来

取代国际。他还把瑞士的汝拉联合会拉过去、作为反对国际的基地,并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收罗信徒,分裂当地的国际支部、成立巴枯宁的宗派组织。这就使国际的处境更加困难。

为了制定巴黎公社失败后无产阶级的行动路线,粉碎巴枯宁分子的分裂阴谋,国际于1871年9月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强调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与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社会革命和消灭阶级,必须"组织成为政党"。会上还指出了工人与农民建立联盟的任务。会议也讨论了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问题,揭露了同盟的分裂活动。

巴枯宁分子拒绝出席伦敦会议,于同年11月在瑞士洛桑维耳耶召开宗派性的"代表大会",到会仅16人。他们公开反对伦敦会议的决议,攻击总委员会滥用职权;要求"支部自治"和"自由联合"。为了回击巴枯宁派的进攻,马克思、恩格斯于1872年春写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揭露了这个阴谋集团的分裂活动和两面派手法。1872年9月,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在彻底揭露巴枯宁派的阴谋活动后,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决定将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美国。总委员会迁到纽约以后,左尔格当选为书记,但因无法与欧洲劳动者保持联系,实际上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宣告解散。

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立了伟大的功勋。首先,它用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教育了各国无产阶级,使国际主义深入人心。其次,在国际内部斗争中,通过批判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错误思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最后,它推动了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并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骨干,为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列宁说:"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留下了深远的影响。"①

三、巴黎公社

第二帝国的危机及其崩溃

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经济上的繁荣,使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一度比较稳固。但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帝国面临严重的挑战,不仅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日益增强,资产阶级也起来反对第二帝国了。1866年至1867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

---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盾，终于使帝国在60年代末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在1848年6月起义失败后，遭到严重摧残的法国无产阶级，进入60年代以后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日益成长壮大。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产业工人的队伍扩大了，到60年代末，法国已有300多万工人。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人的货币工资虽然有所提高，但因物价和生活费用提高得更多，实际工资反而下降了，他们的生活极为贫困。工人的工作日也很长，到1860年仍有许多企业实行12小时工作日。在帝国后期，工人运动重新高涨，他们不仅进行经济斗争，而且积极开展政治斗争。1862年，巴黎印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在1864年举行立法团补选时，巴黎工人发表"六十人宣言"，宣布工人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工人只有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团，才能干预国家政策。在这一年，巴黎工人还利用勒夏普利埃法的废除，开始组织工会，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1865年，在法国成立了国际的第一个支部——巴黎支部，随后在一些其他城市，如马赛、里昂、鲁昂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国际的支部。随着国际支部的成立，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工人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工人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无产阶级开始成为帝国统治的重大威胁。

在第二帝国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帝国的压迫，处于无权的地位。进入60年代以后，他们又在大资本的排挤下纷纷破产，对帝国的不满日益加深。在1848年曾参与镇压六月工人起义的小资产阶级，开始向无产阶级靠拢，逐渐地革命化了。新雅各宾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他们继承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主张推翻第二帝国的反动统治，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

在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虽然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但在经济上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从而使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成为帝国的主要社会支柱。但1860年法国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新商约，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关税率，使英国的商品大量涌入，严重损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三世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又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出现了庞大的赤字，从而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资产阶级也起来反对第二帝国了。60年代初，在法国出现了一个称为"自由联盟"的反对党。它的成员既有奥尔良派的旧权贵，也有从事自由职业的年轻共和派。他们要求选举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并主张建立真正的议会制度，成立向议会负责的内阁。在1863年的选举中，"自由联盟"获得200万张选票，32个议席，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1866年至1867年爆发了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法国是这次危机受害最大的国家之一，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普遍锐减，股票行市一落千丈，大批企业和工厂破产。这次危机持续了两年多，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各次危机。它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盾，促进了反政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在经济危机时期，亚眠、马赛、鲁贝等城市的工人掀起巨大的罢工浪潮。1869—1870年，里卡玛尔矿工和克勒佐制炮厂工人的罢工非常激烈，工人同政府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时，工人群众的组织职工会、合作社、互助会等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869年，巴黎的40多个工人团体统一为"工会联合会"，并与国际的支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际在法国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了。到1870年春，法国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建立了国际的支部，国际会员达20万人左右，在巴黎、里昂、鲁昂和马赛还成立了4个国际支部联合会。起初，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人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很快便从中分化出以瓦尔兰和弗兰克尔为代表的左派。到60年代末，他们已掌握了国际巴黎组织的领导权。在左派的领导下，国际支部在工人中间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1869年，一个资产阶级政论家担忧地说：工人中"十个有九个是社会主义者或准备作社会主义者的人"。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讨论政治斗争和革命任务问题，提出建立公社政权的要求，积极准备迎接新的革命的到来。

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也加强了。参加了"自由联盟"的奥尔良分子梯也尔指责政府："种种错误无一不犯"。资产阶级共和派通过报刊积极开展反对第二帝国的斗争，公开要求推翻帝国的统治，在法国重建共和制。1868年，它的著名领袖列昂·甘必大在为一名受政府迫害的共和派记者辩护时，在法庭上无情地谴责了第二帝国，指出它的起源就是犯罪，它的行为就是残暴，并且预言它将很快地走向灭亡。

1870年1月10日，共和派记者奈尔被拿破仑三世的弟弟庇尔·波拿巴枪杀。这一暴行激起了巴黎人民的强烈革命情绪。共和派的一家报纸公开发出革命的呼吁："法国受这些强盗（指波拿巴及其一家）血手的摆布已经18年了。法国人民，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为了抗议皇室的暴行，巴黎人民在1月12日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游行大示威。工人高呼"打倒波拿巴！""共和万岁！"等口号。这一事件集中地反映了法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它表明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已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中。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拿破仑三世企图用对外战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皇后欧仁妮就说："如果没有战争，我儿将不能做皇帝了。"拿破仑三世选择的战争目标是普鲁士，因为他担心德国成为强大、统一的国家，同法国争夺欧洲的霸权。当时南德的4个邦尚处于北德意志联邦之外，因而拿破仑三世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阻挠普鲁士统一德国。普鲁士也想通过一场战争打败法国，从而完成德国的统一，并夺取法国的重要矿区阿尔萨斯和洛林。

1870年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由于战争是法国挑起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德国的统一，因此这场战争在法国方面是侵略性的，在德国方面是防御性的。战争开始后，法国因士气低落，指挥混乱，连吃败仗，暴露了第二帝国政府的

腐朽无能。8月中旬,法军主力被普军分割包围。由巴赞元帅率领的一支军队被围困在北部要塞麦茨,由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另一支军队被包围在与比利时接壤的色当要塞。在9月1日的色当决战中,法军大败,宣布投降。9月2日,拿破仑三世连同在色当的法国官兵全部做了俘虏。色当的失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

9月3日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4日就在巴黎爆发了革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拥入波旁宫立法团会议厅,要求废除帝制,恢复共和。接着,共和派议员甘必大在市政厅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且建立了临时政府。政府中大多是资产阶级政客,奥尔良派保皇党人特罗胥将军任新政府首脑,资产阶级共和派儒尔·法弗尔任外交部长,甘必大任内务部长。无产阶级虽然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因组织上还很脆弱,他们的领袖又多半被囚禁在帝国的监狱中,因而使资产阶级乘机独占了政权。

3月18日起义和公社的诞生

色当战役后,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很快就占领了法国整个东北部,并向巴黎推进。这时,普法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德意志统一的障碍已经消失。但普鲁士却继续进行掠夺法兰西人民的战争,企图侵占法国的领土。这样,战争在法国方面就转为正义的防御性战争,在德国方面则转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在人民群众坚决要求抗击普鲁士侵略的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声明要抗战到底,并自称为“国防政府”。但事实证明,它实际上是个卖国政府。还在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晚上,“国防政府”首脑特罗胥就对他的同僚说:“目前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挡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事。”外交部长法弗尔在给内政部长甘必大的信中供认,他要“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因为,当时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但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国防政府”对工人阶级是十分恐惧的,它担心武装了的工人阶级在战胜普鲁士侵略者之后,就会掉转枪口来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因此,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由于它采取了投降政策,普鲁士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顺利地向法国纵深推进,于9月19日包围了巴黎。

9月4日革命后,巴黎无产阶级表现了极大的抗战热情。他们强烈要求“国防政府”普遍武装人民,抗击普鲁士侵略者。在群众压力下,政府被迫同意除原有国民自卫军60个营以外,再建60个新营。巴黎工人冲破了政府的规定,到9月30日共建立了194个新营,约30万巴黎工人和小资产者被武装起来了。新建的无产者营是抗击普鲁士侵略和实现巴黎公社革命的主力军。巴黎人民的组织程度也迅速提高。早在9月5日,巴黎20个区就分别选出本区的监察委员

会。9月11日，各区的监察委员会又共同选出一个领导机构——巴黎20区国防共和中央委员会（简称"20区中央委员会"）。于是在巴黎出现了一个和资产阶级政府相对峙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它成为巴黎人民斗争的领导核心。在20区中央委员会于9月17日公布的纲领中，提出了关于治安、粮食和防务等问题的主张，得到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

国防政府害怕武装起来的巴黎人民，加快了投降活动的步伐。10月27日，被普军包围在麦茨的17万法军投降。消息传来后，巴黎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卖国政府，才能拯救法国。10月31日，根据20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巴黎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但由于缺乏准备和统一领导，这次起义失败了。1871年1月22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结果又失败了。此后不久，20区中央委员会就与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共同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推翻政府的寡头政治和工业贵族"，让工人参加政府。

面对人民革命的威胁，资产阶级加紧卖国活动。1月28日，"国防政府"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解除法国正规军的武器，立即缴付2亿法郎赔款，并限期召开国民议会，以批准德国提出的和约草案。1871年2月8日国民议会召开，选举梯也尔为新政府首脑，"国防政府"解散。2月26日梯也尔在凡尔赛同德国签订了和约草案，3月1日国民议会正式批准。这一卖国条约规定，法国要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军继续占领法国6个北方省份。

在梯也尔政府加紧卖国活动的同时，巴黎无产阶级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斗争。1871年2月15日，3 000名国民自卫军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并选出由20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3月15日，正式建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第一国际会员瓦尔兰、阿西、阿尔诺等当选为中央委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取代20区中央委员会成为巴黎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心，实际上它是一个和梯也尔政府相对峙的工人阶级政权。马克思指出："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①

梯也尔政府把充满革命情绪的巴黎无产阶级视为心腹之患，当和约被国民议会批准从而正式结束了普法战争后，便全力投入了发动内战的准备。梯也尔政府开始向巴黎调兵遣将。在和约草案签订前，巴黎仅有政府军1.2万人，宪兵3 000人。3月8日至17日，梯也尔在德国政府支持下，从外省挑选1.5万至2万人调入巴黎。德国政府还准备释放战俘，以加强梯也尔政府的实力。一切准备就绪后，梯也尔政府于3月17日在巴黎召开会议，通过了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强行解除工人武装，并逮捕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3月18日凌晨,政府军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很快便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的停炮场。该区的妇女发现政府军企图拖走大炮后,立即敲响警钟。广大群众和国民自卫军兵士闻警迅速赶来,包围了政府军。许多政府军士兵转到了巴黎工人方面,并逮捕了一些反动军官。梯也尔解除巴黎武装的阴谋破产了。

偷袭蒙马特尔高地,是梯也尔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开始。巴黎无产阶级决定用武装起义回答梯也尔的挑战。3月18日上午11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命令瓦尔兰率领部队开向蒙马特尔。同时,在伯利维尔等区的工人武装击退了政府军,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午后2时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扩大起义。起义者开始向巴黎市中心推进,很快便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市政厅和其他政府机关。梯也尔见大势已去,狼狈逃往凡尔赛。政府的其他官吏和警察、宪兵也竞相出逃。资产阶级政府在巴黎的统治土崩瓦解,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为临时革命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取得了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胜利。

对德战争的失败及围城时期的痛苦,无产阶级的失业与小资产阶级的破产,群众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卖国行为的不满,工人对新的社会制度的朦胧向往——这一切便是推动巴黎人民举行革命的原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次革命具有很大的自发性,谁也未曾有意识、有计划地做准备。革命的胜利也是由偶然的条件促成的,即巴黎的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是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

3月18日革命胜利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本应当立即向凡尔赛进军,消灭反革命的巢穴,但它却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公社的选举上。3月19日,中央委员会接连发表公告,号召"巴黎人民请各回本区,进行公社选举",以表明他们"无意于谋取刚被群众风暴推翻的那些人的位置"。这体现了起义者大公无私的真诚的民主精神,但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而失去消灭敌人的大好时机,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3月26日,巴黎举行了公社选举,当选的公社委员共86人。由于从资产阶级住区选出的21名代表相继退出,因而不久又进行了补选。在公社委员中工人约30名,其余是新闻记者、职员、教师和医生等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委员中有37名是第一国际会员,30人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约40人是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许多人同时兼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数公社委员分别属于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只有少数委员是无党派人士。

3月28日,在巴黎市政厅举行隆重的公社成立典礼,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将政权移交给公社的代表。聚集在市政厅前面的几十万巴黎人民欢呼"公社

万岁！”“共和国万岁！”庆祝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

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

巴黎公社成立后，在与凡尔赛分子进行殊死战斗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公社在政治方面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立法、行政合一的政权机关，并大胆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实验。3 月 29 日，公社颁布法令，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同一天，它又下令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国民自卫军。公社还废除了旧的警察和司法机构。它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治安委员会取代警察局，负责维持秩序和社会治安；同时还选出司法委员会，组织新的民事法庭，颁布新的诉讼陪审条例，以完善司法程序，保护人民的正当权利。这些措施是公社摧毁旧国家机器的重要步骤。

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压迫人民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公社也摧毁了它的精神压迫工具，即“僧侣势力”。4 月 2 日，公社通过政教分离法令，宣布不准教会干涉国家事务，取消宗教预算，剥夺教会财产，查封或征用一部分教堂，将教会势力从学校中清除出去等。

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实行立法、行政合一的公社委员会制。由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会既是立法机构，又是行政机关。公社的委员们不仅讨论和制定法律，而且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为了适应这种工作上的需要，公社委员会成立了执行、军事、司法、治安、粮食、财政、劳动和交换、社会服务、对外联络以及教育等 10 个专门委员会，由公社委员分别担任这些委员会的委员。

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人民的主宰，公社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第一，实行公职人员的民主选举制。公社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国民自卫军营以下的指挥官，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法官、公证人）和工厂企业的负责人，均通过选举产生。但职能机构的负责人，如邮政局长、税务局长、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国民自卫军营以上指挥官，则实行委任制，以保证工作效率。公社实行的选举制体现了真正的民主原则。选举不受任何限制，是名副其实的普选制；选举程序简便，有利于劳动人民；实行无记名投票，不许任何人干预选举。任命制也是本着民主的原则，先由群众提名，经过集体酝酿讨论，然后才任命。第二，保障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公社在《告法国人民书》中申明：“通过选举或竞选任命”的“公职人员和公社官吏”，应该是“经常受到监督的、可以更换的。”为了便于群众监督，公社通过各种形式让人民了解公社的工作。公社还要求公社委员及各级领导人向人民报告工作，通过选民大会听取群众意见，答复群众的质询。公社委员及其他公职人员还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要求，随时撤换。失职者或不称职的领导人，公社一旦发现，或者在人民检举经过查实之后，

一般说来是要被撤职的。第三，取消高级官员的高薪制。4月1日，公社通过法令，指出“鉴于到目前为止，各公共机关的高级职务均享有高薪，因而被视为可钻营和私授的肥缺；鉴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内，既不应有闲职，也不应有高薪”，“规定各公社机关职员最高薪金每年为6 000法郎。”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公社还规定兼职不得兼薪，以保证上述法令的切实执行。这三项措施，是公社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伟大实验。

公社在社会经济方面实行了许多旨在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4月20日，公社颁布禁止面包房夜工制的法令，以保证面包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有机会参加政治活动。4月27日，公社通过禁止任意罚款和非法克扣职工工资的决定，限制企业主对职工的剥削，保障职工的工资收入。5月12日，公社通过关于包工合同法令，要求“凡是能够直接同工人协会签订的一切包工合同，都要委托给工人协会”，以免承包人从中渔利，法令还规定不得随意降低承包价格。公社还实行了一些改善小资产阶级处境的措施。如公社于4月17日通过关于债务无息延期偿付的法令，规定一切债务一律无息，三年内分期偿付，大大减轻了小资产阶级的债务负担。

公社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实行的最有意义的改革措施，是在4月16日颁布的关于将逃亡业主所遗弃的工厂转交给工人协作社的法令。它规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其任务是：统计被遗弃工厂的数目，编制关于这些工厂现状的清册；提出使它们迅速复工的切实措施；拟定工人协作社的章程；成立仲裁委员会，以便在企业主归来时规定把工厂转让给工人协作社的条件以及应向厂主交付的赎金数额。这个法令的实质是用赎买的方式把一部分工厂从私人所有转为集体所有，因而它在一定范围内触及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公社还进行了工人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5月3日，罗浮尔军械厂的工人根据公社的指示，制定了该厂的管理章程。它规定：工长以上各级领导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受工人监督，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成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厂内各项工作。

公社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公社教育委员会负责人瓦扬曾明确提出，应使每个受教育者受到“全面教育”，“使公社革命能够通过教育改革来巩固其实质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4月28日，他签署命令，要求各区“把宗教教育加速改造为世俗教育”，排除教会对学校的控制。公社还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它号召学生要“听从教师的教导，尊敬他们”，并将教师的薪金由原来“低到可笑的程度”平均增加一至三倍。公社在普及初级教育和兴办职业教育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公社提倡和鼓励文学艺术为革命斗争服务。它邀请先进的艺术家、建筑家参加公社成立的艺术委员会，负责管理博物馆，举行展览会以及确定艺术教育的方针。

公社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它欢迎外国革命家参加公社和担任公社的领导职务。3 月 26 日，匈牙利革命家弗兰克尔当选为公社委员。3 月 30 日通过的《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其中写道："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外国人可以加入公社，并建议批准公民弗兰克尔的当选。"参加公社的外国战士来自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俄国、意大利等国家。据统计，仅波兰人就有 500 人，5 月 6 日，公社又拆毁了象征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旺多姆纪念柱，并将旺多姆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

保卫公社的战斗和公社的历史意义

梯也尔政府逃到凡尔赛后，由于只有残兵败将 1.5 万余人，一时无力镇压公社革命，就一面玩弄谈判阴谋，一面集结军队，伺机进行反扑。到 4 月初，凡尔赛军队已达到 6.5 万人。于是从 4 月 2 日起，凡尔赛当局开始对巴黎发动突然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巴黎西北部的一些据点。

凡尔赛军队的进攻，激起巴黎群众的革命义愤，要求向凡尔赛进军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4 月 3 日凌晨，公社调集 4 万名国民自卫军战士，分三路向凡尔赛进军。由于缺乏周密的作战部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国民自卫军遭到惨重损失。公社著名将领杜瓦尔和弗朗斯壮烈牺牲，2 000 多名战士被俘。

4 月 6 日，经过改编的凡尔赛军队重新向巴黎发起进攻。从这时起一直到 5 月初，公社和凡尔赛的战斗主要在巴黎西、南郊进行。4 月 7 日，凡尔赛军队占领了西郊的涅依桥。20 日又占领了西郊的塞纳河左岸地区。但他们向南郊的进攻却被公社击退；于是梯也尔就开始用大炮不断轰击巴黎。5 月 9 日，巴黎西南隅的伊西炮台被轰平后失守。5 月 10 日，梯也尔在德国提出的使法国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作为交换条件，俾斯麦立即释放 10 万俘虏，以加强凡尔赛的军事力量，并允许凡尔赛军队通过德军防线从北面进攻巴黎。

公社成立后，在它的内部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派别：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由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组成，少数派则大都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之间在加强专政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多数派主张必须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把大权集中于几个人手中，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少数派则认为这样做会破坏民主，容易形成专制独裁。由于军事形势日趋严重，布朗基主义者米奥在 4 月 28 日提出了成立拥有全权的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但在 5 月 1 日的公社会议上却以 45 票赞成、23 票反对获得通过。投赞成票的主要是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人士，投反对票的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在选举第一届社会拯救委员会时，由于蒲鲁东主义者进行集体抵制，当选的 5 名委员都属于多数派。但因他们的威望不高，未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公社的军事形势也在进一步恶化。5 月 9 日，公社改组了社会拯救委员会，但新的委员会仍为多数派所控制。紧接着他们又清洗了公社委员

会内的一些少数派委员。5 月 15 日,少数派发表宣言,对多数派提出批评,并表示不再参加公社会议,准备回到各区参加保卫公社的战斗。少数派的宣言公开暴露了公社内部的分歧,在巴黎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通过群众集会和报刊,敦促两派消除分歧,重新团结起来。为了顾全大局,少数派 15 名委员在 5 月 17 日重返公社参加会议。在保卫公社的最后战斗中,两派成员又进一步携起手来,同凡尔赛匪帮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5 月 20 日,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发动了总攻。5 月 21 日,他们从圣·克卢门攻入巴黎,接着又在夜间占领了巴黎的另外 4 座城门。到 5 月 22 日黎明,通过这 5 座城门进入巴黎市区的敌人已有近 10 万人。公社战士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巷战,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五月流血周"。

5 月 22 日,公社委员会发表《告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书》,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巴黎人民同仇敌忾,不分男女老少都积极投入了保卫公社的浴血战斗。他们把每一条街巷、每一座建筑物、每一道墙壁都变成阵地;把一切能够利用的东西都拿来修筑街垒,日夜同敌人进行殊死决战。

5 月 23 日,凡尔赛军队在俾斯麦同意下,穿过德军防线,开始从北面和东北面攻进巴黎。27 日,巴黎大部分地区已陷于敌人手中,战斗继续在梭蒙高地和拉雪兹神甫公墓进行。27 日夜间,梭蒙高地被敌人占领,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约 200 人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同5 000名凡尔赛匪徒展开殊死的搏斗。28 日晚,敌人攻占公墓,弹尽粮绝的公社战士全部殉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公社失败后,凡尔赛匪帮以极其残暴的手段进行报复。在白色恐怖中,有 3 万人遭到屠杀,5 万多人被逮捕,其中有 4.6 万人被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在审判后,又有 200 多人被处死刑,13 000 余人被判处各种徒刑或苦役,2 000 多人被流放。面对敌人的疯狂迫害,公社战士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社将领东布罗夫斯基和公社检察长里果被俘后,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公社委员费烈在法庭上控诉了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他正义凛然地说:"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落在征服者的手里,他们要我的头,让他们拿去吧!我决不会忍辱贪生。我已经自由地活过,也要自由地死去。"

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从主观上说,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因而使公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3 月 18 日革命后,公社没有乘胜向凡尔赛反革命巢穴进军,消灭已濒于瓦解的梯也尔政府的反动军队。公社对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坚决,甚至没有取缔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报刊。在同凡尔赛的战争中,公社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并错误地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利用它对凡尔赛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此外，在公社委员会内部，忽视必要的集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在宗派斗争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从而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但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缺乏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历史条件。19 世纪 70 年代初的法国，尚处于资本主义的“青年时代”，小生产仍占绝对的优势，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而，公社革命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永远不可磨灭。巴黎公社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在总结它的经验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因为，奴役他们的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所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②这是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巴黎公社还提供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用真正民主的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来取代它的初步经验。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③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巴黎公社在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政府方面做得不够坚决，留下了沉痛的教训；那么它在实行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方面所进行的大胆实验，却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公社实行的民主选举制以及保证选民享有真正的监督权、罢免权和取消高级官员的高薪制等措施，是防止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有效措施和伟大创举。公社还创造了立法和行政合一的新的国家形式。它有利于克服资产阶级议会的弊端，使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的自由不致流于形式乃至欺骗，值得借鉴。但因没有实行权力的划分，难以收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之效；一个机构既管立法又兼行政，也有无法兼顾之弊。公社实行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和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法令，也为利用国家政权排除资本主义、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巴黎公社是 19 世纪初期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峰和总结，同时它也使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2 页。

② 同上，第 117 页。

③ 同上，第 58 ~ 59 页。

它吸收和归纳了历次工人斗争的经验与成果，从以往的共和要求、普选运动以及1848年提出的建立“社会共和国”的主张，发展到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革命，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巴黎公社“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①因而它既不可能取得胜利，也不可能阻止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公社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必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发生深远的影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页。

第五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世界市场的形成

19 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期。首先，在这个时期，汹涌澎湃的民族统一运动、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浪潮席卷欧洲和北美洲，资产阶级从此掌握了政权。这大大加速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向着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迈进。其次，在这个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诸国，把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把它们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在这个入侵活动中，英国走在了最前面。英国是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到 19 世纪中叶，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它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畅销；英国在西欧列强中拥有的殖民地最多，它的殖民地遍及东、西半球，有“日不落帝国”之称。可以说，这时期已经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亚、非、拉美诸国在不同程度上均成为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第一节　欧美的民族民主运动·改革运动

一、英国 1832、1867 年的改革

19 世纪初英国的经济状况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持续了 20 多年(1792—1815)的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停止了。英国得以把注意力重新投入到国内事务上。这时，由于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又攫取了大量殖民地，这给它的工商业发展又带来很大好处。所以在 1815 年以后的一段时期，英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从 18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这时已经扩大到英国几乎一切生产部门。不仅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和机械化的过程迅速发展，而且采煤、冶金等重工业部门也飞快地增长。由于蒸汽机和第一批铁路的出现，对金属和煤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这就刺激了重工业部门的发展。

1814 年史蒂芬逊建造了第一个火车头，接着在 1815—1818 年间又建造了一些新型的机车。第一条铁路建成于 1825 年，这是从斯托克顿到达林顿的全长 40 公里的铁路。1829 年，在经济上具有更重要意义的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全长 48 公里的铁路线通车。本来在 19 世纪头几年，在一些工厂和矿山中，已建造了一些简便的轨道，由马拉的带轮子的车辆在上面行驶。火车发明以后，运输速

度和运输量都大大提高了，这对当时的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农业的改造，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 世纪初，经“清洗领地”阶段，从 15 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至此彻底完成。在 1815 年以后，仅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自耕农，作为一个阶级最后完全消失，英国的农业完全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

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表现之一的生产过剩危机，在 19 世纪初的英国也开始出现。最初，1815 年和 1819 年的危机还具有局部性质，而到 1825 年的危机时，已成了第一次全面的周期性的危机了。

在经济危机期间，英国各生产部门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包括纺织工业和冶金业在内的生产和销售，都大幅度降低。

同时，英国的经济具有较大的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性，特别是纺织业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输往国外市场销售的。但是自从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实行“大陆封锁”、英国实行反封锁政策以后，当时各个国家都不得不发展自己的生产，所以到这时，对英国产品的需要量相对减少。这也是导致英国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因素。

托利党专权·“彼得卢屠杀”

19 世纪初，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托利党独揽大权，土地贵族实行只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使广大人民，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在内，都处于无权地位。特别是下层群众，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由于几次生产过剩危机，生活急剧恶化。1815 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谷物法，规定只有当国内市场上的粮价达到 80 先令 1 夸脱①时，才准许国外的粮食输入英国。这样就使国内粮价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不但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且也大大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粮价高涨，势必使资产阶级提高付给工人的工资。同时，由于英国提高了粮食入口的关税，某些农业国为了报复，也提高了对英国的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妨碍了英国资产阶级向外国出口工业产品。

这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继续发展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无产阶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经济剥削、政治压迫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这引起了无产阶级的不断反抗。原来在工业革命开始时期的“卢得运动”又一度复活。1816 年在英国东部许多郡中都发生工人捣毁机器的事件。在勒波罗地区，工人捣毁了 50 多台机器。不过，这是英国“卢得运动”的最后余波，以后，这一运动就消沉下去，让位于工人运动更高的斗争形式。在三四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工人走上了组织工会、进行罢工斗争的道路。1820 年纺纱工和织布工组成了全国性的总工会，造纸工人联盟和铸工联盟也出现了。

失业工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积极行动起来。1817 年，曼彻斯特的失

① 英文 quart 的音译，1 英夸脱＝1.137 升。

业工人组织了向伦敦的进军。他们打算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在行进途中,像士兵一样背着折叠起来的毛毯,所以这次运动又称“负毯者进军”。

面对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托利党政府惶惶不安。1812 年,利物浦勋爵即着手镇压群众运动。1817 年 1 月 28 日,摄政王乔治在从议会回家途中遭到群众辱骂和投掷石头,利物浦勋爵政府就以此为借口,要求停止实行人身保护法。在议会讨论这一提案时,辉格党反对派领导人格雷勋爵和罗素勋爵表示反对。同时,许多城市都举行群众大会,反对政府这一行动,并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维护宪法。但是,在下院讨论这一议案时,以托利党占多数的议员以 165 票对 105 票通过了暂停人身保护法。政府根据这一决议,立即禁止一切集会,如不遵守,则判处死刑。许多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受到迫害。

但是群众运动在短暂消沉之后,到 1819 年又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利兹等城市中兴起。1819 年 8 月 16 日,在曼彻斯特的彼得广场,约 8 万名工人、手工业者等集会。与会者高举旗帜,要求取消谷物法,实行普选权,给人民以自由。但当大会的主要发言人汉特刚走上讲台发言时,一队早已准备好了的警察和骠骑兵冲向群众,他们用马刀砍死了 11 人,砍伤数百人。这次在彼得广场上血腥的镇压,被称为“彼得卢屠杀”,因为屠杀群众的士兵是参加反拿破仑时的滑铁卢战役的团队,他们对待手无寸铁的平民,就像在战场上对待敌人一样。

“彼得卢屠杀”之后,政府又颁布了一些被称之为“堵嘴法令”的法令,禁止不经政府批准的集会,对报刊规定了很高的税率,使民主派报纸无法出版。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1819 年的生产过剩危机过后,1820 年英国的经济开始回升。那些脱离了西班牙统治的拉丁美洲各国,成了英国商品的外销市场。在英国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在政治领域,有一些统治阶层的人感觉到应该给工业资产阶级以适当的照顾。除了辉格党之外,在托利党中的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如乔治·坎宁等,也认为应该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以争得势力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的支持。

托利党中的保守分子、当时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在 1822 年去世,首相利物浦延揽了乔治·坎宁以及罗伯特·皮尔等一些自由主义托利党人入阁。这届内阁在 1824 年取消了 1800 年的反结社法令,给人民以组织工会和社团的自由。虽然,在 1825 年又公布了一个条例,不准强迫其他不自愿罢工的人参加罢工,但从此之后,组织工会已属合法,新的工会纷纷成立。

1826 年,政府又对谷物法进行修正,规定英国国内粮食价格每夸脱高达 66 先令以上时,即可进口粮食。这一措施,多少能使粮价保持在不致过高的水平上,同时也有利于资产阶级同外国的贸易来往。

但是这些微小的改革和局部措施,已不足以消除群众的不满。何况,从

1825 年起又发生更大的生产过剩危机。许多生产部门生产缩减,随之而来的是工资降低,失业人数增长。国王乔治四世在 1826 年议会开会致词中也不得不承认:到处都是贫困!

20 年代末,工人运动在许多地区如约克郡、兰开夏郡等地重新高涨起来。这时工人运动的一个特点是越来越具有政治倾向。大多数工人已逐渐认识到,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要求,而要进行政治斗争。如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一批工人在他们的"全国联盟"所创办的《贫民卫士》报上就提出了议会改革,实行普选权,秘密投票等主张。未来的宪章派领导人奥布莱恩也经常为该报撰稿。

工人运动在城市重新高涨之际,农村中也不断发生农民的骚动。农业工人、农村手工业者和一些由于农业生产危机遭到破产的小农场主都参加了农民骚动。农民骚动开始于肯特郡,然后蔓延到英国南部及东南部各郡。骚动者捣毁打谷机,因为打谷机的使用使许多农业工人找不到工作,同时他们还焚烧地主的庄园和粮仓。农民还向各地发信件,申诉他们的痛苦,表示他们的斗争决心。信的末尾署名为"斯温上尉",所以这个运动又被称为"斯温运动"。"斯温"一词在英文中原意为秋千,又有绞索的意思。农民所以这样自称,是为了表示他们或者受苦受难,死于贫困,或者参加反抗斗争,宁愿上绞刑架。

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

城乡劳动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日益走向政治斗争的道路,促使激进民主派更加急迫地要求议会改革。

早在反法战争结束之后,在英国国内就已成立了一些要求议会改革的团体。其中著名的有"汉普顿俱乐部",这一名称来源于 17 世纪革命时下院的反对派著名领导人汉普顿。该俱乐部的主要领导人物是卡特莱特。它的成员除了资产阶级,还有中等阶层人士及手工工人。它的口号是争取扩大议会选举权,平等划分选区,议会任期一年等。

除了汉普顿俱乐部外,在英国同时还成立了其他一些俱乐部。在这些俱乐部和主张议会改革的人当中,有些人态度温和,如边沁等人,他们从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出发,认为国家是由于人们缔结协约而产生的,现在国家只保护土地贵族的权益,而丢掉了对社会其他阶层的义务,所以应该扩大议会选举权,以便使更广大的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派人还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发展工商业。

在议会改革运动中,另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理查·卡莱尔、亨利·汉特等,特别是威廉·柯伯特影响更大。柯伯特认为,国家的财富都是由下层劳动群众创造的。他要求地主应该把土地归还农民。同时,他认为国家政权被一小撮人掌握,因而应该实行议会改革,给人民以选举权,使人民有决定国家

政策的权力。

柯伯特、汉特、卡莱尔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受到英国17世纪的平等派和18世纪末民主派的思想及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影响，但是他们把理想的政治溯源于古代，而他们的斗争是为了恢复“昔日正义事业”，希望恢复英国人民以前所享有的权利。

激进民主人士在英国各地周游、召集会议，号召进行议会改革，并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同时，他们还出版报纸，宣传他们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卡莱尔的《共和党人》报和柯伯特的《每周政治指南》。1816年，柯伯特出版了他的报纸的廉价版，发行量达数万份，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的报纸，影响甚大。

在要求议会改革的运动遍及全国各地并日益高涨的大环境下，1830年1月，由托马斯·阿特武德领导的一个激进民主主义团体在伯明翰举行大会，成立“保卫社会权利政治联盟”，提出要求社会中、下等阶层应享有议会的平等代表权的纲领，并主张用递交请愿书的和平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个联盟成立之后，其他城市纷纷仿效。在伦敦，1830年3月成立了以普莱斯为首的“首都政治联盟”，他们与伯明翰的“保卫社会权利政治联盟”保持密切联系，共同进行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这些政治联盟的成立，对鼓动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争取议会改革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有社会中、下层人民，而且许多工业资产阶级也积极参加。在英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在此期间，西班牙发生的革命(1820年)、希腊革命(1821年)和比利时发生的革命(1830年)，都在英国国内引起广泛的同情。特别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国内的改革运动。面对这种局势，辉格党领导人考虑到，如果把议会改革列入自己的纲领中，在1832年进行的下届议会改选时，可能有助于战胜托利党。于是，辉格党领导人格雷伯爵也宣布主张选举改革。他在1830年11月向下院的演说中说：在地平线上正集结着乌云，暴风雨就要来了。只有赶紧进行议会改革，才能避免这次风暴的袭击。

1832年议会改革

当要求议会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内阁首脑惠灵顿公爵却固执地反对一切关于改革的建议。他表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他的讲话引起群众激烈的抗议。惠灵顿公爵倒台后，国王乔治四世任命主张改革的辉格党领导人格雷勋爵组阁。格雷一面派军队镇压工人的罢工和农村的骚动，一面向议会提出改革方案，以缓和国内的强烈不满情绪。但是改革法案提出后，在1831年4月和10月先后被上院所否决。议案在1831年12月第三次提出时，又遭到上院的阻挠。这时全国群情激奋，特别是布里斯托尔等地，群众骚动更为强烈。以乔治四世为首的当权者惶恐万状，决定让步。1832年6月，改革法案终于获得通过。

1832 年议会改革法案规定:降低选举资格,城市的居民凡年收入在 10 镑以上的房户主和年租在 10 镑以上的房客都有选举权;农村中的选举资格是年收入在 10 镑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和年收入在 50 镑以上的租地农业家也取得了选举权。同时取消了 56 个人口不到2 000人的“衰败选区”以及这些选区原有的 111 个代表名额。将 32 个小的选举城镇的代表名额各减少 1 名。对 143 个代表名额重新作了调整。增加了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新兴起的大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的代表名额。

1832 年的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它带来了适应于工业革命以后已发生的社会变动,刷新了政治制度。在 1688 年“光荣革命”以后,只有金融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现在工业资产阶级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了。但是在争取议会改革斗争中出力最大的工人阶级却被排除在选举权利之外,他们照旧处于无权的地位。

工业革命的完成

19 世纪中叶是英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正处在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虽然也发生过 1857 年和 1866 年的经济危机,但不论在时间上或规模上,都远不如三四十年代时危机的长久和严重。在各个工业部门,生产都在迅猛发展,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除了原来发达的轻工业之外,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也发展起来。英国成了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号称“世界工厂”。从 1850 年到 1870 年,英国的纺织厂从1 932个增加到2 483个;机器纺锭达到3 000万个,比美国或法国多 4 倍;羊毛工厂从1 998个增加到2 579个。从产量来看,1848 年的生铁产量为 200 万吨,1870 年时已增长到 600 万吨;原煤 1855 年时产量为6 150万吨,到 1864 年增长到9 200万吨,铁和煤的产量都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特别是廉价的、大批生产的钢,已逐渐取代铸铁和锻铁。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由于铁路和汽船的广泛应用,也有了很大发展。到 19 世纪中叶时,英国的铁路网的总长度达到10 600公里,路轨已采用钢材,负荷量更重。在水上运输方面,50 年代时,英国有汽船1 000艘,到了 60 年代已达到5 000艘左右,造船的材料也已用金属代替木材。当时英国拥有的汽船数占全世界的一半。汽船运输对英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英国的海外贸易在整个英国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直到 19 世纪中叶,在英国的水上运输中,帆船仍然比汽船多。

19 世纪中叶英国的对外贸易

19 世纪中叶,世界各个地区基本上都已卷入到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之中。因此,在世界贸易中占垄断地位的英国,获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利润。据统计,1850—1870 年的 20 年中,英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加了约 2 倍。英国的贸易额在世界总贸易额中占很大的比重,1850 年世界贸易总值为 145 亿马克,而

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就达52亿马克。到1870年,世界贸易总值增长到374亿马克,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额增长至140亿马克。

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输出品多为工业制成品,如棉织品,1850年输出总值2 800万镑,1870年输出7 100万镑,占英国对外输出品数额的第一位。毛织品的出口也有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钢铁和煤的输出额增长更大。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英国在全世界居领先地位,它的机器出口额也居世界第一位。1850年英国输出的机器总值约100万镑,到1870年时增加到530万镑。

作为"世界工厂"并在世界贸易中占垄断地位的英国,使许多国家在经济上都从属于它。即使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在经济上实际也是英国的半殖民地。

英国之所以在19世纪中叶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并超过其他国家,是由于下列一些原因:英国最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在生产技术上利用机器和蒸汽作动力进行生产的英国,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过那些继续使用手工劳动的其他国家。同时,当英国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正是全世界资本卷入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中的时候,这大大便利了英国在全世界推销它的产品,同时掠夺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原料,加之在交通运输方面,英国依靠其迅速发展起来的铁路和汽船,使它的商品流通比任何国家都快。有些国家在海外运输上,还得借助于英国的交通工具。另外,19世纪中叶,英国已占有了印度、加拿大、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锡兰、南非开普敦等广大的殖民地,当时英国殖民地的面积达1 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5亿人。这些殖民地成了英国廉价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

英国之成为"世界工厂"及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垄断地位,意味着这时已经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形成,又意味着世界地区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可以说,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向世界连结成一个整体的目标迈进的第三步。

自由贸易的实现

与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相适应,英国在19世纪中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过去,英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17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实行的"航海条例"、"列举商品法"、"主要商品法"以及1815年开始颁行的"谷物法"都体现了重商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完全为英国大商人、大船主及大地主的利益服务的,局部地也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工业(如"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但是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力量愈益强大,于是上述重商主义政策就越来越不适应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了。先以"航海条例"来说,根据这个条例,垄断航运业的英国大商人、船主可以任意抬高进口原料的价格,这自然不利于工业资本家。"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的主要目的是使北美殖民地成为英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及商品倾销市场,这对17、18世纪的

英国的幼稚的工业来说，是起了保护作用的。但是，到了19世纪前半期，强大的英国工业已经不需要国家来保护了，相反地，这个政策只能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因而不利于英国工业的发展。如前所述“谷物法”对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也很不利。因此，1832年议会改革后，上台掌权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便开始了争取废除上述一系列重商主义法律的斗争。到1846年终于迫使议会废除了“谷物法”。“航海条例”也在1849年被取消了。此外，在1846—1849年间，议会又取消了200种左右的商品进口税。这些措施意味着自由贸易的实现。

英国不但在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且也要求外国实行这个政策，以利于英国的商品畅销世界。而强迫外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是与其炮舰政策分不开的，即英国统治集团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打开外国的大门。如1840年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4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6年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等，都是这一政策的体现。

自由贸易政策在表面上是平等的，实际上是极不平等。因为，英国的廉价商品会挤垮工业落后国家的商品。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只能加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破产，摧残它们的民族工业。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富国。然而巨额财富主要都落到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占全国人口不到2%的地主、金融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业资产阶级，占有国民收入的36.5%，而占人口80%以上的劳动群众，却只占国民收入的40%。财政大臣格莱斯顿1863年在下院发言时也承认：“财富和威力的惊人增长，完全只限于有产阶级。”在英国的工商业和财富急速增长的同时，穷人的数目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据统计，1855年穷人数目为851 369人，而1856年就增长到877 767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863年时达到1 097 382人。1866年经济危机到来时，穷人的数目更是大大地增加了。

在社会各阶层中，工人的生活状况格外困苦，特别是女工和童工，受到残酷的剥削，物质上、精神上都处于悲惨的境地。工人群众的工资待遇，并未由于生产的发展而提高，而是降低了。1857年经济危机期间，造船、冶金、煤矿中的工人工资降低了15%～20%；1866—1867年经济危机期间，很多部门的工人工资降低了10%～20%。而大批的失业工人，更是流离失所，走投无路。1858年在纺织工业的中心城市曼彻斯特，有22%的工人失业，在冶金工业中心城市谢菲尔德，大约1/2工人完全失业或部分失业。

50—60年代的英国工人运动

宪章运动失败后，引起工人运动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即生活困苦、工资低、失业增加，加上政治上的无权地位，所以工人运动仍旧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在50—60年代，工人运动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一批工人组织的所谓“新模范”工会。它以 1851 年威廉·牛通和威廉·阿兰建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为开端，以后其他工会纷纷仿效。这种“新模范”工会的特点是：在组织上具有狭隘的行会习气，它只以行业系统来组织全国性工会，只限于工资较高的熟练工人才能参加，会费较高。设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实行集中领导，它的指导思想已不再是把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只是在于经济互助。它有一种理论，即认为：劳动力价值受供求法则支配，所以要限制劳动力的供应，以保持他们的就业机会和高工资。有一个工会的领导人对此曾说过：“当缺乏鸡蛋的时候，鸡蛋是珍贵的，当缺乏工人的时候，工人是高贵的”。在这些工会中，最有影响的少数人形成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金塔(Junta)”，意为小集团。

第二种是以合作运动为主要形式。合作运动由 1843 年成立的所谓“罗奇德尔先锋”首开其端，这是在罗奇德尔城兴办的一个工人合作社，它按照工人购买物品的数量来分配红利。随后，其他各地纷纷仿效，到 60 年代，英国共有 454 个这类合作社。

第三种是以互助会为主要形式。地方性的互助会早已存在，但在 19 世纪中叶，全国性的互助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些互助会活动范围狭窄，它们各立门户，互不团结，只关心本身的利益，而置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于不顾。

上述情况使工人阶级内部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错综复杂的关系。19 世纪中叶发生的几次国际事件，在工人阶级内部引起不同反响，促使工人内部的分歧更加扩大。原来在 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之间，英国工人阶级对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般都是支持的。但是在 1854 年英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后，一部分工人跟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如科布登、布莱特等人反对战争，因为这部分资产阶级害怕战争妨碍他们的对外贸易。但是另一部分工人则拥护对沙皇政府进行战争，因为沙俄是镇压波兰人民和匈牙利人民的刽子手。对于 1857 年的“印度叛乱”——土兵起义，以琼斯为首的一批工人为印度的土兵起义辩护，但是更多的工人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影响，主张镇压起义的印度土兵，即使一向主张和平的布莱特，也主张用武力镇压起义者。

19 世纪中叶，英国工人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权为上层熟练工人所掌握。这部分工人待遇较高，他们不主张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英国全国的工会，也主要由这部分高薪熟练工人所组成。当时英国全国共有工人 800 万人，但熟练工人阶层的人数不到 150 万人。参加到工会中的工人在 60 年代时还不到工人总人数的 1/10。这时的工会收取的会费很高，非一般贫苦工人所能问津。这样的工会被称之为“老工联”，以别于 19 世纪末成立的、以非熟练工人为主体的“新工联”。

在上述工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阶级妥协和经济主义，他们只着眼于提

高工资，加强互助，救援失业工人和生病工人等。这些工会的领导人所提出的口号是："诚实的劳动，合理的工资"、"防御而不是进攻"。他们认为，工人同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号召工人与资本家合作共同搞好生产。

"老工联"中有些领导人，在几十年中一直身居工会的高等职位，渐渐官僚化，脱离了工人群众，在工人组织中也渐渐形成了一个集中的官僚核心。

第一国际与全国职工联合会

工人阶级的基层群众不满上层分子小集团的行为，便另组织了一些工会，并发动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们感到有进一步联合起来的必要，于是在木工、矿工、纺织工中先后成立了职工联合会。在伦敦和另外一些城市还成立了工会会议。伦敦的工会会议出版了报纸《蜂窝》，它的编辑是乔治·波特。《蜂窝》报反对"金塔"工会官僚小集团，主张建立全国性的职工联合会。终于在 1868 年，全国职工联合会在曼彻斯特建立了，当时拥有会员 11.8 万人。

1864 年 9 月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时，英国工人积极参加，许多职工联合会都加入了第一国际。1869 年时，英国的第一国际会员有 9.5 万人。但是许多职工联合会领导人与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他们也反对支持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后来除了厄普加特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领导人都退出了总委员会。

当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时期，英国政府支持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干涉美国内战，英国工人阶级在第一国际的号召下，激烈抗议政府干涉美国内战的企图。另外在 60 年代，英国在酝酿和进行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也积极参加。不过，有的工会领导人追随资产阶级激进派，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改革纲领。

总的来看，在这个时期，英国在生产技术上居世界首位，在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也最为成熟。客观条件对社会主义运动更为有利，但是英国的工人运动却相对落后，自从宪章运动失败后，再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更没有形成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

议会与两党制

这一时期适逢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她力图在政治上发挥重大影响，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这时的英国立宪君主制进一步发展，国王的地位虽然名义上很重要，但实际上仍是"统而不治"。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议会和由议会多数党所组成的内阁手中。外交大臣巴麦尊因为在制订外交政策中，未考虑女王的意见，而引起女王的不满，但她也无可奈何。她的丈夫阿尔伯特虽一再努力，但是除了争得一项权利——女王同大臣谈话时他可以旁听之外，无任何别的实际权力。

在议会里，虽然经过 1832 年的改革，但由于改革很不彻底，土地贵族仍旧在议会里有很大势力。不过，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势力也不断增长。

在议会里，存在着两党制。1832 年改革后的年代里，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改名为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党仍然交替地操纵着英国的政治。保守党仍然代表土地贵族特别是大农场主的利益，但 50—60 年代时，与殖民地的商业有关系的大船主和大商业资产阶级也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在皮尔之后，狄斯累利成为保守党的领袖，他鼓吹“新托利主义”或“小托利主义”。但 50—60 年代，保守党的统治不能再长久维持，自由党已站到了首要地位。

自由党在 50—60 年代时，已不仅代表大地主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部分地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巴麦尊是自由党的著名领袖，曾 16 次当选为议会议员，多次成为内阁成员。他善于玩弄花言巧语，反对改革，是资产阶级理想中的一个政治家。在巴麦尊死后，格莱斯顿成为自由党的主要领导人。

除了上述两个交替掌握实权的大党之外，还成立了一些小党。其中一个是“自由贸易促进党”。这个党代表了曼彻斯特一部分纺织工厂主的利益，他们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展开活动，其著名的领导人为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他们的主要政治主张是:廉价政府，减少关税，自由贸易。在托利党中，有一些主张贸易自由的所谓皮尔派也与他们联合，形成了所谓“大自由党”。这些小的政治集团，在政治上势力不大，不能影响两个大党操纵国家政治的基本格局。而工业资产阶级在 1832 年议会改革后，虽然参加到政权中去了，但经过宪章运动的震撼之后，他们宁愿保持从 18 世纪就已逐渐形成的两党制，并且容忍两个党中的实权都操纵在少数名门贵族手中。

在两党交替执政的过程中，19 世纪前半期保守党占优势，50—60 年代则由自由党长期执政。在 1848—1868 年 20 年之间，自由党执政 16 年。即使在自由党在野的 4 年中，虽然由保守党执政，但事实上也执行了本质上和自由党相似的政策，如废除谷物法，推行 1867 年的议会改革等。这是因为，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正处于欣欣向荣之际，加上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以后处于衰落和分裂状态中，在工人内部改良主义、“经济主义”思想盛行，不足以构成对资产阶级的威胁，所以资产阶级宁愿采取自由放任的改革。这时英国的国家机器也比较薄弱，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保障较多，是全世界少数政治上比较民主自由的国家之一。

1867 年的选举改革

1832 年议会改革后，选举权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广大的中、下层人民迫切要求进行一次新的议会改革。在这种形势下，自由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拉拢选民，便表示主张新的议会改革。但是保守党却坚决反对改革，因为如果扩大选举权，可能会使他们丧失议会中的席位。这使他们在群众中的声誉日益低下。保守党内一部分人为了挽救保守党的政治颓势和声誉，也表示准备实行改革，扩大选民范围。然而保守党内的一些右翼分子却坚决反对这样的主张。

19 世纪 60 年代初，在英国展开了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其中主要有两股力量，即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科布登和布莱特领导下建立的“全国改革联盟”与由英国职工联合会和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领导的争取改革的运动。以上两股力量，以第二种力量的作用较大，实际上它在这次议会改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强大的争取选举改革的群众运动面前，自由党为了把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与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联合。1866 年，自由党的领袖格莱斯顿与布莱特的激进派缔结了联盟，并拟定了新的选举改革方案，由格莱斯顿送交议会。但是议会里的保守党议员反对这个改革方案，方案被否决了。格莱斯顿被迫辞职，由保守党的德比勋爵代其组阁。

改革方案被否决的消息传出以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地区都展开争取改革的斗争，群众到处举行集会。7 月 23 日，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群众大会时，遭到政府禁止，但群众将铁栅栏拆毁，冲进了公园，要求立即实行改革。在其他城市，如爱丁堡、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参加这些大会的群众总数达 20 万人左右。到 1867 年春，争取议会改革的运动进一步高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 1867 年 5 月 6 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群众达 20 万人。

在工人和其他阶层劳动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保守党内阁为了保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并争取在下届议会选举中不致失去议会多数，不得不表示支持议会改革，并着手拟定改革方案。

1867 年 7 月 15 日，议会下院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方案，起初保守党内有些贵族还表示反对，但德比内阁以总辞职相威胁。如果德比辞职，则自由党将取而代之。这样，上院的一些贵族才不得不表示同意，批准了改革方案。1867 年 8 月 15 日，改革方案成为法律。

这一改革方案规定，在城镇，选举权应给予每一房主和租户，也给予支付租金每年不少于 10 镑和居住不少于一年的房客。在各郡，选票给予从私产或承担租金中每年所得不少于 5 镑的人。短期租户如有 12 镑收入，也可获得选举权。另有 46 个“衰败选区”被取消，所空余出来的席位，分配给各大城市。选民的总数从 135 万人增加到 225 万人，但是妇女仍无选举权。

1867 年的议会改革是继 1832 年以后，废除“衰败选区”的第二阶段，它完成了工业资产阶级争取参加政权的斗争。贵族地主的势力进一步降低了，在“衰败选区”被取消后，贵族地主不能够再随心所欲地选送代表到下院去了，资产阶级在下议院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不过，直到这时，英国仍然只有 1/2 的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工人中只有高工资的熟练工人才获得选举权。劳动群众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普选权仍远未实现。

二、俾斯麦与德国的统一

统一运动的政治经济背景

1848年革命失败后，有名无实的“德意志邦联”又复活了，德意志仍旧是大小邦林立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各邦君主纷纷取消了革命期间颁布的宪法，恢复了革命前的专制统治。奥地利皇帝宣布《1849年宪法》作废。在普鲁士，容克贵族仍旧控制政府、军队和法院，恢复了书刊检查制度，并且把学校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

这次革命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在革命的震撼下，感到有必要在政治上作一些调整，以缓和下面的情绪，因此，国王在1848年和1850年前后颁布两部宪法，成立两院制议会，上院议员由国王任命，下院议员通过选举产生。但是，由于实行三级选举制①，下院落到大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控制之下。而且，下院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只有表决法案及预算案的权力，而且上院权力很大，如果上院反对，下院所通过的法案都归于无效。国王享有统治国家的“神圣的权力”，他是军队、教会和文官的首脑，他有否决议会立法的绝对权力。内阁大臣向国王负责，他们可以向议会提出法案。因此，在实行宪法后，普鲁士不过是一个用议会装潢起来的专制国家。

然而，德意志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50—60年代，全德出现了工业建设的热潮，大规模的工厂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埃森的克虏伯钢铁公司及柏林的波西格机车工厂在1860年就已闻名世界了。基础工业，如煤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发展，由于铁路网的扩大而加速。1846年全德生产煤320万吨，到1860年增至1 230万吨，1871年又上升到2 940万吨，为法国和比利时产量之和。全德生产的铁，1850年为52.9万吨，1875年增至200万吨。

这个时期，德意志工业之所以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是因为：第一，1848年革命失败后，解放农奴的过程加速（详情见后），从而增加了人口的流动，为工业提供了更丰富的自由劳动力。第二，工业投资增加了，向工业投资的既有外国人，也有本国的合股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德范围内，普鲁士的工业走在最前面，普鲁士的鲁尔、西里西亚及萨尔等地区的工业居全德首位。

普鲁士工业发展有两个特点：第一，政府直接插手工业生产，它独占了萨尔布吕肯及西里西亚的煤炭生产，政府成为全德最大的煤炭生产者，由政府向各个工业企业提供燃料，这就加强了工业生产的计划性。第二，普鲁士的工业生产与

① 三级选举制：所有选民依纳税多少分为三个等级，纳税最多者是第一等级，人数最少；纳税次多者是第二等级，人数较少；纳税最少者为第三等级，人数最多。但三个等级选出的代表人数相等。

军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联。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力图使工业发展为军事服务，普鲁士的铁路网都是按战略上的需要修建的。鲁尔工厂之生产大炮，更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农业资本主义在德意志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早在19世纪初，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邦已经对封建农奴制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赎买与土地有关的封建义务。1848年革命进一步加速了农奴制改革的步伐。1850年3月2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降低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赎金额，允许农民通过出让部分土地的办法赎买封建义务。普鲁士政府还设立了土地银行，向农民贷款，这大大加快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进程。从1850年到1865年，普鲁士共有64万户农民办理了赎买手续。其他各邦也实行了改革，解放了农奴。

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地主从农民手中掠夺了大量的赎金和土地。据统计，仅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就攫取赎金10亿马克，土地11.3万摩尔根①。另一方面，千百万农民摆脱了封建依附枷锁，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就使许多大地主有可能改变土地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力，采用机器生产。

下述情况也促进了普鲁士农业向资本主义过渡：德意志城市的发展和工业人口的增长，以及英国废除《谷物法》后进口粮食的增加，都刺激了国内外市场上的粮价上涨。在粮价上涨的刺激下，愈来愈多的容克地主把封建庄园经济改造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有的地主还因地制宜，开办酿酒厂、面粉厂、制糖厂、锯木厂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少数富有的容克地主甚至投资于铁路建筑和证券交易。

这样，在德意志，在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统一运动的兴起

资本主义愈发展，国家的分裂状态就愈难以令人忍受，资产阶级对此尤感切肤之痛。不同的邦有不同的《国籍法》，这大大限制了邦与邦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从而使煤铁资源丰富的少数工业中心难以得到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各邦不同的货币、不同的度量衡制度和不同的工商业法律阻碍着商品的流通；由于诸邦林立，缺乏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政权去保护海外贸易；更重要的是，国家分裂阻碍德意志开拓海外市场，建立海外殖民地。因此，德意志资产阶级对于统一的要求是十分强烈的。当然，资产阶级在要求统一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求政治改革，希望在政治上享有更大的自由。

广大人民也喁喁然希冀国家早日结束分裂局面，因为分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小邦林立给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各邦之间的相互倾轧更使他们感到痛苦。

---

① 1摩尔根相当于0.85公顷或2.12英亩。

对于统一和自由的要求,到50年代末形成一个强大的运动。1859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德意志人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争取统一及政治自由的热情在消沉了十年之后重新昂扬起来。人们通过歌咏大会、射击比赛、体育表演和民族服装展览等文化活动来表达内心对于统一及自由的渴望。这一年夏天,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射击运动会上,“统一德意志祖国”的呼声震天动地。同年7月,图林根的民主派和普鲁士的自由派举行集会,要求用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去代替邦联议会。同年8月,一些邦的自由派领袖集会于爱森纳赫,发表一个呼吁书,号召成立一个政党,为统一而努力。同年9月,民族同盟成立,推选汉诺威的自由派领袖鲁道夫·翁·贝尼格森为第一任主席。这是第一个全德性的政治组织,它联合了德意志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参加同盟的,既有北部、中部的著名的政客,也有许多名流学者,如经济学家赫尔曼·舒尔兹·德利赤、历史学家亨利·翁·特列茨克和约翰·古斯塔夫·德洛伊森等。到1862年,同盟盟员已达到2.5万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北部及中部德意志。同盟在大多数邦都建立了组织。同盟的宗旨是支持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

参加同盟的学者们从理论上论证由普鲁士领导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展示了自由发展的历程,这个自由体现在国家及其制度之中,最后将在德意志的统一中,得到最圆满的体现。他们认为,历史本身就证明,普鲁士注定要统治全德意志。德洛伊森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扬普鲁士,而极端仇视奥地利,并且看不起小邦,认为小邦是统一道路上的障碍。这些人虽然热烈地歌颂自由,但是又相信,只有在一个像普鲁士这样强大的国家里,才能实现自由,才能发展有价值的文化生活。有的学者为了统一,宁愿牺牲立宪政府的自由主义理想。他们的口号是:“即使最强硬的普鲁士军事统治,也比小邦林立所造成的悲惨状态更好。”当然,也有一些自由派盟员,一方面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另一方面也相信普鲁士在自由派的推动下,会逐渐地变为真正的君主立宪国家。

这个同盟还有一个思想倾向:重视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决不耽于幻想。弗洛贝尔在1859年写道:“德意志民族已经厌倦于原则和理论、书本上的东西和高尚的理论。它所缺少的是力量、力量、力量,无论谁,只要他给它(指德意志民族——引者)以力量,他就会得到荣誉,这个荣誉比他所能想象到的更多。”在国际舞台上,他们只看到力量的角逐,而且认为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本身利益的自主的人格。德洛伊森甚至把列强协调的观念看得一文不值,他毫不掩饰地宣称: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德国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

“民族同盟”不仅得到学术文化界人士的支持,而且也得到金融家及工业家的赞助,其中有西门子及麦尔(北德意志洛伊德船舶公司的创始人)。

德意志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界的代表支持普鲁士领导统一,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在他们看来,普鲁士是军国主义国家,有强大的军

事力量，由它用武力统一德国是游刃有余的。第二，普鲁士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政策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早在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就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关税同盟”就是在普鲁士的倡导下建立的。第三，普鲁士在镇压1848年革命后实行立宪，成立议会，尽管是虚伪的，但是却引起了资产阶级对它的幻想。第四，普鲁士是德意志民族爱国主义的故乡，在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走在最前头，因而普鲁士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中间有很大的号召力。

但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意志也存在反对统一的分裂势力。首先是奥地利的统治阶级。他们满足于奥地利在邦联议会中的领导地位（奥地利代表主持这个议会），希望维持在“德意志邦联”这个招牌掩盖下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他们之所以对德意志统一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奥地利有自己的帝国，这个帝国统治着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以及意大利人。倘若奥地利扛起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大旗，势必唤起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情绪，危及帝国的存在。因此，奥地利统治阶级总是把巩固这个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置于首要地位。奥地利不但对统一不感兴趣，而且还反对统一，特别反对由普鲁士领导统一，这是因为这会加强普鲁士而削弱奥地利在中欧的地位。诚然，奥地利在19世纪中期也想建立一个经济统一体，曾计划成立“中欧关税同盟”，包括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广大领土，但是这个计划被普鲁士挫败了。其次是南部、中部各邦的君主也是反对统一的力量。这些邦在普奥两国的斗争中一直起着平衡的作用。这些邦的君主之所以反对统一，主要是因为统一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

统一只能走“普鲁士道路”

但是，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问题只是在于通过什么道路实现这个统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呢？还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道路？这个问题取决于当时德意志的力量对比。那时，德意志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希望国家统一的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代表容克阶级的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按理说，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首先应当由资产阶级来承担，然而，“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惯常的德国方式，出世得太迟了。”[①]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资产阶级才真正成长起来，而那时欧洲无产阶级已经以战斗姿态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因此，当德意志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抗的那一刻，它发现无产阶级以及市民等级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集团也以威逼的气势同它自己形成了对抗。它看到，不仅有一个阶级在它后面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整个欧洲都在它前面对它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

取敌视态度。"①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德意志资产阶级不敢领导德国人民，通过革命来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

由于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西欧国家，德意志的无产阶级也出世较晚。尽管他们十分关心国家的统一，但是在组织上还很脆弱，尚未成立自己的政党。所以，无产阶级也没有力量完成统一大业。

只有普鲁士王朝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因为：

第一，普鲁士王朝所依靠的是一个力量雄厚、生气勃勃的容克阶级。容克地主自从17世纪以来就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他们不但独占了普鲁士政府、军队中的要职，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财力雄厚的统治阶级，与没落腐朽、暮气沉沉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容克阶级虽然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然而却是一个富于进取的阶级，他们有力量、有能力支持普鲁士王朝完成统一大业。第二，普鲁士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其现役军人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占欧洲第一位，每年的军事拨款在预算总额中的比例也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军队训练有素，有铁的纪律，因而战斗力很强。他们的军事统帅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因为普鲁士自从17世纪以来，就不断靠对外战争扩大疆域。第三，普鲁士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农业，这成为其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源泉。第四，普鲁士有完善的行政系统和教育制度，从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工作效率高的、忠于职守的管理人才。在康德哲学熏陶下，普鲁士官僚都养成一种自觉的工作责任心，这不仅是普鲁士国力强盛的重要根源，而且也为它领导全德统一提供了重要条件。第五，容克作为普鲁士的统治阶级，素来好战，抱有无止境的领土野心。他们多年来就梦想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德意志。而且，容克大部分已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和资产阶级一样，也迫切要求统一，以便于自身经济的发展。

因此，德意志的各种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只有普鲁士王朝有力量完成统一任务，决定了统一只能走"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道路。

然而，普鲁士之所以能够通过王朝战争道路，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的才干和主观努力。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出身于勃兰登堡省的一个容克地主家庭。他从柏林大学毕业后，在某一专区公署当过候补官员。公职人员生活使他感到厌烦，一年后，他返故里经营地产。他改变旧的经营方式，采用新式农具，雇佣无地雇农耕种，还开办砖瓦厂、石灰厂等。他与许多大银行家过从甚密，并通过他们进行证券投机。可见，俾斯麦是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容克。在政治上，俾斯麦是一个顽固的专制主义者、自由主义的敌人，具有强烈的权力欲。他崇尚暴力，讨厌"人文主义者的喋喋不休的说教"。1848年革命期间，他曾劝国王使用武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页。

镇压革命,并在自己庄园内着手组建武装,准备进军柏林"勤王"。因此,他获得了"头号保守派容克"的名声。他全盘继承了容克的专横暴戾的作风,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有时在给妻子的信中又洋溢出诗人般的情感;他刚愎自用,喜欢发号施令,但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又能装出礼贤下士、谦虚和蔼的样子;他既气度恢宏,又胸襟狭窄。他思维敏捷,能在错综复杂和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巧妙地利用各派政治力量,把握恰当的时机,采取果断行动。他曾多年担任普鲁士驻邦联议会的外交代表和驻外公使,对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了如指掌,其中对奥地利的了解尤为深刻。他始终坚持,应由普鲁士王朝通过战争手段,来完成德国统一。他还认识到,奥地利是普鲁士统一德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了完成统一,就必须打败奥国。1859 年,他得知意大利反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写信,建议政府派兵把奥地利从德意志驱逐出去,以实现德国的统一。可惜他的建议未获采纳。

至于俾斯麦的上台及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大显身手,则是以一场"宪法纠纷"为序幕的。

宪法纠纷

1858 年,普鲁士国王之弟威廉就任为摄政,①1861 年即位为国王,称威廉一世。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掌权后就决心用武力统一全德,因而热衷于军事改革,以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他相信,强大的军队不但有助于加强王权,而且也是统一德国的强有力的工具。1859 年,他任命著名的军事家阿尔布雷特·冯·洛恩为陆军部长,并委托他草拟军事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不但涉及纯技术性的改革,如全军要装备新型武器等,而且也涉及兵制的改革。计划要求把现役年限从 2 年延长到 3 年;把每年征兵数目从 4 万增至 6.3 万人;在战争动员时,把后备军中的年轻士兵征召到正规军中去;把后备军的军官归并于正规军军官团;要求议会增加拨款,以充军事改革费用。

1860 年 2 月,以这个军事改革计划为内容的法案被提交到议会下院。下院中的自由党人,本来是拥护普鲁士用战争手段统一德国的,所以对于法案中关于增加每年征兵数目一事欣然同意,但是反对把现役年限从 2 年延长到 3 年,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政府之要求把现役期限增加一年,是想在第三年里,向士兵灌输反动的忠君思想及绝对服从的观念。他们特别反对的是对于后备军的变动。后备军保存了 19 世纪初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斗争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且,与正规军不同,后备军的军官都出身于中等阶级。因此,自由党人把后备军看成是人民武装,是有志于自由主义改革的人们的希望所在。在他们看来,现在把后备军的军官归并到正规军军官团中去,无异于消灭普鲁士军队中所仅有

① 因其兄腓特烈·威廉四世患严重的精神病,不能理事。

的这块自由的阵地，对于普鲁士的政治改革的前途不利。由于自由党人坚决反对，政府撤回法案。洛恩企图甩开议会，强制推行军事改革。于是，自由党人让步了，他们在1860年5月，投票赞成拨款950万塔勒①，以供军事改革一年之用，同时以政府不执行自由党人所反对的那些改革项目为条件。然而，威廉和洛恩对此不予理会，而着手进行军事改革：把增补的部队改编成新的军团。政府这一专横无理的作法，虽然引起自由党人的不快，但是到1861年，他们又一次投票同意临时拨款，条件是政府必须把现役期限缩短到两年。

自由党领袖的这种妥协态度引起党内左翼分子的不满，后者不仅反对妥协，而且也主张利用讨论军事改革的机会，向政府提出议会改革的要求。他们终于在1861年脱离自由党，而另外成立“德意志进步党”。参加进步党的，多半是大学教授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奋斗目标有二：第一，加速德意志统一的步伐；第二，在普鲁士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实际上，进步党的纲领要求与“民族同盟”是基本一致的。

在1861年12月的选举中，进步党获得110个席位，成为下院中最大的党团。为防止政府不经议会的同意而擅自进行军事改革，进步党人在下院中坚持要求，在预算中详细明确地列举经费开支的项目，目的是防止政府把非军事性的经费用于军事改革。这个要求是针对威廉一世和洛恩的，威廉一世在一怒之下，把下院解散了。

但是，1862年5月举行选举的结果，进步党取得更大的胜利，他们得到135个席位，再加上其他反对党的支持，进步党完全控制了下院。面对进步党的强大力量，洛恩和其他将军们同意把现役年限定为两年，一些进步党人也准备接受。但是，威廉一世很强硬，他反对两年的现役期。在这个情况下，下院拒绝为军事改革拨更多的款。双方僵持不下，军事改革面临搁浅的危险。在绝望之余，国王一度甚至打算退位。这时，洛恩提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政府可以在不取得议会支持的情况下治理国家。他向国王推荐铁腕人物俾斯麦来支撑局面。威廉一世此时也看到，只有像俾斯麦这样有魄力、有手腕的人，才能帮他渡过难关，所以同意启用俾斯麦。

1862年9月20日，俾斯麦奉命返抵柏林，②两天后就同意就任宰相，因为他在与威廉一世的晤谈当中，二人的见解不谋而合：不管议会同意与否，军事改革必须进行。俾斯麦上任后不久，在9月29日的议会预算委员会上，公开宣布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说“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威力……普鲁士必须保持它的威力，等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

① 普法战争前德意志的大银币名。1857年起规定1磅白银铸30枚。

② 俾斯麦此前为驻法国大使。

了……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

这一段话把俾斯麦专横跋扈、崇尚暴力的面孔暴露无遗。不过,俾斯麦善于玩弄政治手腕,尽管他向威廉一世坚决表示,要毫不动摇地支持他与议会的斗争,但他也清楚地看到,在他应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外交问题之际,让国内的严重危机继续发展下去是不明智的。所以,他在上任之初,装出与议会和解的姿态,用好话哄骗进步党领袖。但进步党人拒绝了他伸出的橄榄枝,再一次表示:不经下院的同意,支出军费是不合法的。

于是,俾斯麦在1862年10月宣布议会休会。从此,开始了无议会的统治,亦即俾斯麦的军事独裁时期。他在不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征税,以便推行军事改革计划。为了压制舆论,政府还下令限制新闻出版自由。俾斯麦还为他的独裁统治狡辩。他曲解《1850年宪法》说:这部宪法虽然要求政府的预算每年都要由议会通过,但是,它对于在预算问题上,政府与议会发生争执时应该如何解决问题,没有规定具体办法。他还说,普鲁士不是英国,这里的内阁不向议会负责;在发生宪法上的纠纷时,只有国王有权力决定一切。俾斯麦之所以敢于实行独裁统治,而不把进步党人看在眼里,是因为他看清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弱点:他们虽然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但是他们更迫切的要求是统一,只要普鲁士政府满足他们这个要求,他们也会甘愿放弃自由的。

面对俾斯麦赤裸裸的独裁统治,进步党一筹莫展。虽然他们也想使用暴力,但是其领袖们认为,在武装到牙齿的普鲁士军队面前,人民的武装起义只有失败之一途。他们组织群众抵制征税的努力也毫无效果。他们也试图与工人阶级接触,在工人中间建立教育协会,以提高他们的道德文化水平,但同时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工人的社会政治要求。工人曾要求进步党接受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但是却被拒绝了。而且,德意志工人在60年代初开始有独立的阶级觉悟,不愿跟进步党人走。1863年5月,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样,进步党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俾斯麦一意孤行地推行军事改革。

在进步党人没有认识到联合工人阶级的重要性的时候,俾斯麦却认识到了。他在1863年5月秘密会晤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此后两人经常接触,并且达成协议:拉萨尔保证他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俾斯麦的统一计划,俾斯麦则允诺实行普选制。这样,俾斯麦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领袖勾结在一起了。

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软弱无力和拉萨尔与俾斯麦的勾结,使俾斯麦赢得了国内政局的安定。于是,他便有恃无恐地推行“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计划。

俾斯麦与对奥战争

经过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普鲁士的军队成为欧洲大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普鲁士加强军队力量的首要目的，是用它去进行反奥战争，但是，在发动对奥战争之前，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突然发生了领土纠纷。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个公国位于丹麦与易北河之间，都是丹麦国王的私人领地，但是，荷尔施泰因也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并且与石勒苏益格不可分地组成联盟。荷尔施泰因居民大多数为德意志人，丹麦人居少数；石勒苏益格的居民大多数为丹麦人，德意志人居少数。1863 年底，丹麦国王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把石勒苏益格划入丹麦版图。此举立即引起德意志人的反对，在全德出现了爱国热潮。各地的“民族同盟”和学术团体也行动起来，他们举行群众大会，向邦联议会写信，要求把两公国合并到德意志邦联，许多人还表示要参加对丹麦的战争。

俾斯麦积极准备对丹战争，因为他希望通过对丹战争提高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中的威信，同时也想把这次战争作为未来对奥战争的预演。当时奥地利不甘落后，也跃跃欲试地想打一场对丹战争。1864 年 1 月，普奥结成同盟，共同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丹麦国王放弃正式合并石勒苏益格的打算，否则以兵戎相见。丹麦拒绝了。于是在 1864 年 2 月 1 日，普奥军队出动，在两周内就占领了整个石勒苏益格。同年 7 月，丹麦军队全面崩溃。8 月初，丹麦国王被迫签订《维也纳和约》，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割让给普奥两国。8 月 21 日，普奥双方达成《加施泰因协定》：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管辖，荷尔施泰因归奥地利管辖；普鲁士有权在荷尔施泰因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敷设电缆。作这样的安排是俾斯麦的诡计，它埋下了后来普奥战争的火种。同时，通过这次战争，俾斯麦还摸清了奥地利军事力量的底细。

在对丹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展开“多边外交”活动，为的是在对奥战争中孤立奥地利。他深知，统一德国，就等于破坏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安排的欧洲秩序，因而列强是不会作壁上观的。首先他必须稳住英国，为此，他对英表现出亲善的姿态：与英国达成协议，降低普鲁士的关税。但是，他更重视俄、法两国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两个国家不会坐视普鲁士统一德国，因为德意志的分裂曾使俄国有可能向西扩张，使法国有可能占领莱茵河流域的土地。早在 1863 年爆发波兰民族起义时，俾斯麦就曾使普鲁士充当俄国镇压起义的帮凶，因而得到俄国在普奥战争中信守中立的承诺。

至于法国，俾斯麦摸清了拿破仑三世的脾气：他好虚荣，有领土野心，想靠扩张法国领土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1864 年 10 月到 1865 年 11 月，俾斯麦三次会晤拿破仑三世。晤谈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显然，拿破仑三世表示同意普鲁士向奥地利进攻，俾斯麦则暗示，不反对法国取得领土

"赔偿",即由法国兼并卢森堡、比利时或者普鲁士的莱茵省的一部分。

俾斯麦也确信,德意志许多邦会在战争中站到奥地利一边:小邦的君主害怕德国统一会剥夺他们的统治地位;小邦的自由派害怕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巴伐利亚及符腾堡的天主教徒会使这两个邦袒护天主教的奥地利。这样,奥地利的力量就会增强。为了抵消奥地利的力量,俾斯麦在1866年4月与意大利订立同盟条约,约定:如果战争在3个月内爆发,普意两国合作,共同进攻奥地利;普鲁士同意在对奥战争胜利后,意大利收复威尼斯。

这样,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俾斯麦造成了一个不利于奥地利的国际形势。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高枕无忧,他还要为对奥战争安排一个安定的后方。1866年4月9日,他向德意志邦联议会提出一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提案,要求在普遍、直接选举的基础上,选出一个全德议会,以便对邦联进行改革:建立全德铁路、邮政、电报和电话的管理机构;实行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统一货币、度量衡、关税和商业立法,等等。这个提案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却起了很大的迷惑人心的作用。普选制引起工人阶级对于普鲁士的幻想,改革建议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从而稳定了国内局势。在对丹战争结束后,德意志许多地区爆发了人民群众反对普鲁士强权政治的运动,但是在俾斯麦提出这个提案后,这个运动就平息了。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俾斯麦便借口奥地利对荷尔施泰因管理不善,对奥地利横加指责。这就激怒了奥地利,双方互不相让,终于导致1866年6月14日战争的爆发。

在战争中,德意志大多数邦(包括南德诸邦)站到奥地利方面对普作战。普鲁士曾要求萨克森、汉诺威及黑森-卡塞尔动员参加普鲁士方面作战,但是遭到拒绝。于是,普鲁士"兴师问罪",只用3天时间就占领了这3个邦的领土。7月3日,普奥两军决战于萨多瓦,普军大获全胜。当时,普王威廉一世和将领们都主张乘胜进军,占领南部各邦,直捣维也纳,强迫奥地利割地赔款,以示惩罚。但是,俾斯麦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过分凌辱奥地利和南部各邦,不仅会加强反普势力,妨碍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而且有可能招致法国出兵干涉。他力排众议,坚持适可而止。在俾斯麦的努力下,普奥双方于7月20日达成停战协定。8月23日,在布拉格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放弃了对荷尔施泰因的统治,同意普鲁士吞并汉诺威、黑森、拿骚和法兰克福;更重要的是,奥地利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联,同意美因河以北诸邦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除要求奥地利缴纳少量赔款外,没有割取奥地利一寸土地。对战败国的这种宽大处理,表现了俾斯麦的恢宏气度和政治灵活性,为后来对法战争中争取奥地利保持中立打下了基础。

普奥战争是俾斯麦统一德国道路上的关键性步骤。1867年,以普鲁士为首

的"北德意志联邦"宣告成立,它由美因河以北的19个邦和3个自由市组成,囊括了德意志2/3的领土和人口。

同年开始实施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是俾斯麦的精心"杰作",它既保持了普鲁士在联邦中的统治地位及普鲁士国王在政府中凌驾一切的权力,又处处罩上了民主的外衣。宪法的主要内容如下:普鲁士国王为联邦的永久主席,他不但有行政大权,而且还有对外宣战和媾和、统率联邦武装力量的权力。普鲁士首相兼联邦总理,他向主席负责而不向联邦议会负责。联邦议会的上院由各邦的代表组成,在全部43个代表中,普鲁士代表占17个,而且上院议长由总理兼任,这保证了普鲁士对上院的控制。为了安抚自由派(自由派在普鲁士以外的德意志各邦拥有很大的势力),也为了讨好工人阶级,俾斯麦又成立了根据普遍、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方法选出的下院。但实际上他对下院的权力作了很大的限制:下院所通过的法案,必须得到上院的批准才具有法律效力;军队编制和军事费用都永远固定下来(称之为"铁的预算"),下院无权过问;下院只能每隔3年讨论非军事预算(这只占预算总额的1%)的分配问题。显然,俾斯麦不想让下院掌握实权,只是利用它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安全阀。他曾私下对人说:他是想用"议会主义去摧毁议会主义",希望用一个毫无实权的下院的滑稽表演,来败坏议会制度的声誉。

但是,"北德意志联邦"的成立,标志着德国统一的初步完成,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拓宽了道路。因此,俾斯麦在德国资产阶级中的威望大大提高。过去反对俾斯麦的进步党,现在愿意和俾斯麦和解。新选出的普鲁士议会以压倒多数票,追认了自1862年以来,俾斯麦政府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所支付的一切费用。俾斯麦也不失时机地伸出和解之手,承认议会享有决定预算的权力。"宪法纠纷"至此烟消云散。进步党也发生分裂,其中多数人另外组成民族自由党,该党成为俾斯麦"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路线的忠实支持者。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意志,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二者不可兼得,资产阶级终于舍政治自由而取民族统一,这对德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普法战争与统一的完成

北德意志联邦之成立,并不意味着统一事业的大功告成,因为南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4邦仍然置身于联邦之外。这4个邦的君主们害怕加入北德联邦,会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民主派不信赖俾斯麦,担心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会侵犯人民的权利。然而,俾斯麦对南德诸邦采取了和解的态度,既没有因为它们在普奥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而惩罚它们,也没有强迫它们加入北德联邦。但是不久,俾斯麦利用了法国的侵略野心,促使南德诸邦转变了态度。

在普奥战争结束后,法皇拿破仑三世要求俾斯麦同意,把莱茵河西岸的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的部分领土合并于法国,作为对于法国在普奥战争中

保持中立的报偿。俾斯麦断然拒绝,并立即把拿破仑三世的这个意图通知了巴伐利亚国王及南德诸邦政府,从而在南德诸邦造成了恐惧法国的心理。利用南德的这种心理状态,俾斯麦遂与它们缔结了秘密的攻守同盟条约。在这个形势下,只要打一场普法战争,就可以激发南德诸邦的民族感情,就可以推动它们与北德联邦合并。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在战争中,南德诸邦与北德并肩作战,符腾堡及巴伐利亚的军队和普鲁士军队一样,都对德意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从而在全德激起了爱国热潮。南德诸邦的分离主义被这个热潮所压倒。1870 年 11 月,俾斯麦与南德 4 邦政府之间缔结了联合的条约,南德 4 邦正式与北德联邦合并,成立“德意志帝国”。1871 年 1 月 18 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终于完成。

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此后,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很快便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并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导致了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主角。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他为促进统一而推行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战争政策,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一个“从上面进行的普鲁士革命者”,①不自觉地充当了 1848 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② 因此,应当肯定俾斯麦的历史功绩。

由于德国的统一是由普鲁士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完成的,统一后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官僚警察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容克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些封建残余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三、意大利统一

1848 年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外国的奴役更变本加厉了。不但伦巴底和威尼斯二省照旧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直接统治下,而且还增添了新的外国势力:奥地利军队驻扎在托斯坎纳等国,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在罗马教皇国的法国军队也不肯撤走。外国势力竭力阻止意大利的统一,是因为意大利的分裂更有利于他们的宰割和奴役。1848 年革命失败后,大多数邦国又恢复了专制制度,废除了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只有撒丁王国保留了 1848 年宪法,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而且,也只有撒丁王国是不受外国奴役的独立国家。撒丁王国实行两院制的议会制度,保障了资产阶级自由,掌握政权的是地主资产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8 页。

级自由派。

摆在意大利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便是通过驱逐外国势力和消灭分裂状态，完成国家的统一。

统一运动中的两条路线

在如何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民主派和自由派有着不同的主张。

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战争，驱逐外国侵略者，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包括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则主张用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驱逐外国势力，实现统一，通过有限的资产阶级改革，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劳动人民的愿望。这一派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是共和主义者、"青年意大利"的创始人马志尼，他的思想在中小资产阶级和青年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也得到了城市工人和贫民的支持。1848 年革命失败后，他在意大利各地多次组织武装暴动，希望通过起义来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武装斗争，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但是马志尼所依靠的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和城市劳动人民，而对占人口总数 70% 以上的农民的问题却不重视。他也提出给农民一定的物质利益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他看不到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不主张破坏旧的土地关系，甚至害怕实行土地改革。他说："我们不要求改变合法获得的权力，不要求土地法，不要求违背个人特长的无益作法，不要求没收财产。"因此，民主派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结果走上了靠少数人暴动、暗杀等活动来实现统一的道路。马志尼天真地认为：只要少数人一起义，就会立即得到群众的响应，革命就会遍及全国，取得胜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组织了 1853 年 2 月的米兰起义、1854 年刺死帕尔马大公、1856 年刺伤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1857 年那不勒斯远征等行动。但是由于群众不了解这些行动的意义，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这些行动并没有导致革命的发生，反而遭到了反动势力对民主派的残酷镇压，使民主派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例如，那不勒斯远征的本来目的是发动一场人民革命，以推翻那里的君主统治并进一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但是远征队伍在那不勒斯登陆以后，由于事先没有作群众的组织准备工作，人民群众不了解远征队的意图，不但没有给革命者以支持，反而在反动当局的挑拨下，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远征军首领皮萨卡尼好不容易率领一小部分人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却在桑扎村被当地农民包围。皮萨卡尼下令不准向农民开枪，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牧师的挑唆下，把他们 27 个人活活地杀死了。

马志尼派的这些努力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者以自己的英勇斗争、鲜血和生命唤起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和斗争勇气，为即将到来的

民族统一运动的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民主派对统一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然而在另一方面，马志尼统一计划的屡次失败，也使许多原来的民主派人士逐渐脱离了他的路线，开始把统一的希望寄托于自由派身上。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人是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还在1848年革命的前夕，他主办了《统一报》，宣传废除专制制度的政治改革，认为“最好的法律在专制政府统治下也不会起任何作用。”1848年革命后，撒丁王国萨伏依王朝的新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也能容忍自由派思想，所以撒丁王国不但保留了1848年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而且继续实行改革。加富尔担任了财政大臣，执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很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拥戴。1852年他担任了首相，继续推行政治经济改革。在经济上，他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以资助铁路、港口和商船队的建设，取消了一些限制性的工业法规，降低了关税，鼓励工商业活动和发展对外贸易。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他又不断加强国防力量，以实力与奥地利对抗。在政治上，他主张政教分离，允许一定范围的言论自由，允许报纸刊载反奥文章，允许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人到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主要由皮埃蒙特和撒丁岛两部分组成；皮埃蒙特是意大利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撒丁王国首都都灵就在这里，所以撒丁王国也被称作皮埃蒙特。）政治避难。1848年革命后，意大利各地的许多革命者为了逃避迫害而来到皮埃蒙特，仅伦巴底—威尼斯地区就有2万家迁到皮埃蒙特。1852年米兰起义爆发后，奥地利当局没收了意大利流亡者在伦巴底—威尼斯地区的财产，加富尔就向议会提出一项法案，对需要照顾的流亡者发放津贴。对意大利的敌人奥地利，加富尔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奥地利对皮埃蒙特报纸刊登反奥文章向皮埃蒙特政府提出抗议，说这是煽动奥管区的意大利人造反，加富尔拒绝了这一抗议。他答复说，皮埃蒙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有新闻自由，政府无权干涉。他还讽刺说，这些报纸在奥统区是禁止发行的，所以他看不出会起什么煽动作用。

加富尔的这些措施增强了撒丁王国的国力，提高了撒丁王国在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地位和声望，不但得到了意大利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也博得了许多温和的民主派的好感，特别是在马志尼派组织的起义多次失败之后，许多中小资产阶级也开始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加富尔身上。1855年9月，1848年革命时的威尼斯共和国总统、著名共和派领导人曼宁发表声明说：“共和党，虽然受到那么多的诽谤，为了祖国大业，再一次采取了克制和牺牲的行动。它相信万事之首应该是建立意大利；它对萨伏依王朝说：‘建立意大利，我就站在你的一边……’”1857年，加富尔筹建了“意大利民族协会”，让曼宁担任主席，加里波第担任副主席，把相当大的共和派力量集中到他的间接领导之下。

然而，在如何实现由萨伏依王朝统一的问题上，加富尔与民主派的主张仍有

不同。民主派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深知人民革命的力量，所以主张以革命的方式统一祖国。而加富尔是贵族出身，不了解人民群众，更多地看到的是革命的一些破坏性和对君主立宪制的威胁，所以希望通过外交和王朝战争的方式来完成统一。然而，撒丁王国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像奥地利这样的大国，所以他极力想依靠法国的帮助把奥地利从意大利土地上驱逐出去，实现由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的目的。为了这一目的，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撒丁王国站在英法一方参加了战争。后来他又力主国王放弃个人的爱情而与法国皇室联姻。1858年7月21日，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在普隆比埃尔会晤，双方商定：法国将在一场撒丁王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支持撒丁王国，出兵20万，帮助撒丁王国把奥地利从伦巴底和威尼斯赶出去，建立一个包括撒丁王国、伦巴底和威尼斯以及教皇领地罗曼那在内的上意大利王国，归萨伏依王朝统治。作为报答，皮埃蒙特将把萨伏依和尼斯两地割让给法国。

1859年对奥战争·统一运动的第一阶段

从普隆比埃尔回国后，加富尔便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加强军队，筹集军费，修筑要塞，组织意大利各地的“意大利民族协会”成员筹划起义配合战争。1859年1月10日，国王艾曼努尔二世在皮埃蒙特议会开幕时讲话，公开发出警告：“我们对意大利各地区向我们发出的痛苦呼喊并不是无所知觉的。”同一天，皮埃蒙特与法国正式签订同盟条约。

接着，皮埃蒙特开始进行总动员，召集预备役人员，并且从意大利各地征召志愿人员入伍。大批的伦巴底和威尼斯人越过边界加入皮埃蒙特的军队，每天都有数百人之多，总共约2万人。为了使相当多不愿在国王军队中当兵的共和派发挥作用，加富尔让议会颁布了志愿军条例，建立了志愿军基金。他把加里波第召回国，商定由加里波第领导并指挥这支志愿军。

所有这些针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工作，都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加富尔的目的是刺激奥地利开第一枪，赢得舆论上的胜利。加富尔的这一目的终于达到了。4月23日，奥地利向皮埃蒙特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限皮埃蒙特3天内必须答应解除总动员，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皮埃蒙特拒绝了通牒。29日，奥军越过界河，打响了第一枪。

战争开始阶段，奥地利军队进入皮埃蒙特，占领了几个小地方，双方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5月23日，加里波第率志愿军进入伦巴底，攻占了瓦莱斯和科摩两城。6月4日，在马金塔战役中法国—撒丁联军获胜，占领了米兰，加里波第又占领了布莱西亚和伯尔哥摩。6月22日，法撒联军和奥军在索尔菲利诺发生激战，法撒联军获胜，奥军退守威尼斯的曼图亚等四大要塞。

与此同时，意大利各地的爱国运动迅速高涨。4月27日，托斯坎纳发生了由民主派领导的起义，大公利奥波德逃走。5月，帕尔马起义，女公爵逃走。6月

莫德纳起义,统治者被赶走。接着教皇领地之内的罗曼那也发生起义,摆脱了教皇的压迫。起义各地都建立了由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的临时政府。

拿破仑三世被意大利的革命形势所吓倒,害怕意大利统一会打乱他在意大利中部建立法国势力范围的计划。为了阻止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他没有通知撒丁王国便单独和奥地利讲和,并于7月11日在维拉弗朗加签订了和约。和约规定:奥地利把伦巴底割让给法国,由法国转让给撒丁王国,但威尼斯仍归奥地利;恢复莫德纳和托斯坎纳等中意各邦的君主统治。这一条约对加富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破坏了他的统一计划,因此他要求撒丁王国继续单独同奥地利作战,但被国王拒绝,加富尔便在这一天辞职了。11月10日,皮埃蒙特政府与奥地利签订条约,承认了《维拉弗朗加和约》的条款。

加富尔辞职前夕,暗中指使意大利中部各邦的临时政府首脑,要他们设法制止民主派或旧君主重新掌权。1859年八九月间,托斯坎纳,莫德纳帕尔马和罗曼那的临时政府先后选出了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担任"专政者"。他们采取了共同的防卫措施,加里波第也率志愿军来到中意大利,负责统一指挥各邦的武装。各邦都宣布和撒丁王国合并,在艾曼努尔二世迫于法国的压力不得不拒绝以后,各邦的"专政者"又强行实行撒丁王国的法律制度和政府制度,使合并成为既成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想恢复旧君主的统治的企图无法得逞,再加上英国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对抗法国,也反对在意大利中部各邦强行恢复旧君主的统治。1860年1月15日,英法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外部势力不得干涉意大利的内部事务,意大利中部各邦应由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归属。

1860年3月,加富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在中部各邦搞了一次全民投票,正式肯定了中意各邦合并于撒丁王国。4月,在法军的监视下,萨伏依和尼斯也举行了所谓的公民投票,正式将这两地划归法国。这样,到1860年春,撒丁王国的统治阶级利用了人民革命斗争和外交手段,初步完成了意大利的局部统一。

西西里起义和加里波第的远征·统一运动的第二阶段

1860年春天,意大利人民的统一运动又出现新的高潮。这是由西西里的农民起义引起的。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人民一向遭受极残酷的封建剥削。贵族地主占有全部可耕地,租佃条件十分苛刻,赋税极其繁重,农民除了缴纳捐税和地租外,几乎一无所有。1860年4月,西西里人民奋起反抗,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王国政府派出大批军队进行血腥镇压。消息传到意大利北部之后,人民立即向加里波第呼吁,请他率远征军去支援。加里波第是在50年代开始,走上与萨伏依王朝合作进行统一意大利的道路的。但是他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不同:一方面,他同意由萨伏依王朝统一意大利。在远征西西里前不久,他写信给西西里起义的领导人皮洛说:"要记住,纲领是:意大利和艾曼努尔。"另一方面,他与下层人民群众有比较

密切的联系，而且长期从事人民革命战争活动，深知人民群众的力量，对加富尔以尼斯（加里波第的家乡）换取法国支持来完成统一的作法十分不满，坚决主张用人民革命战争的方式完成祖国的统一。

为了进行远征，民主派组织了“千人志愿军”，让加里波第指挥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具有相当浓厚的民主派色彩，其成员大多数来自深受共和派影响的伦巴底—威尼斯地区，有一半人来自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家庭，有一半是工匠和工人，加里波第的几个助手都是民主派。5 月 5 日，加里波第率军从热那亚启程，渡海前往西西里，5 月 11 日在西西里的马尔萨拉登陆。加里波第的队伍受到西西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援，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协助作战。同时，北方人民也掀起了援助加里波第的声势浩大的运动，3 个月内，又有 2 万多名志愿军来到西西里加入了加里波第的队伍。撒丁王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意大利民族协会”和“千人长枪基金会”向志愿军提供武器和资金。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援助下，加里波第和西西里人民一道，很快打败了政府军，7 月初占领了整个西西里岛。

5 月 14 日，加里波第在萨拉米宣布以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名义任“专政者”，命令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重新组织地方议会，并颁布法令取消了许多不合理的税收，规定每个参战农民可以从公共土地上分得一块土地。但是加里波第同时也拒绝了农民提出的分配地主土地的要求，甚至同意派兵镇压抢夺地主土地的农民，这就使他在后期渐渐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对于加里波第的胜利，加富尔内心是很矛盾的。他想利用加里波第实现统一，又担心统一运动会变成一场革命，而使撒丁王国失去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和英法等国的支持。西西里解放后，加富尔派代表劝说加里波第立即使西西里和撒丁王国合并，企图以此来控制西西里，阻止加里波第进军那不勒斯，但被拒绝了。加富尔认为，只有在那不勒斯发动一场“革命”，使那不勒斯立即和撒丁王国合并，才能阻止加里波第的进军。但“人民只相信加里波第领导的革命”，对加富尔的计划根本不感兴趣。加富尔又让国王艾曼努尔命令加里波第不要渡过海峡进攻那不勒斯。加里波第这样答复国王的命令：“意大利目前的局势不允许我服从您的命令……，如果我现在无视人民的呼唤，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使神圣的意大利的事业毁于一旦。所以，请允许我这一次不服从您的命令。一旦我完成了我的义务，把人民从可恨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我将在您的脚下放下我手中的宝剑，在我的余生中永远服从您的命令。”

8 月 18 日，加里波第率领志愿军 16 000 人越过墨西拿海峡，在两西西里王国的卡拉布里亚地区登陆。人民以起义来迎接加里波第的到来。起义的人民封锁住西班牙波旁王朝军队向北逃跑的道路，1 万多名波旁王朝军队在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和起义群众的夹击下，于 8 月 30 日在索弗里亚村向加里波第缴械投

降。从此，波旁王朝军队望风披靡，许多军队不战而降。9月3日加里波第进入萨普里，9月6日占领萨勒诺，那不勒斯的军队狼狈逃窜，9月7日，加里波第进入首都那不勒斯。

加里波第进入那不勒斯城后，以行动表明了他主张由萨伏依王朝统一意大利的态度。进入那不勒斯城的当天晚上，他下令把停泊在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的舰队直接交由撒丁王国海军指挥。他还请停泊在那不勒斯海湾的撒丁王国军队参加那不勒斯城的防卫，并任命了许多加富尔派的人当临时政府部长，甚至还留用了一名波旁王朝的部长。这些措施甚至连加富尔都吃惊不已。

另外，加里波第没有立即乘胜追歼波旁王朝的军队，使它残存在那不勒斯境内，这就使加里波第进攻教皇国的计划无法实行。加富尔也竭力阻碍加里波第向教皇领地进军，他让科苏特等加里波第的朋友写信，劝说加里波第不要进攻教皇国，以免和法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时，拿破仑三世也害怕民主派在南意大利掌权，同意了加富尔的要求，让撒丁王国的军队进攻教皇领地的马尔撒和安波里亚两地区。为了防止加里波第在撒丁王国军队之前进入教皇领地，8月中旬加富尔下令停止向加里波第运送志愿人员和作战物资。

9月11日，3万多名撒丁王国军队攻入教皇领地，9月29日全部占领了马尔撒和安波里亚两个地区，然后向那不勒斯推进。这时加富尔向加里波第建议，让南意大利实行公民投票，对南意大利并入撒丁王国进行表决。加里波第不顾马志尼派的许多人如克里斯皮的反对，同意公民投票。民主派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表决结果，南意大利合并于撒丁王国。1860年11月初，艾曼努尔二世在加里波第的陪同下进入那不勒斯，接受全部权力。

1861年3月17日，都灵议会正式宣布成立意大利王国，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为意大利国王。不久，加富尔重申：在法国的同意下，在“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的原则”下，罗马应该成为意大利的首都。但是，1861年6月加富尔去世，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进入政治上不稳定的时期，平均每年换一个首相，因而没有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致使包括罗马在内的大部分教皇国仍处于意大利王国之外，意大利的威尼斯地区还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下，统一事业并没有最后完成。

意大利统一的最后完成

为了完成最后统一，加里波第等民主派曾多次组织志愿军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但是受到政府的阻挠。意大利统一的最后实现是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

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爆发战争，意大利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意军在战斗中不断失败，只有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屡获胜利。最后由于奥地利被普鲁士战败，根据《维也纳和约》，威尼斯归还意大利。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不得不调回驻罗马的军队。9月

初，意大利军队和加里波第的志愿军进入教皇辖地，20 日占领罗马。根据公民投票，罗马合并于意大利，教皇被剥夺世俗权力，避居梵蒂冈。至此，意大利统一最后完成。1871 年 1 月，意大利王国首都由佛罗伦萨迁到罗马。

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特点是：它始终贯穿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最后以“自上而下”道路的胜利而结束，因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都留下许多后遗症。在经济上，封建的土地制度——世代永佃制被保留下来。1866 年实行的民法保留了许多奴役性条款，如规定夫妻不得离异，已婚妇女从属丈夫等。所以广大农民和下层群众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生活日益恶化。在政治上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体，世袭的国王保留着很大的权力。他统率武装部队，任命内阁部长，有权否决议会的法案，有权任命参议员等等。虽然按惯例政府是向众议院负责，但众议院的选举是非常不民主的，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当时全国只有 2% 的人有权选举众议员，所以国家政权实际上是操纵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手中，连中小资产阶级都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尽管如此，意大利统一的完成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很多障碍。统一后的意大利，各邦间的关税壁垒消除了，统一了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铁路和公路的建设蓬勃开展起来，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四、俄国 1861 年改革

俄国农奴制危机

19 世纪前期，西欧主要国家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先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俄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

全国 90% 的人口是农奴，他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饱受贵族地主的压迫、虐待和剥削。农奴在地主的折磨下，死亡率极高，1836—1851 年农奴人口减少 50 万人。地主不但任意虐待农奴，而且还可以像买卖牛马一样买卖农奴，这是俄国农奴制的特点。

沙皇制度是最残暴的君主专制制度，军队、警察、特务是沙皇最得心应手的统治压迫工具。警察、特务遍布全国，他们专门伺察、监视人民的一言一行。军队驻扎全国各地，随时待命，一旦发生农奴暴动，立即前往镇压。沙皇政府还严厉执行书刊检查制度，剥夺了人民的出版、言论自由，全国人民噤若寒蝉。沙皇制度的国家机器的重大使命便是维护封建农奴制度。

但是，沙皇制度的残暴统治挽救不了黑暗的农奴制度。到 19 世纪前期，俄国农奴制度已经走向衰落。在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下，商品生产从内部瓦解着俄国农奴制。1846 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俄国的粮食出口激增。1850 年出口的小麦近 44 万吨，比 20 年代增加了两倍。出口粮食有利可图，推动着地

主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增加农民每周的劳动天数,缩减农民的份地;有些地主甚至完全收回农民的份地,迫使农民每天都为他们劳动。农民的地位已经下降到近乎奴隶。然而,强迫劳动不但不能提高生产率,反而使生产率越来越低。剥削农奴已经无利可图。某些生产出口粮食的地区,特别是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地主开始采用雇佣劳动代替农奴劳动。这样,农奴制度已走向衰落。

同时,农民阶级的分化也日益显著。少数富农通过扩大粮食生产和经商而发财致富,成为农奴关系掩盖下的农村资产阶级。他们利用剥削贫农的大量金钱,赎取了人身自由。农民的两极分化,也是农奴制衰落的重要表现。

在农奴制衰落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发展起来。1804 年,俄国有 1 200 家手工工场,到 50 年代末发展到 2 800 家。30 年代末,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1858 年,仅莫斯科一省就有蒸汽机 158 架。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人数也不断增加。在 1861 年改革前,共有工人 86 万名。同时,工业中自由雇佣劳动也逐渐超过农奴劳动。自由雇佣工人在全部工人中的比例,1804 年为 48%,1860 年上升到 87%。

但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远远落后于西欧。18 世纪末,俄国的生铁产量和英国相等。但到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俄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两倍,而英国增长了近 30 倍,俄国的生铁产量仅为英国的1/15。同期,俄国的铁路有 1 500 公里,而英国有 1.5 万公里,德国有 1 万公里。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反映出俄国工业水平之低。俄国出口的是农产品,进口的是工业品,它已逐渐沦为西欧各国的原料供应地。

农奴制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满足工业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在地主巧取豪夺下,广大农民一贫如洗,无力购买工业品,严重地限制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很明显,到 19 世纪中叶,农奴制已成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废除农奴制的斗争

在俄国思想界,围绕着废除农奴制问题,到 1840 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派别——“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但不赞成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它们,而是主张通过渐进的改革,废除农奴制,建立西欧式的君主立宪制,以实现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斯拉夫派”反对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认为西方国家因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变得腐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就是西方社会的“溃疡病”。他们认为俄国发展的道路是独特的,发展的基础是俄国农村公社。他们主张,在保留农村公社及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这样地主就会和农民在农村公社内和平相处,农民也不会反对沙皇政府。农村公社将会给俄国带来社会安定及经济繁荣。因此,“斯拉夫派”拥护沙皇制度,仅渴望在沙皇制度下享有言论自由。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实现以沙皇俄国为中心

的、斯拉夫人的联合。

到1848年,“西方派”又分裂为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由派。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坚持旧立场的“自由派”不同,是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多数人出身小官吏、低级僧侣、小市民和农民家庭,少数为贵族家庭的背叛者。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废除农奴制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到五六十年代,他们成为俄国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

亚·伊·赫尔岑(1812—1870)在青年时期立志献身革命,1847年因受沙皇政府迫害流亡国外。1857年开始出版《钟声》杂志,号召俄国一切进步力量为农奴的解放和实现民主而斗争。他还在伦敦建立了一个革命组织。

赫尔岑的革命精神,唤醒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新的革命一代。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社会活动家。他熟知农民的悲惨境遇,理解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认为只有农民革命才是农民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因而他对统治阶级不抱任何幻想。他在抨击农奴制的时候,积极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废除农奴制,必须先消灭专制制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是比赫尔岑更为坚定的革命者,但他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同赫尔岑一样有空想思想。他认为:俄国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和学生。他嫉恶如仇,毫不留情地批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

这些以废除农奴制度为己任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非孤军奋战,与他们遥相呼应的是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在1825—1855年的30年间,农民运动发生500次以上,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被农民斗争困扰的沙皇和贵族坐卧不宁,他们力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摆脱国内的困境。

克里米亚战争

1853年,俄国终于发动侵略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有其国际背景。19世纪前期,土耳其帝国日趋衰落,欧洲列强觊觎其领土,都虎视眈眈,想趁机宰割这个老大帝国。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地域,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首都伊斯坦布尔是东西方贸易的必经之路,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为黑海通往东地中海的咽喉,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因此,英法俄等列强都想控制两个海峡及伊斯坦布尔,其中俄国野心最大,因而与英法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从18世纪末起,俄国就连续不断地用武力蚕食黑海北岸的土耳其土地。还企图进一步控制土耳其境内的海峡,以便向中近东地区和巴尔干扩张势力。1833年,俄国利用土耳其内部困难,强迫土耳其签订《温卡尔—斯凯列西条约》,土耳其同意俄国军舰通过海峡,同时却禁止其他国家的军舰进入海峡。这使俄

国在近东的地位大大加强。

当时土耳其已经成为英法两国的商品市场,但是它们还不满足,都想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俄国势力的扩张,自然引起了英法的不安和反对。

1841 年《温卡尔—斯凯列西》条约期满,英法乘此机会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缔结了关于海峡的国际条约,它规定:土耳其处在和平时期,外国军舰一律不得进入海峡;一旦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只有得到土耳其允许的国家才有权通过海峡。这实际上剥夺了俄国军舰通过海峡的权利。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俄国派军队帮助奥地利把匈牙利革命镇压下去,由是俄国在国际反动势力中间的地位突然抬高。俄国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恢复自己在土耳其丧失的地位,开始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准备攻打土耳其。同时,俄国国内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沙皇专制制度面临覆灭的危险。为了摆脱困境,进行对外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这时,西欧进入资本主义高涨时期,英法资产阶级加紧争夺国外市场,它们都渴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土耳其的市场,因此对俄国侵略土耳其的野心都很不安。为了对付俄国,英法都积极“援助”土耳其,尤其是法国以大量贷款和军火供应土耳其。土耳其愈益靠近英法。

巴勒斯坦“圣地”问题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长久以来,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就“圣地”管辖权问题争执不断。1852 年 8 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圣地”的管辖权归于天主教会。俄国是东正教国家,沙皇便以此为借口,于 1853 年 6 月派大军入侵土耳其,俄土战争由是爆发。这一年 11 月,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南部被俄国海军歼灭。土耳其的军事惨败,促使英法于 1854 年 3 月对俄宣战。英法联合舰队向俄国的沿海城市发动猛烈的攻势。但是,英法政府不打算彻底摧毁沙皇的统治,因为它是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柱,一旦失去它,欧洲革命可能又会爆发。因此,英法就把战争局限在克里米亚半岛上。这场战争的性质,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在战争中,俄军士兵虽然勇敢顽强,但是落后和腐败使俄国毫无胜利的希望。俄军仍旧使用滑膛枪,其射程仅是英法联军来复枪的 1/3。俄国海军战舰仍旧是帆船,而联军已更新为先进的汽船。俄国南方没有铁路,军用物资全靠大车运送,弹药、粮食供应极度不足。联军却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占领区修筑了铁路,能及时地补充作战物资。除此之外,俄军还缺乏必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甚至没有作战地图。军官也利用战乱侵吞公款、贪污军需物品。

结果,1855 年秋,俄国军事重镇塞瓦斯托波尔被联军攻陷,战争很快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856 年 2 月,双方在巴黎订立和约。根据和约,黑海中立,不准俄国在黑海保留舰队及在黑海沿岸设立要塞。战败使俄国的国际地位一落

千丈。

俄国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这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同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英法之间的战争。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俄国统治者从政治昏睡中清醒过来,他们认识到:只有废除农奴制,尽快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才是俄国的出路。

改革的背景

克里米亚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苦不堪言。政府置农民疾苦于不顾,加重赋税以充军费,迫使农民铤而走险进行反抗。结果,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运动。仅 1860 年就发生 108 次农民暴动。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震撼了贵族地主的统治。

在农民运动的推动下,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准备革命。早在 1859 年 5 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圣彼得堡成立秘密革命组织,并主动与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伦敦的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准备发动公开的起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组织还制定了比较彻底的纲领,坚持"自下而上"的革命,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农奴制,使农民无代价地分到土地。1860 年末到 1861 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起草了题为《领地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的宣言,揭露沙皇的真面目,号召农民准备起义。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份宣言还没有发出就落到警察手里。

由于沙皇政府拥有强大的军事警察机器,加上农民的觉悟尚低,力量涣散,革命民主主义者难以把分散的农民运动统一成全面的革命。这样,1859—1861 年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运动没有结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消灭农奴制的革命道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却迫使沙皇政府走上了"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

早在 1856 年 3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对莫斯科贵族谈及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他认为: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从 1857 年开始,沙皇政府着手改革的准备工作。负责改革工作的是由高级官吏和大农奴主组成的"农民事务总委员会"。改革草案的基本原则是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亚历山大二世在最高国务会议最后审定改革方案时说:"诸位会相信,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做的一切都做到了。"

1861 年 3 月 3 日(俄历 2 月 19 日),沙皇签署了《1861 年 2 月 19 日宣言》和《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法令》。3 月 5 日,上述"宣言"和"法令"正式公布。

1861 年改革的内容

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首先宣布农民实现人身自由。地主再也不能买卖、交换农民,也不能干涉农民的家庭生活。农民有权用自己的名字订立契约、从事工商业活动,拥有动产和不动产,进行诉讼;还可以改变身份,成为市民或商人。其次,规定全部土地

仍属地主所有,农民可以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赎金数额高出土地实际价格二三倍。赎金的 20% ~25% 由农民支付现金,其余由政府以有息债券代付,农民需在 49 年内向政府还本付息。最后,为了管理农民,又规定把农民组织在原来的村社中。村社的公职人员由农民选举产生,但必须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并隶属于地方行政机构。在村社上面又设置一个由地方贵族担任的调停人,负责处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保障地主的利益。同时,村社实行连环保,以约束农民按时完成各类赋役。这样,过去受个别地主支配的农民,现在落入地主地方政权的管理之下。

1861 年的改革,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一次大规模掠夺。农民在改革中分到的土地,按 1861 年市价计算仅值 5 亿多卢布,但到 1905 年为止,农民共交付赎金 20 亿卢布。农民虽然付出高昂的赎金,但分得的土地的面积比改革前减少了,质量也更坏了。因为地主在改革过程中把最好的土地割走,把最坏的土地留给了农民。在黑土地带,地主平均割去农民使用土地的 1/4,在全国平均为 1/5。改革前地主和农民共有的水塘、牧场及森林也都归地主所有。改革后,全俄每个农民平均分到 3.4 俄亩土地。由于耕地减少,经济上不能自立,他们不得不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向地主租地。获得“解放”的农民又在“工役制”或“对分制”的形式下,重新遭受地主的盘剥。这些剥削方式都是农奴制的残余。

改革措施实施后,沙皇政府欺骗农民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引起广大农民的极度不满,农民运动又席卷全国。仅在 1861 年到 1863 年间,就发生了 2 000 多起农民暴动,但都遭到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也遭到逮捕,被判处苦役或流放。

农奴制废除以后,沙皇政府又在其他方面实行一系列改革。1864 年,在省、县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自治会议和自治局)。1870 年,在城市建立杜马和自治局。但是,地方自治机构都控制在地方贵族手中,城市自治机构被城市大资产阶级所操纵;而且自治机构受到行政当局的严格监督,职权也很小,只能管理地方经济、卫生和教育。1864 年,还参照西欧模式进行司法改革,建立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实行公开审判。司法改革在当时各项改革中是比较彻底的,但仍带有农奴制色彩。政治案件往往由行政部门处理,被捕的革命者不经审判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些事实表明,改革没有触动沙皇专制制度。

1861 年改革虽然是在农奴主主持下进行的,但就其内容而言,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废除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统治权力,使2 100多万农民从农奴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为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又对政治上层建筑作了局部调整。这些变革毕竟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农奴制的废除成为俄国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五、美国内战

北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9世纪前期，美国通过购买、武装颠覆和发动战争等手段，实行领土扩张。1803年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地区（包括现在的阿肯色、衣阿华、密苏里、内布拉斯加和路易斯安那等13个州）。1810年，侵入西班牙所属的佛罗里达西部，1818年，又出兵侵占佛罗里达东部，并于次年胁迫西班牙政府将它卖给美国。1835年策动美国移民在墨西哥的得克萨斯搞武装暴动，成立得克萨斯傀儡国，1845年将这块土地合并为美国的第28个州。1846—1848年挑起侵墨战争，夺得了包括现在的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4个州和科罗拉多及怀俄明州的一部分在内的辽阔领土。同时，美国又在1846年以战争相威胁，从英国手中夺取了俄勒冈地区的一部分。最后，美国在1867年又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

这样，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领土已经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土地从1783年的200余万平方公里扩大到内战前的约780万平方公里。

美国领土扩展的过程，也是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被剿灭、其土地被掠夺的过程。到19世纪末，印第安人从原来的100多万减到24万。仅在1802—1822年的20年内，就有1 500万英亩土地被掠夺。

美国还在东亚扩张势力。1844年。它强迫中国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的《望厦条约》，除得到像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得到的一切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还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853—1854年，美国用炮舰迫使日本放弃“锁国政策”，为美国和其他殖民强盗侵略日本打开门户。1866、1867年，美国曾两次入侵朝鲜，但均被朝鲜人民击退。

领土扩张和海外掠夺，加速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790年，塞缪尔·斯莱特引进新式纺纱机。以此为标志，美国进入了工业革命阶段。在1810—1860年的50年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9倍，仅次于英、法、普（普鲁士），居世界第4位。

在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业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发展。在19世纪初，北部、西北部的小农经济还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但这种自然经济由于东北地区进入工业革命后，逐渐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少数富裕农民把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通过雇佣工人，扩大经营而成为农业资本家；另一方面，广大贫苦农民受到剥削、压迫而走向破产，不得不受雇于人，成为农业工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形式，列宁称之为“美国式道路”，以区别于“普鲁士式道路”。

新兴的农业资本家所经营的农场，有的规模很大。如迈克尔·沙利文拥有8万英亩土地，使用一二百名雇佣工人，饲养5 000头羊。资本主义农场一般都采用机器和先进技术。19世纪中叶，美国农业中耕地、碎土、播种、收割、打谷等都已用机器。由于大农场的出现和机器及先进技术的采用，农业产量大大提高。到19世纪中叶，芝加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谷仓。

必须指出，移民在美国资本主义工农业迅速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仅在1820—1860年的40年中，移民总数就超过了500万。1848年以前，到美国的移民主要是农民和熟练的手工业者，1848年以后，则主要是产业工人。他们移居美国后，不仅补充了美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带去了欧洲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美国资本家曾诱骗数万华人前往做苦力。1862年在加利福尼亚矿工中，华人超过半数。内战后10年中，运往美国的华工达10万之众。他们参加修建美国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联邦中央太平洋铁路，后来又参加了北太平洋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的建筑。中国华工为开发美国西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南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不过，美国工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只限于北部和东北部，美国南部却是沿着另一条道路——奴隶制经济发展的。

奴隶制度未被独立战争的炮火摧毁，反而受到1787年《联邦宪法》的保护。本来，美国南部奴隶制经济因为生产效率低、成本高，到18世纪末已奄奄一息，不少奴隶主已开始自动释放奴隶。但在1793年，小学教师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将清除棉籽的手工劳动变为机器操作，效率提高149倍，配以蒸汽机推动，效率更提高1 000倍。由于此时西欧一些先进国家以及美国北部都开始了工业革命，对棉花的需求量陡然增加，因而使种植棉花有利可图。于是，南部种植园奴隶主便拼命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并大量贩入黑奴，建立新的蓄奴州。南部奴隶制因此而绝处逢生。至内战前夕，南部的黑奴已增加到400万人，共有15个蓄奴州，南部变成了“棉花王国”。

以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美国奴隶制经济，一开始就依赖资本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组成部分。它的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原动力是追求剩余价值、增殖财富。它不同于古典奴隶制，而属于商品奴隶制。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每一滴血汗，它比古典奴隶制带有更大的残酷性。黑奴在监工的鞭打下劳动，每天工作长达18或19个小时，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即使原先身强力壮的黑奴，也往往劳动七八年就活活累死。

由于片面发展种植园奴隶制经济，南部工业远远落后于北方。内战前，在全国工厂总数中，南部只占15%；在全国工业投资总额中，南部只占9.5%；在工资

劳动者总数中，南部只占 8.5%；在全国工业总产量中，南部只占 8%。

南北两种经济制度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北部需要大量自由雇佣劳动力，南部奴隶主却把几百万黑奴禁锢在种植园内；北部需要大量的棉花等工业原料，南部奴隶制经济却具有殖民地经济性质，产品多数输往英、法及其他欧洲国家；北部需要南部作为商品销售市场，一贫如洗的黑奴却无力购买任何工业品；北部资产阶级需要提高关税以保护自己的工业，控制联邦政府的南部奴隶主却极力降低关税，以购买廉价的外国商品。南北双方上述矛盾，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领土的扩大、废奴运动的发展和黑人反抗斗争的加强而日益激化。

两种制度矛盾的激化

南北方斗争的焦点围绕西部领土展开。这是因为：在领土扩张中，不断有新州加入合众国。种植园奴隶主力图把每个新州变为蓄奴州。从经济上讲，奴隶主主要把资金投放到购买奴隶和土地上，所以无力改良土壤，无力施肥，对土地实行掠夺式耕作，以致一块土地在几年之后便失去地力而无法继续耕种。因而，“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①从政治上讲，增加蓄奴州个数有利于奴隶主增强在参议院中的势力。按《美国宪法》规定，众议院代表席位与所代表的人口成正比例。南部各州人口增长大大缓慢于北方各州，因而奴隶主很难在众议院取得更多席位。但参议员名额无论州大州小，各州均有两个。每增加一个蓄奴州，就意味着在参议院中增加了两个奴隶主利益的代表。

北部资产阶级也力求把每一个新州变为自由州。在自由州里，小农经济可以避免奴隶制经济的排挤得到发展。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向工业提供粮食和原料，也有利于扩大工业品市场。当然，自由州的增加，对北部资产阶级控制国会同样有利。广大农民、失业者和新移民站在北部资产阶级一边，坚决反对把新州变成蓄奴州，以便他们能自由地获得土地。

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双方争夺西部土地的斗争愈演愈烈。不过在这些斗争中，北部资产阶级一再退让妥协，南部奴隶主则得寸进尺。

1819 年以前，自由州与蓄奴州数目相等，所以南北双方在参议院中的势力是平衡的。1819 年，密苏里申请以州的资格加入联邦。由于该州奴隶制存废问题对于南方在参议院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所以南方奴隶主疯狂地要求把密苏里确定为蓄奴州。一连数月双方争执不下。1820 年 3 月，国会的南北方代表终于达成妥协：确定密苏里为蓄奴州，同时从马萨诸塞州分出一个新州——缅因州作为自由州。但对北方有利的是，它为尚未建州的西部广大地域，划定了奴隶制与自由制的分界线——北纬 36 度 30 分以南为奴隶制区域，以北为自由制区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53 页。

此为“密苏里妥协案”。

然而,南部奴隶主并不满足于这次妥协,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奴隶制扩展到整个西部。他们的这种野心在1854年国会讨论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建州时暴露无遗。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均位于北纬36度30分以北,按《密苏里妥协案》规定,应成为自由州。但奴隶主却强迫国会授权新州居民自己决定奴隶制的存废。《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通过,奴隶主反动武装便冲进堪萨斯,企图用武力强行建立奴隶制。奴隶主的暴行激起北部工人、农民、废奴主义者的极大愤慨,他们自动武装起来,在堪萨斯与奴隶主反动武装进行流血斗争。堪萨斯事件表明,两种制度的矛盾已发展为武装冲突。马克思称这一事件为美国内战的开始。

在堪萨斯内战中,北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顽强、英勇的战斗精神,使南方奴隶主认识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并不可靠。到1857年,他们又利用联邦最高法院作为扩张奴隶制的工具。这一年最高法院通过了“德雷德·斯科特判决”,宣布:今后奴隶被带到任何地方都是主人的财产。这就是说:奴隶制度在全国一切地方都是合法的。因此,这个判决激起了北方广大人民的义愤。

两种制度的矛盾也因北部废奴运动的发展而尖锐起来。废奴思想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萌发,废奴运动也于那时兴起。到19世纪30年代,北部废奴运动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833年全国性废奴组织“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废奴运动的兴起。废奴运动著名领袖有劳埃·加里森、温德尔·菲利普斯及黑人弗雷得里克·道格拉斯等。北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黑人及先进的知识分子是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到处进行消灭黑奴制的宣传鼓动,并组织起“地下铁道”,协助南方黑奴逃到北方和加拿大。到1840年,这个协会已有2 000个地方组织,会员达25万人,至少办有25种报纸。

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废奴运动声势大,但战斗力不强,主要原因在于,主张用道德说教去感化奴隶主的派别在运动中占支配地位。1840年废奴派发生分裂:一派拥护政治行动,主张废奴派成立政党,参加竞选,通过立法手段消灭奴隶制;另一派继续坚持道德说教的方式。

到50年代,废奴运动中一个新的派别——暴力革命派兴起并愈益得势,他们既反对道德说教,又反对政治行动,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消灭奴隶制度。

约翰·布朗起义是暴力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1859年10月16日,布朗带着他的3个儿子、13个白人和5个黑人,在弗吉尼亚州境内的哈泼斯渡口发动武装暴动,开始解放奴隶。经过两天激战,终因众寡悬殊,被奴隶主反动武装镇压下去。布朗和他的战友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反奴隶制的壮歌,有力地激励了反对奴隶制的力量。

19世纪40—50年代,废奴运动队伍也迅速扩大。有人估计,仅仅由于1852

年斯托夫人出版的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影响，就有200万人成了废奴主义者。

奴隶制的危机

当北部经济高涨，废奴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南部奴隶制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南部十分缺乏劳动力，而外来移民极少到南部去，致使奴隶价格扶摇直上，1828年每名奴隶售价700美元左右，到1860年时上涨至1 800美元，种植园主投入成倍增加。奴隶制经济效益极低，到50年代，已到了几乎无利可图的地步。投资大，利润少，使大多数种植园主负债累累。内战爆发时，南部奴隶主向北部银行家和商人借债总数已达4亿美元。

到50年代，南部奴隶主寡头政治统治也遭到了非奴隶占有者的强烈反对。在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等州，他们公开提出了逐步解放奴隶的要求。有的废奴主义者还当选为州立法议会议员或市长。

这一时期，黑人奴隶密谋事件和起义此伏彼起，在各州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他们的活动往往有贫穷白人支持、参加，表明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在南部已处于孤立境地。

到50—60年代，由于美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奴隶主的政治优势也丧失了。首先是西北部的成长。在过去几十年中，民主党之所以有力量，关键在于南部奴隶主与西部农民之间结成了联盟。开放西部国有土地、拆除关税壁垒是二者共同利益所在。但奴隶主无限制地扩展种植园的野心却与西部农民争取土地、发展小农经济的要求相悖，因而随着奴隶制向西北部的扩张，二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农民逐步脱离了与奴隶主的联盟，转而支持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奴隶主的政治优势被打破。

其次是共和党的崛起。共和党成立于1854年，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以反对奴隶制为目标的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及黑人的联合组织，其领导力量是工业资产阶级。共和党形成不久，便把全国各派反奴隶制势力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自由党、自由土地党①、民主党内的反对派以及瓦解中的辉格党北方派都参加了进来。到1855年末，北方所有的自由州都建立起了共和党组织。1856年，共和党参加竞选总统，在11个州获胜，这表明它得到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巨大支持。共和党的崛起严重威胁着奴隶主的政治统治。

最后是民主党自身的分裂。民主党由北部民主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组成。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两派各执一端。南部民主党人一贯不择手段地扩展奴隶制，北部民主党人坚持“居民主权原则”，即由居民自己投票决定所在州的奴隶制存废。堪萨斯流血斗争引起民主党内部第一次分裂。在1858年关于奴隶制

---

① 成立于1848年，提出“自由土壤、自由言论、自由劳动、自由人民”的政治口号，是一个新兴的反对奴隶制的政党，是共和党的前身。

的大辩论中，裂痕进一步扩大。在1860年的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公开分裂，形成南北两个民主党，各有自己的纲领和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为共和党在1860年大选获胜提供了方便。

内战的爆发及第一阶段

1860年，美国进行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林肯的当选，成为美国内战爆发的导火索。

林肯(1809—1865)出生在肯塔基州一个农民家庭。从7岁开始帮助父母放牛、开地和打柴。年岁稍大一点，又当过雇农、船夫、小店铺里的伙计，后来又当过乡邮员和土地测量员。他一生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但是他刻苦勤学，利用一切机会向人请教、借书，终于通过自学成为一位博学的人。他阅读范围甚广，特别努力钻研法律，结果当上了伊利诺斯州的律师。他曾4次被选进伊利诺斯州立法会议，而且在联邦众议院中任过一届众议员(1847—1849)。1856年他加入共和党。他反对奴隶制度，认为奴隶制度违反自由平等原则。他说，不能以种族优劣为借口替黑人奴隶制度辩护。但是他不是废奴主义者，因为他反对立即废除奴隶制度，反对干涉南方诸州现存的奴隶制度。他只是要求限制奴隶制向西部扩张，他认为，如果把奴隶制度固定在原来的地区内而不让它进一步扩展，则它在一定的时期会逐渐自行消灭。他尤其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用暴力手段去推翻南方奴隶制度。他在1856年说过："不要弄错了，选票比子弹更有力量。"

林肯之反对奴隶制度，也是和他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过下面的话，以证明资本主义比奴隶制度优越得多："'希望'二字对于人的努力和幸福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如果你用鞭子强迫奴隶梳大麻的话，他在一天之内连75磅也梳不出来，但是假如派他梳100磅，同时答应按他做的工作全部付给报酬的话，他将给你梳出150磅。"他之拥护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制度，也是由于他在这个制度中看到了人们的自由。他说："……我很高兴看到一个劳动制度盛行于新英格兰，在这个制度下，劳动者当他愿意的时候就可以罢工，在这里他不被强迫在一切环境下工作，而且也不被束缚住和(不管你给报酬与否)被强制去劳动！我喜欢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容许一个人离开工作，当他愿意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制度到处施行。我之所以反对奴隶制度的理由之一，正是在这里。"

在1860年的竞选纲领中，共和党明确地宣布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扩张。因此这次大选的胜利意味着奴隶主把奴隶制扩大到西部去的希望完全破灭，这也意味着奴隶制面临灭亡的前景。

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奴隶主决定在林肯就职以前发动叛乱。南卡罗来纳等7个州先后宣布脱离联邦，并于1861年2月4日宣布成立另外一个名为"美

利坚诸州同盟"的国家,将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定为首都,推举"野心勃勃如恶魔,冷酷无情似蛇蝎"的戴维斯为总统。林肯就职后,曾试图同奴隶主谋求和解,但遭拒绝。奴隶主叛乱武装于4月12—14日首先炮轰并占领了政府军守卫的萨姆特要塞。4月15日,林肯政府正式宣布对南部同盟作战。内战爆发了。之后,南部又有4个州参加叛乱。

南方奴隶主之所以敢于发动这一场内战,是由于他们对于局势作了主观片面的估计。首先他们认为北方缺乏军事人才,当时美国的许多知名将领都是奴隶主出身,他们在林肯当选总统以后,纷纷南下参加叛乱。而且他们知道北方对战争毫无准备,南方则早有充分的准备。早在1860年冬林肯大选获胜后,南方就通过其在北方的代理人布坎南总统把大批武器运往南方,还从欧洲购入大量武器弹药,并且积极训练军队。其次,他们指望得到英国的援助。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手中有一张王牌——棉花。南方诸州是英法棉纺织工业原料的主要供应者,一旦断绝棉花供应,英法尤其是英国的棉纺工业将陷于停顿,这就必然迫使两国进行武装干涉。一个叛乱分子得意忘形地吹嘘棉花的作用说:"我们所指的是那小小的、细弱的棉线,一个小孩子可以弄断它,但是它却能够把世界绞死。"

战争开始时,联邦政府在人力、物力及政治方面较南方占有明显的优势。站在联邦政府方面的有23个州,站在南部同盟的州仅11个。根据1860年的人口统计,支持联邦的北部各州总人口达2 234万人,11个分离州的总人口才910万,其中400万是黑人。1860年全美共有纺纱厂107座,其中南方只有6座。同年,北方的银行资本超过34亿美元,而南方只有2 200万美元。北部的铁路占全国铁路的2/3。北方在政治上也处于比南方更为有利的地位。正义在北方,广大人民积极支持联邦政府粉碎叛乱的斗争。4月15日,林肯发布征集7.5万名志愿军的命令后,人民踊跃参军,报名者达30万人之众。与此相反,南方奴隶主不仅受到400万黑奴的反抗,还遭到南方白人中间的广大下层人民的反对。

北方虽然在人力、物力及政治方面比南方优越得多,但是在内战第一阶段时,北方在军事上连遭失败。1861年7月在马那萨斯一役,北军被打得溃不成军。1862年北方虽然在西线上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从南方手中夺取了几个战略据点,但是在东线却连受挫折。1862年夏的"半岛战役"以严重的失败而告终。南军乘胜北上,甚至直接威胁了首都华盛顿。

北方在内战初期的屡次失利,首先由于北方潜在的优势未能立即发挥作用,南方在军事上的某些优势反而显得突出,北方特别缺乏有才干、有经验的高级军官。其次在战争准备上,北方措手不及,士兵都是仓促之间召集的,没有经过训练,毫无作战经验。再次,战争开始后,北方采取进攻战略,交通线拖得很长,在人力、物力上常常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战争初期北方的失利也与林肯政府坚

持的战争目标密切相关。

以林肯为首的北方政府一开始就宣布恢复国家的统一(或拯救联邦)是战争的主要目标。林肯特别坚持这个目标。他的这个态度遭到激进派和废奴派的反对,他们要求政府为解放南方奴隶而战,把解放奴隶作为北方进行战争的最高目标。

林肯的上述态度显然是正确的。当时美国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是:南方分裂出去,国家分为两半,而且南方分裂主义者还企图勾结英法干涉美国内战,美国有重新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危险。退一步讲,即使事情没有恶化到这个地步,国家的分裂也将严重阻碍美国的进步发展,使方兴未艾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可见,林肯把恢复联邦的统一摆在首要位置上,说明他高瞻远瞩,能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

在内战第一阶段,林肯坚持不肯实行解放奴隶的政策。1861 年 8 月 30 日在密苏里战场上指挥作战的弗里蒙特将军,发布一道局部解放奴隶的命令,宣布在密苏里州境内任何人,凡是参加敌人方面作战的,他手中的奴隶一律予以解放。林肯得知后,便马上取消了弗里蒙特的命令,而且将他免职。可见,林肯反对解放奴隶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那么,林肯为什么反对解放奴隶呢?

本来,林肯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但是一旦就任合众国的总统,他就身不由己了。他说:“我自然是反对奴隶制度的。然而我从来也不理解,一当上总统就可以有无限的权力,按照这个判断和感觉以总统的身份行动”。实际上,在内战初期,他之反对解放奴隶,与他的性格和思想倾向有莫大的关系。他为人老成持重,从不“盲目急躁”,而是“一步一步前进”。[①] 在他看来,解放奴隶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必须缜密考虑其利弊得失,不应该匆忙地作出决策。而且,林肯一贯反对走极端,除非客观环境逼迫他这样做。他认为立即宣布解放奴隶就是一个走极端的作法,所以他表示反对。

但是,林肯之拒绝解放奴隶,还有两个具体原因。第一,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内战爆发后,边境诸蓄奴州肯塔基、马里兰、密苏里及特拉华,由于种种原因未参加叛乱。前三个州都是大州,是联邦士兵的重要来源地,是首都华盛顿的屏障,更重要的是联邦进攻南方的战略基地。林肯担心,一旦宣布解放奴隶,就会把这几个州推到南方叛乱者的怀抱,这将葬送整个内战的前途。据林肯自己透露,弗里蒙特的命令曾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战场上有一个整连的志愿军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放下武器回家。第二,林肯总是优先考虑白人工人的利益,而把黑人奴隶的利益放在从属地位。他担心解放奴隶会造成对白人工人极为不利的后果,因为自由黑人在劳动市场上与白人工人的竞争,会造成白人的失业及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60 页。

资的下降。

林肯之拒绝解放奴隶，在北方引起了共和党内激进派的批评，随着战争的拖延（内战初起时，北方人一般都估计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未料想到战争持续4年之久），这个批评也越来越猛烈。激进派指出，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摧毁作为战争根源的奴隶制度。有人说，林肯是“为了维持现状而进行这一场战争的，殊不知战争正是现状所引起的。”国会中的激进派议员甚至表示要停止向军队拨款和供应军需品，借以迫使林肯让步。来自人民群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到1862年，北方已有100多个人民团体散发传单，要求解放奴隶。

林肯静静地倾听激进派及其他人的批评和谴责，也彬彬有礼地听取一些废奴派代表团的意见。在激进派、废奴派以及广大群众的压力下，到1862年7月，林肯终于不得不考虑解放奴隶。他看到，激进派是这场战争的坚决的支持者，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对战争的进行是不利的。但是，林肯之决定实行解放奴隶的政策，还有以下几种更为重要的原因。

第一，到1862年7月，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但是北方在军事上进展迟缓，这导致了北方人民参军热情的锐减。而且，据一些州长的反映，有反对奴隶制情绪的青年都不愿意报名参军，因为他们认为联邦军队不是为解放奴隶而战的。结果，北方的兵源大减。在这个情况下，林肯认识到，解放奴隶有助于解决兵源问题：一则可以鼓起北方青年参军的热情，二则可以推动南方奴隶逃到北方参加军队。他认为此外还可以瓦解南方赖以维持战争的种植园经济。1862年9月，林肯对一个代表团说：解放奴隶“把对于南方极其重要的劳动者拉过来，从而削弱叛乱者的力量”是没有问题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假如不采取解放奴隶的政策的话，人力是不可能平息这个叛乱的。……解放奴隶会给我们带来在南方土地上生长起来的20万人（指黑人——引者）。它还会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它使敌人减少同样多的东西。”

第二，当时英国政府正在着手承认“南部同盟”，并且积极准备出兵干涉。美国的外交官们提醒林肯说：只有实行解放奴隶的政策，才能击败英国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林肯认识到，解放奴隶可以促使英国工人及国际舆论同情和支持北方，从而有利于破坏英国武装干涉的企图。他对一个代表团说：我已认识到“解放奴隶会在欧洲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后果。”

第三，这时，联邦已经牢牢地控制住边境诸州，即使宣布解放奴隶，也不怕他们投向南方了。因此，林肯原先的顾虑也解除了。

总之，解放奴隶关系到是否能平息这一场叛乱的大问题。为了夺取内战的最后胜利，以便恢复联邦的统一，林肯除了解放奴隶外，别无选择。

1862年9月24日，林肯终于发布了《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叛乱诸州的奴隶全部获得自由。不过，《宣言》也有其局限性：第一，它没有

涉及边境诸州的奴隶。后来只是通过大批奴隶逃亡，这些州的奴隶制度才走向瓦解。第二，它只是让南方奴隶得到自由，被解放的奴隶既没有得到土地，也没有取得选举权。

但是，《解放宣言》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煞的，因为它一发表，马上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南方奴隶成批地逃亡，他们纷纷来到联邦军队营地，要求参军杀敌。1864 年，联邦部队中的黑人团队增加到 166 个，达到 12.6 万多人。《宣言》也使英、法工人阶级清楚地看到，正义在北方一边。他们积极开展活动，迫使政府最终放弃了武装干涉美国内战的企图。

1862 年 5 月 24 日，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规定凡支持、拥护共和国的成年公民，从 1863 年 6 月 1 日起，只要缴纳 10 美元登记费，就可从国有土地中领取 160 英亩土地，耕种 5 年后，成为私有财产。《宅地法》极大地鼓舞了联邦军队中广大士兵的战斗热情。

在军事上也实行了改革。早在 1862 年末，林肯政府就清洗了军官中的亲奴隶主分子，提拔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军事人才。1864 年初又改组军事领导，实行统一指挥作战；任命有卓越军事才能的格兰特为“全军大将军”（即陆军总司令）。

这些革命措施和改革，大大地增强了北方军队的战斗力，也有力地鼓舞了北方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从 1863 年夏开始，北军转入反攻。这一年 7 月，北军取得葛底斯堡大捷，战争主动权从此完全操在北军手中。1864 年，北军从东西两面同时对南军展开强大攻势。格兰特将军所率部队在东线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把南军主力逼到叛乱者首都里士满附近。在西线，谢尔曼大军于 1864 年攻克南方军事工业重镇亚特兰大后，开始有名的“向海洋进军”，直捣萨凡纳。年底，萨凡纳为北军攻占，至此，南部同盟被截为两段。1865 年 4 月 9 日，南军主力罗伯特·李将军的部队陷入北军层层包围之中，只好向北军投降。持续 4 年之久的美国内战，以北方获得最后胜利而告结束，美国重新恢复了统一。

在战胜南部叛乱分子的军事斗争中，工人、农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北军的每 1 000 个士兵中，有 421 个工人，487 个农民。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在后方与内奸进行顽强斗争，为北部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黑人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整个内战期间，有 25 万黑人参加了作战，至少还有 25 万黑人在军队其他岗位上服役。有 68 170 人牺牲了生命。50 万黑奴从种植园逃跑，不但使南部经济濒于破产，还牵制了奴隶主 10 万兵力。

英法工人阶级的国际支援也从外部促进了北方的胜利；林肯政府一系列革命措施的实施，调动、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并使北方巨大的经济军事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这些都是北方取胜的重要因素。

南方重建

在南方叛军主力投降后第5天,亦即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刺,翌晨逝世。林肯是美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之一,他品德高尚,是一位气度恢宏的杰出的政治家,他识大体,处处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善于采纳人民的意见,甚至是反对派的意见。

林肯逝世后,副总统约翰逊就任总统。他是一个亲奴隶主分子,上台后不久就宣布大赦,几乎赦免了所有的叛乱分子,准许他们在宣誓效忠联邦后享受一切政治权利。在约翰逊的庇护下,奴隶主分子在南方各州又得势了,他们控制了各州的立法行政大权,并且采取各种手段迫害黑人。他们组织起恐怖团体"三K党",专干残酷杀害黑人的罪恶勾当。他们还在南部各州推行《黑人法典》,几乎剥夺了黑人的一切自由权利,如不准黑人拥有土地,不许集会,不许和白人接触,对黑人仆役可以任意实行体罚等等。

约翰逊的妥协政策及奴隶主的重新得势,引起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人民的支持下,共和党的激进派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1867年,国会不顾约翰逊的反对,强行通过了激进派的《重建南方方案》,从而开始了民主重建南方的时期。

激进派的《重建方案》宣布:按约翰逊有关《重建宣言》建立起来的各州政府无效;对南方10个州实行军管,划分为5个军区,由总统任命的军区司令统辖;给予包括黑人在内的全民以选举权,而剥夺"参加叛乱或犯法律上的重罪的人"的选举权,凡参加叛乱的人,均无资格成为州立法议会代表,也无资格担任州政府的官员。

在激进派重建南方期间,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了投票选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一些黑人当选为州、县级立法议会议员或政府官员,甚至有两名黑人当选为联邦参议员,16名黑人被选为联邦众议员。在南卡罗来纳州立法议会中,黑人获得一半席位。由于黑人代表的努力,南方各州都废除了《黑人法典》,并制定了保障黑人人权的法律。各州"黑白混合政府"还拨出大量款项创办黑人学校,使黑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各州政府还进行了司法及地方政府的改革,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推行奖励工商业政策,对铁路实行补助等等。

在重建过程中,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逐步让位于以小块土地为单位的分成租佃制种植园经济,开始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与此同时,原来的奴隶主也逐步地转变为资产阶级化的种植园主,原来的奴隶也转变为一个新的、主要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劳动阶级。随着南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资产阶级集团和一个新的金融商业资产阶级集团,资本主义势力已在经济、政治上迅速成长起来,战前那种少数奴隶主贵族的寡头政治已经不复存在。这一切,使原奴隶主的复辟成为泡影。

激进派重建的局限性也是显然的。第一,它只是从政治上着手建设民主的

南方，并没有在保障黑人和贫穷白人的经济权益方面作根本性的改革，特别是没有按广大黑人和贫穷白人的愿望和要求，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第二，南方各州的民主政府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以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致使三K党得以肆意迫害黑人。

到1870年以后，北部资产阶级感到自己的政治统治权在南部已经巩固，也由于南部奴隶主逐步资产阶级化，二者的阶级利益日趋接近，更由于北部工农运动的发展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北部资产阶级便开始与南部种植园主妥协。1872年，格兰特政府颁布特赦令，恢复了参加原南部同盟政府首要分子的公民权。1877年2月，共和党总统海斯宣布将联邦军队撤出南部各州，南方重建结束。

19世纪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美国北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度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内战正是这两种制度矛盾发展的结果。陷于走投无路困境的奴隶主统治集团，为维护和扩展奴隶制度，凭借尚存的政治、军事实力，铤而走险，挑起了内战。北部人民起来迎战，终于用炮火摧毁了在美国领土上延续了200余年的罪恶的黑奴制度。

美国内战实质上是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是内战，通过战争打败南方军队；第二阶段是南方重建，对南方社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给战争进程及其结果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美国内战又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美国内战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粉碎了奴隶主的政治势力，使工业资产阶级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使工业资产阶级能够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内战消灭了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制度，为资本主义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在美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内战也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但是经过内战和重建，黑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他们仍受到极其严重的种族歧视与迫害。他们争取真正解放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

第二节　自由主义思潮

一、从人权理论向自由主义的演变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既是理论学说，又是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思潮，它是17、18世纪天赋权利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主义一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主流。

19世纪的欧洲史，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的。法国大革

命、拿破仑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维也纳会议和封建复辟逆流，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接连发生的巨大政治变动。这些变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欧洲各国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工业革命则引起了物质生活的巨变，使西欧各国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不再能适应这种新的经济环境。于是，反对复辟逆流和要求适应工业革命发展潮流的各种改革以及革命运动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和大工业发展造成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既使得新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产生出来，又使得原有的阶级发生分化，引起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的重新组合，形成一些意向各不相同的社会利益集团（或称群体）。这些利益集团都要在社会变动的大浪潮中争取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其中，尤以工业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和工人运动表现最为强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19世纪后，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产生了许多"主义"。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也还存在保守主义思潮。这些"主义"反映了当时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同时并存的社会状况，反映了各阶级、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的不同意向。

保守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反动。最早表达出保守主义思想的是英国国会议员爱德蒙·伯克（1729—1797）。他从政治、宗教、伦理等各个方面全盘否定法国大革命，但也表示赞同渐进的改革。1815年后，保守主义在复辟时期的法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梅斯特尔（1754—1821）和博纳尔（1753—1840）。他们是代表封建复辟逆流的思想家，不仅将启蒙学者和大革命的所有活动家咒骂为罪犯，而且极力颂扬传统的农业社会。他们仇视自由、平等、民主与共和制度，同时也反对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非人格化"。他们主张完全恢复天主教昔日的地位。总之，保守主义者把现存社会视为上帝的旨意，强调服从权威，维护宗教的至高地位，不准打破社会的均衡和历史的连贯性。不过，作为一种逆历史潮流的思潮，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已无力取得稳固的地位和众多的支持者。

民族主义产生于18、19世纪之交。它主张各民族都有权利保持和发扬自己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传统，并且在政治上建立统一的民族主权国家。在中世纪，欧洲人的基督教世界主义和世代居住地的狭隘地区观念，远远胜于民族意识。中世纪晚期一些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才使民族意识逐渐有所强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民族主义真正产生。大革命中"国民"概念的提出，卢梭"人民主权"学说在某种程度上的实践，逐渐形成了民族自决的观念。个别领导人提出了法兰西民族是"世界第一民族"的说法。在全体法国人都卷入政治斗争的环境中，开始懂得了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的道理。拿破仑以战争方式将法国这种"民族国家"的形象传给了欧洲，唤醒或激起了各地区的民族意识。而拿破仑

的扩张主义和军事占领又使民族独立的意识强烈发展起来。于是,既有保守主义因素,又有自由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学说形成了。这时,明确表达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普鲁士被迫与拿破仑签订丧权辱国的《提尔西特和约》之后,他于 1808 年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一文,明确提出,成为一个民族的根本,在于民族精神。他说,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是优于法兰西或其他西欧精神的。他反对崇拜法兰西文化,主张弘扬德意志民族文化,懂得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使德意志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后来,民族主义很快成为遍及欧洲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处在俄国、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压迫下的各民族,以及处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各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都纷纷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于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欧洲形成了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

在所有各种社会思潮中,自由主义处于主导地位。因为它最典型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尤其是反映了工业革命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大趋势。自由的口号在 17、18 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很响亮。那时,自由的含义几乎都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而确定的。为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它强调公民生而俱有的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这种人的自然权利主要包括私有财产、人身安全、思想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经营企业和订立契约自由等权利。这是当时自由主义思想家和革命者们的原则和理想。这种人权理论在摧毁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风暴中,成为十分锐利的思想武器,得到了千百万群众的热烈拥护,发挥了极大的威力。进入 19 世纪之后,人权学说仍然在发挥着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依旧是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后形势的变化,它已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出现了从人权理论向自由主义思潮的演变。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是反对维也纳会议后封建反动逆流的自由主义,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适应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自由主义。它的主要方面已不仅仅是与封建专制的对抗,而是对政府决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导向性理论了。因此,19 世纪的自由主义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形成不少学派。它阐述的理论有许多方面直接针对国家的职能,即要求国家的立法者和决策人以自由主义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便是不干涉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主张,恰好是工业革命后自由竞争兴起的反映。另外,由于工业革命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形成,特别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使得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强烈地感到,必须明确表示出自己独特的阶级利益。所以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还带有明显的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倾向。最后,自由主义还体现出改革与进步的精神,反对当时掌权的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的独占统治。

19 世纪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的主要自由主义思想家有:法国的邦雅曼·贡斯当、英国的耶利米·边沁和约翰·穆勒(又译密尔)、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等。此外还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二、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学说

法国的自由主义是在反对拿破仑独裁统治、尤其是在反对复辟王朝的极端派王党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拿破仑时代,贡斯当(1767—1830)已是女作家斯塔尔夫人自由主义沙龙中的核心人物,复辟时期他更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灵魂。

贡斯当既反对君主专权和神权主义,也反对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他极力主张"人身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财产享用自由"。但是,他的自由主义与 18 世纪的人民主权学说并不相干。他断言,大革命时期盛行的平等只是"全体受个人压迫",而民主不过是"独裁的普遍化"。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只能产生最大的专制。他所强调的自由是有产者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自由。他着重提出,个人可以离开国家的干涉而保持必要的独立性,私人比国家权力更重要。尤其应该承认,财富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在任何场合都比其他力量更现实、更灵活。因此,自由也是一种特权,只能由有产者享有。如果将政治权利给予有产者以外的人,他们就要企图夺取财产。在他看来,财产权并不属于天赋权利,而是后天的权利。这个结论也包含了对贵族世袭财产权的否定。

贡斯当明确提出,国家必须保证不干涉私人生活,尊重私人的财产权。而且,由于财富就是力量,所以应该由有产的"中间阶级"(即资产阶级)来掌权。他说,18 世纪"革命的最大收获",就是"使中间阶级得以管理政治事务"。对这一收获必须加以巩固。为使富人掌权,议会便不应是人民代表机构,而只应是公共意见即有产者操纵的舆论的体现。因此,应该建立起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

贡斯当的自由主义主要的是针对法国复辟王朝的,带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但是,它也反映了 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与工业资本主义要求的自由放任主张是相呼应的。贡斯当的主要代表作是《立宪政治教程》,特别是其中的第一卷《政治原理》。

继贡斯当之后出现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列克西·托克维尔(1805—1859)。托克维尔同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生活在法国从七月王朝到第二帝国的动荡政治环境之中和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之下。社会变迁提出的新问题,已不能从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学说中全面找到答案。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本国的历史演变,写出了《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两部代表性著作,对自由和民主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随着

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世袭的财产和地位已不可能维持不变,而且大众的平等愿望也会日益强烈。平等就是指寻求工作、得到晋升、获得尊严与荣誉方面的平等,并不是财产权上的平等。这里就包含了个人奋斗,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求得发展。他提出,与这种平等社会相适应的,只能是民主的政府。因此,他反对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但是他又提出要避免实行民主制度时可能出现的两种危险:一是无政府状态,即用人民的随心所欲去代替政府作决定;二是权力过于集中在立法机构手中。为了使民主与自由并存,他主张仿效美国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原则,特别是要重视法制、地方自治和结社自由。这样,就可以正常地发挥自由的力量,限制国家的干涉。

三、边沁的功利主义和穆勒的自由学说

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最快的国家。自由主义思潮在英国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功利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英国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耶利米·边沁(1748—1832)。边沁出身于伦敦一个律师家庭,青年时即从事写作。他的作品涉及伦理、政治、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主要代表作有《道德与立法原理》、《政府论断篇》等。边沁强调,人的全部活动、道德和立法的活动,都只能依据一个原则,即功利。他解释说,功利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力争有利的东西而避免有害的东西。在功利这个原则面前,"品行最坏的人和德行高尚的人,其行为动机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人都想增加自己的幸福。因此,尽力保障人的快乐和利益,不仅是个人的动机,也应成为立法者的目标。"

边沁明确表示,旧的法律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制定的;社会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旧法律中的大部分就已不合潮流了,需要加以修改。这个论点反映了当时工业资产阶级反对谷物法和要求改革国会选举制度的愿望。边沁提出,修改法律的依据,不应是一般所说的那种抽象而绝对化的天赋权利即人的自然权利,而应该是他所阐述的功利主义。因此,首先应该研究一种行为将会带来快乐,还是带来痛苦。这样,才能明确立法的原则,那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现了这一点就是真正实现了功利主义。

根据上述观点,边沁抨击了英国现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特别是由土地贵族把持的上院。他指出,由贵族议员世袭的上院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违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他提出的改革主张是建立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实行分权和法制,合理地分配和运用权力,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融洽。为此,最高权力应归议会行使,官吏要在立法权的控制下行使行政权。议会应是一院制的,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但文盲不应有选举权。议会要每年改选一次,

选举时要无记名秘密投票。议会议员必须保证按选民的意志行事，既不受行政权的约束，也不得兼任行政官吏。不难看出，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一运用到具体政治主张之中，就表现出它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意愿。

关于政权机构的职能，边沁也是主张不干涉主义的。他认为，立法者最应该关切的是保护公民的"安全"和私有财产。此外不应再干预其他方面。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求乐避苦"，即按功利原则处世。人的"快乐"就是对生存、安全、富裕的追求和满足。每个人的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构成社会利益。所以社会利益是抽象的，个人利益才是唯一现存的利益，财产的安全又是个人得到最大幸福的必要条件。所以保障安全应是国家的唯一职能。对经济生活则不应干涉。边沁同时也承认，国家要制定法律，以便制止邪恶。不过，他认为法律本身也是一种祸害。因为法律一旦制定和实行，就要使人们承担权利和义务。对于个人来说，义务就是一种负担，就意味着失去某种自由，从而就成为痛苦。因此，人们承担的义务越多，对自由的限制就越多，痛苦也就越多。所以，立法者必须在法律要制止的邪恶与法律本身带来的祸害之间进行衡量和选择，以尽最大努力去制止"邪恶"和减少"祸害"。边沁的反对"祸害"，实质上就是不干涉主义。

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以及据此而阐述的政治学和法学思想，由于反映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意愿而盛行一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开了实证主义之先河。

以边沁思想继承者自居的穆勒，是 19 世纪中叶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1806—1873)是积极传播边沁思想的詹姆斯·穆勒之子，青少年时便深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曾组织过"功利主义社"。1858 年他所就职的东印度公司撤销后，穆勒便专事著述，主要代表作是《论自由》和《论代议制政府》。

穆勒在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致力于新的国会选举制度改革，对宪章运动也怀有同情心理。穆勒开始著述活动时，谷物法已废除，第一次议会改革早已实现，自由主义已经上升为英国的国策。因此，尽管穆勒自命为边沁的继承者，但是已经不再完全按边沁的公式赤裸裸地宣传功利主义了。他对功利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为自由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他抛弃了边沁不加区别地强调追求"快乐"的论断，认为快乐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他主张，理性的、有道德情操的快乐比仅仅是感官上的快乐要更高尚，更有价值。"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要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因此，当一个人追求快乐时，应该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功利的标准不应该是追求者一己之幸福，而应是与这一追求有关的所有人的幸福。这与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宣传的行使自由不得损害他人自由的主张相吻合。可见，与边沁所断言的人有自私的本性不同，穆勒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感情。他声称，基督教的"己所欲者，施之于人"，正是功利主义的精神所在和理

想境界。

然而，穆勒在强调人的社会感情时，决没有否定个性自由。相反，他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个性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价值是穆勒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他指出，老一辈功利主义者向往开明政治，为的是追求效率而不是追求自由。这就忽视了个性自由的价值。实际上，组成国家的全体个人的价值才是国家的价值。个性自由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尽管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必须服从某种权力，以维持社会的存在和福利，但是个性自由却是全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动力。于是，至关重要的是调整好“个人独立”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明确政府应该在什么样的范围和限度内去干涉个人行动才是正当的。他认为，社会和法律应制止或制裁的，只能是危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对个人的干涉，只能出于“自我防卫”，此外便不得干涉个人的自由。

穆勒认为，自由包括思想、言论、信仰、志趣、贸易、经营、联合、个性发展、追求幸福等各个方面。其中，他十分强调思想、言论自由。如果不允许形成意见并无保留地发表意见，那就将在人类智慧与德性方面造成毁灭性后果。穆勒坚决反对压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认为那是一种罪恶。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能压制，而应该让真理在同错误的辩论中显出正确与光辉，使人们接受和信服。不过，如果某种意见成为导致祸害的煽动，那就不再能享有绝对的自由。正因为穆勒非常强调个人的发展和个性自由，所以在政府与个人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了“放任主义”和“不干涉原则”。

基于这些见解，穆勒主张建立真正“民主制”，既能满足多数人要求，又能保护少数有教养者利益和意见的代议制政府。因此，必须再扩大选举权，包括给妇女选举权，而且要给少数有教养者以两票以上的选举权。他认为，对于有教养者实行“保护少数”的做法，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原则。

穆勒从更广阔的角度上论证个性自由，比当时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更全面、更系统地论述了个人自由的意义，使他成为19世纪自由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应当指出，19世纪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反映了随着工业革命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封建或反专制政府的积极意义。上述自由主义者宣扬的所谓保障个人的“自由”和“价值”，平等地顾及“一切人”的利益，等等，表面上似乎具有超阶级的性质，但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自由无疑具有特定的阶级内容，即自由成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特权，而后者得到的只是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自由。在剥削制度下，自由总归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享有，而劳动人民是享受不到真正自由的。

四、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19 世纪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突出成就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在 18 世纪中叶，英国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就数以千计。1776 年，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1723—1790）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创立了第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其后几十年里，大批学者都以斯密的继承者自居，著书立说，解释和发展斯密的学说。其中，大卫·李嘉图（1772—1823）和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是成绩最突出的。这些人的学说被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

这批学者以科学抽象的方法论证了劳动价值理论。斯密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并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指出了创造交换价值的是社会劳动。李嘉图对斯密的价值学说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发展，精辟地提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原理。

古典经济学家赞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它奠基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因为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生产的分工与商品的交换调节起来，使人们彼此满足了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的利益。显然，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指市场调节规律。它不是人为的主观臆造，而是“自然秩序”，有更大的优越性。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他们主张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他们要求让“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自然秩序”不受干扰地存在，不要用人为的制度去加以控制。政府只需发挥保卫国家的职能，并维持某些公共工程，其余的就该让“看不见的手”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强调完全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 16 至 18 世纪盛行的重商主义的传统政策。李嘉图还特别批判了农业保护主义，其矛头指向了保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分别与工资、利润和地租相联系，这也是一种“自然秩序”。李嘉图对此论证说，地租、工资和利润是成反比例运动的，地租增长就会降低利润，影响资本家积累的积极性，但却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所以，为增长国家财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地主的利益并废除谷物法。古典经济学家们还认为，工人也需要忍受暂时的苦难。

马尔萨斯从人口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永远快于生产增长是一种“自然规律”。因为人口总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等到人口增长到生活资料维持其生存的极限时，就要出现饥荒、瘟疫或战争。所以应该用“堕胎”（包括避孕）、“灾难”和“自我抑制”来控制人口。工人失业和贫困就是人口过多造成的。政府不应再用济贫法去维持人口的增

长。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它向人类敲响了限制人口增长的警钟。但是他抛开社会制度，从人类作为生物的属性出发，制造了一个抽象的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劳动群众失业和贫困，都归因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掩盖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失业和贫困的真正根源。

显而易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它是对重商主义理论的否定，而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对重农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它还从经济学角度阐述了某些与功利主义学说类似的思想。它和功利主义等社会政治学说一样，都带有工业资本主义来临的时代特点，因而是19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实证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奠基人和主要代表者是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孔德出身于一个税吏家庭，1818年起担任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圣西门的秘书。后因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圣西门发生根本性分歧，关系破裂。从1824年起，孔德开始创立自己的学派。他立意从实证知识出发去研究社会整体，以建立起“社会科学”。他写下许多著作，主要代表作为《实证哲学教程》和《实证政治体系》。他被誉为“社会学之父”。

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产生在法国的七月王朝时期。那时，法国经历了18世纪末的大革命，又经过复辟王朝的统治，到1830年七月王朝建立才真正完成变革封建制度的任务，使资产阶级的统治稳定下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德对社会的和谐与“团结”十分重视，主张调和矛盾，尊重秩序。同时，他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注重现实和实际利益的属性，因而成为实证论者，并以此来解释整个社会，开创了社会学。他的实证主义是针对神学和形而上学提出来的，既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又反对大革命造成的过激情绪。所谓实证，带有“确定”、“存在”、“实用”的意思，即指现实的、有用的东西。他的两个核心的口号是“秩序”与“进步”。

孔德在阐述他的社会学时，根据“秩序”与“进步”的基本思想提出，社会学包括两部分: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探索并指明家庭、国家和宗教的结构与职能。孔德认为，这些都是保证社会和谐和社会秩序的基本机构。家庭、国家、宗教等机构的职能与结构合理了，社会的平衡也就能保持了。社会动力学则是研究社会体系的历史发展。孔德以人类的精神发展为标志，将社会的进步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1300年以前为“神学阶段”。那时，人们在探求一切事物的本质，但却不可得。于是就把一切归之于神灵，用神力的影响来解释世间的现象。因此，宗教神学便在思想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就使人们盲目地崇拜和迷信权力及军事首脑，过着军

事生活。这是一种君主政治和绝对权威的时代。神学阶段也对社会有过有益的影响,但毕竟是暂时性的。它最终要退化并变为腐朽。1300—1800 年是“形而上学阶段”即“抽象阶段”。这个阶段是革命创造的,用抽象的概念和知识代替了神学,而且用抽象力量去探索事物的本质和说明事物的现象。这些抽象概念便是契约论、自由、平等、人民主权、民族独立等等信条。这是个形而上学的政治时代,是个民族国家和人民主权的时代。以形而上学反对神学是必要的和进步的。但是这种进步性只是破坏了旧东西,却不能提供新东西,因而是消极的。从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来看,形而上学政治是失败的。因为它产生无政府状态,造成混乱和不确定的原则。所以,形而上学的基本教条是危险的,只能使知识陷于混乱,并不能真正反对神学和认识事物的本质。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科学的力量,是由他所开创的实证学说。所以,这要在第三阶段即 1800 年之后的实证阶段中得到实现。

在孔德心目中,“实证阶段”是“科学阶段”,也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后阶段。这时,人们已经承认,要想得到绝对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于是不再去研究事物的本质,而是去研究现象。这种研究,不应运用形而上学的那种简单否定与破坏的思想,而应采取实证主义的态度,即以被证实了的事实和被承认了的关系为对象。只要把各种局部现象的联系认识了,就能通晓过去与现在并预测未来。这种靠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获得的“科学知识”,就可取代专断的法律。因此,实证主义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力量。孔德说,实证阶段的社会是按“工业方式”组织起来的,资本家与工人恪尽职守,实现合作与博爱。社会既然是个和谐的整体,那么个人主义的功利论、自由放任的原则以及完全的代议制民主便是不可取的,侵犯私有财产也是不容许的。因为功利论等主张只看到了人的利己主义的本能,忽视了人性中的利他倾向和社会感情。利己主义是不可少的,但是更高尚的本能与冲动也是存在的,就是“利他倾向”。所以,不应强调人的权利,因而不应实行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应该强调人的义务,实行利他主义。这样,社会就会在“团结”中前进。实证政治的任务就是巩固这种团结。因此,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即政府是必要的。为了维护这种“社会团结”,孔德主张建立一种膜拜“社会”或“人类”的实证宗教,即“人道教”。孔德解释说,所谓社会就是“大我”,是一种道德实体或爱的化身。孔德的“大我”也像基督教的上帝一样,是一种超现实的精神实体。其教会也有各类神职人员和繁琐的膜拜仪式。

孔德的学说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已确定地取代了封建制度之后,资产阶级要求社会稳定、社会和平的意愿,以及资产阶级重现实、重实利的特性。同时也反映出法国工业发展水平较低,以致自由主义经济主张和政治民主要求还未成为当务之急的时代课题。但是,他的实证主义的继承感与现实感,对后世则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第三节　日本明治维新

到19世纪中叶，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下的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但是，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后，不但避免了半殖民地的命运，而且在维新后不久就积极向邻国——中国和朝鲜发动侵略，用侵略所得养肥了自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说，日本的强盛，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对中国的奴役与掠夺。

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西学东渐"最突出的表现。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便是通过向西方学习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明治维新是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

一、明治维新的背景

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德川时代（1603—1867）的日本处于封建社会。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初期，就日本社会经济的整体来说，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为明治维新准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

在德川时代，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耕地面积在1600年为150万町步①，18世纪初为297万町步，到1864年达到305万町步，即在整个德川时代增加了1倍多。农产品的产量在1600年为1 800万石，18世纪初上升到2 600万石，到1871年则已增长到3 200万石。

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性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桑、茶、棉花、菜籽、烟草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显著提高。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大阪、京都）的一些地区，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19世纪前半期已超过了稻米的种植面积。农业生产开始出现了地方分工，如棉花的主要产地是以摄津、河内为中心的畿内地方，以尾张、三河为中心的东海地方与濑户内海的周边等三个地区。养蚕业的主要地区是关东的上野、常陆、武藏、下总，中部的信浓、甲斐、越前、加贺，以及近畿地区的山城、播磨、丹后等地。

在德川时代，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18世纪末，日本生丝产量比17世纪末增加了4倍。丝织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分为养蚕、制丝和织物三个部门。在越后的"小千谷绉绸"产地，一些村民把自己的土地租给邻

① 1町步约为99.18公亩。

村的农民,自己则专营丝织业。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十分显著。19世纪初,运往大阪的白棉布,比1736年增加6至8倍。棉纺织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也出现专业性的分工,如脱籽、弹花、纺纱、染色、织制等。随着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分工,形成了许多手工业中心。如当时的摄津、和泉、纪伊和淡路等地是纺纱的中心,和泉、摄津、大和和淡路等地是织制白棉布的中心,和泉、摄津和纪伊等地是织制条纹布的中心。与纺织业发展的同时,其他手工业如陶瓷、造纸、制糖、酿酒等也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发展起来。

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农村自然经济的日益解体,加速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大量贫苦农民失去了土地,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和富农手中。同时手工业逐渐脱离农业和地域性分工的发展,使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了,这就为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准备了条件。

由小手工业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方面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另一方面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主。在日本,商业资本对生产者的控制是以包买主的出现开始的。以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为例,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被称为"木棉寄屋"的农村商人即包买主,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再转售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切断了生产者同商品市场的直接联系。随后他们又进一步采取"换棉"和"出机"的形式直接控制了生产者。所谓"换棉"是商人供给皮棉,由农村手工业者在家纺成纱或再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一部分产品作为工资。这样就进一步切断了生产者同原料市场的联系。所谓"出机"是商人供应棉纱和织机,由手工业者在家里织成布匹,商人则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完全依靠由资本家供给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实际上已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后来,"出机"资本家便设立自己直接经营的作坊,从贫苦农家招募"机织下女"即女工从事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在当时已屡见不鲜。

同时,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也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企业主。例如,在棉织业比较发达的尾西地方,就有许多棉织业的手工工场主,并非原来的农村商人,而是一些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就他们占有的耕地面积来看,只不过是个中农,但他们依靠经营手工业副业发财致富,于是扩大自己的作坊,使用雇佣工人,成为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主。

到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末期,在日本,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已经十分广泛,并在一些先进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19世纪中叶,棉织业甚为发达的尾西,仅鹈多须代官所辖区内,拥有6台以上织布机的作坊就有92家,占作坊总数(322家)的28.6%,共拥有织布机818台,占这个地区织布机总数(1 435台)的57%。在个别地区,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如在足利就出现了拥有数

十台甚至200台织机的手工工场。此外，丝织业手工工场也很发达，仅以关东地区为例，在19世纪中叶约有丝织业手工工场200多家，每个工场拥有织机6至10台。但总的说来，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它虽已开始进入“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但还处于它的初级发展阶段。

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绝大多数享有世袭耕作权的农民，世世代代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从事耕作，向领主缴纳沉重的实物地租——“年贡”。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使农民非常贫困，杀婴、堕胎的现象普遍发生，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在农村，有许多富农和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承包开垦新田，把新田出租给农民，成为新地主。还有的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向贫苦农民放贷，在债务人过期无力偿还时，便将他们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于是他们也成为新地主。新地主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封建领主，因此他们必须按年向领主缴纳年贡；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向租佃土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每年生产所得有70%～80%被领主和新地主夺去。新地主除出租土地者外，还有人雇佣长工或短工亲自经营农业，变成经营地主。这些新地主固然靠剥削农民、雇农而存在，但是他们本身也受封建领主的榨取和压抑。

无论是受封建领主直接剥削的农民，还是在新地主和封建领主双重剥削下的农民，他们的处境都十分悲惨，他们往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因此，在幕府统治末期，日本的农村中充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反封建的主要动力。据统计，在1590—1867年间，日本共发生2 809次农民暴动，平均每年多达10次以上。进入19世纪以后，农民暴动更加频繁，仅1801—1867年就发生1 169次，平均每年达17次以上，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在日本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在明治维新前，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主要产生和发展于农村地区，因此农村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活动基地。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经济上的发展又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要求。但因幕府末期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不高，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还不是“现代的资产者”，而是经济力量比较弱的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经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同时，还经常投资于土地，成为新地主，因而具有了地主、资本家一身而二任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又是十分软弱的，并具有很大的妥协性，没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革命。

除工场手工业资本家外，在日本还有一些享有特权的大资产阶级，如三井、鸿池、小野、住友等特权商人。他们是伴随着领主经济的商品经济化成长起来的。他们主要是一些享有特权的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同封建主有密切的联系，其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城市。他们同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着局部的利害冲突。因此他们虽缺少革命的要求，但并不拒绝有利

于自己的社会变革。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的新地主，对无地的农民进行的地租剥削依然是封建性质的。但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下，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仍有很大一部分被封建主以年贡的形式所占有。因此，新地主同封建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同时由于他们也常常兼营工商业，与资产阶级有密切关系，因此在政治上倾向于资产阶级。

农村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被称为"豪农豪商"，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特权的大资产阶级在倒幕运动的初期虽然是动摇、观望的，在胜利已在望时也投向了倒幕阵营。但如果不是因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统治阶级的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化，倒幕运动的兴起和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德川统治时期，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武士等级所有，他们靠剥削农民过着寄生的生活。在政治上，他们享有绝对的统治权，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但就武士等级的内部来说，它的各个集团和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差悬殊，因而在他们中间发生了种种对立和矛盾。例如，外样大名(其主要代表为西南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的藩主)无权过问幕政，并备受将军的限制，一向不满于幕府的专制统治。一些下级武士由于被削减俸禄，生活水平下降，也产生了"恨主如仇"的不满情绪。这些矛盾严重地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力量。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武士等级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大批下级武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在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些人甚至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间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做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济困难。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①家，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深受兰学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地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成功地领导了倒幕维新运动。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与尊王攘夷

就国际环境而言，明治维新运动是在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严重威胁下爆发的，这一外部条件催化了这场革命的提早发生。

---

① 日本江户中期起通过荷兰书籍传入的西方学术。——锁国后，日本仅与西方国家中的荷兰有贸易关系。

早在19世纪初，英、俄、美政府纷纷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均遭幕府拒绝。1825年幕府重申“驱逐令”，指示各藩炮击一切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国船只，打死一切企图在日本登陆的外国人。1840年英国挑起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幕府害怕继续采取过激行动会引起冲突，于1842年修改了驱逐令，指示各藩允许外国船只在日本某些港口加煤上水。但是西方的侵略者并不满足于日本的这种有限开放。美国政府率先企图用武力相威胁，强迫日本开国。1853年7月8日（嘉永六年六月三日）和1854年2月11日（嘉永七年一月十四日），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舰队两次强行驶入江户湾的浦贺及神奈川（今横滨）。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1854年3月31日（嘉永七年三月三日）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被迫同意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口，美国船可以在这两个港口加煤上水，并得到粮食等物品的供应。条约还允许美国在上述两港派驻领事，并享有最惠国待遇。不久，英、俄、荷等国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1858年7月29日（安政五年六月十九日），美国又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规定除下田、箱馆外，增开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四个港口和江户、大阪两个城市，并给予美国领事裁判权、议定关税权、建居留地权和自由贸易权等特权。接着荷、俄、英、法等殖民强盗又援例强迫日本签订类似条约。因这些不平等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故通称“安政五国条约”。

1859年7月正式开港通商后，大量的外国工业品充斥日本市场。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因无力竞争，受到严重打击。生丝、棉花的大量出口，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本国的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许多手工工场纷纷破产，不少织工流离失所。日本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西方商人和各国使馆人员还利用日本黄金价格低于世界市场的情况，用白银套购黄金（日本金银比价为1：5，欧美比价为1：15），攫取暴利，使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仅1859年6月到12月，日本流出的黄金达100万两。结果引起市场混乱，物价暴涨。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日益贫困，下级武士的处境也大为恶化。

资本主义国家和沙皇俄国利用它们攫取的特权，在日本建立居留地，驻扎军队，粗暴地干涉日本内政。1863年，长州藩炮轰一艘美国船，后来又炮轰法国和荷兰军舰。英、美、法、荷四国为了报复而组成联合舰队，于1864年9月5日（元治元年八月五日）炮轰下关，登陆后大肆烧杀。长州藩的武装无力抵抗联军，只好求和。四国向日本索取300万两白银的赔款，才告罢休。

幕府腐朽的专制统治、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及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遭受悲惨命运的前车之鉴，不能不使得日本一些有识之士担忧祖国的前途，考虑日本的出路。这些人主要是来自西南诸藩的下级武士，因为这里接触西方先进思想

较早，许多下级武士早已向往西方的文化科学。而且这些下级武士中的不少人已与新兴资本主义发生联系，他们最关心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

这些人士认识到：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必须打击、驱逐外国势力，实行开国进取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改革幕藩体制，革除弊政，必须借“王政复古”（恢复天皇的最高权力）之名，以行改革幕藩体制之实。因此他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并且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尊王攘夷”运动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绪方洪庵、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和吉田松阴等。

“尊王攘夷”的志士们虽然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热情，坚决要求击退外国侵略者，以保卫国家民族的独立，但是与盲目排外的封建顽固分子不同，他们都清醒地看到：为了消灭西方入侵势力，必须向西方学习，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吸收过来为己所用。当时在日本思想界居统治地位的是儒学和国学（日本学），但是他们敢于冲破旧的思想牢笼，大胆地提倡新学，要求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这在当时的日本说来，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也表现了这些志士们的胆识。这里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志士是受中国先进人士魏源的思想启发，因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尊王攘夷”的志士们对旧学还有一定程度的留恋，还不想与旧学一刀两断，而是力求把旧学与洋学调和起来，并且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指科学技术）”的救国方案。

“尊王攘夷”派的先辈佐久间象山很早就认识到西方列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并且提出“以夷之术防夷”的方略。他说：“故余谓巧乎今之世，而欲明兵法，非兼取洋法不可。”但是他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还是有用的，所以他主张在保留东方道德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科学技术。桥本佐内也有类似的思想倾向，他说：“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由吾开，器技之工，艺术之精取于彼。”吉田松阴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他在恩师的教导下，思路极为开阔，既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又关心世界大势，注意海防。1854 年他在佐久间的协助下，曾企图偷渡美国留学，结果失败。但是他在倾心于西学的同时，仍未能忘情于旧学。他通过讲《孟子》来批判幕末政治，他说日本之所以陷入危机，是由于“幕府诸藩将士皆心术不正，不能为国家为忠义而死”。他特别提倡“忠君”思想。

“尊王攘夷”派的这种思想倾向与中国清末士大夫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但是，在“尊王攘夷”派内部，有的志士在思想上更前进了一大步，不但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且进而要求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如横井小楠就是一个例子。他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深受影响，于是提出“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口号，倡导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并且主张以欧美国家的社会制度为典范以改造日本社会。他在 1860 年著《国是三论》一书，对西方各国的社会制度作了

肯定的评价，他尤其赞赏英国议会制度。他说："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源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他认为，英国之所以战胜中国清朝，除因富国强兵外，还因实行了议会政治，统一了民心。他能从社会根源去寻找英国战胜中国的原因，因而比"东洋道德西洋艺术"高出一筹。但是，横井小楠在思想深处也未能与儒家思想彻底决裂。他自幼接受程朱理学思想，认定中国"三代之治"是人类社会理想的极致。他称颂英美的政治制度"符合三代之治教"。这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如出一辙。

有不少志士还设帐授徒，向青年学子灌输"尊王攘夷"思想。吉田松阴在从事政治活动之余暇还成立"松下村塾"，从事讲学。他从社会各个阶层广收门徒，而不问其贫富贵贱，目的是从各方面网罗人才。他在讲学中不但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也传授各种知识，使学生通晓国家大事，开阔眼界，以培养有学识、有度量的治国人才。因此从"松下村塾"的学生中涌现出不少著名的爱国志士，如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瑞就有"松阴门下双璧"之称。吉田的门徒中还有一些人后来成为明治维新的开国元勋，其中有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及井上馨等。

倒幕运动

最初，"尊王攘夷"派还不想推翻幕府，只希望幕府能够拥戴天皇，驱逐西方入侵者。但是到1858年幕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这些志士便萌生了倒幕的思想。如吉田松阴就是如此，他在《议大义》一文中愤怒地痛斥幕府"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号召人民起来诛讨卖国的德川将军，以便粉碎外国侵略者。

不久，吉田进一步认识到，为了倒幕，必须发动"草莽"的人们，他说："只有那些不再为封建君主效力的浪人、爱国的豪农豪商和粗食陋衣的农民等出身卑贱者，即被称为'草莽'的人们，才能献身于救国斗争"。他在著名的《草莽崛起论》中说："三千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草莽崛起"思想的产生，是倒幕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

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吉田便和其他志士到京都进行活动，并且与天皇及近臣秘密策划"倒幕"。但是密谋泄露了，吉田等志士在1858年10月（安政五年九月）被幕府逮捕。1859年，包括吉田在内的7名志士被处死刑。在行刑的那一天，吉田松阴高声朗诵着辞世之诗，从容就义。

吉田松阴遇害后，他的学生们发展了他的倒幕思想。久坂玄瑞提出了"草莽横断结合"论，他认为"宜先将政府置之度外，各藩有志之士相互联合"，主张打破藩界而实现"草莽"之士的横向联合。高杉晋作又把"草莽横断结合"论发展到"草莽武装"论，这就为倒幕斗争指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倒幕运动比起尊王攘夷运动有更大的进步:(1)它用武装倒幕代替和平的幕政改革。(2)倒幕派虽然仍有浓厚的尊王思想,但是又赞成按照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改造日本政治。

高杉晋作不但提出"草莽武装"的思想,而且还把它付诸实践。

高杉晋作的爱国思想非常强烈,他"蒿目时艰",对祖国的命运忧心如焚。1862年他在中国上海目睹中国人民惨遭英法联军的蹂躏,心中受到很大的震动,决心把日本从外国人的欺压下解救出来。他认为,要想拯救日本,必须先打倒幕府,而为了打倒幕府,就必须把人民武装起来。1863年夏,在他掌握了长州藩政之后,在豪商白石正一郎的帮助下,在长州藩组织了第一支草莽武装——"奇兵队"。这是由爱国武士、豪农豪商、农民、渔民、猎人、僧侣等组成的新型队伍。他说:"食肉之士人等辈不堪用……如欲编组新兵,务须矫正门阀之弊,不问士庶,加厚俸禄,专募强健之人。"他为了组建新兵,夙兴夜寐,不辞辛劳。前原一诚为他赋诗曰:"军谋终夜剪青灯,晓闪旌旗气益增,凛冽寒风面欲裂,马蹄踏破满街冰"。这可以说是高杉晋作的艰苦卓绝精神的真实写照。

长州藩的其他志士们也组织了类似的人民武装。不久,长州藩已成立有5 000人的新式武装队伍。长州藩成了倒幕运动的基地。

在此情况下,幕府决心粉碎这个基地。在1864—1866年间两次前往征讨,但是第二次征讨以失败而终。

幕府征讨长州的失败,大大鼓舞了其他反幕府的藩主,他们纷纷联合起来。1867年7月22日(庆应三年六月二十二月)出现了萨摩、土佐同盟,同年10月又出现了萨摩、长州和安艺的同盟。

此时,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倒幕力量。英国与日本倒幕派接近,愿意支持倒幕运动。

为了对付倒幕势力,幕府便勾结法国。从1865年起,幕府聘请法国教官,组织新式军队,从法国购买武器,并从法国取得贷款。为了换取法国的援助,幕府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同意由日、法两国的富商合资经营"日法贸易公司",使法国垄断日本对外贸易。

二、1867—1868年的革命

戊辰战争

1866年12月5日,德川庆喜继任将军。1867年1月30日(庆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反对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突然死去。同年2月13日(庆应三年一月九日),由年仅16岁(满14岁半)的睦仁继位,是为明治天皇。公卿岩仓具视早在1866年就开始同情倒幕派,现在他看到天皇年幼,便利用这个时机秘密在公卿们中间进行"王政复古"活动。倒幕派很快便与岩仓发生联系,建立了倒幕派—公卿的统一战线。1867年11月8、9

两日(庆应三年十月十三、十四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倒幕派领袖通过公卿岩仓具视等,从天皇睦仁手中弄到一份分别给萨摩、长州二藩的"讨幕密敕","密敕"要求二藩派军队征讨幕府。

当时,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席卷京都、大阪、横滨、江户等幕府管辖区。幕府的根据地关东一带的农民也起来响应。这样,幕府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于是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1867 年 11 月 8 日(庆应三年十月十三日)在京都二条城召开重臣会议,决定采纳土佐藩建议,实行"奉还大政"。11 月 9 日,德川庆喜上奏辞表,将"政权奉还朝廷"。

但是,萨摩、长州二藩的倒幕派态度非常坚决,他们按照既定计划把大军开到京都。1868 年 1 月 3 日(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在萨摩、长州两藩军队的协助下,倒幕派发动政变,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王政复古"的诏书,宣布废除幕府将军制,将政权归还给天皇。诏书还宣布在天皇下面成立由"总裁"、"议定"、"参与"三种官职机构组成的天皇政府。在这个新政府中,虽然有倒幕派参加,但是保守派势力很大。在政变后第二天的政府会议中,在保守派与倒幕派之间展开了斗争。保守派主张保留德川将军的土地和军事大权,但是遭到倒幕派的坚决反对,最后会议决定要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并且下令责成德川庆喜交出土地、人民和军权。

1868 年 1 月 3 日,"王政复古"政变时,将军德川庆喜正住在京都二条城,1 月 7 日逃往大阪,手下尚有兵力 1.5 万人。当"辞官纳地"的命令下达到他那里时,庆喜以人心动摇为借口,拒不接受命令。而且幕府军队中的官兵也支持庆喜。1868 年 1 月 26 日(庆应四年一月三日),幕府军队分为两路,向京都进发,妄图推翻新政府。傍晚,幕府的两路军队分别在鸟羽、伏见(二地均在京都南郊)与倒幕派军队遭遇。经过三天激战,倒幕派军队大获全胜。德川庆喜由海上逃归江户。4 月,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5 月 3 日(庆应四年四月十一日),德川庆喜被迫开城投降。占领江户后,政府军继续征讨东北地方的叛乱诸藩,年末,在本州境内的幕府叛军全部被歼。1869 年 5 月,政府军抵达北海道并包围箱馆。6 月 27 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固守的军事要塞五稜郭。历时一年半的国内战争以政府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统治日本长达 265 年的德川幕府终于被彻底推翻。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农历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

废除封建制度的措施

1868 年 10 月 23 日(明治元年九月八日),朝廷改元,把年号"庆应"改为"明治"。因此,1868 年革命及革命后的一系列改革称明治维新。"维新"一词来源于中国《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868 年 11 月 26 日(明治元年十月十三日),明治天皇驾临江户城,将江户改为东京。在革命期间及其以后,新政府采取几项重大措施,把封建国家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国家。

1868年6月11日(庆应四年闰四月二十七日)公布“维新政体书”,规定天皇有无限权力,在天皇下面设有太政官,以辅佐天皇,太政官下设“议政官”、“行政官”和“刑法官”三个机构。表面上是三权分立,实质上大权集中在天皇及其重臣手中。因此,革命的结果是在日本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

在这个政府中,显要职务均由亲王、公卿和藩主担任,但是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因为实际负责处理政务的,主要是出身于下级武士的倒幕派领袖。而且,通过不断改组,他们逐渐排除了公卿和藩主。1871年后,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是公卿外,担任参议和省卿(相当于部长)的实权职位的几乎都是萨、长、土、肥四藩的倒幕派领袖。

早在1868年4月6日(庆应四年三月十四日),新政府就宣布了它的政治纲领——“五条誓约”。其内容虽然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甚至还有一些军国主义色彩,但是却表现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破旧来之陋习”)和积极向西方学习(“求知识于世界”)的决心。

首先,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废除封建制度,实施改革:

1. 废藩置县。1869年7月25日(明治二年六月十七日),新政府利用在“戊辰战争”中获得全面胜利的有利形势,宣布“听从”236个藩主的“奉还版籍请求”,并命令尚未奉还的14个藩也要一律照办。此举把藩主变为藩知事(地方官)、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1871年8月29日(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又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免除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一律迁往东京居住;1872年1月(明治四年十一月)最终完成改置府县任务,把全国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免府知事和县令。这就一举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并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2. 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权。在“奉还版籍”时,新政府就废除了公卿之称,改为华族,一般武士改为士族。1872年3月(明治五年二月),随着世袭的卒编入士族,只一代的卒编入平民,以及乡士中家世有来历者也称为士族的新规定,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份制,大致被确定下来。在幕藩体制下居于被压迫等级的农、工、商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随后,又逐渐剥夺了旧统治等级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废除了对平民的各种封建性限制,并准许华族、士族与平民通婚,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

旧统治等级中武士的特权主要包括:统治权、封建财产权和垄断军职的特权。在推翻幕府的统治和消灭地方政权之后,明治政府又废除了一般武士均可对平民“格杀勿论”的特权,从而彻底剥夺了武士过去享有的统治权。在幕藩体制下,将军和大名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均享有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封建年贡的权

利,隶属于他们的武士也通过领取俸禄的形式参与了对农民的剥削。这种剥削形式虽然伴随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废除而消失,但旧领主和武士仍由新政府发给俸禄。这成为新政府的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于是它便逐渐减少俸禄总额,最后于1876年8月用发给"金禄公债"的方式赎买了武士所享有的这种封建财产特权。武士垄断军职的特权也在1873年1月10日(明治六年,日本从1873年1月1日起改用公历)颁布征兵令,而被剥夺了。这样,武士作为一个特权等级被消灭了。其上层因领得高额的"金禄公债",转化为地主和资本家;广大的下级武士则变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3. 土地改革。在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新政府又着手确定土地所有权。1872年3月(明治五年二月)新政府明令解除幕府所颁布的永世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宣布"自今以后,允许四民买卖和私有"。同年8月(明治五年七月),进一步通告在全国丈量土地,发给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以土地执照,确认其土地所有权。这意味着不仅在幕末出现的新地主取得了完全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多少年来一直受领主直接剥削的广大自耕农及富农也成为真正的土地所有者。接着在1873年7月发布"地税改革法令",规定:凡持有土地执照者,均要向政府缴纳地税,地税的税率应为土地价格的3%,不因年景的丰歉而有所增减。地税一律用现金缴纳,而不以农产品的价格变动为转移。土地价格由政府规定,而政府规定的价格很高,以致地税也很高,甚至与幕府时代的封建年贡不相上下。此外,政府还按地税的1/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附加税——村费;将旧税法水田交纳实物、旱田交纳货币或实物的规定,改为一律用货币交纳。上述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使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自耕农和新地主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

但是,已经丧失了份地的农民却未因实行改革而重新获得土地。据估计,1872年在全部耕地中,自耕地约占71%,佃耕地约占29%。由于部分地主雇工自营耕作,因此属于地主所有的土地已经超过了全部耕地的1/3。在改革中,明治政府还使新地主出租土地,进行地租剥削合法化,并保证他们可以获取高额的地租(1873年地税改革时,在全部收获中,地税等占34%,地租占34%,归佃农的仅占32%)。通过出租土地,在地租的形式下榨取佃农剩余产品这种剥削形式,决定了新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半封建的性质。但是,新地主可以像每个商品所有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他们同佃农之间已不存在人身的依附隶属关系,而只是租佃土地的契约关系。原则上,订立和解除这种契约都是自由的。因此,新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已经不是纯粹封建性质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是半封建的、即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性质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至于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则属于近代的"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因此,通过改革在日本大体上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明治政府实行的土地税制也

属于近代税制，地税额虽不低于封建时代的年贡，但却成为明治初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

三、明治政府的建国三大政策

明治初期，日本的社会经济还很落后，集中的手工工场虽然在先进地区比较发达，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分散的手工工场仍占统治地位。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商业资产阶级，由于缺乏经营资本主义工业的经验，一时还不肯把资金投到工业中去，重工业几乎不存在。同时，由于受到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制约，日本仍没有摆脱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威胁。

明治政府为了摆脱落后，为了摆脱受外国奴役的地位，以争得民族独立，并且进而称霸东亚，在改造封建国家的同时，大刀阔斧地进行国家的建设工作。维新元老的目标便是把落后的、弱小的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及经济力量的资本主义强国。为了进行建设，有远见卓识的元老们一开始就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为了学习西方，他们决定派遣一个庞大的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国进行考察。这个使节团由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兼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全权副使。该使节团的使命是与欧美各国谈判修改条约，①并且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等进行全面考察，作为日本建设的参考。使节团在1871年12月23日由横滨启程，到1873年9月前分批回国。在考察期间不断地往国内写信，随时介绍情况，以便国内及时地学习到西方的先进经验。明治元老们就是参照这些考察报告进行近代化建设的。为了建设日本，他们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

殖产兴业

明治政府实行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

1870年12月成立工部省，作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工部省首先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了官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并且兴建铁路。1873年11月又成立内务省，与工部省配合，共同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内务省利用国家资金，创办了千住呢绒厂、新町纺纱厂和爱知纺纱厂等近代化的"模范工厂"。其目的是让它们起示范作用，以推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把官营企业转让给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享有特权的大资本家。

---

① 谈判修改条约一事，未获结果。

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转而实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保护，从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工业革命席卷一切工业部门，而以纺织业为重点的轻工业发展得特别迅速。在1885—1890年的短时期内，棉纺厂就从20个增加到30个，纱锭也从7万个增至28万个。棉纱的产量也增加大约8倍。到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一个棉纱出口国。

文明开化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在19世纪70—80年代推行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文化科学、生活方式等，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运动。教育改革在文明开化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培养建设资本主义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新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国家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在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影响下，一些洋学家和思想教育界名流于明治6年(1873年)成立了研究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创办机关刊物《明六杂志》，积极宣传改革思想，提倡自由主义、欧化主义，对日本人民进行启蒙教育。明治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改历”、“易服”、“剪发”等，以改变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倡导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富国强兵

明治政府三大政策是互相联系的。在维新元老心目中，“富国强兵”是最高目的，而“殖产兴业”及“文明开化”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在“富国强兵”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取消旧的军制及建立新的军制。提出改革军制的是山县有朋，他认为改革军制的目的就是“内以镇压草贼，外足以伸张对峙之势力”。可见，“富国强兵”不但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镇压人民及对外侵略。

军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便是模仿西方，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的常备军。1872年颁布征兵诏书和1873年颁布征兵令，标志着建设新军的开始。实行征兵制就是军制上的革命，就是取消封建武士军队，剥夺武士垄断军队的特权，从民众中征兵，建立资产阶级军队。在建立新式军队的同时，解散了在维新初期由诸藩军队改编的旧式军队。但是，实行征兵制也包含了不平等的因素，官吏、专门学校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而且富人只要缴纳代役费270元者，亦可以免除兵役。

新式军队称为“皇军”，向军人灌输忠于天皇的封建思想。1878年颁布的“军人训诫”，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且以所谓“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的行为准则。“武士道”精神是纯粹的封建性的东西，其主要内容是“忠君”、绝对服从、不怕死及野蛮的侵略思想。

“富国强兵”政策的贯彻，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的道路。

明治维新是在作为社会形态更替的前提条件的资本主义关系及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的催化作用，为了克服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而提早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同时面临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在国内，它的主要任务是摧毁德川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消灭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割据状态，实现国家的统一，并使日本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它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强加给日本的殖民枷锁，克服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维护日本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在当时日本的具体条件下，民族革命任务的最终完成，有赖于民主革命任务的顺利解决，因此，民主革命的任务成为明治维新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明治维新取得的积极成果主要是：(1)它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社会由落后的封建历史发展阶段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阶段，并在这个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2)它为日本摆脱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创造了条件，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能够继续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因此，明治维新基本上完成了民主和民族革命的任务，扭转了日本民族的历史命运，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事件。

但是，明治维新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这首先表现在，日本虽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仍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如天皇制、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等。因此，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又是不彻底的。其次，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日本虽然通过明治维新顺利地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但却迅速地走上了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的道路，成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不仅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四、近代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19 世纪中叶，日中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但到近代，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命运竟是这样的不同：日本迅速地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则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总的说来，决定两国不同发展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从 1853 年培里叩关算起，到 1869 年戊辰战争结束，经过短短 16 年的时间，封建专制的幕府统治就被推翻了。这就为日本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和维护国家的独立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中国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算起，经历了 72 年的漫长岁月，才在 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比日本晚了 40 多年。在这期间，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资

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步履维艰，始终无法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

近代时期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不同时期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也不尽相同。

就两国进行社会变革的内部条件而言，19 世纪中叶在日中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但就全国而言，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因素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等方面，中国是落后于日本的。这对日本实现向近代社会变革是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

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坚固程度和内部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社会变革时期它所形成的阻力也是完全不同的。19 世纪中叶，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则是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这两种土地所有制虽然都是封建性的，但前者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是“硬化了的私有财产”；后者却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领主制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地主制则不然，它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其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因为在土地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商人高利贷者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转化为地主，这不仅缓和了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而且形成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在经济上的三结合，结果地主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巩固了。

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日中两国的差异是：(1)中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强大的中央政权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镇压来自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日本是封建的幕藩制国家，一方面存在着作为中央政权机构的幕府，因而具有集权政治体制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全部国土又被分割为 200 多个藩国，保留了由领主在自己藩国内实行统治的政治格局。由于一些藩国，主要是外样大名统治的藩国和幕府长期对立，甚至发生公开对抗，这就为革新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19 世纪 90 年代中国戊戌维新失败后不久发表的《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社会论中国政变》一文就指出：在日本由于存在着同幕府处于对立地位的藩国，使“志士有所凭借”，这是倒幕运动能够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2)日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不满于大权旁落的天皇及其小朝廷虽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过去的统治地位，但社会上一旦出现反对幕府统治的政治势力，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政治工具为自己的夺权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以天皇的名义来动员和团结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中国的皇帝则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全国唯一的最高政治权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普天之下的万民，必须绝对服从和信奉皇帝一人，他不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是一切权力的实际源泉。

因此，在中国不存在可以用来对皇帝的统治地位进行公开挑战的其他权威。中国皇帝的统治地位，较之日本的幕府将军无疑具有更大的稳定性。(3)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方面，日本实行的是门阀制、世袭制，中国实行的则是科举选官制。日本的武士属封建的统治阶级，按照门第的高低在武士的内部又分为20余个等级。幕府和各藩政府的各种职务，均依武士的等级身份分配并可世袭。这种门阀制度，阻碍了封建的政权机构吸收新鲜血液，以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它也使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因无缘获取较高的职务，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并终于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却可以把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府来，这对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调整官僚机构以增强它的活力起到了一定作用。(4)清王朝既腐朽透顶，又冥顽不化，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正是由于日中两国旧的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因此两国的封建制度在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方面也有明显的区别。在日本，由于领主制占统治地位并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因此富裕的农民和商人、高利贷者即使购买了土地，也不能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更不能因此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跻身于统治等级的行列。而门阀制、世袭制又使被压迫等级以及统治等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封闭式的社会结构，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及阶级关系较少变化的状况相适应的。一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就会因无法调节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土地权和货币权的对立而陷于瓦解，并最终导致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溃。在地主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以末致富”的商人和“力农致富”的农民，都可以爬上地主阶级的阶梯。如前所述，科举制度又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特别是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的社会机制。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三个主要剥削集团，官僚则是它们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在中国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的“四位一体”，维护封建制度成为它们共同的根本利益。这就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剥削集团和统治力量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把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的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

在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日中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社会变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

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过细地说起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①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通过对19世纪中叶以前日中两国的全面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中日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

第二,为了实现近代化,必须首先变革国内的封建旧制度。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度充分发展的国家。它的社会经济的内部结构比较坚固,并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同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又是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日本的情况则不然,同中国相比,日本封建制度的发展显然是不充分的,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使它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对于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封建旧制度所造成的阻力也显然要比日本大得多。

第三,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颇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旧的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在中国,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的学说又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准则。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日本的情况则不然。商品经济的冲击、民族危机的意识和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的影响,使日本在被迫开国后就形成了一支主张倒幕维新的革新势力,维护封建旧制度的幕府则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这些就是导致近代时期中日两国不同命运的主要内部原因。

就进行社会变革的外部条件而言,19世纪中叶日中两国同样面临着西方资

---

①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1卷,第70、72页。

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威胁,并被迫签订了内容大体相似的不平等条约。开港通商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其严重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但相对来说,日本的处境是较为有利的,并曾受惠于中国。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这就使日本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美国的历史学家马士和宓亨利就曾经讲到幕末日本的幸运,他们说:"日本虽处于一种军事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在进行攻守战事的能力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要来进攻,日本只有听其为所欲为。只是由于欧洲各国常常彼此攻伐,中国又是多年来一直扮演着阿塔兰塔的金苹果的角色,日本才得长期幸免沦入狼狈之境。"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也同样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确切地说,作为日本的盾牌以防范欧洲列强对于商业和殖民的贪婪,除去偶然的国际势力均衡而外,就是中国那个倦卧的老大帝国,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都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早在培里率美国舰队叩关前10余年,中国就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1857年,英法两国又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这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唤醒了一些先进人士的民族意识。他们把中国作为前车之鉴,决心要摆脱日本"开国"后面临的民族危机。例如,1862年高杉晋作来到上海后就深有感触地说:"上海地方虽属于中国,但实际上也可以说英法属地。""我国人民必须留神,决不能出现中国那样的情况。"

第三,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外三元里的广大群众曾奋起抗击英国的侵略军。1851年,在中国又爆发了威震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这虽然主要是一次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但也直接威胁到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因此,它们便同清政府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美国流氓华尔招募外国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英法也出动了侵略军。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英勇地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任务,不仅直接给了西方殖民势力以沉重打击,也在客观上牵制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和干涉。日本倒幕派的领袖久坂玄瑞曾说道:"英法之所以未能随心所欲地对皇国大动干戈,就是因为中国的太平军声威雷震所致。万一的万一,太平军屈服于英法,英法必将入寇我国。"这说明他已认识到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牵制英法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日本人民是个很大的支援。

第四，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英国驻日公使阿尔克科在给本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就曾说过："我们对日本的纲领是必须慎重行事。这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已经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中吃过苦头……这一切必须铭刻在心。"因此，英法等西方列强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的实现。

就日中两国社会变革的进程而言，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是一次由多种形式的斗争所推动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被迫开国后，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以"改革世道"为目的的农民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外国侵略者的攘夷运动，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以及为推翻幕府的专制统治而展开的倒幕运动，此伏彼起，终于结束了德川幕府长达200余年的封建统治。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一方面对封建的旧体制实行全面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大力地推进了日本近代化事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中的部分爱国者和开明之士，为了挽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几乎也做了与倒幕维新运动的诸因素大体上方向相同、方式和内容也很相似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势头，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本 所达到的水平。从三元里的反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反侵略的斗争，其规模和声势远远超过了幕末日本的攘夷运动。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就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地区之广以及斗争纲领的内容和政权的建立等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幕末日本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在中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虽然发展缓慢，但毕竟也在不停地向前推进。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移植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同日本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戊戌变法，在维新派的主观上是完全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楷模的。辛亥革命虽然比日本的倒幕运动大约晚了40余年，但在推翻旧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这个根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而且，在消灭帝制和建立共和方面，中国辛亥革命比起日本明治维新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但是，日中两国社会变革进程的重大差异是：日本构成倒幕维新运动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在幕末被迫开国后，利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尚未全面渗入日本的有利时机，几乎同时兴起，形成一种"合力"，引起强大的"共振"，终于一举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分散的努力却导致了同样的失败。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声势浩大，斗争的水平也很高，但他们孤军奋战，面对的又是十分顽固的反动势力。中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没有同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此外，社会变革活动的"错

位”,也是导致日中两国一成一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本,各项资产阶级改革措施,其中也包括建立近代工业的殖产兴业政策,都是在推翻旧政权后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政权推行的,即先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都是在没有经过革命的情况下,依托旧政权进行的。因此,这两次改革运动均属于改良主义的变革,获得成功的可能自然是很小的。1911 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这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严峻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决定了它已无法像日本那样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四节　资本主义入侵下的亚非拉诸国

一、中国被打开大门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的封建国家。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

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拓市场、扩大贸易时,这种经济对大工业品不仅无所需求,而且有着本能的顽强的抵抗力。英国运到广州的毛织品、印花布、棉纱销路不畅,连遭亏本,而中国的茶、丝、棉、麻、瓷器、药材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却为国际市场所需要。加上清王朝的“闭关政策”的实施,在中外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在 19 世纪前 30 年中,中国每年的出超额用银元计算,在 200 万 ~300 万两以上。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英国迫切要求扩大其统治范围、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状况,把古老的中国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清王朝为防范外国人侵,对外采取了“闭关政策”,并重申“公行制度”和管理外国人的章程。为改变这种状况,英国便以鸦片这种特殊商品,作为侵略中国的主要手段。鸦片涌入,严重毒害中国人民,并引起白银大量外流,清廷财政拮据,统治危机日益严重,被迫实行禁烟。1839 年 6 月 25 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将缴获的鸦片 237 万余斤,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向全世界庄严表明中国坚决的禁烟意志和反抗侵略的决心。而英国却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1840 年 6 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挑起战端。英军进犯广东、福建均未得逞,北犯浙江,攻陷定海,继而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炫耀武力,并向清政府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割地、赔款等项无理要求。清政府大为惊慌,道光皇帝从抵抗转向妥协,表示林则徐禁烟“措置失当”,命琦善赴天津大沽口与英方谈判。旋任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继续商议。不久,道光皇帝又倾向主战,命御前大

臣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接替琦善指挥战事。英军先发制人,攻陷虎门,提督关天培及将士数百人壮烈战死。奕山到达广州后,对内镇压,对外妥协,于5月27日与英方订立《广州和约》,规定清军撤出广州城,缴赎城费600万银元。

8月27日,英国攻陷厦门,进犯定海、镇海和宁波,扩大侵略战争。清政府改派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应战。1842年3月10日,奕经指挥1.3万名清军反攻英军失败。从此,清政府不再言战,派耆英、伊里布向英国求和。8月29日,清政府完全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鸦片战争遂告结束。《南京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向英国赔款2 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及上海为通商口岸。1843年英国又强迫中国与它签订《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于是英国又取得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西方其他列强也趁火打劫。美国胁迫清政府与它订立《望厦条约》,法国与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这些也都是不平等条约。

这样,中国被打开了大门,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等国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取得比《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更多更大的特权,便以"修约"为借口,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父事件"为导火索,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因其性质与鸦片战争基本相同,是它的继续和扩大,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8日,中国广东水师登上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商船亚罗号,搜捕海盗,逮捕嫌疑犯。英国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其实已过期),并诬称英国国旗被广东水师侮辱,要求广东当局释放人犯,公开赔礼道歉。广东当局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于是,英军悍然进攻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10月,英法联军正式组成。12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总督叶名琛被俘,巡抚柏贵投降。英法联军在广州设立"联军委员会",广东地方政府成为傀儡政权。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又北上进犯。1858年5月20日,联军进攻大沽口,直抵天津城外,并且扬言要攻占北京。清政府在英法联军武力威胁面前屈膝求和,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会谈,并相继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迫使中国缴纳赔款,开放新的口岸,让列强享受更多的特权。

但是,英、法侵略者并未善罢甘休。1859年6月,英、法、美三国公使率兵舰北上,以武装互换条约来扩大事端,企图勒索更多的侵略特权。他们拒绝从北塘登陆,坚持由设防的大沽溯白河进京。于是,清朝守军与英法联军进行了一昼夜的激战,侵略者遭到惨败而撤走。

清政府准备乘胜求和，而英、法侵略军则扬言进行报复。1860 年 8 月 1 日，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没有遇到清军抵抗，转而进攻大沽。清朝守军奋力抵抗，但大沽终于失守。清政府急忙表示与英法联军议和，但遭到联军拒绝。英法联军相继进攻通州、八里桥直逼北京。9 月 22 日，咸丰皇帝逃往承德，清军继续溃败。10 月 13 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此后，圆明园遭到侵略者抢劫并被焚毁。

北京沦陷后，清政府更是急于求和。奕䜣在 1860 年 10 月下旬分别与英、法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新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沙俄利用这场战争，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1858 年)、《中俄北京条约》。同月，侵略军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这场战争使中国的独立主权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害：英占九龙司地方一区；赔偿英法巨额军费；沙俄割去 40 万平方公里土地；增开口岸、内地游历通商等，使外国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内地；公使驻京，加强了侵略者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在外敌打拉结合的侵略政策下，中国封建统治者进而与侵略者勾结，导致中外“合作”新格局的出现。

外国资本的入侵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局面就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经济在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当中，一步步地败下阵来。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还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就在对华倾销商品的同时，外资在华投资设厂也已经开始了。据估计，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总额已达 2 ~ 3 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第一，商业和航运业投资。外商为在华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需要一整套庞大的商业机构和航运机构。这些机构，垄断了中国的远洋航运，并逐渐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第二，工矿企业和铁路投资。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开矿设厂合法化。从 1895 年至 1900 年，列强在华投资在白银 1 亿两以上，利用资本输出直接压榨和剥削中国劳动人民，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占据中国的商品市场。列强还纷纷在中国投资修筑铁路，如英国的京奉、津浦、沪宁铁路，法国的滇越铁路，比利时的京汉铁路，德国的胶济铁路，美国的粤汉铁路，都先后动工兴建。第三，设立银行和向清政府提供政治性贷款。列强在华设立的金融机构主要有：英国的汇丰银行、惠通银行、中华汇理银行等；法国的法兰西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等。其中英国的汇丰银行势力最大。列强还以附加各种政治性要求为条件，向清政府提供贷款，其中只是在 1895—1898 年间，清政府就与俄法订立一次借款合同，借白银 1 亿两；与英、德订立两次借款合同，分别借白银 1 亿两，总额为 3 亿两，本息高达 7 亿两。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沿海逐渐深入内地，中国农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

有悠久历史的手工业，特别是手纺业无法同大量输入的物美价廉的西方棉织品竞争。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的敬穆报告说："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厦门）……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上海开港后，洋布倾销，土布消灭，商贾不行，生计路绌。广东顺德县，原来"女布遍于县市"，因洋布"舶至贱售"，因而"女工几停其半"。手工业的破产，影响到社会生活的稳定和经济领域的变化。

对农业经济的冲击，表现在农副产品开始纳入世界市场，农业中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丝变成了侵略者掠夺的主要对象。鸦片战争前，丝每年出口最多不过12 000包，而1847年增至22 000多包，1853年再增至62 000多包。茶叶不但出口骤增，而且产品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也发生了变化。如湖南安化原产黑茶，主要运销陕西和甘肃。鸦片战争后，转而为国外生产所需要的红茶。道光末年，湖南平江红茶生产大增，"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外国商人控制着丝茶出口的数量和价格，把这些农副产品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原料市场。

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意味着传统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这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把农民同市场联系起来，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地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成为它的附庸。农民除了受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削外，还要受西方资本主义和本国商业资本的剥削。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或重新附着在土地上忍受封建剥削，或破产而沦落为通商口岸"猪仔馆"买卖人口的对象。侵略者在上海、厦门、香港等地大量掠夺人口，仅1852年上半年，厦门就有1.5万人被贩运到海外。

清王朝的屈膝投降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清王朝采取了抵抗政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落后及军事上的废弛，清王朝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及甲午战争中打了败仗。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妥协退让，以致走上屈膝投降的道路。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死，其子6岁的载淳继位。慈禧太后与取得英国人支持的恭亲王奕䜣暗中结盟，于是年11月发动宫廷政变，废除了顾命王大臣们的职务，把实权攫取到自己手中。她还任命奕䜣为议政王大臣，改元为"同治"。这时，清王朝已经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等人为总理衙门大臣，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管理中国海关总署，不久又任命英人赫德继任此职。各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团，以便就近驾驭清王朝。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携手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斗争。

与此同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大量丧失。尤其是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使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司法行政权遭到破坏，中

国任何一项权益的丧失,都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国家丧失的,而是向整个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了大门。5个通商口岸开放后,外国在华建立租界地,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为适应外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在通商口岸又造成了一批买办商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伸展到北方沿海地区,从中国的沿海地区又伸入到内江内河和内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进一步落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标志着外国侵略的加深。

农村的凋敝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农业生产服从外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封建经济关系和农业生产的变化,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鸦片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封建统治阶级把战争的恶果转嫁到农民身上。他们巧立名目,除继续搜刮农民难以承受的旧税之外,又加上了更为沉重的新税。地租仍有实物、货币和劳役三种形态,而且地租额都很高。除地租外,还有“小租”、“预租”、“押租”等额外剥削。同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榨取也极为残酷。当时流行着这样的民谣:“农民背上三把刀,徭役苦,租米重,利钱高。”

土地兼并比鸦片战争以前更为严重。太平天国革命发源地的两广地区,更是典型。如桂平县金田村有地750亩,地主即占去662亩。在其他地区,清政府对农民勒逼强夺,“沿乡苛索,官役分肥,每逢听讼,未看讼纸,先查粮册,有钱曲可为直,无钱是反为非”。曾国藩也承认,“县官竭力以催科”,“力役四出,昼夜追逼,鞭扑满堂,血肉狼藉”,“真有日不聊生之势”。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奉天讨胡檄》中揭露了清王朝的残酷统治:“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广大乡村贫苦农民,不堪忍受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处于饥饿与死亡线上。加上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连年战乱的纷扰,纷纷离乡背井的农民变为流民,或流落南洋、北美做苦工,还有一些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农、雇农。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输入量不断增加,1850年达到5万余箱。白银外流现象日益严重起来,1847—1848年,每年外流约1 000万银元。银价因此而继续上涨,战前库平纹银1两折合制钱1 600文,而1850年竟至2 200文以上。农民和手工业者缴纳赋税时,需要以钱折银。因而殖民者的鸦片贸易,通过清政府而转嫁给农民的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曾国藩在奏疏中也谈到这种情况:“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农村的凋敝,引起了农民的反抗,正像天地会领袖陈开在《自述》中指出的:“睇(看)到番鬼入广……小民穷

苦，纷纷四散，无路可走，因而说其人伙，同打江山。”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和各种反抗斗争，约有110次之多。如1842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1843年湖南武岗曾如炷起义，1844年台湾嘉义县洪协等抗粮斗争，1846年云南永昌回民起义和陕西同州“刀客”起事，184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当时人民起义以两广、特别是以广西最为激烈。在1848年，广西大多数府县都发生了农民反抗斗争。洪秀全、冯云山利用了广西的条件，以广西为基地，把分散的反清力量组成巨大洪流，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奴役，封建主义势力对农民群众的剥削与压迫，以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中国的社会危机。各地各族人民相继发动起义，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种形势下，洪秀全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洪秀全继承了历代农民战争的传统，吸收西方基督教教义中的“一神教”思想和“平等”观念，以及儒学大同理想和中国古代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设计太平盛世蓝图，自称受上帝天命，下凡救世。他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与此同时，洪秀全等人外出传教，创立了紫荆山根据地，并逐渐形成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

1851年1月11日，规模空前、震撼中外的农民起义正式爆发。参加太平军的主要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及矿山工人，也有农村知识分子和家庭富裕的各阶层人士。太平军攻克永安后，封王建制，太平天国政权初具规模。永安突围以后，太平军长驱北上，沿长江顺流而下，于1853年3月19日一举攻克江苏南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太平军奠都南京，改称天京，并且派师北伐、西征，屡次大败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了鼎盛时期。

太平天国在政治上要推翻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建立农民政权，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平均分配土地。在文化上反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和多神教，提倡拜上帝教和新的文化规范。《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按照“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全部土地分为上中下好坏三级九等，按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给农民，设想建设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人间天国。《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守土乡官制。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具有彻底的反封建制度的重大意义，体现了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群众斗争，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平均主义的方案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在客观上无法付诸实现，并且造成不良效果。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发展和外部压力相对减轻，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分裂。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的矛盾，已经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1856 年 9 月初至 11 月初的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许多骨干罹难，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太平天国从此走向衰落。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有所起色，陈玉成、李秀成成为太平天国的军事支柱。

1859 年，洪仁玕来到天京，将他在香港、上海等处学到的西方文化，结合所了解的情况，写成《资政新篇》呈送天王洪秀全，得到批准刊刻颁行。这是中国近代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它要求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即发展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等；主张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如建议设立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新闻官”、“新闻篇”（报纸）、“暗柜”（检举箱），使民心公议，上下情通；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提倡改革文风等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在外交上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往来，但不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洪仁玕是中国近代农民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他对“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的探求，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愿望，表现为企图用模糊的建立资本主义的理想，来代替农民的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因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资政新篇》缺乏实现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它没提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也没提如何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因而未得到广大农民和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加上严酷的战争环境也使它无法实施，因此它对农民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对挽救后期太平天国的危局也没有发挥实际作用。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资政新篇》却闪耀着新的思想异彩，其启蒙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1861 年，安庆失守，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转入防御阶段。太平军在东西战场接连失利，形势日益恶化。1864 年 6 月 1 日，天王洪秀全逝世，7 月 19 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终于失败。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对太平天国进行了联合绞杀。主观原因在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力量的代表者，因而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同时存在严重的宗派思想，加上政权的封建化和腐化，以及在军事上的错误。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时 14 载，席卷 18 个省，攻克 600 多座城市，建立了农民政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军所到之处，破坏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打击了清朝统治，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国侵略者迅速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图谋，对于亚洲和欧洲的革命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揭开中国旧式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达到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

二、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

法国的侵略

法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在17世纪初已进入越南。1787年，越南的法国传教士头目阿德兰区主教，代表越南同路易十六签订了军事援助条约，以恢复阮福映王位。虽然由于法国革命前的危险局势使这个条约告吹，但阮福映还是得到法国在印度本地治理商人的军事援助，1802年占领东京，建立了阮朝。阮福映于1808年称帝，同年被中国清朝册封为越南王，规定二年一贡，四年一朝。

阮福映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在行政管理上建立了国家的中央机构并划分了地方行政区：南圻、北圻和中圻，并定都顺化。为了整顿税收，阮朝进行了普遍人口登记，建立了土地清册。但是，阮朝建立不久，就发生了危机。官吏豪强兼并土地、沉重的赋税杂捐、繁重的劳役、水利的失修，使人民穷困不堪。1820年有20万人死于饥馑。1850年又饿死近60万人。在1820—1840年期间，农民起义多达200余次。阮朝还穷兵黩武，1834年把柬埔寨变为"保护国"。柬埔寨人民多次反抗越南侵略，1840年打败了越南占领军。在阮朝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殖民化过程。

早在1847年，法国炮舰"维克多利"号以保护传教士为名，轰击越南军舰。1858年8月，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侵占土伦，1859年2月，侵占西贡。这种野蛮的炮舰侵略行径，遭到越南军队的坚决抵抗。1860年3月，侵略联军从土伦和西贡撤走。

1861年，法军侵占嘉定、边和、定祥三省。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侵略军毁灭了几十个村庄，杀害了村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1862年，阮朝同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根据条约，越南把边和、嘉定、定祥及昆仑岛割让给法国，而且规定以后割地给他国须经法国同意；10年内越南向法国和西班牙赔款400万皮阿斯特；①开放土伦、巴叻、广安三港及湄公河及其支流；保证法国人贸易自由。

第一次西贡条约标志着法国侵占越南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法国历史学家布哀耶是这样描述法国军事侵略和金融界的"默契"的："银行家们紧跟着士兵的脚步前进。1862年刚刚占领了边和、西贡和美荻三省，法国国家银行便立即在印度支那设立分行。"法国决心夺取越南统治者的一切权力。1862年，阮朝被迫向法国交出了对柬埔寨的保护权。1867年，法军侵占了整个越南南部。

1873年10月，法国侵略军向越南北部发动了突然袭击，侵占了古都顺化；接着又于11月侵占了河内和红河三角洲一部分地区。1874年3月，法国强迫

① 西班牙货币名。

阮朝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南部全部割让给法国;开放河内、海防、归仁和红河;法国监督越南外交;法国侨民在越南享有治外法权。1883年法军再次侵犯顺化,迫使阮朝于是年8月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和外交监督权。法国在顺化设立总督,成为阮朝的太上皇。1884年6月,法国又拟定《巴德诺条约》,迫使阮氏王朝签字,最后确立了它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法国的殖民政策

法国侵占越南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把越南变成侵略中国的基地。在吞并越南的过程中,法国挑起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早在70年代初,越南政府联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协同抗击法军。1873年12月,收复河内,击毙法军司令安邺。1883年,中越军民在红河三角洲并肩抗击法军的新进攻。1885年,冯子材所部清军,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大获全胜,刘永福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法国的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但怯懦昏庸的清朝政府旨在"乘胜即收",却向战败的法国侵略者屈辱求和,于当年4月和6月先后签订了《中法停战协定》和《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1887年,法国建立了由驻西贡总督统治的、由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组成的"印度支那联邦"。

法国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侵略的目的。法国殖民统治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分而治之"。它承袭了阮朝的南圻、中圻和北圻的行政区划,并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殖民统治形式。在南圻,采取直接统治形式,由总督直辖。在中圻,采取"保护领地"形式,保留阮朝统治机构,派总监进行监督。在北圻,实行间接的"半保护领地"形式,由阮朝傀儡政权统治。法国对印度支那三国的统治方式,也是以破坏它们之间的团结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法国人利用这一国军队去镇压另一国的反抗,利用这一民族去反对另一民族。常用的手段是利用越南的力量,牵制其他两国,即所谓"以越治柬"、"以越治老"。

法国殖民政策的第一个特点,是以垦荒、登记土地、强购或没收等方式掠夺土地。在最初,法国利用了越南旧土地法,不久就颁布了新的土地法,规定只留一小部分土地给皇室,其他土地归殖民行政机构管辖。这样,便开始了大量掠夺土地的过程。1890年掠夺土地10 900公顷,1900年增至301 000公顷,1913年再增至470 000公顷。仅在法国统治北越的最初15年内,殖民行政机构就把200个土地承租权无偿地交给天主教会、殖民官吏和商人。这些新土地占有者或经营大米、橡胶、咖啡、茶叶、种植园,或出租给农民,以获取高额收入。

法国殖民政策的第二个特点是征收重税苛捐。法国议员拉涅桑曾在议会指责过"安南人缴纳着惊人的税捐"。但就在他以后任印度支那总督期间(1890—1894),捐税仍有增无减。比如,在东京便从376万皮阿斯特增加至660万皮阿斯特。而在他的后任保罗·杜美统治时代,不仅土地税、人头税大大增加,各种间接税以及鸦片、酒、食盐等税收,都有增无已。如1900年的间接税收入为

1 350万元，盐、酒、鸦片 3 种税收占 1 100 万元。1897 年每担盐税为 0.25 元，1906 年增至 2.35 元。殖民当局用这些重税苛捐来弥补其庞大的军政费用和偿付资本家的高利贷债款。

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剥削方式也表现了它高利贷帝国主义的特点。20 世纪初以前，越南的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法国在这里的资本基本上是货币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只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法国才把资本投资于花费最少的采矿业。大量的资本都用于购买殖民政府的公债，对越南进行高利贷剥削。1886—1913 年，法国资本家向殖民政府贷款 4 亿多法郎。1873 年成立的东方汇理银行，1885 年获利息 39.3 万法郎，1905 年达 266.6 万法郎。

法国的殖民剥削制度，使越南社会发展缓慢，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三、朝鲜危机与外国资本入侵

闭关锁国

1392 年，李成桂自立为王，把前代国号“高丽”改为朝鲜，把国都由开城迁到汉城，开创了朝鲜历史上延续了 400 多年的李朝。李朝按照中国明代的模式，改组了国家制度，正如朝鲜《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

从 14 世纪起，日本海盗（倭寇）开始对朝鲜沿海地区进行经常性的侵扰，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16 世纪后期，日本海盗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遭到失败以后，转而大规模北侵朝鲜。1586 年，日本丰臣秀吉取得政权后，积极推行海外扩张政策，于 1592 年和 1597 年两次侵略朝鲜。明朝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进行了抗倭援朝战争。经过朝鲜人民的长期英勇斗争，终于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但此后倭寇仍侵扰不已。

从 17 世纪中期开始，李朝下令实行海禁，严禁朝鲜人同外国人接触，甚至不许同海上遇到的渔民接触，违者处以死刑。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严禁任何人居住在沿海地带，使大片土地变成荒地。政府派军驻扎沿海地区。严禁制造远航船只。

闭关政策只是针对沿海地区。李朝同清朝恢复正常关系后，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据统计，1637—1850 年，李朝向清朝派使节团共 615 次，清朝向李朝派使节团 160 次。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的中江、会宁、庆源等地的边境互市贸易，相当繁荣。18 世纪以后，许多著名朝鲜学者随使节团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对传播中国和西方文化起了积极作用。

李朝的改革

17—18 世纪，李朝封建制度发生了日趋严重的危机。1644 年庆尚道农民起义，1684 年“杀尽贵族”的教派起义，

1751—1753 年农民市民起义。这些都反映了下层动荡的危机。在封建上层，“南人”、“北人”和“西人”各派之间争权夺利，此伏彼起。“西人”派后来又分为“老论”与“少论”两派，在 17—18 世纪进行了长期的明争暗斗。

朝鲜上层和下层的危机是封建社会经济和国家制度的危机。朝鲜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国王对全国土地的所有制和全国地主对国家土地的占有制。农民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农民公社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从 1785 年颁布的《大典通编》中可以看出，朝鲜第一类土地占有制是国王本人及其宗室的宫房田；第二类包括中央和各道机关的公廨田、官吏俸禄衙禄田、备边司的军资田、国家开支的公须田；第三类是寺院田和书院田；第四类为王赐的私人占有土地（功荫田、别赐田）。17—19 世纪朝鲜土地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地主私田日渐增多，而农民份地则不断减少，随之而来的是佃农的增加，到 18 世纪末已占农民的绝大多数。自耕农不但负担着什一税、土地税等十几种正常税，而且还要缴纳几十倍于正常税的附加税。苛重的租税和高利贷盘剥制度同国家官僚机构的普遍贪污腐败结合起来，给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都带来灾难性的损失，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动摇了朝鲜的封建统治。

为了挽救危机，李朝政府实行了稳定人心的改革。“老论”统治集团在显宗时期（1660—1674）推行废除儿童人头税、盐税、渔场税的措施，重新分配被贵族代理人和地主强占的林地，举办恤养所以安排乞丐和无家可归者。此外，为了解决税收下降问题，进行了新的土地丈量和人口调查。“老论”派在英宗统治时期（1725—1776），继续实行减少或废止某些捐税的政策，修筑水利灌溉工程，废止酷刑，允许奴隶子孙成为自由民等。这些改革同封建制度的危机问题密切相关，也受到实学派思潮的推动和促进。

实学派思潮

强调实用科学（农艺学、数学、天文学），主张学习中国并利用从中国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在朝鲜实行改革的思潮称为实学派思潮。

柳馨远（1622—1673）是实学派的创始人。他属“南人”派，在“西人”派当政时期，退隐田园，从事文学与军事研究。他在 26 卷的《磻溪随录》中，提出了“消除弊端、整顿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改革方案。他主张用一切土地归公和禁止土地买卖的办法来实行土地改革。它的要点是：全部私人占有的大块土地交公；禁止土地买卖；分给耕者以小块份地；农民只缴一种土地税（约为收成的1/15）；规定固定不变的土地单位；草原、森林交农民支配；国家严格规定国王、贵族和官吏的俸禄，取消以土地为俸禄的办法；规定对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统一适量捐税；废除对养蚕业、果木业、渔场、盐场的捐税。柳馨远的改革方案具有进步意义，他的这部著作在朝鲜启蒙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上半期，实学派思潮有了进一步发展，涌现了一批史学

家、文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改革思想家。李瀷、朴趾源、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他们中的著名代表。

李瀷(1681—1763)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理学、科举制度、门阀制度、党派斗争、贵族和官吏的腐败及土地制度的不公正等，提出了平等和富国强兵的改革设想。他经常研究农民生活，认为“王通政治，若不以田地分配为主，则其他一切亦将困难。家产之贫富不均，权利之强弱不同，将何以治国乎?”他提出了反对和消灭“六蠹”(奴婢、科举、门阀、浪费、僧尼、游惰)，发展农业生产，以建立理想的农民社会。

朴趾源(1737—1805)于1780年随李朝祝贺清乾隆皇帝70寿辰使节团在中国观光4个月，行程近万里。回国后又用13年时间，整理编著了他的传世之作《热河日记》。这部包括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哲学、历史、科技、宗教、美术、音乐、戏剧、语言、医学和书志学等各方面知识的多卷本著作，贯穿着继承发扬本国文化和学习吸收外国文化，以图祖国繁荣昌盛的热烈愿望。它汇总了中国的农业、畜牧业、商业、建筑业、修路、筑城、造车船等方面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改革方案。全书的主题是:必须立即实行改革，反对士大夫的游手好闲，同情穷苦人民，谴责虚伪的伦理制度。

洪大容(1731—1783)有丰富的天文、地理、历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他独立研究，得出了地球自转和公转的结论。1765—1766年他随李朝使节团到清朝北京，结交中国学者，回国后积极主张学习中国先进技术、文化，成为实学派的“北学论”(学习中国)的先驱者。集中反映“北学论”诸家的社会经济思想的是永平郡守朴齐家(1750—1805)。1778年以后，他作为李朝使节团随员，3次到中国，对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进行了研究，写成了《北学议》。他关心农民生活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主张建立模范农田、发展交通、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对中国、日本、越南及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朝鲜金石学和考古学者、实学派的金正喜(1786—1858)，1809年随父来京，进行学术交流，后获得李朝“阮堂大师”称号。实学派丁若镛在《牧民心书》中批判了现存制度，因而被流放18年之久。

法国和美国的侵略

实学派是朝鲜新的社会思潮的先行者。后来这一派的许多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思想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1794年，中国的周文谟作为第一个外国传教士进入朝鲜。1801年，他同“南人”派基督教徒一起被处死。此后，李朝把镇压基督教与反对改革派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进行。1847年法国就以保护传教士为借口，派舰要求开放口岸，因触礁而返回。1863年摄政的大院君，于1866年1月在汉城及其他地方逮捕和处死上万名天主教徒，①其中包括9名法国神父。法国印度支那舰

① 天主教为基督教的一派。

队司令罗兹,又以此为借口,占领江华岛,强迫朝鲜对法通商。朝鲜军民奋勇抗击,打死打伤侵略者百余人,法舰队夺路而逃。

1866年7月,在天津活动的美国商人普雷斯顿率领由24人组成的海盗集团,乘坐装有2门大炮的"谢尔曼将军号"商船,侵入平壤地区。他拒绝当地政府警告,侦察地形,准备盗墓,并抢劫财物和屠杀居民。朝鲜军民用火攻战术全歼入侵者。尽管朝鲜政府说明了事件真相,但美国资本家还是加紧策划武装侵扰事件。曾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的詹金斯,于1868年4月乘船到德山郡偷掘大院君之父南延君陵墓。他的目的是盗取珍宝、盗走骨骸作为通商和其他要求(如为"谢尔曼将军号"事件赔礼、赔款和通商等)的交换条件。但由于陵墓宏大而坚固,而且被发觉,只好仓皇逃走。

1871年4月初,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美国亚洲舰队司令罗杰斯率远征朝鲜舰队入侵江华岛,要求赔偿"谢尔曼将军号"损失和开放口岸。侵略者在江华岛登陆后,遇到了朝鲜军民的英勇抵抗,不得不在5月间撤退。镂斐迪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承认:"朝鲜人决心殊死战斗,他们的勇敢是世所罕见的"。

大院君政府在采取抗战政策的同时,却把胜利归功于闭关锁国政策。它把资本主义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又拒绝革新要求,而一味用闭关锁国、加强压迫剥削来维护封建制度。1873年冬,大院君下台,高宗的妻子闵妃以"国王亲政"为名,建立了外戚闵氏政权。

四、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

英国的侵略和榨取

欧洲势力东渐印度起自15世纪末。1498年达伽马的商船沿迪亚斯发现好望角的航线,到达印度马拉巴海岸的卡里库特。1510年,阿尔布奎克全部占领果阿,建立了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随后荷兰在柯钦等地也建立了据点。

英国官商合营的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成立后,击败了葡萄牙和荷兰的海上军事优势,在苏拉特、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地站住脚跟。1757年,大盗克莱武利用孟加拉的内讧,在普拉西战役中取胜,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完成的。1746—1749年、1751—1752年、1756—1761年,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印度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战争,结果法国势力被排挤出印度。在印度,英国进行了4次侵略迈索尔的战争(1767—1769、1780—1784、1790—1792、1799)、3次侵略马拉特的战争(1775—1782、1803、1817—1819),占领了南部和中部印度。1849年吞并旁遮普,完成了对印度的全部占领。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和掠夺印度的工具和殖民剥削的执行机构。在

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它一开始就采取以暴力为基础的、赤裸裸的直接搜刮和抢劫手段，仅侵吞孟加拉国库一项，就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3 700多万英镑的收入，其中2 100万英镑被高级官吏们中饱私囊，而克莱武自己就拿走了23万多英镑。除直接掠夺之外，还用苛捐杂税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仅1760—1780年间，用这项收入向英国输进价值1 200多万英镑的商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连一文本钱都没花。

鸦片贸易(占公司收入1/7)和向当地商人出卖豁免国内关税的执照，也是公司一笔发大财的买卖。公司的所有官员都疯狂地搜刮财富。两次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的克莱武，一度曾企图节制部下的贪欲，为此提高官员工资并禁止他们经商和接受"礼品"。但所有措施都无法制止发财心切的人，连克莱武也在设法赚钱。他组织了盐和烟草垄断公司，参加的高官们共分经营收入，他自己一年就可赚1.7万英镑。

东印度公司对土地税的掠夺也占有很大比重。在1765—1766年，征收孟加拉的地税为147万英镑，1771—1772年增加到234.1万英镑，1775—1776年增加到281.8万英镑。1769—1770年，该公司囤购大量米谷，用贵得吓人的价格出卖，在印度造成了大饥荒，使孟加拉1/2(1 000万人)的居民丧失了生命。

英国在18世纪后半期对印度的侵略和榨取，给印度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个英国议员说："我深信，地球上任何时候的任何一个文明政府，也没有比1765—1784年的东印度政府更为腐败、更为背信弃义、更为凶恶了。"大量财富(1757—1815年共榨取10亿英镑)流入英国，转化为资本，促进了各种科技发明的增多和许多贵重设备的普遍采用，加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侵略和掠夺印度的过程中，逐渐由官商公司向英印政府过渡。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管理制度"，规定英国政府任命印度领地的总督，结束了孟加拉统治者管民事、公司掌田赋的"双重管理制度"。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印度管理印度法案"，规定由内阁任命督察委员会处理印度一切重大事务，使英国政府获得了统治印度的最高权力。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开始了英国工业资本剥削印度的新阶段。

经过工业革命，到19世纪初，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英国资本主义在印度破坏了印度自然经济社会，并且建设了西方式社会基础。英国凭借政治统治权力、工业技术优势和低关税等条件，破坏了印度手工纺织工业。他们首先把印度的棉织品排挤出欧洲市场，接着把印度的棉花运到英国各纺织工业城市进行加工，然后再把制成品输入印度。1814—1835年，即印度对英国实行"自由贸易"的21年间，印度输入英国的棉布从125万匹跌到30多万匹；而同一时期中，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由不足100万码增加到5 100万

码以上。印度手工纺织业的被破坏，意味着千百万手工业者的破产。往日工业发达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如达卡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人口从 1827 年的 15 万人锐减到 3 万人。失业的手工业者找不到工作而挣扎于死亡线上。印度总督本丁克承认："悲惨的情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

英国资产阶级在破坏了维系印度公社的家庭工业的同时，也破坏了与手织业、手纺业相结合的农业。1793 年，印度总督康华礼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等省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废除了农村公社成员对土地的共有权，把包税人(柴明达尔)变为私有地主。柴明达尔以 1790 年的征税额为不变的"固定"数额，但须将土地税收的九成上缴公司。哈斯丁在总督任内(1813—1823)，实行了两种土地税收制度：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省是"莱特瓦尔制"，承认公社农民("莱特")对所耕土地的所有权，但须向公司缴纳相当于全年收成的 1/2 以上的土地税；在中印度实行了"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把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的税额规定为每 25～30 年重定一次。这些土地制度是对印度农民群众的残酷压榨。榨取的土地税占殖民当局总收入的 3/5，从而使印度农民陷入赤贫。

英国资产阶级和以前征服过印度的征服者不同，他们破坏了印度的公社，破坏了印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被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不择手段，在殖民地毫不掩饰地表现了野蛮的本性。但是在历史上，资产阶级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①破坏了印度公社，也就破坏印度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②因此，"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

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资产阶级除了破坏旧的社会经济之外，并没有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失去了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个社会现实导致了印度的社会政治动荡。

民族大起义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是一次由封建王公领导的、以印籍士兵为突击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起义。

英国殖民统治者不但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遭受深重灾难，也损害了部分印度封建王公的利益。1848 年戴贺胥任印度总督后，为了扩大其统治地盘，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8 页。

② 同上，第 765 页。

③ 同上，第 766 页。

辟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原料产地,炮制了"丧失权利论"。根据这个理论,王公死后如无直系后嗣,他们的领地和年金均收归东印度公司。萨塔拉、那格浦尔、詹西等10多个土邦因此被公司兼并。1856年,戴贺胥又以治理不善为名,吞并了奥德王公的土地。随后又以种种借口,剥夺了马拉特王公那那·萨希布领取年金的继承权,剥夺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寺院的大量土地。这些曾经在乡村拥有一望无际的大片土地的所有者,一旦沦为居住泥棚、仅有几只瓦锅的佃户,其对英国殖民者的恐惧、不满和仇恨再也无法控制,因而一些爱国封建王公成了大起义的领导者。

大起义前,英印军队共24万人,印籍雇佣兵就占20万人。他们是迫于生活而受雇于公司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而公司则依靠他们征服了印度。过去,英国殖民者曾用高薪、低税等手段来掩盖英印军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占领整个印度后,原来的优待被取消了,触犯种姓、强迫改宗基督教等事件屡有发生。破坏雇佣合同,强迫印籍土兵渡海作战,也激起反感。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与家乡有密切联系。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因而许多印籍土兵就可能由侵略工具变为起义的发难者,成为起义队伍中有组织和训练的突击武装力量。

1856年开始,在印籍土兵中的秘密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传递着联络信号红莲花,利用节日在各团队之间建立联系。烤薄饼则是北印度农村中广为传递的神秘信号。一些秘密组织也奔走于恒河流域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号召起义的宣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军队团队之间常有信件来往,如巴拉克普尔印籍土兵团队致其他团队的信中号召"暴动";马拉特王公那那·萨希布等则派使者联络游说,密谋发难;一些爱国伊斯兰僧侣,如阿哈默德·沙在勒克瑙、阿格拉特等地宣讲印度近百年亡国史以激发穆斯林群众的忧患意识;许多民间艺人在说书、卖唱、木偶戏等演唱内容中,加进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鼓动宣传;在德里和马德拉斯等大城市中,也出现了揭露英国殖民者罪行和号召起义的传单。

1857年初的"涂油子弹事件"是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索。这种新发的子弹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纸包装,使用时必须用牙咬开。印度教徒敬牛,而伊斯兰教徒禁忌猪肉,所以使用这种新子弹伤害了印度土兵的宗教感情,激起了普遍的愤慨而拒绝使用。英国军事当局对土兵的反抗采取了镇压,这加速了起义的爆发。5月10日,米鲁特的第三骑兵团首先发难,5月11日进入德里,5月16日全部占领德里。随后,起义者把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推上印度皇帝宝座。事实上,皇帝巴哈杜尔·沙不过是一个政治象征,真正实施权力的是以巴赫特·汗为首的10人行政会议。这个以下级军官和土兵组成的起义领导机构发布了废除柴明达尔制的命令,逮捕通敌分子,对地主、高利贷者和富商征收特别税,而对贫民则豁免捐税。行政会议以巴哈杜尔·沙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召印度教徒和伊

斯兰教徒团结起来，对英国人进行圣战。

起义者在传统政治中心的德里首战获胜，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印度各地的起义。大约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起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印度，特别是北印度和中印度的广大地区。起义的中心是勒克瑙、康波尔和詹西。

英国殖民当局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即把主力用于镇压德里起义。印度总督康宁到处调兵遣将，扩大兵力。1857 年 6 月 8 日，起义者开始了 3 个月之久的艰苦的德里保卫战。近 4 万起义军英勇奋战，屡挫英军攻势。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指挥，在关键时刻发生分裂；由于部分贵族、商人制造混乱，囤积粮食，进行间谍活动，使德里保卫战越来越困难。9 月 14 日开始，起义者进行了最后 6 天的战斗，撤出了德里城。

德里陷落后，勒克瑙起义者面对强敌，进行了近 6 个月的保卫战，多次重创英军。1857 年 3 月 21 日，勒克瑙陷落。3 月末，英军进攻詹西，美丽而英勇的女王拉克什米·巴依领导军民同英军激战 8 天。4 月 3 日，女王突围，与唐提亚·托比的起义军汇合。6 月 18 日，起义军在瓜廖尔附近与英军会战，拉克什米·巴依身先士卒，壮烈牺牲。此后，起义转入游击战争阶段。15 万起义军由城市转入农村，由大部队化为小部队，转战于巴雷利、卡尔皮、奥德、比哈尔和印度西部山区。唐提亚·托比、宫瓦尔·辛格、毛列维·阿穆德·沙等著名领袖虽能运用灵活战术，但未坚持积极主动战略。1859 年 4 月 7 日，唐提亚·托比被叛徒出卖而就义。同年年底，起义结束。随着老皇帝巴哈杜尔·沙的被俘与流放仰光，莫卧儿帝国宣告灭亡。1858 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发表宣言，把印度的统治权由东印度公司转移为皇家直接管辖。1857—1859 年起义为印度以后的反抗准备了条件。

五、伊朗的衰落

沙法维国家

16 世纪初，伊斯马尔自立为伊朗王(1502—1524)，建都大不里士，以什叶派为国教，建立了沙法维国家。

在全盛时期，这个国家占领了中亚细亚的呼罗珊和赫拉特，征服了坎大哈的阿富汗部落和东南方的俾路支，版图扩大到阿尔明尼亚和整个阿塞拜疆。

阿拔斯一世(1587—1629)进行了军事改革。他建立了有 2.2 万人的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正规军，并配有大炮。骑兵编制和奥斯曼帝国的新军类似：从格鲁吉亚与高加索其他民族的儿童中选取，儿童们从小离开父母，信仰伊斯兰教，在伊朗进行军事训练。他把首都迁到伊朗中心伊斯法罕，并以此为基地开辟了波斯湾的蚕丝陆路商线。在国内贸易上，他防匪治盗，严惩贪污，修建道路，从里海南岸通往马赞德朗的 270 公里的宽阔驿道，至今尚存。

苏莱曼时期(1666—1694),沙法维国家开始衰落。由于各代国王昏庸无能、王室腐化、宫廷内部倾轧,削弱了统治力量。早在15世纪末,从欧洲到印度绕行非洲航线的开通,使通过伊朗的陆路商线失去意义,伊朗的重要地位随之下降。统治者对农民和市民进行残酷剥削,特别是最后一代国王侯赛因(1694—1722),他把赋税增加了一倍到两倍。1722年10月12日,侯赛因在伊斯法罕向包围他的阿富汗人米尔·马穆德投降,把伊朗的"王中之王"的王冠献出。沙法维国家宣布灭亡。

纳迪尔的统治

阿富汗军队入侵伊朗后,烧杀抢掠,肆无忌惮地凌辱当地人民的信仰与习俗。俄国的彼得一世也乘机侵入伊朗,同奥斯曼帝国竞相角逐。在这个混乱时期,出身于土耳其族系的纳迪尔应运而出。他1688年生于呼罗珊,1725年已经是率领2万名军队驰骋疆场的名将。1726年,重创阿富汗军。1729年进入伊斯法罕,被拥为王。1730年,他把入主伊朗7年的阿富汗侵略者赶出伊朗。以后,他又战胜了土耳其人,并用外交手段使俄国撤军。政治上的成功,提高了他的威信。

1736年1月,纳迪尔在穆冈草原上召开了2万人参加的封建贵族会议。纳迪尔玩弄了专制者常用的欲擒故纵的政治手腕:先是假意声明他已很疲倦,不愿再理政事,孩子又小,请另选新主云云;但大毛拉讲了维护沙法维王朝的言论后,即被早有预谋的纳迪尔杀死。在纳迪尔军队包围会议的情况下,全体与会者表示愿意选他为王。于是他又向大会提出三个条件:不得拥护沙法维王朝,忠于纳迪尔及其儿子,排斥什叶派而尊逊尼派。在逊尼派四派之外,另组第五派,并以该派教长为教主。贵族代表们一致接受了他的条件。3月8日举行了加冕礼。

纳迪尔登基不久,即用强制手段削减了什叶派的供奉田,并为伊朗改奉逊尼派采取了其他措施。这项宗教政策旨在拆除沙法维王朝的经济支柱和政治思想支柱,并为征服奥斯曼帝国、阿富汗、中亚细亚和印度西北部那些逊尼派国家服务。1737—1738年,完成了对阿富汗的征服。1739年侵入印度,2月在德里附近的卡纳尔,打败莫卧儿帝国的军队。3月进入德里,有1万余人被杀。在掠夺了7亿卢比以上的战利品之后,伊朗军队于5月回国。

此后,纳迪尔在1739—1741年间,又三次远征信德、布哈拉和花拉子模,把这些地方并入伊朗版图。他为了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帝国,在国内复兴手工业与商业,发展对外贸易,并企图建立海军。但是,他依靠的土库曼、乌兹别克及阿富汗各部落的上层集团与伊朗封建集团之间的矛盾,繁重的赋税政策,对外战争的耗费,都不断引起国内动乱。1746年在赛义斯坦、基尔曼、呼罗珊、阿塞拜疆等地发生了起义。1747年6月他被他的近卫军杀死。

卡扎尔王朝

纳迪尔死后,阿富汗在阿赫默德统治下宣告独立,其他地区陷入混战之中。伊朗北部的卡扎尔部落的阿加·穆罕

默德，不断扩大版图。1785 年占领库姆、伊斯法罕和德黑兰，并以德黑兰为首都。1791 年占领阿塞拜疆。1794 年末，占领伊朗主要省份，建立了卡扎尔王朝（1794—1925）。

卡扎尔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国王、世俗和教会封建主对土地的封建私有制。国王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他把土地作为采邑或俸禄分封给诸汗。18—19 世纪初，存在着国有的、诸汗的、伊斯兰寺院的土地所有制。军事采邑制还继续存在，采邑所有者在战时要为国家提供兵士。伊斯兰教寺院则有免税特权。国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宰相和财政、对外、军事大臣在国务活动中起主要作用。全国分 30 个省和州，省设总督，州设州长，通常都是由王亲国戚来担任。

伊斯兰教什叶派在国家生活中起巨大作用。古兰经、教典和语录是法律、制度及整个社会政治的基础。国王为了使决策具有宗教力量，也求助于高级僧侣。高级僧侣管理寺院经济，有些人还通过中间人或直接经营商业和放债。他们还操纵着国民教育与民事诉讼的权力。

农民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收成的 4/5 交给地主，向封建主交羊毛、食油等贡赋，供给过境官吏和军队的费用。牧民必须上缴 5% 以上的牲畜、畜产品，要为封建主牧放牲畜，还要捐献礼品。城市手工业者均归属于中世纪式的行会组织，他们用货币或产品形式向州长的管事人或包税者交税。国内贸易掌握在中小商人之手。18 世纪末以后，对外贸易缩减。由于英、俄、法诸列强的干涉，在卡扎尔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日趋衰落。

巴布教徒的起义

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从根本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积弱不振和社会的落后状态为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俄国利用地理接近的条件，两次（1804、1828 年）侵略伊朗，强迫订立不平等条约，索取 200 万卢布赔款，吞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北阿塞拜疆，获取了许多特权。英国以发达的工业为后盾，在 19 世纪 40 年代，强加给伊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它的商品输入伊朗税率为“值百抽五”，并豁免各种国内关税，还取得了领事裁判权。

列强的入侵给伊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外国商品充斥伊朗市场，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扼杀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业工场，导致商人和手工业者破产。19 世纪 40 年代末，许多地方的人民起而抗争。1847 年，赞兼发生了手工业者、小商人与市民联合反对州长的起义，起义者把州长驱逐出城。同年，伊斯法罕城市贫民发生骚动。1848 年，在大不里士、伊斯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市民暴动。

这些起义的领导者是伊朗的巴布教派。巴布教的创始人是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1820—1850），他生于设拉子一个棉布商人家庭。他经商 5 年之后，

到卡伯拉和纳哲夫朝圣，成为什叶派分支的谢伊克教派的信徒。1843 年该派领导者赛义德·卡西姆去世后，没有指定继承人。1844 年 5 月 23 日，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回到设拉子的这一天，恰好是 1000 年前第 12 代伊马木隐遁的日子，他便自称“巴布”。“巴布”是“门”的意思，他认为自己受天命，要充当人类与神意执行者伊马木之间必经的门户。他的教派因此被称为巴布教。

1847 年，赛义德·阿里自称为先知马赫迪，写了巴布教的经典《默示录》。巴布的教义要点是：人类社会是新时代代替旧时代、新制度和法律代替旧制度和法律、新的先知代替旧的先知的过程；当前人类不公平与倾轧的原因，在于当权的官员与僧侣以《古兰经》与教典维护旧制度，而巴布教的任务就是建立保障人身自由权、私有权和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正义王国”；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目标，现在以伊朗 5 省为圣地，凡不信教者，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要赶出圣地并没收其财产。充满着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巴布教义，受到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阿訇的欢迎，到 1849 年 2 月，教徒已达 10 多万人。

第一次巴布教徒的起义是 1848—1849 年在马赞德兰省发生的。2 000多名起义者同 1 万多名王军在塞克·塔别尔西陵墓进行了浴血战斗，并且打败了王军。5 月，王军采取欺骗手段，许诺特赦，诱杀了 200 多名起义者。1850 年 5 月，巴布教徒 1.5 万人在赞兼起义，建立了一个拥有公平制度的“正义王国”。他们几乎坚守了一整年，抵挡住了占优势的政府军队。后来，王军故技重演，起义者再次上当被害。巴布已在 1845 年 8 月被捕，相继被监禁在法尔斯省和阿塞拜疆。1850 年 7 月，为了防止起义蔓延，国王下令把他处死于大不里士。但是，他的殉道，更加激起教徒们的反抗，随之而来的是血腥镇压。巴布教徒起义失败之后，巴哈·阿拉继续传教，后来演变为人道主义教派，1893 年传至美洲。

伊朗的改革运动

19 世纪末，伊朗进一步半殖民地化。1889 年，英国路透男爵在德黑兰获得开办波斯帝国银行的租让权。该行拥有发行货币、规定外汇牌价和开办厂矿企业的特权，并有分行遍布各大城市。俄国在 1881 和 1890 年取得在伊朗北部敷设电报线的特权，在德黑兰开设波斯信贷银行，办理国家借款，兼营地产业务。70 年代以来，常驻首都的、由俄国控制的哥萨克旅，负有保护国王和俄国利益的双重任务。

在纳西尔·丁的统治时期(1848—1896)，伊朗曾经有 20 年左右的稳定局面。纳西尔·丁本人曾于 1873、1887、1889 年 3 次访问欧洲。最后一次访问时，他把泛伊斯兰主义者贾马尔·丁·阿富汗尼带回伊朗。虽然他不久又把阿富汗尼驱逐出境，但将新的改革思想留在了伊朗穆斯林中间。仿照西方国家机构，伊朗政府设立了法制、邮电、交通部。欧洲式的学校在首都也建立起来了。国王为了模仿西方，曾下令伊朗男人刮去胡子和命令宫廷妇女改着西方衣服。

在欧洲受教育回国的青年们，是新思潮的传播者。半殖民地和封建伊朗的文化和改革运动是同资产阶级的形成相联系的。伊朗年轻一代作家们的写作主题更接近人民生活。米扎尔·法塔利·亚洪多夫的抨击封建秩序、讽刺诸汗专制和伊斯兰上层伪善的作品，在伊朗享有声望。1875 年在伊斯坦布尔出版的《星辰》周刊，是伊朗国外的主要启蒙刊物。1890 年，马尔考姆汗和贾马尔·丁·阿富汗尼在伦敦创办《法言》杂志，激烈抨击伊朗政府，首次提出普选、立宪和人权。马尔考姆汗作为改革、立宪的思想家和组织家，在伊朗享有盛誉。国王任命他为驻伦敦公使，本意削弱他的影响，不料他到伦敦后，积极组织欧洲的伊朗侨民。国王召他回国，他拒绝从命，因此被革职。他用波斯文创办的《法言》杂志变成伊朗立宪派的喉舌。这个杂志和其他伊朗侨民的报刊被秘密运进伊朗，在官吏、学生、商人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地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未来伊朗革命的前奏。

1890—1891 年，在伊朗发生了反对政府赋予英国塔尔博特公司烟草专卖权的抗议运动。以大不里士为中心，波及伊斯法罕、设拉子等地的人民群众，开展了罢市和禁止吸烟运动。伊朗政府被迫取消此项特许令。1896 年 5 月，纳西尔·丁准备庆祝自己的登基 50 周年大典，他按惯例接受臣民诉状时，被贾马尔·丁·阿富汗尼的一个门徒刺杀。穆扎费尔·丁继位，面临着革命风暴的到来。

六、埃及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抗法战争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8 世纪 80 年代，法国与英国争夺印度失败后，迫切要求将埃及变为与英国在东方进行竞争的基地。90 年代，法国资产阶级加速了向东方扩张的步伐。1797 年夏，带领法军驻扎在意大利的拿破仑·波拿巴向法国督政府提出了侵略埃及的方案。波拿巴被授命为东方军司令，统率陆、海军占领埃及，要把英国的势力从它所能到达的所有东方国家中统统清除出去。1798 年 7 月，波拿巴带领精兵 3.5 万人入侵埃及。

当时的埃及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马穆鲁克贝伊①掌握着埃及政权，导致政治腐败、经济衰退。18 世纪末，尼罗河三角洲有 1/3 的土地荒废了。埃及生产的农产品仅仅只有古代产量的 1/4。传统工商业一落千丈，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只是万把人口的城镇。埃及人口因长期饥饿和瘟疫而大大减少，19 世纪初的人口还不到 10 世纪时的一半。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内战频繁，从 18 世纪初起，平均每 10 年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内战，统治力量大大削弱。埃及人民的

---

① 马穆鲁克意即奴隶，早先是从希腊、高加索等地招募来的，埃及统治者利用他们统治人民。贝伊是奥斯曼帝国封给地方官吏和军官的称号，次于“帕夏”。

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法军在亚历山大港口登陆后，土耳其军队和马穆鲁克军团节节败退。亚历山大城、开罗相继失陷。不屈服于外来侵略的埃及人民积极开展反法斗争。初期，亚历山大城的市民自发起来以房屋、墙垣作掩护，用刀枪、棍棒和石块袭击敌人。开罗城郊的9 000农民军和城内平民组成志愿军，协同马穆鲁克军队作战。这些斗争打击了敌人，推迟了他们的侵略进程。

波拿巴统治埃及期间，规定：凡反抗者"予以灭绝"，其所在村庄"将被夷为平地"。法军在埃及竭力搜刮掠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敛取钱财竟达400多万法郎。1798年10月21日，开罗爆发了有1.5万人参加的反法武装起义。起义迅速蔓延到周围广大地区，农民以及来自利比亚的牧民积极投入斗争。这次起义虽被法国殖民军血腥镇压下去，但它揭开了埃及近代反帝反殖斗争的新篇章。

1800年3月初，开罗人民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整个城市一度被起义群众所占领，法军疯狂反扑，伤亡惨重。埃及不少地区相继爆发反法游击战争，迫使法军龟缩在少数城镇内。此时，英国根据它和土耳其政府的协定，向埃及派遣军队。1.7万多名英军在埃及地中海沿岸的阿布基尔登陆，挫败前来阻击的法国守备军。土耳其军队从陆路经叙利亚攻入埃及境内。由于埃及人民的英勇斗争和英、土两国的出兵等原因，迫使法军于1801年10月中旬撤离埃及，历时3年的法国殖民统治结束了。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

法军撤退后，埃及还存在着马穆鲁克、土军和英军三股势力，它们激烈争夺，都想独占埃及。驻埃土军力图恢复土耳其素丹在埃及的实际统治。英军驻扎在开罗、亚历山大城等重要城市，他们极力拉拢马穆鲁克，给他们种种许诺，以便赖在埃及达到自己的目的。埃及人民面临的形势是只有赶走一切外来侵略势力，结束马穆鲁克的腐朽统治，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利。穆罕默德·阿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登上埃及政治舞台的。

穆罕默德·阿里原是阿尔巴尼亚人。1769年生于希腊马其顿的卡瓦拉城。他参加土耳其军队，后前往埃及。1801年5月，阿里站在埃及人民一边，在同法军的战斗中崭露头角，1805年5月被推举为埃及总督，土耳其皇帝被迫封他"帕夏"称号。

1806年底，欧洲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战争再次爆发，法军屡战屡捷。土耳其也屈服于拿破仑的压力，法国取得了在埃及"任意行动"的权利。早在1803年被迫从埃及撤军的英国抢先向埃及用兵。1807年3月，英军5 000人攻占亚历山大城后，进犯通往埃及内地门户的罗塞塔城。该城军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屡败来犯的侵略者。阿里动员人民积极支援前线，组织起战斗力很强的志愿军，到

处打击英军。历时半年之久，英国在埃及战场上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同意和平谈判，英军撤出埃及。1811年3月，阿里在开罗诱杀了460多名马穆鲁克上层人物，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捕杀马穆鲁克，彻底清除了数百年来在埃及充当外来奴役者内应的马穆鲁克势力。阿里在埃及的统治得以稳定。

为了进一步抵御外来侵略者，增强国力，阿里在国内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改革和各项建设工作。埃及农村长期以来实行腐朽的包税制度，大部分土地为马穆鲁克包税人所霸占，他们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在消灭马穆鲁克势力后，随之没收了他们的土地。1814年，政府宣布废除租税承包制度，将包税人所管辖的土地收归国有。同时，又没收了伊斯兰教会掌握的全部土地。阿里下令把没收来的土地一部分分成小块土地租让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每户农民可分得3~5费丹①土地，规定只向农民征收定额的土地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阿里又将一部分土地赐给他的亲属和军官，他们成为新的土地贵族，扩大了阿里政权的社会基础。

阿里重视发展农业所需要的水利灌溉事业。他大规模地动用人力、物力去修筑堤坝、开挖水渠，先后挖通20多条新河渠，建筑了近30座水坝，大力推广用风力或畜力带动的水车。这些水利设施不仅控制了河水，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保证了水的常年供应，使同一块土地由过去的每年一熟变为三熟，产量激增。耕地面积1821年为200万费丹，1840年增至385.6万费丹。广泛种植经济作物，著名的埃及长纤维棉花开始得到种植，此外还有甘蔗、靛青、玉米、稻米和豆类作物。棉花的出口量从1821年的944堪他尔②猛增到1849年的25.7万多堪他尔。

阿里创办了一批近代工厂，如纺织、制糖、榨油、造纸、制革和染料厂等等。到1829年时，光纺织厂就有30家，拥有纺织机约1 500台，织布机1 200多台。各种类型的工厂工人总数达3.1万多人。许多工厂利用机器进行生产，用公牛作为动力。阿里特别重视发展同军事有关的工业，仿效西方建立军火工厂和造船厂，如亚历山大港造船厂规模庞大，设有15个车间，全厂职工达5 500多人，制造了一批战舰。所有这些工厂都由政府控制，聘请英国人、法国人当技师，有的工厂由政府出租给私人经营。

商业方面实行国家垄断制度。政府的商业机构专门收购农民的产品，农产品不得自由买卖。对手工业产品也实施专卖政策，出口物资的95%，进口物资的1/3都控制在政府手里。由于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1836年进出口贸易总值比1800年增长了8倍。出口多于进口，年年有盈余，国家建

---

① 1费丹约合6.3市亩。

② 1堪他尔约等于44.9公斤。

设不举外债。

为保证经济发展,阿里推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央设立了内阁,下设军事、司法、财政、商业、交通、教育、卫生等7个部,规定各部长官均由阿里亲自任免。地方行政实行三级制,将全国集中分为7个省,省长由中央任免,下设县、村两级,县长受制于省长,村长听令于县长。全国实行统一的政令。严密的统治体系,使埃及很快实现了全国大一统的局面。

军事改革是整个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阿里废弃传统的雇佣兵役制,实行征兵制。建设一支新的陆军,装备了新式大炮和火器,建立步兵学校、骑兵学校和炮兵学校,从法国、西班牙等国聘请教官。到1839年时,埃及已拥有陆军23万余人。大力发展海军,创建了地中海舰队和红海舰队,逐步自造战舰武装自己,极盛时海军有战舰32艘,1.5万名官兵。

经济建设的发展带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阿里重视发展一些非宗教性的世俗学校和专科学校,例如创办了工业、农业、建筑、医学、语言等专门学校,邀请外国专家进行讲授,培养本国的技术人员、医务工作者和翻译人才。同时,又派遣学生去英国、法国留学,培养高级人才。

上述这些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埃及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只是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史称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代替了腐朽反动的马穆鲁克王朝。农民对统治集团的依附更为加深,即使在新建的工厂里,也实行终身强迫劳动制。他们的地位如同农奴。有些不过是模仿西方国家发展工商业、创办学校、建设强大军队的一些做法而已,但没有改变封建的性质。然而,阿里的改革和建设毕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埃及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全国人口增加到450万人,亚历山大城则拥有15万人口。埃及军队成为中近东地区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超过了它的宗主国——土耳其。这时埃及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实际上却是一个独立的、强大的主权国家。

埃及的强盛非但推迟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进程,还向外实行扩张。阿里首先夺取阿拉伯地区,1811年发动了屠杀阿拉伯半岛瓦哈比派起义者的战争。控制了红海要道,建立了进攻叙利亚的基地。1820年攻掠南方近邻苏丹,苏丹实际上沦为埃及的殖民地。1824年,阿里以土耳其让出叙利亚和克里特岛为条件,参与了镇压希腊革命的战争。1831年阿里为使土耳其履行其诺言,挑起了第一次土埃战争,进军叙利亚,直抵土耳其本土安纳托利亚地区,迫使土耳其投降。一系列的对外掠夺战争耗尽了埃及的人力和财力,国库空虚,广大人民被繁重的徭役、强制的兵役和苛重的赋税逼迫得走投无路,不断举行武装反抗。尤其在阿里统治的后期,起义更加频繁。这些斗争从内部动摇了阿里统治的基础。

列强的入侵和埃及的半殖民地化

英国绝对不愿在它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出现一个强大的埃及,于

是挑动土耳其发动了第二次土埃战争。紧接着,它拉拢俄、奥、普召开伦敦会议,用武力威胁埃及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阿里严词拒绝。

1840 年英奥联军攻入黎巴嫩和叙利亚。埃及军队被击败。1841 年英国海军在亚历山大港大举登陆。阿里的军队已无力抵抗英国侵略者。阿里被迫屈服,于 1841 年 1 月底签订了和约。阿里失去全部属地,只保留埃及和苏丹的总督世袭权。埃及交出全部海军舰只,只保留陆军的 1/10。埃及接受 1838 年签订的英土商约。此时,阿里实际上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由长子伊卜拉欣掌握埃及的统治权。1849 年 8 月,阿里去世。

伊卜拉欣执政时,外国殖民势力加紧入侵。英国利用埃及对产品专卖权的取消,倾销廉价工业品,打击了埃及的近代工业。买办商人深入内地,压价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埃及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军需订货减少,工厂生产一蹶不振,工厂纷纷倒闭,工人人数大减。农民生活更趋恶化。

阿巴斯一世(1849—1854 年在位)、赛义德(1854—1863 年在位)相继上台后,埃及每况愈下。英国在埃及取得了修筑铁路、架设电报线,建立商船队自由通航的特权。它通过修建贯通尼罗河三角洲的铁路,逐步控制了埃及的经济。法国也加紧在埃及扩张势力。1856 年同埃及签订条约,开凿苏伊士运河,规定埃及提供土地和无偿提供劳动力,运河通航后出租 99 年,每年可收取运河收益的 15%。运河于 1859 年 4 月动工,1869 年 11 月竣工。运河的通航大大缩短了欧亚航程。埃及为修建运河牺牲了 12 万人的生命,承担费用 1 600 万英镑,而欧洲国家只花费了 400 万英镑。埃及为了支付这笔费用只得依靠借外债。1862 年一次即达 329.3 万英镑。从 60 年代初起,埃及日益沦为英法等国的原料供应地,棉花、甘蔗等农产品被迫压价出售。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不断向西方国家借欠债务,1863 年埃及的国债已达 1 600 多万英镑,被迫以国家的主权作为抵押。埃及逐渐沦为英法的半殖民地。

七、资本主义入侵下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奴隶贸易

从 15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后半期的奴隶贸易,是西方殖民者掠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要手段。奴隶贸易最早是由葡萄牙人开创的。1441 年,葡萄牙人贡萨尔维斯和特里斯唐在摩洛哥南部沿海劫掠了 10 名非洲人,把他们运回里斯本,充当了家内奴隶。1444 年葡萄牙的捕奴远征队在西非北端大西洋沿岸捕捉了 200 多名黑人,运往欧洲市场上出售。从此,残酷的奴隶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但在近半个世纪内,贩运到欧洲去的黑人数量极为有限。

15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①。随着西方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经营的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便从非洲输入奴隶。1501年第一艘满载非洲奴隶的船只到达了圣多明各岛。西班牙和葡萄牙向西方奴隶贩子们发放执照,允许向他们统治下的美洲殖民地输入黑人奴隶。从这时起,奴隶贸易日益变得重要,贩卖黑奴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从非洲到欧洲和美洲的奴隶贸易早期为葡、西两国垄断。以后,荷兰、法国、英国,甚至瑞典、丹麦和勃兰登堡,再加后起的美国也都加入了贩卖黑奴的行列。奴隶贸易大多是由私人出面经营,得到国家支持而进行的。

到17世纪中叶,奴隶贸易的范围集中在大西洋东西两岸,一般称为大西洋奴隶贸易。来自欧洲的贩奴船,先从欧洲装载枪支、布匹、甜酒和糖等廉价物品,航行到非洲,换取奴隶,然后把非洲黑奴运往美洲,以高价卖给那里的白人种植园主或矿山主,换取当地的烟草、甘蔗和棉花等原料,最后运回欧洲,形成三角形的路线,史称“三角贸易”。在非洲西海岸,从摩洛哥海岸最南端直到刚果河口全长3 500公里的沿海地带是奴隶贸易最活跃的地区。在今加纳、多哥和贝宁的沿海地带以及尼日利亚西部海岸,因输出大量奴隶而被称为“奴隶海岸”。西方各国的奴隶贩子在贩奴过程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纷纷在非洲海岸建立据点以霸占地盘,像荷兰在17世纪前半期破坏了葡萄牙的奴隶贸易垄断权后,在西非沿海拥有40多处据点。其他国家也建有不少据点。加纳的埃尔米纳、海岸角,贝宁的维达,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是当年最著名的奴隶贸易据点。

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发展到最猖獗的程度。这同该时期美洲种植园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关系,甘蔗、烟草、棉花、咖啡、香料等作物的大量种植,迫切需要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此时,英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越来越多的工业原料。奴隶贩子在非洲低价收购黑奴,在美洲高价出售,牟取100%到1 000%的暴利,黄金、白银滚滚而来。而向美洲提供日益增多的黑人劳动力,欧洲市场自然会获得越来越廉价的工业原料。

17世纪中叶以后的150年间,奴隶贸易已经成为非洲与欧洲、美洲之间唯一的贸易活动。在贩奴活动的方式方面,除了存在“三角贸易”外,英法等国相继成立贸易公司,垄断对非洲的奴隶贸易,其中最著名的有:1660年英国成立的“皇家开发非洲公司”,1672年创立的英国“皇家非洲贸易公司”,还有法国在1664年建立的“西印度公司”等。奴隶贸易得到西方国家政府的大力资助,还派正规军进行保护,形成十分严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在西非沿海建立贩奴据点和要塞,而且向非洲内地和东非海岸扩展贩奴活动。每年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奴达数万人,18世纪80年代,每年平均从非洲输出的奴隶达10万人之多!18世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0页。

时，奴隶贸易成为世界最大的商业贸易之一。这时候，英国的世界殖民霸权最终确立了，黑奴贸易主要控制在英国手中。英国成了奴隶贸易的头号罪犯，它所运走的黑人比所有国家运走的总和还多4倍。17世纪末，当时美国还没有独立，但那里的奴隶贩子已开始自主经营奴隶贸易。他们在黑人贸易中走的也是“三角”航程，把北美、西印度群岛和非洲三个地区联结了起来。后起的美国奴隶贩子在贩卖黑奴中特别凶狠和残暴。18世纪时，美国的贩奴船比英国的小得多，后者一般有100吨，前者只是40～50吨的单桅帆船。可是，前者装的黑人并不少，把黑人塞满船舱，航运中死亡率特别高。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逐渐趋向衰落。其主要原因是，在贩奴过程中，非洲黑人和美洲黑人奴隶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18世纪时，在英国贩奴船上发生的奴隶暴动，有文字记载的就有18次。1700—1845年间，在英、美贩奴船上发生过55次奴隶起义。到达美洲后的奴隶也不断举行起义，仅在美国，从1619年后的40多年中，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至少有250次。这些斗争大大地打击了奴隶贸易。再由于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奴隶主的失败，奴隶制度被废除，种植园经济遭到沉重打击，这一切都使奴隶贸易的规模大大缩小。特别重要的是从18世纪后期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要求把包括非洲在内的海外殖民地变成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甚至是资本输出的场所。把非洲人留在非洲进行奴役，既无风险，又可得到远远超过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这些因素使西方资本家对奴隶贸易渐渐失去了强烈的兴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奴隶贸易大体上在19世纪70年代就停止了。

罪恶的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非洲大陆损失了大量人口。由于奴隶贸易延续时间长，地区分布广，又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在奴隶贸易过程中（包括掠奴战争、非洲内地到沿海路上、海上航行），非洲究竟损失了多少人，学者们估计不一。有的认为是1亿人，还有的认为是2.1亿人，总之是骇人听闻的。运往美洲的奴隶都是身强力壮的，其中2/3是男子，年龄多数在12到35岁之间，使非洲损失了大量的精壮劳动力。奴隶贸易破坏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稳定。掠奴战争的恐怖造成了社会的极端混乱，许多古老王国纷纷瓦解，非洲原有的物质文化趋于消灭。奴隶贸易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传统商品黄金、象牙等货物的出口逐步让位于奴隶出口，火器成为主要的进口货。非洲经济变得畸形发展。如同参与奴隶掠夺战争的部落酋长成为殖民势力的特殊代理人一样，也出现了一大批依靠贩奴起家的非洲本地商人，他们都成为后来西方国家在非洲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随着黑奴贩卖的兴盛，歧视黑色人种的种族主义思潮也开始泛滥起来。

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繁荣也正是依靠掠夺和贩卖非洲黑奴取得的。马克思指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

光”的标志之一①。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奴隶贸易取得的巨额利润转变为发展工业的资本。奴隶贸易也推动着制铁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商业、纺织业、银行和保险业的发展。现代欧美国家许多有名的城市不少是在奴隶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英国的利物浦、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伦敦和普利茅斯，法国的马赛、南特和波尔多，美国的纽约、查尔斯顿，葡萄牙的里斯本等等。后来，西方国家禁止奴隶贸易后，英国则在禁止贩运奴隶的借口下，以追捕为名在非洲扩大侵略活动，入侵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埃及和苏丹等国。在西非，英法两国都迫使当地国王和酋长签订禁止奴隶贸易的条约，随后借口破坏条约干涉其内政，甚至使用武力来达到侵略的目的。

南非人民反对入侵者的斗争

南非地处非洲大陆的最南端，那里气候良好，土地肥沃，地理位置重要。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通往亚洲后，它控制着欧亚航线的通道。南非的殖民化过程同非洲其他地方不同，它是白人移民在这块大陆上建立的第一块居留地。

165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今开普敦地方建立了通往远东航线的中途供应站，以后发展成为开普殖民地。初来的移民大多是公司退职的雇员，还有退伍军人和罪犯，后来有来自荷兰、德国和法国的农民。移民中绝大多数是荷兰人，别的国家移民在语言、风俗等方面逐渐被荷兰人同化，日常用语为荷兰语。到 1795 年，在开普殖民地的欧洲移民达 2 万人，其中 30% 的人住在开普敦地区。白人移民起初主要从事农业，不同于居住在这里的公司职员，他们的后裔被叫作“布尔人”。殖民地受东印度公司管辖，总督由公司任命，听命于驻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公司总部。

欧洲移民到达南非后，利用他们掌握的优良武器、车辆与马匹，随意迁徙，肆意侵夺当地科伊人的土地，掠走他们的牲畜。公司明文规定移民未经同意不得占领非洲人的土地，并划定了殖民地边界，但这只是一纸空文而已。17 世纪末曾任殖民地总督的范·德·斯坦尔本人就霸占了 400 摩尔根的土地，成为当时最大的农场主。18 世纪初，布尔人开始经营牧业生产，殖民当局鼓励布尔人进入内地占地养牛羊，任意霸占科伊人土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拥有土地 6 000 ~ 10 000 英亩的大牧场主。白人农牧场的生产都依靠非洲人劳动力，除了奴役科伊人外，还从非洲内地引进黑人奴隶和马来人奴隶进行劳动。他们建立的是落后的奴隶制经济，生产的产品不再是早期供给往来船只需要的新鲜食品，而是出口棉花、甘蔗、烟草和牲畜等。

历经一个半世纪，布尔人占领了今开普省的整个西南部，面积达数 10 万平方公里。科伊人和内地的桑人从荷兰人登上南非进行侵略活动时起，就不断举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19 页。

行反抗斗争。科伊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反荷战争发生在1659年,迫使荷兰人签订协定,答应不再劫掠科伊人土地和骚扰生产。因布尔人违反协议,1670年再次爆发反荷斗争,科伊人在冈纳玛酋长领导下进行顽强抵抗,迫使殖民者不敢明目张胆地掠夺土地。18世纪初,科伊人患流行性天花病,造成大量死亡。科伊人的部落瓦解了,一部分人北迁居住在今纳米比亚的南部地区。一部分人流落在开普殖民地境内,遭受布尔人的奴役。桑人也被逐步挤入北部的沙漠干旱地区。

布尔人继续向东扩张,在大鱼河西部又遭到班图人的一个分支科萨人的猛烈反抗。科萨人不同于科伊人和桑人,他们有着强固的部落组织和较强的战斗力。他们的反侵略斗争延续了百年之久,史称"卡弗尔①战争"(1779—1877),其间有9次战争。前两次(1779年、1789年)是反抗布尔人的侵袭,均以布尔人的失败告终。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承认科萨人居住的地区。由于科萨人的抵抗,有力地阻止了布尔人向东的扩张。18世纪末,欧洲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795年,英国利用法军侵入荷兰,乘机出兵占领了开普殖民地。随后,英国西侵,发生了第三次卡弗尔战争,科萨人挫败英国的入侵,捍卫了大鱼河以西的领土。1803年英军撤离开普殖民地。1805年英国再度实行占领。根据1815年的和约,开普殖民地由荷兰让予英国,由英国殖民部实行直接管辖。英国人继续不断东向扩张,到1879年为止,同科萨人发生了6次战争。科萨人的斗争最终遭到了失败,但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南非人民反殖民压迫斗争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其中第8次战争(1850年)最为激烈,战争扩展到大凯河与大鱼河间的广大地域,他们联合了班图人其他各族,甚至长期遭受白人殖民奴役的科伊人也投入了斗争。起义坚持了3年之久。直到1877年英国才最终占领了科萨人的全部领土。

英国夺取开普殖民地后,从1819年起大力资助移民迁往南非,次年移民5 000人,其中英国人最多。以后,英国的移民人数越来越多。英国统治当局不仅支持他们占领最肥沃的土地,而且不断向布尔人增税,规定英国货币为正式货币,英语为官方语言,甚至不准布尔农场主使用奴隶劳动,等等。布尔人不满英国的统治,从1836年起纷纷离开开普殖民地,向北部今奥兰治、德兰士瓦以及东北部祖鲁人居住区大迁徙。

布尔人的大迁徙实际上是几个世纪以来白人移民掠夺非洲人土地的继续和扩大。他们在广大被占领土上建立了纳塔尔、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在此过程中,班图人各族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其中祖鲁人的斗争最为英勇、悲壮。

祖鲁人是班图人的一支,很早就居住在今纳塔尔境内。19世纪初,祖鲁人

---

① "卡弗尔"来自阿拉伯语,意为异教徒。荷兰人把班图人称作卡弗尔。

日益强大起来。历经国王丁吉斯瓦约(1809—1818 在位)、恰卡(1818—1828 在位)两代,建立了强盛的祖鲁王国。恰卡根据他 10 多年来同英国人、布尔人打交道的经验,深知殖民者迟早要企图吞并纳塔尔这块濒临印度洋的宝地。他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防御力量。首先,改革军事制度,将各部落的成年人按年龄组织"同龄兵团",规定 35 岁前为服兵役年龄,儿童 12 岁起参加准军事训练,18 岁起接受正式军事训练。其次,加强战士的武器装备,每个战士配备一个盾牌和一支短杆刺矛,增强了作战能力。

1828 年丁刚继位后,进一步增强军队实力,配备马匹和火器,加强机动应变能力。他还利用英国人和布尔人的矛盾,从前者手中购买枪支弹药。

布尔人从 1837 年初起,派遣民团潜入纳塔尔,建立堡垒和农场作为前哨,蚕食祖鲁人土地。丁刚于 1838 年 2 月诱杀了布尔人头目雷提夫,击溃了驻守在纳塔尔境内的布尔军主力,清除了他们的堡垒和农场。该年 11 月下旬,布尔人将军比勒陀利乌斯被任命为总司令,重整远征军,配备有 500 名精干骑兵以及包括小炮在内的大批装备,大举反攻。他们利用优势兵力,采用环形牛车阵战术,即以牛车为掩护,发挥枪炮的密集火力进行杀伤,然后用骑兵追击。

当年 12 月 15 日,布尔军前锋与祖鲁军相遇于恩康姆河的河套地区。16 日清晨,上万名手执刺矛、盾牌的祖鲁战士在丁刚的指挥下排成密集队形呼喊着向敌阵冲去。祖鲁军是以中央为主攻部队,进攻时,左右两翼先行插入敌阵,合力消灭被围中的敌人。战斗持续两个小时,祖鲁战士遭到敌人猛烈火力的阻击,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时又遭到敌骑兵的袭击。祖鲁军遭到重创,死伤 3 000 人,鲜血染红了恩康姆河。后来这条河被称为血河。此战即是南非史上著名的"血河之战"。布尔军占据了祖鲁人的大部分领土,并利用祖鲁人内部酋长的反叛,最终瓦解了祖鲁人的反抗。丁刚也于 1840 年死在向北逃亡的途中。接着,英国和布尔人为争夺纳塔尔发生激烈的冲突,前者于 1843 年出兵最终吞并了纳塔尔。祖鲁人的反抗斗争始终没有停息,19 世纪 70 年代斗争再次进入高潮。

八、资本主义入侵下的拉丁美洲诸国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拉丁美洲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迟缓,资产阶级还十分软弱,各国政权都落到了土生白人(即克列奥人)地主手中,殖民时期的封建结构被保存下来,大土地所有制得到继续发展。在整个 19 世纪,拉丁美洲各国大土地所有者兼并的土地相当于以前 3 个世纪的总和。阿根廷2 000户地主拥有全国 1/5 的耕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富商安乔雷纳家族于 1818 年开始对牧场投资,40 年后它成为本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共有 160 万英亩富饶的土地。委内瑞拉有 80% 的土地属于大土地所有者,每户地主占地都在 4 000 英亩以上。在巴西,有

些地产面积和英国一样大；2 000 户大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土地面积，比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丹麦四国面积的总和还大。墨西哥北部的桑切斯·纳瓦罗家族在 1840—1848 年间占有的土地竟达 1 600 万英亩，包括有 17 个庄园。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都有类似的大地产。天主教会拥有大量土地，也属于大土地所有者的行列。1856 年，墨西哥天主教会拥有全国大地产的一半。

拉丁美洲各国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大土地所有者利用掌握的政权扩充自己的地产；第二，在独立战争期间，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半岛人）拥有的大量土地转入土生白人地主手里；第三，独立后各国政府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印第安人的公社土地以及国有土地投放市场。这些土地很快地落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第四，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垄断水源、丈量土地、强迫迁移等卑劣手段，夺占农民的土地。此外，世界市场对拉丁美洲农产品的需要增加，也推动大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大土地所有制造成农民无地或少地的恶果。小农地产只占整个拉丁美洲耕地的 10%。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忍受大土地所有者封建的甚至奴隶制的剥削。佃农除缴纳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外，每年还不得不拿出 1/3 到 1/2 的时间为地主服各种劳役。债务奴隶制在一些国家仍然盛行，无力偿债的农民世世代代丧失自由，和奴隶一样为地主服劳役，地主有权追捕逃跑的债务奴隶并加以毒打。农民还受许多额外剥削，他们必须到地主商店以高价购买日用品，产品只能按低价卖给地主，以高额的租金使用地主的农具等。

大土地所有者竭力保持极端落后的大庄园制。庄园主统治着他的家族、仆役、债务奴隶、佃农和奴隶（在奴隶制没有废除的国家），享有绝对权威。庄园占地辽阔，远离政府所在地；政府和教士站在地主一边，这些都加强了庄园主的权力。庄园主的住宅如同一座城堡，成为大地产上的活动中心。庄园主从这里发号施令并过着非常豪华奢侈的生活。大庄园一般是自给自足的，有木匠、铁匠、裁缝、面包师等手工匠，几乎可以满足当地所有的一般需要，没有什么必要与庄园以外的地区进行联系。奴隶或债务奴隶在这里出生，过着单调的生活并死在这里。庄园主及其家庭成员则不时地去最近的市镇和首都购买贵重物品，欣赏城市生活和参加娱乐活动。大庄园主在城市都有住房，他们经常住在城市，有的还在当地政府中供职。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引起了拉丁美洲各国愈来愈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大土地所有制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约占人口 5% 的地主及其家庭成员过着极其富裕的生活，而大部分人因丧失土地和工作，处于十分悲惨的贫困境地。大土地所有者占有大片土地，其中很多土地被弃置荒芜。委内瑞拉有 6 900 万公顷可耕土地，只有 73 万公顷被耕种，约占可耕土地的 1%。巴西实际耕种的土地仅占可耕土地的 1.6%，庄园制主要采用奴隶或债务奴隶劳动，保持原始的耕种方

法，生产效率很低，种植单一的出口作物，造成经济畸形发展，粮食短缺。它的自给自足经济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不利于市场的扩大。总之，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展，摧残了农业，阻碍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成为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考迪罗的统治

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国（除巴西外）形式上都建立了共和政府，如颁布宪法，成立议会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广大人民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黑人和印第安人更遭到种族压迫和歧视。各国普遍出现了军事独裁统治，即考迪罗的统治。

考迪罗统治是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政治统治形式。考迪罗原意为首领或领袖，引申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独裁者。在取得独立后初期，考迪罗不少是独立战争时期的领袖。后来的考迪罗，多半出身于军官或某一地区地主集团的首领。他们取得政权既非来自世袭，也不是通过选举，主要是通过武装政变。考迪罗统治的实质是独立后各国地主阶级借以维护其统治的一种工具。

考迪罗主要的依靠是教会和军队。教会本身是大土地所有者，它是保守势力的一个重要阵地，始终与提倡改革的自由派相对立。教会的领导人支持任何维护教会利益和财产的考迪罗。军队在独立后拉丁美洲各国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统治者维持自己统治的工具。利用军队发动政变是野心家惯用的手段。考迪罗或总统都巴结军人。结果是军官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享有高薪和迅速提升的机会。军队不仅通过政治干预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而且由于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850 年以前，在不少国家，军队支出在国家预算中平均占 50% 以上。墨西哥从 1812 年到 1845 年，军队开支有 14 次超过政府的总收入。

考迪罗拥有无限制的权力。他们任意修改宪法或终止宪法的实施，宣布军事管制；随意没收人民的财产，任意监禁、流放，甚至处死任何人。他们还搜括民财，抢劫国库，贪污受贿。各个地主集团夺取政权的惯用手法便是发动军事政变。墨西哥在 1824—1848 年间，曾发生约 250 次军事叛乱，更换了 31 个总统，其中仅在 1841—1848 年 7 年内就更换了 21 个总统。玻利维亚在独立后的 70 年中发生了 60 次暴动和政变，其中有 6 个总统被杀死。委内瑞拉在 1830 年以后的 70 年间发生了 50 次暴动，其中有 12 次推翻了原有的政权。秘鲁在 1829—1845 年的 16 年间就更换了 12 个总统。通过政变上台的考迪罗，总是说自己发动政变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苦难，促进国家的繁荣。但每次政变不仅没有减轻暴政的程度，反而使之强化了。考迪罗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经常以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来换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借款，这就为外国资本的渗入和政治干涉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考迪罗们的表现，除了他们的共性外，也还存有差别。有些考迪罗为了显示自己的“开明”和“为人民谋取幸福”，采取了一些有益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如修筑港口、公路、铁路，建造学校和政府大厦等。有些考迪罗的强有力的统治，客观上阻止了一些国家的分裂。阿根廷考迪罗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在他统治期间(1829—1852)，制止了国内无政府混乱状态，确立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还有一些考迪罗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民众和印第安人的利益，被人称为“平民的考迪罗”。巴拉圭自治革命期间的考迪罗弗朗西亚，1848—1855 年统治玻利维亚的考迪罗曼努埃尔·贝尔苏等就是其中的几个。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但是，好的考迪罗终究是少数，而且有很大的偶然性。总之，考迪罗制只能使国家和人民经常陷于苦难和不安之中。

英、美资本的渗入

独立后的拉丁美洲诸国的经济落后、政治动荡以及国家软弱，等等，都为英、美等国殖民势力的入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英国早在 19 世纪以前就在加勒比海占领了牙买加、巴巴多斯、圭亚那等殖民地。独立战争期间，它以“同情”、“支持”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为幌子，对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国进行经济扩张。1824 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曾说：“西属美洲是空地一块，如果我们不是把事情办得太糟的话，西属美洲将是英国的”。独立战争后，新兴的独立国家中亲英势力比较强大，他们希望借助于英国来抗衡原先的宗主国，这样英国很快地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而且在整个 19 世纪一直保持这一优势。

英国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渗透，主要采取贷款、投资、控制对外贸易和获得特权等方式来实现。1822—1826 年，在拉丁美洲解放战争期间，英国对拉丁美洲各国发放了 10 次贷款，共 2 100 万英镑。在这些贷款中，拉丁美洲国家实得现款仅 700 万英镑，其他 1 400 万英镑则作为利息预先被扣除了。1826—1850 年，英国对拉丁美洲各国贷款和投资总额达 1 亿美元。1824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的英国商人已达 3 000 人。约有 100 家英国商行在西属拉丁美洲开业，经办了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对外贸易。英国还迫使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签订有利于英国商人的条约。如为了换取英国对巴西独立的承认，佩德罗一世与英国签订了有利于英国的商约。这一商约对英国进口货物税降低到 15%，并且不准巴西对其他国家降低关税，从而保证了英国在巴西市场的统治地位。英国还在拉丁美洲水域保留了军舰，以保护英国的贸易，维护英国商人的权利。

1850 年以后，英国在拉丁美洲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例如建筑港口、铁路、开辟轮船航线、低价收购土地和利用廉价劳动力开发矿产等。英国资本先后控制了巴西的棉花、阿根廷的谷物和肉类贸易，墨西哥的银矿生产以及大多数国家的交通、铁路和港口等企业。1870 年英国在拉丁美洲各国的投资金额达到

8 500万英镑，成为拉丁美洲的主要投资国和债权国。

美国一直觊觎拉丁美洲。1823 年发表的门罗宣言，目的固然是为了抵制神圣同盟对拉丁美洲的干涉，要维护拉丁美洲独立国家免受欧洲列强的侵略，但是美国政府同时也企图把拉丁美洲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门罗宣言公布后的最初几十年间，美国还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忙于开发本国资源，没有力量对拉丁美洲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掠夺，甚至对欧洲国家入侵拉丁美洲的行动也置若罔闻。1828 年，美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的贸易额不到 1 400 万美元。到 1830 年，美国还没有过剩资本可供输出。但是美国却不放松对邻近的墨西哥进行侵略。在 1836—1845 年间，美国通过不光彩的手段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在 1846—1848 年间，又通过侵略战争从墨西哥手中抢去大片土地，相当于墨西哥全部领土的一半。

与此同时，欧洲列强也曾多次对拉丁美洲进行侵略和殖民占领。1833 年英国侵占南大西洋福克兰群岛（即阿根廷拥有主权的马尔维纳斯群岛）。1838—1840 年间，法国军舰侵入拉普拉塔河地区，封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1840 年前后，英国扩大了洪都拉斯的殖民地。1845—1849 年，英法又联合入侵拉普拉塔河地区。在 19 世纪 60 年代，西班牙再次威胁其前殖民地，向秘鲁开战，占领了生产鸟粪的岛屿中的一个，并炮轰了智利港口瓦尔帕莱索。1860—1865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一度重新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62 年，法国军队开进墨西哥，并把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推上了王位，直到 1866 年法国军队因被击败才撤走。

随着英、美等国殖民势力的入侵，拉丁美洲经济日益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并且逐渐成为欧洲列强及美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拉丁美洲向国外运出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迅速增加。1815—1820 年，智利与英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每年只使用两三艘船，但在 1847 年，将智利出口的商品运到英国需要 300 多艘船。从 1825—1850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口原料的价值翻了近 3 番。1830—1831 财政年度，委内瑞拉出口 6 万袋咖啡、3.8 万袋可可、1 500头牛、4.5 万张皮革，而在 1847—1848 财政年度，则增加为 20 万袋咖啡、6.7 万袋可可、1.6 万头牛、36.6 万张皮革。同时，大量的外国货物进口，特别是英国工业品充斥拉丁美洲市场，打击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导致工厂和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墨西哥的改革

墨西哥独立后，国内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十分尖锐。绝大多数大地主、官僚政客、军阀和教权集团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保守派。一些开明地主反对保守派独占政权，主张实行温和的改良，被称为温和派。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冲破封建束缚，反对外国势力入侵，因而具有革命性，他们的政治代表是自由派。其核心力量是一批受到欧美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主张按照资产阶级国家模式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把墨西哥改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国家。

独立后，英、美等国殖民势力相继入侵。它们通过贷款、投资、输入商品以及签订不平等条约，逐步控制了墨西哥的政治和经济。特别是强邻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行为，使墨西哥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保守派的反动独裁政权却屈膝媚外，丧权辱国，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使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出现了由自由派领袖胡亚雷斯领导下的墨西哥革新运动。

胡亚雷斯出生于印第安农民家庭，在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当了律师。在担任瓦哈卡州议员和州长期间，他致力于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曾提议将西班牙殖民征服者科泰斯家族世袭的土地财产收归州政府所有。1854—1855 年，他参加了由阿尔瓦雷斯将军领导的起义，推翻了保守派圣塔安那独裁政权，并在自由派组成的新政府担任司法、教会事务和国民教育部长。在他主持下，政府颁布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法院组织和司法管理的法令，即著名的“胡亚雷斯法”。它规定废除天主教会和军队特设的法庭，取消军人和教士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革新运动打击封建势力和教会特权的第一个革命措施，是在墨西哥确立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步骤。

1857 年，墨西哥制宪议会通过了在当时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新宪法。新宪法规定政教分离，重申共和、联邦、代议制民主以及公民自由权利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原则。根据新宪法举行大选，胡亚雷斯担任最高法院院长，即法定的副总统。第二年，保守派为反对新宪法，策动政变，推翻自由派政府，建立了保守派反动政权。自由派在克雷塔罗组织了以胡亚雷斯为首的政府，同保守派政权进行内战，并把改革斗争推向高潮。

为了动员人民与保守派展开斗争，胡亚雷斯政府果断地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1859 年 7 月 12 日公布了《墨西哥社会改革宣言》，宣布保守派和教权集团是内战的罪魁祸首；无偿没收教会的全部土地财产，把收归国有的教会地产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在 5 至 9 年内分期付清价款；实行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取消什一税和教会其他捐税等。7 月 23 日颁布实行婚姻和户籍登记移交国家机构办理的法令。8 月 11 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出版自由，改革国民教育制度，封闭修道院，取消教会管理墓地和主持公众节日的权利等。同时，承认印第安公社土地公有制合法化，改善了政府和印第安农民的关系。通过这些改革，有力地打击了保守派和教权集团势力，保证了自由派在内战中的胜利。1861 年保守派反动政权垮台，自由派政府胜利迁回墨西哥城。同年胡亚雷斯当选为总统。

由于连年内战，国家财政赤字达 500 多万比索，外债利息的支付即占国家预算的 1/4。1861 年 7 月，胡亚雷斯政府宣布暂停偿付外债 2 年。支持墨西哥保

守派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以此为借口,共同出兵干涉墨西哥。不久,英国和西班牙同胡亚雷斯政府谈判后,撤回了它们的军队。但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坚持侵略政策,悍然对墨西哥宣战。1863 年法军先后出动 3 万人入侵墨西哥,并占领了墨西哥 1/3 国土,拿破仑三世还把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送到墨西哥充当傀儡皇帝。胡亚雷斯政府撤出首都,向北转移,迁至今华雷斯城,领导抗法斗争。

胡亚雷斯政府继续采取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如颁布《国有荒地分配法》、《没收叛国犯财产法》等。同时,依靠人民和军队的力量同法国侵略军展开游击战,从而使战局向有利于墨西哥的方向发展,终于在 1867 年击败法军,光复了全部国土并处死了马克西米连,胜利结束这场神圣的卫国战争。

胡亚雷斯领导的革新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和教会特权,抵制了外来的民族压迫,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处境。它实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成为 19 世纪中期拉丁美洲国家捍卫国家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的一个范例。

但是,这次革新运动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内没有根本改变大土地所有制和大庄园制,对外国的经济势力也没有触动。1872 年胡亚雷斯病逝后,原自由派将领波菲列奥·迪亚士在发动政变后上台,实行了长达 30 多年的独裁统治。欧洲列强和美国乘机扩张势力,墨西哥迅速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第六章　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世界连结成为整体

19 世纪末期(1871—1900)是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完成于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的高速发展,而工业的高速发展又促进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从而引起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为了适应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的新形势,资产阶级不得不在政治上和社会经济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以便缓和由于垄断组织的出现而加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结果,这个时期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和平"状态。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根源。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需要,资产阶级思潮也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思想逐步让位给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以及其他反映垄断资本要求的思想潮流。

垄断组织的产生推动资本主义列强去加强殖民扩张,因之出现了瓜分世界的狂潮。这一方面加剧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把更多的亚、非及拉美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世界就联结成一个在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密切联系的整体。

第一节　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特点和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在 19 世纪进入空前活跃并取得重大突破的高峰期。在物理学方面,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在 19 世纪 40 年代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英国科学家法拉第于 1831 年成功地发现电磁感应现象,提出发电机的理论基础,使电力工业得以建立。在生物学方面,19 世纪 30 年代末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德国动物学家施旺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建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胞学说;1859 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正式出版《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学说,对人类思想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化学方面,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于 1869 年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奠定了无机化学的基础;有机化学的绝大多数重要原理也在 1828 年到 1870 年的约 40 年间基本确立,物理化学也在 19 世纪形成并发展起来,从而推动了化学工业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新突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要求的新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广泛地运用于工业生产,从而引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从 19 世纪的 60—70 年代开始,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基本完成。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其显著特点的,它使世界跨进了电气时代。从 19 世纪 60—70 年代起,出现了一系列电气发明。1866 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制成发电机;1870 年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了电动机,电力开始被用来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随后,电灯、电话、电焊、电钻、电车、电报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电动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具的出现,产生了对电的大量需求。1882 年,法国学者马·德普勒发现了远距离送电的方法,同年,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火力发电站,把输电线联接成网络。电力作为一种新能源的广泛应用,不仅为工业提供了方便而价廉的新动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的诞生。以发电、输电、配电为主要内容的电力工业和制造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电线电缆等的电气设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内燃机的发明是这一时期应用技术上的又一重大成就。1876 年德国人奥托制造出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成为颇受欢迎的小型动力机。1883 年,德国工程师戴姆又制成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具有马力大、重量轻、体积小、效率高的特点,可充作交通工具的发动机。1892 年,又一名德国工程师狄塞尔发明了一种结构更简单、燃料更便宜的内燃机——柴油机,它虽比使用汽油的内燃机笨重,但却非常适用于重型运输工具。由于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动机问题,在这一领域中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19 世纪 80 年代,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汽车诞生了。从 90 年代起,许多国家都建立起汽车工业。随后,以内燃机为发动机的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拖拉机和军用装甲车等也陆续出现了,并带动了相应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加速了石油化学工业的产生。美国在内战前夕的 1859 年,已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现石油,钻出第一口油井,但石油最初只用于照明。随着内燃机的广泛应用,开始大量开采石油。1870 年,全世界生产的石油只有 80 万吨,到 1900 年就猛增至 2 000 万吨。

化学工业的建立也是 19 世纪晚期应用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在无机化学工业方面,60—70 年代发明了以氨为媒介生产纯碱和利用氧化氮为催化剂生产硫酸的新方法,使这两种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产量有了很大的增长。有机化学工业也随着煤焦油的综合利用得到迅速发展。从 80 年代起,人们开始从煤焦油中提炼氨、苯、人造染料等化学产品。人造染料成本低,性能好,很快就代替了天然染料。化学工业不仅采用化学方法进行原料加工,而且采用化学方法合成物

质。1884 年法国人圣·夏尔东发明人造纤维,后来人们开始用粘胶丝来生产人造丝。1869 年,美国人黑特发明赛璐珞,10 年后德、英、法等国也出现了赛璐珞工业。化学工业的另一个重要的新部门,是与炸药有关的工业。1867 年诺贝尔发明火药,80 年代又改进了制造无烟火药的技术,并在军事上广泛应用。

新的技术革命也推动了一些老工业部门的发展。最突出的是钢铁工业。1856 年英国人贝西默发明的"吹气精炼"操作法很快得到推广,从 60 年代起许多国家都修建了贝氏转炉。1864 年法国人马丁和德国人西门子兄弟同时宣布发明了平炉炼钢法。平炉不仅可以熔化生铁和熟铁,还可以熔化废钢,使之变成优质钢。到 19 世纪末,平炉炼钢法比贝氏炼钢法得到更广泛的采用。但这两种炼钢法都不能使用含磷的矿石。1875 年英国冶金技师托马斯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发明的碱性转炉,使用含磷矿石也可炼出优质钢。冶炼技术的不断改进使钢的质量明显提高,产量持续增长。从 1868 至 1900 年,英、美、法、德 4 国的钢产量由 24 万吨增加到 2 355 万吨。钢逐渐取代铁,成为基本的工业原料和重要的建筑材料。

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较,第二次工业革命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许多技术上的发明都是一些不具备科学理论知识的工匠依据实践的经验而取得的成果。例如,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哈格里夫斯原是织工,后来做了木匠;骡机的发明者克伦普顿是个纺纱工兼织工;生产熟铁的搅拌法是工厂主科特和他的工头彼得·奥尼恩斯发明的。只有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初步地将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部门未曾受到科学新发现的影响。在 19 世纪,自然科学特别是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等方面的新发展,开始与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技术上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并带动了相应的许多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总之,科学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与技术的结合使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了更大的成果。

其次,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重要的新机器和新生产方法都是在英国发明的。就世界范围来看,则是以英国为中心,通过新技术的逐步传播来带动后进国家,其发展进程缓慢而不平衡。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虽然也有一些重要的发明,如合成染料、贝氏炼钢法、托马斯碱性炼钢法和蒸汽涡轮等,但内燃机、柴油机、汽车、发电机和电动机等的发明和改进,却大部分是德国人干的;而环锭纺纱机、缝纫机、打字机、白热丝灯和电话,则是美国人发明的。因此,新的技术和工业革命一开始就超出一国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规模,发展的进程也是比较迅速的。

最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于 19 世纪 60—70 年代开始时,除英国和美国北部已完成、法国接近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外,其他国家有的正处于它的高潮期,

如美国的南部、德国和俄国，有的则刚刚起步，如远东的日本和中国。因此，对一些后进的国家来说，两次工业革命是交叉进行的。以德国为例，它一方面积极地吸收、消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另一方面又直接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因而发展的速度异常迅速。起步更晚的日本，则同时吸收两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在短期内就取得跳跃式的发展。

正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具有如上的一些特点，它的影响也远比第一次工业革命要广泛和深远。它在工业生产的领域内部引起一系列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向较为成熟的阶段——垄断阶段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产生了以纺织工业、机器制造业、铁路运输业和煤炭工业等为主的工业群。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方面带动了一个新工业群的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等；另一方面也使旧的工业部门由于生产技术的改造而得到飞跃发展，钢铁工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不仅是一个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突变。因为重工业的发展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它们开始由轻工业为主导转化为重工业为主导，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并为其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工厂制度代替了过去的工场手工业，但企业的规模不大，基本上还是中小型企业。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或者由于生产技术和产品结构复杂，如汽车工业，或者由于需要大型的生产设备，只有大批量生产才能赢利，如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因此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股份公司适应扩大企业规模的要求，在19 世纪最后 30 年得到广泛的发展，作为超大规模企业的垄断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适应这一要求而出现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还为生产过程的合理安排和在生产中实行进一步分工创造了可能。由于利用电能作为动能和采用电动机，从而得以从合理地生产产品的观点出发安装工作机和机器体系。过去以蒸汽机作为工作机的主要推动力，蒸汽机和传动装置构成的相当固定的体系，把工作机排列的变动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这种推动体系的限制使生产组织难以确定生产产品的有效进程。可见生产场所的具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推动体系决定的。而新发明的电动机是同活动的单个工作机连接在一起的，它没有对推动体系的一定结构的依赖性，因此可以按照产品制造进程的各个阶段去组织生产过程；从而也就为机器生产中的进一步分工，为把复杂的控制和监督职能分为一个一个的简单操作创造了前提，这自然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在生产的管理方面引起了深刻的变革，科学化的管理开始兴起。19 世纪末，美国的工厂系统组织的咨询工程师和专家泰罗开始提倡

"劳动科学组织",发明了"泰罗制"的科学化管理方法,使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列宁评价说:"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指提高劳动生产率——引者注)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①

二、1871—1900 年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

19 世纪最后 30 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就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充满了"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活力,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下列的统计数字就是有力的证明。

世界工业发展指数

(以 1913 年为 100)

1850 年	9
1860 年	13
1870 年	20
1880 年	27
1890 年	41
1900 年	59

根据上述统计数字,1850—1870 年的 20 年,世界工业生产只增加了 1 倍多,而 1870—1900 年的 30 年却增加了将近 2 倍,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

但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方面有发展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也有较为缓慢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但后一类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并非完全陷入停滞的状态。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年平均增长率(%)

	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1861—1873 年	(1851—1873) 3.3	5.0		3.8
1874—1890 年	1.7	5.2	(1870—1890) 2.1	3.5
1891—1900 年	1.6	3.5	2.6	4.8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91～492 页。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然要引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急剧变化。1870 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居第 1 位,约占总产值的 1/3。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 1 位,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 30% 以上。1900—1910 年间,德国又超过英国居世界第 2 位。法国和英国一样,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俄国和日本的地位虽有显著提高,但它们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很小的。

美国是这一时期工业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从 1859 至 1899 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由 18.8 亿美元增至 114.07 亿美元,增加近 5 倍。1860 年以前轻工业在工业中占统治地位,此后是重工业迅速发展的年代。生铁的产量,在 1860 年时只有 84 万吨,1900 年达到 1 401 万吨。钢产量在 1860 年只有 1.2 万吨,1900 年则猛增至 1 035 万吨,开始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煤的开采量,1860 至 1900 年间由 1 820 万吨增加到 2.4 亿吨。机器制造业,特别是农业机器制造业有很大的发展,20 世纪初其产值已相当于欧洲各国产值总和的一半。19 世纪最后 30 年,新兴工业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石油开采量从 1860 年的 50 万桶增加到 1900 年的 6 362 万桶。90 年代,由于电动机在工业中的普遍应用,电力工业也得到飞跃发展。从 1880 年第一家发电站建成起,全国各地陆续兴建了许多发电厂,到 1902 年全国的发电量已达 60 亿度。汽车工业在 19 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1900 年产量不过 4 000 辆,1914 年猛增至 56 万辆以上。化学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轻工业的产量虽然有很大增长,但其速度远不如重工业快。轻重工业的比重,1860 年为 2.4 : 1,1900 年已改变为 1.2 : 1,重工业的产值已开始接近轻工业的产值。工农业的比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889 年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约 2 倍。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化已基本完成,美国开始由农业国转变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农业国家。

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德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仅次于美国,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 1870 至 1900 年,工业生产总指数由 17.5 上升至 64.7(以 1913 年为 100),增加了约 2.7 倍。1870 至 1900 年德国的重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煤的开采量从 3 400 万吨增至 1.49 亿吨,钢产量从 17 万吨增至 665 万吨,铁产量从 139 万吨增至 852 万吨。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特别迅速,其中电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新兴的化学工业发展也特别迅速。德国的化学工业在 19 世纪 60 年代几乎还是空白,但在 1870—1900 年,酸和碱等基本化学原料的产量增加了 7 倍,染料的产量增加了 3 倍,均已跃居世界首位。1900 年世界所用染料的 4/5 是由德国制造的。电气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这一时期德国取得的又一巨大的经济成就。德国电气工业的总产值,在 1891—1913 年间增加了 28 倍。尽管这一时期轻工业绝对产量的增长还是相当快的,但它的发展显然已落后于重工业。从 19 世纪 60 年代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

的生产资料生产增加了8倍,消费品生产仅增加了3倍。重工业在德国的整个工业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在这一时期,俄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俄国在1861年改革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迅速,只用了数十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完成的转变。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特别迅速地发展,甚至比俄国还要快10倍。

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发展相对要缓慢一些。1850—1870年,英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12%,而在1870—1900年下降到了1.6%。当时,英国的工业力量主要建立在纺织、煤炭和冶铁等几个旧工业部门上。这些部门的技术装备到19世纪70年代后都已陈旧落后,因此生产的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1870—1900年间,棉花消费量从10.75亿磅增至17.37亿磅,生铁产量从597万吨增至910万吨,煤炭产量从1.12亿吨增至2.28亿吨。但钢铁业和造船业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钢产量从1870年的22万吨增至1900年的498万吨,造船数量从34万登记净吨增为93万吨。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也开始建立起来。1895年制造了第一辆汽车,到1913年汽车产量已达3.4万辆。在动力方面,80年代出现了利用硬煤生产煤气的瓦斯工业和电力工业,1912年全国电站安装容量达90万千瓦。1900年英国开始试制人造纤维,到1913年生产了700万磅人造丝。但英国新兴工业部门的规模很小,其产值在1903年只占工业总产值的6.5%。因此,新兴工业部门的增长抵偿不了旧工业部门发展的滞缓,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下降。

19世纪最后30年,法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它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在1870—1890年为2.1%,1891—1900年为2.6%。但重工业的发展比较快,特别是钢铁产量增长得最为明显。1870—1900年生铁产量由118万吨增加到424万吨,钢产量由8万吨增加到157万吨,煤产量由1 318万吨增加到3 340万吨。作为法国主要工业部门的纺织工业,由于普遍采用蒸汽动力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取得显著的发展。1863年棉花消费量只有5.9万吨,1900年增为15.9万吨。电力、汽车、制铝、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也开始建立起来,并取得很大成就。但这一时期,法国工业中的中小企业仍占很大比重,轻工业也还居于重要地位,法国工业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交通运输业也取得显著的发展。下表表明了这一时期世界航运业的发展情况。

1870—1910 年世界船舶数

（单位：百万净吨）

年份	帆船	汽船
1870 年	14.1	2.7
1880 年	14.5	5.5
1890 年	12.0	10.2
1900 年	10.0	16.2

1870 年全部船舶的总吨位为 1 680 万吨，但其中将近 84% 是帆船，共 1 410 万吨，汽船仅占 16%，共 270 万吨。进入 90 年代以后，一方面船舶总吨位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帆船的吨数开始减少，比重逐渐减少，汽船的吨数猛增，比重明显上升。到 1900 年时，全部船舶的总吨位增长到 2 620 万吨，比 1870 年增加了 55%，其中汽船已占约 62%，共 1 620 万吨，帆船仅占 38%，共 1 000 万吨。航运业不仅取得巨大发展，而且基本上实现了海上运输工具的现代化。

在这一时期，铁路运输业的发展更为迅速。1870 年世界铁路总长度为 21 万公里，其中 10.5 万公里在欧洲，9.3 万公里在美洲大陆。欧洲的铁路主要分布在英（2.45 万公里）、法（1.66 万公里）、德（1.89 万公里）三国，美洲大陆的铁路差不多有 90% 在美国（8.52 万公里）。到 1900 年，全世界的铁路已长达 76 万公里，比 1870 年增加了 2.6 倍。美洲大陆的铁路已远远超过欧洲，亚、非、大洋洲三个洲的铁路也有很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环绕世界的铁路网（见下表）。

1870—1900 年的铁路网

（单位：千公里）

年份	全世界	欧洲	美洲	亚洲	非洲	澳洲
1870 年	210	105	93	8	2	2
1880 年	372	169	175	16	5	8
1890 年	617	224	331	34	9	19
1900 年	760	284	402	60	20	24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在飞机还没有发明和普遍使用之前，船舶是唯一可以把被海洋隔绝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联系起来的交通工具。但木帆船的装货舱位小，航速慢，风险大，运费也高，不能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以蒸汽涡轮机、柴油机为动力的铁壳或钢壳轮船，改变了这一状况，它速度快得多，也更加安全可靠，载重量一般相当于木帆船的 4 倍，有的则多十几倍。由于轮船在航运业中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从 1870 到 1913 年航运费用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就极大地便利了国际的经济交往。但是，轮船只能抵达沿海国家和

地区的一些口岸,在铁路建设以前,国际贸易仍很难接触到各大洲广袤的内地。对于大多数国家,只有铁路才是使它进入世界市场的工具。因此,环绕世界的铁路网的初步形成,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扩大,使这一时期的世界贸易获得巨大的发展。下面的数据反映了这一情况。

下表统计数字表明,1870—1900 年世界贸易总额增加了约 1.6 倍。不仅数量上明显增长了,而且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继英国之后,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迅猛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扩大了本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对外贸易已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又引起了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卷入世界市场的大多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们共同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原料,同时供给它们必须的工业品。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一批新工业国家的兴起,英国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世界贸易形成了多中心的新格局。1900 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为:英国 19%,美国 12%,德国 13%,法国 9%。此外,这一时期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世界贸易额呈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从 1870 至 1913 年,这两类商品的贸易额都增加了 2 倍多。这就说明工业发达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以及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都加强了。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在经济上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世界贸易指数和贸易总额

年份	世界贸易指数 (以 1913 年为 100)	贸易总额 (单位:10 亿法郎)
1870 年	24	45.5
1880 年	36	68.8
1890 年	49	94.2
1900 年	68	118.2

19 世纪最后 30 年,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工业产品的增长幅度暂时超过了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幅度,结果使价格和利润普遍下降。总的说来,19 世纪 90 年代初的价格一般比 1873 年低 40%。其中钢和钢轨的价格下跌最为严重。欧洲的钢轨价格在 1872 年至 1881 年间降低了 60%,美国钢轨在 1898 年的销售价格仅为 1875 年的 1/10 稍多一点。直到 1896 年,工业品的价格才开始出现回升的趋势,但比 70 年代还要低得多。因产品的增长超过了市场的需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更加频繁了。进入 70 年代以后,在 1873、1882、1890、1900 年共发生 4 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的间隔时间明显地缩短了。同 70 年代以前相比,危机的破坏性也大大加强了。

由于出现了价格和利润的普遍下降以及经济危机更加频繁与深刻的现象，因而有些人把19世纪最后30年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大萧条”时代。但是从上述情况全面地考察，应该说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还是相当快的，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也是繁荣的。

三、垄断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最后30年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兴起，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规模越大，要求的资本也就越多，于是股份公司这种早已出现的集资经营方式开始得到广泛的发展。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与生产迅速地集中了。此外，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也加速了大资本吞噬小资本的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美国，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1904年约1 900个，占企业总数的0.9%，而它们拥有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5.6%，它们的产值占总产值的38%。在德国，雇佣50个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在1907年占企业总数的0.9%，而它们拥有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39.4%，占有的蒸汽马力和电力分别高达75.3%和77.2%。英国和法国因进入70年代以后生产增长的速度相对缓慢，技术装备陈旧，新工业部门比较薄弱，生产集中的速度与程度要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特别是法国，工业中小生产者仍占很大的比重。但是，这两个国家工业生产集中的趋势，也在明显地加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由于在工业革命中引进了外国技术和企业的组织形式，加之外国资本的支持，因此生产的集中程度特别高。到19世纪末，雇佣500人以上的大企业，已拥有工人总数的45.2%。在纺织工业部门，生产的集中尤为突出，约3/4的工人集中在雇佣工人1 000人以上的大棉纺织工厂中。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一开始就是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进行的，很快就出现了与国家政权密切勾结的少数特权资本，因而生产集中的程度也很高。

生产的集中引起了垄断组织的产生。早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已开始出现个别的垄断组织。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许多中小企业破产，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集中，于是垄断组织较多地发展起来。不过这时的垄断组织一般还不稳固，在国民经济中也不占统治地位。一直到19世纪末的经济高涨至1900—1903年的危机期间，垄断组织才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展起来，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所谓垄断组织，一般是指资本主义大企业间为了独占生产和市场、以攫取高额利润而联合组成的垄断经济同盟。垄断组织有多种形式，如卡特尔是生产同类商品的大企业通过签订关于产品价格、销售市场、生产规模等协定建立的垄断组织；辛迪加是同一生产部门的少数大企业通过签订统一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

的协定建立的垄断组织；托拉斯是由若干生产同类商品的大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大企业合并组成的垄断组织；康采恩是共同依赖某一大金融资本集团的不同经济部门的大企业、大公司和银行联合组成的垄断组织。但不论垄断组织采取何种形式，它们都是以生产集中、个别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前提而形成的。卡特尔和辛迪加的参加者虽然在生产上还是独立的，但它们都是一些大型企业；托拉斯和康采恩则已是大型企业合并组成的规模极大的企业和企业群。因此，垄断组织既是一种旨在攫取高额利润的独占生产与市场的经济联合，又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超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正式进入垄断阶段。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不同，垄断组织发展的程度和形式也有很大差异。美国的垄断组织主要采取托拉斯的形式，这同美国工业生产的集中程度很高有密切联系。美国的许多企业是在采用当时最新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创业之初规模就很大。它们在竞争中拥有优势，很快挤垮了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把生产集中到自己手中。这样，同一部门的少数大企业为了垄断销售市场和加强竞争能力，又进一步采取合并的形式组成“托拉斯”，确立了它们的垄断地位。美国出现的第一个托拉斯是 1879 年成立的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它在建立之初就掌握了全国石油产量的 90%，是美国最大的垄断组织之一。进入 80 年代后，在榨油、造酒、制糖、制绳、炼钢、火柴、烟草、屠宰和采煤等部门也都出现了托拉斯组织。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垄断组织在美国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 1904 年，美国共有 318 个工业托拉斯，其中 236 个是在 1898 年以后建立的。这 318 个工业托拉斯吞并了5 300个工业企业，拥有全部加工工业资本额的 40%。美国的各重要工业部门一般都已被一两个或少数几个大托拉斯所垄断。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孚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杜邦火药公司和福特、通用、克莱斯勒 3 家汽车公司等。

德国垄断组织发展的程度仅次于美国。由于德国农村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国内市场狭小，它作为较晚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扩大国外市场方面又面临激烈的竞争，因而解决销售市场问题十分紧迫。德国虽然也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大企业，但还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条件，使得在产品销售上进行垄断联合的“卡特尔”成为德国垄断组织最普遍的形式。1857 年德国出现了第一个卡特尔，到 1870 年增加到 6 个。1873 年危机爆发后，卡特尔迅速增加，1879 年已有 14 个，1890 年猛增到 210 个。在 19 世纪末期的高涨和 1900—1903 年的危机期间，垄断组织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05 年卡特尔已达 385 个，垄断组织遍及采煤、冶金、电气、化学、纺织、皮革、玻璃、砖瓦、陶器和食品等工业部门。在 20 世纪初，卡特尔开始向高级形式——拥有统一销售组织的辛迪加发展。在 1905 年的 385 个工业卡特尔中，约有 200 个具有了辛迪加性质。与

此同时，在一些主要生产部门还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巨大托拉斯和康采恩。因此，20 世纪初垄断组织也已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特别是在重工业和运输业中，许多部门往往被一两个垄断组织所支配。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在 1893 年成立时就集中了该区煤产量的 86.7%，1910 年更高达到 95.4%，超过全国煤产量的一半以上。德国钢业联盟（1904 年成立）和铁业联盟（1910 年成立）垄断了全国钢铁产量的 98%。电气工业基本上被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公司两个集团控制，航运业则集中于汉堡-美利坚公司和北德意志航运公司手中。

在英国，由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占优势的纺织业等旧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程度较低，以及拥有庞大的殖民地为资产阶级带来高额利润等因素的影响，垄断化的进程比较缓慢，垄断组织的发展程度也比美、德两国要低。就垄断组织的形式而言，由于英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在销售方面较少实行联合的辛迪加和卡特尔。它的垄断组织一般都是经过激烈的竞争，由若干家大企业合并改组为大股份公司，并进行一系列兼并活动后形成的生产上的联合。垄断组织在各工业部门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新兴工业中发展较快，垄断程度也较高，并开始出现跨部门的垄断联合企业；在轻工业方面，特别是在棉纺和棉织这两个部门中甚至尚未形成垄断组织，例如，在军火工业和造船工业中于 1897 年出现了著名的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和维克斯-马克西姆公司。它们不仅生产军火，建造军舰，并且拥有自己的钢铁冶炼工厂以及其他有关的金属加工、机器制造等工厂。在冶金工业中，则出现了鲍尔考·汪干公司、约翰·布朗公司、贝尔兄弟公司等著名的大冶金联合企业。它们几乎都拥有从煤矿、铁矿、石灰石矿、炼焦、冶铁、炼钢、各种钢材轧制、金属加工，直到造船等一系列的工厂。在新兴的化学工业中，早在 80 年代就出现了垄断英国炸药生产的诺贝尔炸药公司，控制 91% 食盐生产的盐业联合公司，垄断全部漂白粉生产的碱业联合公司，控制大部分苏打生产的鲁诺·蒙得公司以及控制英国近 2/3 肥皂生产的利毕兄弟公司等垄断组织。在轻工业部门，生产比较集中的棉线和染整业中也出现了垄断组织；为了抵制美国烟草公司的倾销，英国的制烟大企业也于 1900 年合并成帝国烟草公司。

法国向垄断阶段过渡时，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是比较缓慢的。法国中小企业比重很大，工业生产集中程度较低，因而在垄断组织的发展速度和程度上比不上美国和德国。同时，它也没有形成某种比较突出的垄断组织形式，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在法国都有所发展。法国的垄断组织首先发生在重工业部门，特别是冶金工业以及与冶金工业密切相关的部门。例如，冶金工业中的郎格维“康多阿”（辛迪加）于 1876 年即已成立，它后来包括 14 家最大的铸铁企业。又如西克利达辛迪加，在 1887 年即掌握了全世界钢的 30% 销售量。20 世纪初，法国

重工业中最著名的垄断组织有：旺代尔、施奈德、马林、奥姆古尔、德恩·昂赞等公司。化学工业中则以久尔曼和圣戈班托拉斯实力最为雄厚。在轻工业部门也出现了一些垄断组织，如著名的亚麻辛迪加控制了全国约 90% 的麻织品生产；1883 年成立的制糖卡特尔也在该部门中取得垄断地位。

俄国资本主义起步虽晚，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也开始进入垄断阶段。在俄国，辛迪加成为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这是因为重要工业企业一般都分别掌握在不同国别的外国资本家手中，它们在生产上难以联合组成托拉斯；而政府的大批订货和保护关税政策，又使资本家争夺订货和国内市场的斗争异常激烈。于是它们便组成辛迪加以调节彼此间的矛盾。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就出现了一批垄断联合组织，如铁轨工厂联合，铁板、铁丝和铁钉工厂联合，桥梁工厂联合等。但垄断组织的广泛发展是在 1900—1903 年危机以后。

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比欧美先进国家落后得多，但它的近代工业一开始就操纵在得到政府特殊保护与扶持的少数特权资本手中。这类特权资本原来就广泛从事商业、金融、运输、工业生产等各部门的活动，以后它们又在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中膨胀起来，很快便转化为垄断资本。它们大多采取康采恩的形式，其主要代表是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从事“多角经营”的财阀。例如，三井财阀在 1909 年成立了拥有资本 5 000 万日元的三井合名公司，统辖分立的商业、矿山、银行、仓库等直辖企业，还拥有北煤、王子造纸、钟纺、芝浦电气等旁系大企业。三菱财阀则在三菱合资公司下，统辖矿山、造船、运输、银行、地产等直辖企业，以及邮船、明治制糖、日本氮气、富士纺织等旁系企业。此外，在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垄断组织，财阀系统的企业在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轻工业部门，早在 1882 年就成立了纺纱业卡特尔——大日本纺纱联合会，1905 年又成立了缫丝业卡特尔——蚕丝同业公司等等。在重工业部门，也产生了一系列垄断组织。在钢铁工业中，八幡制铁所一直居于垄断地位。在煤炭工业中，5 大公司和海军直营煤矿，在 20 世纪初垄断了整个生产的 54%。

在工业生产集中并形成垄断的同时，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也达到很高的程度。20 世纪初，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银行集团统治着美国的整个银行业；柏林的德意志银行等 9 家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的资本约占德国银行资本总额的 83%；法国的法兰西银行是法国金融中心。另外 3 大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贴现银行和信贷总公司共拥有分行总数达 1 229 家，遍布全国各地；英国的银行“五巨头”——密德兰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劳埃德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地方银行共掌握了全国银行存款的 39.7%。随着银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它们控制了全社会工商业的经营，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与工业资本相融合，形成所谓“金融资本”。它们之间的融合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如银行和工业企业相互购买对方的股票；双方的代表互兼董事会的董事；银行为工业企业发行股

票、公司债券，发放长期贷款；银行建立自己的工业企业或工业企业建立自己的银行或金融公司等。在比较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金融资本形成的过程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些国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一些资本家缺乏创办这类企业的资金，于是银行的贷款成为它们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这就促使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美国的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银行集团，就是拥有成百家工业企业的巨头；柏林的6家最大的银行则参加了751个各种类型的企业。法国的银行垄断资本对工业的控制也比较严密。从事"多角经营"的日本财阀同样具有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混合生长的金融资本的特征。在英国也逐渐形成了金融资本，但因英国银行大部分是商业银行（或称存款银行），具有不参与对国内工业进行长期投资的历史传统，因此与工业资本的融合不如美、德两国显著。

为攫取高额利润，垄断资本家还把大量"过剩资本"输出到国外，主要是输往落后国家或者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资本输出的现象，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就已出现（例如19世纪中叶在英国），到19世纪末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资本输出同商品输出一样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19世纪末，英国和法国是两个主要资本输出国。英国资本输出在1862年为36亿法郎。1902年增加到620亿法郎。法国的资本输出仅次于英国，在1902年达到270～370亿法郎。英、法两国资本输出的地区与方式有所不同。英国资本绝大部分输往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美国，并且很大一部分采取生产资本即直接投资的形式。而法国资本绝大部分投放在欧洲，主要是俄国，并且主要采取借贷资本即间接投资的形式。德国开始对外投资比较晚，1902年输出的资本约125亿法郎。所输出的资本半数投放在欧洲，其余分布在拉美、亚洲、非洲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仍是资本输入大于输出的国家。至于俄国和日本，20世纪开始后也有少量资本输出（主要是对中国的投资），但基本上还是资本输入国。

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和垄断组织国外联系的扩大，各国大垄断组织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加剧了。为了减少由竞争带来的损失，它们签订国际协定，成立国际卡特尔以瓜分世界市场。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国际铁轨卡特尔，垄断了铁轨的生产和销售。20世纪初，国际垄断同盟纷纷成立。美国和德国的电气工业当时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德国电气总公司一直为瓜分世界电气市场进行激烈争夺。1907年，这两家公司达成暂时妥协，订立了瓜分世界市场的协定：通用电气公司获得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电气总公司分得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各国市场。在航运方面，1903年汉堡-美利坚公司、北德航运公司和摩根英美航运托拉斯之间，也签订了划分航运市场范围的协定。

四、垄断组织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垄断组织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尽管垄断组织作为独占生产与市场的经济联合体,必然会带来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但作为高度社会化的超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它的出现却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其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就客观的条件和影响而言,垄断组织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产生后又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大型企业是垄断组织形成的基础。它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所要求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以及因采用新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的传统工业部门,如炼钢工业等,都要求大量的生产资料,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巨额投资,因而其企业的规模都是很大的。垄断组织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发展的程度较高,绝非偶然的现象。垄断是在竞争中形成的。由于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因此在竞争中获得胜利的必然是设备精良、经营管理有方的大企业。它们在发展成为垄断组织后,使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自然会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它也使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社会化了。资金雄厚的垄断组织所能提供的条件,使科学技术的研究能够更大规模和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地进行,从而取得新的成果,运用于生产之中。这一切都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从主观的动机来看,建立垄断组织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独占生产和市场,以攫取高额利润。但这也是为了"调节生产",以适应市场的变化。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工业产品的增长幅度暂时超过了市场需求的增长幅度,结果导致价格、利润的普遍下降以及经济危机的更加频繁、深刻和持久。恩格斯指出:为了摆脱困境,"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①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都是为了"调节生产"而建立的一种经济联盟。这实质上是"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②,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51 页。

② 同上,第 759 页。

最后，托拉斯和康采恩等高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组织比较科学、合理，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但在企业的外部和企业之间，就缺乏这种组织性了。建立高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把原有的企业之间的外部关系转化为企业内部关系，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好生产，从而达到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因为通过企业的合并而极大地扩大了它的规模之后，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可以产生如下一些优越性：企业合并后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这就有可能使用那些位置最有利的工厂和最有效率的机器设备来进行生产；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实行更有效的分工，在不同的工厂里实行生产的专业化，同时它也能使副产品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当一个托拉斯拥有生产同一产品的许多工厂时，就可以通过对各家工厂进行仔细的比较，发现既节约成本又提高效率的生产方法；通过许多企业的合并，可以取消重复的高薪职位，以减少行政费用，并获得最有才干的技术专家和经营管理人员。如果托拉斯进一步实行纵向联合，不仅控制生产，而且控制原料资源和加工（向前联合）以及产品的销售（向后联合），就可以进一步改善企业的经营，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存在上述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因素，因此尽管垄断组织引起了某种停滞和腐朽的趋向，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没有放慢。更何况垄断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竞争仍然是生产发展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因此，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前还要快得多。20世纪初，垄断组织的发展程度很高的美、德两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最快，其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8%和4.2%；而垄断组织的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英、法两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来说都是缓慢的，其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和3.3%。这也说明了垄断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没有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反而使它加快了。由此可见，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开始成熟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垄断组织虽然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一面，但是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它既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剥削性和侵略性的加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垄断组织之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势必降低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垄断组织的形成，意味着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掠夺。第二，垄断资本的形成，就是大生产吞噬小生产的结果，其间充满了暴力、欺诈的行为及种种卑鄙丑恶的手法。这在美国最为突出。第三，垄断的形成，必然伴随着食利者阶层的出现，他们靠海外投资及向外国放贷（如法国对俄国放贷），坐享超额利润及高利息的收入，因而成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阶层。第四，垄断组织的形成推动了殖民扩张。

垄断资本的胃口更大，它不但继续要求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及原料供应地，而且也要求扩大资本输出地，因此出现了瓜分世界的狂潮，有更多的国家、地区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五，垄断资本是战争的根源。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的争霸。争霸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第二节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向

一、政治发展的趋向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向，诸如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国家机器日益强化、政府结构更加完善、政治民主进一步扩大、两党政治正式形成、资产阶级代议制度开始从欧美向亚洲扩散等。

行政权力的膨胀

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 1870 年以前，都已经通过革命战争或和平改革制定了宪法，设立了议会，确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度。尽管有的国家采取了君主立宪制，有的国家采取了民主共和制，各国议会都享有很大的权力，除立法、财政大权外，还行使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在个别国家（如英国），议会的权力甚至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有人说："议会除了不能使一个女人变成男人和使一个男人变成女人之外，能够做一切的事情"。然而，到 19 世纪晚期，议会的权力和作用开始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不断膨胀。这种政治发展的趋势，在议会制度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表现得最明显。

英国的内阁在 19 世纪中叶时是秉承议会旨意管理国家的"执行委员会"，但是，到 70 年代以后，它的权力逐步凌驾于议会之上。议会的立法权在很大程度上为内阁所控制，因为内阁几乎垄断了全部立法提案权，"下院的真正工作无非是充当内阁登记机关"。根据 1882 年制定的关于议会议事程序的《普通规程》，议会开会的大部分时间要有政府参加。据统计，从 1887 年到 1897 年，政府参加议会会议的时间平均达到会议全部时间的 84.5%，因此议员个人很少有提出议案的机会。此外，19 世纪前期形成的"委托立法"制度到 19 世纪后期也有了新的发展，"委托立法"的范围日益广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议会只规定一般原则，而授权内阁或某一行政部门去制定具体的施行细则，这种制度使议会的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直接转入内阁手中。所以，当时许多英国人称内阁为立法机关的"第三院"。内阁有时甚至篡夺了议会的财政权。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事件是一个突出的例证。1875 年，内阁首相狄斯累利未经议会预先许可，擅自

借款400万英镑,购买了苏伊士运河近一半的股票。这本是一种侵犯议会传统权力的"违宪"行为,但事后议员们非但未加追究,反而齐声喝彩。过去,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曾经被认为是议会监督和控制内阁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在政党组织日趋完善的情况下,首相和内阁作为议会多数党的"党魁"和领导核心,对下院议会党团的控制大为加强,因而除非多数党自身发生分裂,议会是不可能对内阁投不信任票的。即使通过了不信任票,内阁还可以"诉诸选民公断",提请英王解散下院。在新议会选举中,内阁因处于执政党的有利地位,获胜也不成问题。总之,英国议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一种"内阁专横"的政治格局正在出现。

美国也出现了国会权力削弱、总统权力增强的趋势。美国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权力机关相互独立、彼此制衡。在内战之后的"南方重建"过程中,国会曾一度取得压倒总统的优势地位。当时,国会不顾约翰逊总统的否决,强制通过关于"南方重建"的法案,可以说"南方重建"工作是在国会的监督指导下进行的。在"南方重建"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国会通过各种常设委员会;控制着诸多行政部门,其权威达到顶峰,形成所谓的"国会政府"。但是,这种格局只是昙花一现,不久,权力重心便开始向总统方面转移,国会把越来越广泛的自由裁定权授予总统,使总统在许多重大事务中享有独立的决策权和执行权。立法否决权作为总统牵制国会立法活动的强有力武器,越来越经常地使用。克利夫兰在第一次任总统期间(1885—1889)就否决国会法案314项,而在1789—1885年的近100年间,总统一共才行使否决权131次。总统还通过提交国情咨文等多种渠道影响国会立法,例如在1893年,第二次任总统的克利夫兰运用了一切可用的办法施加影响,使本来犹豫不决的国会终于通过了《废除白银收购法》。1870年的一项国会法案,授权总统使用军队以保证《宪法第15条修正案》的实施,这就扩大了总统的军事权。进入20世纪后,权力向总统手中集中的趋势愈益加强,最后,在威尔逊时代终于出现了"强有力的总统统治"。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德、法两国情况不同。德国早在实现国家统一时,就已经为君主及行政机关保留了广泛而强大的权力。法国则自从18世纪末爆发大革命后,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变幻莫测,只有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稳定下来,最后确立了议会权力较大的议会制共和国。所以在19世纪最后20年内,法国还来不及强化行政权力。

国家机器的加强

到1870年为止,英国仍实行地方自治,中央权力尚未伸到地方去。各郡的行政司法权力由治安法官掌握,他们都是地方贵族。县评议会则由国家僧侣控制。因此,作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工具的官僚机构尚未形成。

但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内,情况发生变化。1872年设立内政部,目的是

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和监督。此后,又一步一步地充实了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在内阁增设了劳工、卫生、教育等机构。到1914年,内阁已增至16个部,阁员增到20多人。1888年,英国对郡政府进行了改革,成立了由富人选举产生的郡务会议,掌管地方行政警察事务,原来的治安法官只保留受理诉讼的职权。1894年,又对郡以下的县政府进行了改革,由地方纳税人选出的县务会议代替了县评议会。在此期间,还对城市管理作了调整,以伦敦为首的80多个大城市确定为郡级市,直属内政部管辖,其余中小城市分属所在郡的郡务会议领导。这样,一方面,把地方贵族势力从地方政权机构中清洗出去;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因而实现了中央集权。

与此同时,军事警察组织也不断完善。1870年以前,英国的军队数量很少,而且绝大部分驻守在海外殖民地。那时的英国海军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几乎全部被用于海外扩张和保卫海运航线,因此,国内兵力微乎其微。然而,在1870年以后,情况大变。1872年,英国从殖民地调回一部分军队,增加了国内驻军力量,同时,把全国分为若干军区,每个军区招募两营常备军,其中一个营留驻国内,另一个营派往殖民地。海军规模也一再扩大。1889年,英国提出"双强标准",即英国的海军力量不能低于其他两个强国的海军力量之和。军费拨款逐年增加,1875年,海陆军费为2 530万英镑,1907年增加到5 980万英镑。此外,英国还建立了一支职业警察队伍,代替了原来各地的非专业性的义务保安队。

实现中央集权,军队警察力量大大充实,这意味着英国国家机器加强了。

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还没有强有力的军事镇压机构。那时,各州实行民兵制度。1877年,在镇压铁路工人罢工时,暴露出国家暴力机器软弱无力的"弊端"。不久,国会便通过决议,规定各州州长可以从联邦政府领取武器,改善民兵装备。同时,参谋本部重新配置了国内武装力量,定期举行军事演习,加强了训练。1894年,对陆军进行了改组,增加了各州民兵数额,还在各大工业中心建立了军火库。海军编制也进一步扩大。另外,从70年代起,美国设立了司法部,整顿了警察机构,增加了警察人数。1908年,又成立联邦调查局,这一机构成为美国统治者监视国内革命人民和进行国外间谍活动的主要工具。

德国在统一之后,全盘继承了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从法国取得的50亿法郎赔款,大部分被用于扩军和改善武器装备。1874年,俾斯麦迫使帝国议会同意,将和平时期的军队从35万人增加到40.2万人,另外还成立了全国非常后备军。同时通过了《七年法》,一次批准了7年的军事预算,后来,再次延长7年。到1899年,德国陆军人数达到62万人。此外,德国多次通过《海军法案》,加速发展海上力量。整个德意志几乎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军事机构控制着一切,军人充斥各个领域。马克思曾把当时的德国描写为"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

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①。

这样，在这个时期，英、美、德几个资本主义大国都加强了官僚、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强化了国家的镇压职能。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们经常使用国家暴力机器镇压劳动人民。例如在美国，当 1877 年爆发铁路工人大罢工时，政府在巴尔的摩、匹兹堡等罢工中心城市，都出动了军队进行镇压，结果 300 多人惨遭杀害，1 000 多人受伤，数千人被捕。1886 年，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罢工也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死伤工人 200 多人；1894 年，普尔曼车厢工人罢工同样被政府镇压在血泊之中。国家镇压职能的加强在德国表现得最明显。1878 年 10 月，俾斯麦政府借口这年 5 月发生的谋刺皇帝事件，操纵议会通过《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非常法”。该法令规定：凡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组织、团体及其报刊和其他印刷品，一概加以禁止。在实施“非常法”的 12 年间（1878—1890），全国共有 1 300 多种出版物被查封，330 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 多人被放逐，1 500 多人被投入监狱。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不仅仅限于对劳动人民的镇压，而且还扩大到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干预。它通过社会立法调整社会关系，如实行劳动保险、工厂法等等，干预经济生活，兴办教育，保护自然资源，负责全民卫生保健工作，营办社会福利事业等等。有时政府还以调停劳资纠纷的姿态出现。1902 年 5 月，美国爆发无烟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罢工持续时间甚长，这主要是因为煤矿主蛮不讲理，顽固地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实行干预。这一年 10 月，他把煤矿主和工会领导人召集到白宫，与他们进行磋商。当时煤矿主无理地要求政府动用军队迫使工人停止罢工，这激怒了罗斯福。他告诉煤矿主说，他准备动用军队去剥夺煤矿主的所有权，然后由军队来生产无烟煤。结果，煤矿主屈服了，不得不提高工资 10%，工作时间减到 9 小时，在有些情况下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当然，总统也向煤矿主作了一些让步，准许他们将煤价提高 10%。

政府结构趋于完善

在 19 世纪后期，英美两国都实现了文官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整治腐败的吏治和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在英国，官吏任免一向实行“恩赐制”。恩赐权最早属于国王和枢密院，到 18 世纪，这个大权转到内阁首相和大臣手中。他们滥用这个权力，任人唯亲，把本党的党徒安插在各级政府，这就造成官吏的腐化和无能。

吏治的腐败，在美国表现为“分赃制”。这个“制度”形成于 19 世纪 30 年代，其特点是：甲党上台后，立即斥退大批政府官员，而让在竞选中有功的本党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5 页。

徒填补这些空位。乙党上台后，亦如法炮制。这些官员们在任职期间，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无所不为。结果造成官员素质下降，不能胜任政府工作。而且这种"分赃制"也影响了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

为了纠正这些弊端，以适应大工业时代，政府工作专业化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需要，英国先后在1855年和1870年颁布了两道枢密院命令。美国于1883年颁布了《文官制度条例》，即《彭德尔顿法》，分别对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两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即：第一，对文官的录用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办法，择优录取；第二，定期考核，按能力和政绩大小予以升降奖惩；第三，文官常任，不与执政党共进退。这些改革，把竞争机制引进了文官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中的腐败现象，改进了文官的素质，激发了公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促进了文官的专业化及行政管理的科学化。

英、美文官制度的健全化，使政治上层建筑适应了工业化社会的需要，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起了保证作用。

政府结构的完善化也表现在专家的科学化管理上面。这在美国最为突出。20世纪初，美国城市管理日趋科学化。19世纪，美国城市管理一般地实行市长—市政会议体制，这个体制因内部职权不清，造成市政软弱无力。职业政客乘虚而入，他们依靠党派势力，操纵选举，篡夺市政大权，成为"城市老板"（City-boss）。他们对市政管理一窍不通，且营私舞弊，声名狼藉。因此，19世纪70—80年代，城市改革的呼声甚高。到90年代，随着"进步运动"①的兴起，城市改革的要求发展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

改革运动产生了结果：市长—市政会议体制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超党派的行政人员组成的市政委员会。这个改革是得克萨斯州的加尔沃斯顿市首倡的。1900年9月8日，该市在飓风及海啸的袭击下遭到严重的破坏。当时，腐败无能的市政会议在城市重建的任务面前束手无策。在改革派的联合敦促下，州议会任命5名有能力的企业家组成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立法与行政合为一体。这个机构行政效率颇高，迅速完成了这个城市的重建工作。翌年，这个委员会作为一种城市管理制度固定下来，并且规定此后历届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在选举中不由政党提名候选人，而由市民直接选举。

1907年，衣阿华州的得梅因市实行了加尔沃斯顿首创的委员会制，并且通过实行市民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为它增添了更为民主化的内容。衣阿华州议会赞许这个制度，决定推广它：允许2.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以得梅因市为榜样，成立富有民主色彩的委员会制。到1910年，已有100多个城市采用市政委员会制，到1914年，采用这个制度的已有400个城市。市政委员会制的推广，根

① 关于"进步运动"，将在以后作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不赘。

绝了“城市老板”的腐败统治，标志着美国城市管理的进一步民主化。

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市政委员会制也有弱点：第一，城市问题极其复杂，需要管理上的专门业务知识，而市民选举产生的委员们往往不具备这些知识。第二，委员们地位相等，不利于集中管理。第三，立法与行政合一，容易造成委员会大权独揽，不利于发扬民主。因此，改革派对这个体制也不满意，他们继续探索更佳的方案。不久，弗吉尼亚州的斯通顿市为体制改革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斯通顿市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城市，发展很快。1908 年市议会任命一位“总经理”管理市政，并授予较大的行政权。试行的结果令人满意，这引起改革者的重视。著名的改革理论家理查德·蔡尔兹便把斯通顿市的经理制与委员会制结合起来，综合成一个完整的市政管理体制——委员会—经理制。1913 年，俄亥俄州的戴顿市采纳、实行了这个体制。

委员会—经理制是这样一种市政管理体制：先由市民根据普选制原则，选举一个超党派的委员会(5 人或 7 人或 9 人)，由它负责制定政策及法令，批准年度预算。再由该委员会聘请一位受过专门训练，并且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与才干的专家担任市经理，全权负责城市行政管理事务。他对委员会负责，任期不限，由委员会视其政绩而定。

这个体制既保存了市政委员会制的民主成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以民主方式制定法律及政策——又增加了目的在于发挥专家特长的经理管理的成分。换句话说，这个体制把民主管理与专家治市结合为一体，既能照顾到市民各个集团的利益，又能保证工作效率。市经理把市民所纳的税视同托拉斯的股金，为市民精心筹划使用。它的优点很快就显示出来。斯通顿市试行这个体制仅 3 年，面貌为之一新，财政状况趋于好转，供水系统得到改善，现代化照明设施逐步完善。因此，这个体制很快地代替了市政委员会制。到 20 世纪初，已有数百个城市实行了委员会—经理制。当然，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的科学化在这个时期只是一个开端。

上述欧美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加强行政权力，强化国家机器，完善政府结构，实际上就是实行政治上的调整，而实行这些调整，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众所周知，1870 年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渡，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斗争格局都发生了剧烈变化。面对这个新的局面，旧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结构中的某些环节已经不能适应了。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也为了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下去，上述几个重大的政治调整势在必行。具体说来，进行这些政治上的调整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1870 年以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各国工人阶级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甚至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工人还到处成立工会，并且在工会领导下举行罢工。

这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的严重挑战。面对这个挑战,资产阶级不能不加强国家机器。第二,由于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列强加强了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加强了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斗争,为此,垄断资产阶级必须增强军事力量,提高行政权力,讲求行政效率。第三,19世纪末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社会经济生活日趋错综复杂,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靠社团或私人力量无法解决,只有国家干预才能解决,这就要求扩大国家的职能。第四,在这个工业化时代,政府工作的专业性质更强了,这就要求改革文官制度,要求科学化管理。

政治民主的扩大

1872年,在自由党人格莱斯顿的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了《投票法案》。过去英国选举采取口头表决的方式,所以有钱有势的人很容易操纵选举,选民的意志自由难以保障。《投票法案》把口头表决改为秘密投票的方式,从而保护了选民的投票自由。

经过1832及1867年两次改革后,英国选举权已经扩大到城市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但是为数200万的农业工人仍被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因此,农业工人深表不满。1884年,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人民代表法案》,并且获得通过。该项法律把选举权扩大到农业工人,这样,距离成年男子普选制已经不远了。1913年,在1 000万成年男子中,有800万人享有选举权。但是,到这时为止,英国的选举制度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家庭仆人和妇女仍未获得选举权;大约有50万人享有两个以上的投票权,他们都是在两个以上选区内拥有住所的大商人,有的人甚至拥有9个投票权。

1885年又通过了《重新分配席位法案》。过去,英国的代表席位的分配很不公平:一个城市或一个郡,不论其人口多寡,在议会下院中的代表均为两名。1832和1867年改革法案虽然对部分选区的议席分配作了适当调整,但仍是不公平的。1885年的法案取消了人口不满1.5万人的城市在下院中的席位,而把这样的城市分别并入所属各郡;人口在1.5万到5万的城市只保留一个席位。空出来的席位分配给英格兰(64个)、威尔士(4个)和部分新兴城市(74个)。除22个城市外,其他各城市和各郡一律实行单一代表选区制,大体上每5.4万人选出一个代表,从而接近于平等代表制原则。

英国还实行了旨在清除选举舞弊行为的改革。在英国,用金钱贿赂选民的腐败现象一直十分严重。在1880年的议会选举中,麦克尔斯菲和桑贵克两城市的选民,大约有半数有接受贿赂等不法行为。为纠正这种弊端,国会于1883年通过《取缔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法》,它规定了选举费用的最高限额及其正当使用范围,要求由一名合法的选举工作人员负责选举费用的使用,他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全部账目。该法还明确了哪些行为属于违法之列,规定了对违法者进行罚款、监禁、剥夺政治权利7年等惩罚办法。1883年法律虽然不可能根除选举中的腐败现象,但以后的舞弊行为确实明显减少了。

1911 年又进行了两项改革。第一，每一届议会的期限从过去的 7 年缩短为 5 年，这就缩小了议员与选民之间的距离。第二，实行下院议员薪金制，每年 400 英镑。过去，下院议员不领薪金，这对于工人出身的议员很不利，他们的生活只能靠工会补助。议员有了薪金，工人议员就无后顾之忧了。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下院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但是上院仍是一个保守力量的堡垒，它一共有 600 名议员，其中大多数是世袭贵族，还有 26 名高级僧侣，只有少数选举产生的爱尔兰、苏格兰贵族。他们大多数顽固地维护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及利益，反对任何民主措施，成为英国政治进步的主要障碍。1909 年，上院竟敢于否决下院所通过的、由劳埃德·乔治提出的预算案，这就违反了长期以来实行的惯例：上院必须同意下院所通过的财政法案。上院的这种作法，立即激起了自由党的愤慨。自由党内阁首相阿斯奎斯在下院自由党多数议员的支持下，宣布上院的行动"破坏了宪法"，并且草拟了一项旨在限制上院否决权的法案。在自由党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上院屈服了。1911 年 8 月 18 日，阿斯奎斯提案获得两院通过后成为正式法律。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下院通过的财政法案在提交上院后，经过一个月就自动成为法律（不管上院通过与否）。第二，其他法案，如果连续由下院通过三次，不管上院通过与否，也可以成为正式法律，但条件是：在第一次讨论该法案到它最后获得法律效力，必须有两年的间隔时间。

这样，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英国的政治民主一步一步地扩大了，其最显著的后果便是：工人阶级可以参与政治生活，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议会，可以推动政府实行劳工立法。

英国自由党之所以倡导上述一系列民主改革，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第一，如果不让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有发言权，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这就会威胁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二，自由党倡导民主改革，就会赢得人民的支持，从而使自由党在与保守党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在美国也出现政治民主愈益扩大的趋势，不过，在时间上较欧洲稍晚，是在 20 世纪初。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在殖民地时代就开始了。到 1870 年为止，美国已实现了成年男子（包括黑人在内）的普选制和平等代表制（各选区选进国会下院及州议会的代表与人口成正比例）。

20 世纪初，在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各州和各城市纷纷进行了政治民主改革。

1902 年在密西西比州实行直接预选制，即由人民直接提名候选人，而过去是由党的代表大会提名候选人。到 1916 年大多数州实行了这个制度。1898 年，南达科他州开始实现创制权，即由选民直接提出法案，由选民表决通过即成为正式法律，而无须经过立法机关。犹他州在 1900 年，俄勒冈州在 1902 年，实

行了人民的创制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20多个州实现了这个民主权利。1908年俄勒冈州实行了罢免权，人民可以罢免官员。在6年内有10个州实行了俄勒冈州的办法。最初罢免权只适用于行政官员，后来在亚利桑那州又扩大到法官身上。在投票方式上也有改进：各州普遍实行了秘密投票制。群众也喊出了要求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的呼声。在群众的要求下，1899年内华达州采行了由人民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的办法，而避开了宪法上关于联邦参议员由州立法会议选出的规定。到1912年为止，有30多个州采用了由选民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的办法。1913年批准的《第17条宪法修正案》承认了这个既成的事实。

19世纪后期，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也实现了进一步的民主化，这主要表现在实现普选制上面。

19世纪后期，比利时实现了普选权，这是工人阶级自己争取到的。比利时的工人政党通过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以及罢工等斗争方式，在1893年基本上争得了选举权。为此，工人阶级付出了代价，不少工人遭到解雇和政治迫害。

奥地利也走了与比利时相同的道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1889年的《海因斐尔德纲领》中，把争取普选权列为"鼓动和组织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并且在1893年的五一节示威中提出争取普选权的口号。经过长期斗争，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在1906年组织了以争取普选权为目的的罢工，才迫使国会在1907年通过《普选权法案》。

意大利在统一后沿用撒丁王国的宪法，这部宪法对选举权规定了极高的纳税额和文化程度等限制，因而全国只有60万人享有选举权。但是，1882年的《意大利宪法》大大降低了选举权条件，使选民人数猛增到200万人以上。到1912年，终于取消了选举权限制，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

实现普选权，希腊是在1864年，瑞士是在1874年，法国是在1875年，保加利亚是在1879年，西班牙是在1890年，荷兰是在1896年，挪威是在1898年。

总的说来，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欧美各国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一方面是劳动人民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当政资产阶级深谋远虑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同意扩大民主权利，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政治民主可以发挥"安全阀"的作用；而且，民主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也是一付有效的麻醉剂，可以使他们满足于现状；归根结底，实现民主可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在实际上，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目的达到了：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在这些实现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社会安定的局面，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民骚动，更没有发生人民的革命。可见，扩大民主与加强镇压，对于维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安定而言，可谓异曲同工。

两党制的正式形成及其他形式的政党政治

在近代英国，最早出现的政党是托利党和

辉格党。它们最初在组织上都很松散，两党的界限也很模糊，而且只限于在议会内活动，在议会外还没有建立常设的组织机构，只是在议会选举时，各地自发地成立一些临时俱乐部，选举一结束，即告解散。如前所述，1832 年议会改革后，托利党改称为保守党，辉格党改称为自由党。两党后来在组织上也都加强了，在议会内成立严密的议会党团组织及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核心的任务是提名候选人，制定竞选计划及组织竞选。在地方上建立选区委员会，设置登记员，其任务是登记支持本党的选民、开展宣传和争取选票。1868 年，保守党率先把各选区委员会联合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因而赢得了 1874 年大选的胜利。1877 年，自由党也建立了全国性的党的组织系统。于是，英国两党的组织臻于完善。

1870 年以后，随着垄断组织的出现，两党都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阶级基础渐趋一致，都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因此，两党在许多方面意见是相同的：在对待工人的问题上，都主张用微小的改革及施以小恩小惠，来缓和工人的斗争；在对外政策上都主张加强殖民地扩张。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两大党分别代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利益，在具体的纲领主张上也有不同之处。在经济政策上，保守党主张保护关税，反对自由贸易；自由党则恰恰相反，坚持主张自由贸易。在对外政策上，保守党主张明目张胆地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扩张，而自由党则比较小心谨慎，力图精巧地掩饰英国殖民扩张的掠夺性。

正是由于阶级利益基本一致而在具体问题上又有意见分歧的自由、保守两大党在 1870 年以后轮流执政，所以，这个时期两党制在英国正式形成。

但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自由党失势，工党起而代之。经过是这样的：到 19 世纪末，由于英国工业霸权地位的丧失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自由党一向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越来越脱离英国的现实，因而内部发生分裂，大批上层资产阶级分子转入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保守党，自由党势力衰落。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同盟、费边社、独立工党等各种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相继成立。这些组织和团体的基本群众虽是工人，但领导权都掌握在“工人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利用工人群众希望在议会中有自己的独立党团以维护工人民主权利的愿望，于 1900 年将上述三大组织和 50 年代出现的工人联合会合并一起，组成工党。工党成立后发展迅速，很快取代自由党的地位，成为与保守党相抗衡的英国两大政党之一。不过，英国两党制的总格局依然如旧。

美国在建国初期就产生了两个对立的政党。在华盛顿第一任总统期间，在国务卿杰斐逊与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斗争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联邦党到 1820 年前后销声匿迹。到 19 世纪 20—30 年代，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和辉格党。从这时起，党的组织逐渐加强。在总统选举中，两党都设立了专职选举委员会，利用各地的竞选俱乐部展开竞选活动。最初，总统候选人通常由国会

中党的核心会议提名，后来改由更加公开和广泛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名。40—50年代，党的代表大会逐步被职业政客和党棍所操纵，开始出现常设的党全国委员会组织，还设立了主席职务。同时，还建立了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因之政党组织趋于系统化、规范化。1850年后，辉格党逐渐解体。1854年，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北方工业资产阶级联合广大工人、农民，组成共和党。该党反对奴隶制向西部地区扩展，与主要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相对抗。内战结束后，特别是在70年代后，随着南方奴隶制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两大政党的阶级基础都发生变化：共和党成为与工农大众相对立的、代表金融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化了的南部大种植场主、富农及南方资产阶级的政党。两党的基本差别消失了，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罢了。这样一来，两党在重大问题上，如镇压工农运动、对外侵略等问题上步调日趋一致，只是在某些次要问题上，如关税问题（共和党主张保护关税，民主党强调自由贸易）、争夺肥缺等问题上尚存有分歧。

从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共和、民主两党基本上是交互执政的。其间，共和党执政时间较长，有20年之久（1865—1885）。这是因为内战中，领导北方战争并且取得最后胜利的是共和党人。

这样，在19世纪末期，美国也正式形成了两党制。

不容否认，两党制下面的政党本质上都是垄断资本的御用工具。两党都有大财团作为政治背景，在竞选中主要是依靠各个大财团提供竞选经费，而且两党制也离不开贿赂。垄断资本就是通过两党操纵全国政治。在美国，垄断资本惯用的手法，便是用金钱收买立法机关中占多数的政党，促使它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就曾花费60万美元贿赂当政的政党，以图保护自己的特权。因此，两党制与贪污贿赂及金钱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两党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起到某些积极作用。第一，可收互相监督之效，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当权的政党滥用权力。第二，人民群众有可能利用两党的斗争，实现自己的某些要求。在竞选中，两党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都不得不把人民的某些要求吸收到竞选纲领中去，并且在上台后予以某种程度的兑现。在英美近代史上，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立法都是两党斗争的结果。

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两党制度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一，通过两大政党的相互竞争，资产阶级能够不断地发现和选择出自己最满意的优秀政治人才，并通过和平的方式让其上台执政，为自己服务。第二，两大政党之轮流执政，都遵循了民主的程序，都是靠选民的支持上台的，尽管其间免不了大量舞弊行为及竞选丑闻。这种作法助长了人民群众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麻痹了人民的革命斗志。第三，在野党之批评、指责甚至攻击执政党的作法，起了一种迷惑人

的作用，使人民群众把希望寄托在在野党身上，从而放弃革命理想。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中两党制度是常态的话，那么还有以下三个变态：一是多党政治；二是无党政治；三是虽有政党，但只是装饰品。

与英、美的两党制度不同，法国以其“多党政治”而著称于世。19 世纪末，在法国议会中始终存在着众多党派，而且各党派都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员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变幻莫测，时而彼此勾结联合，时而分道扬镳，相互攻讦，因而很难形成议会中的稳定多数。这种状况导致内阁更迭频繁，1873—1890 年的 17 年间就更换了 34 届内阁，平均每届内阁执政时间只有 6 个月。这种“多党政治”是法国存在大量小企业、小农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反映。法国的“多党政治”经常引起政府危机和政局的不稳。

意大利由于经济落后，中产阶级力量薄弱，文盲率高，以及国民政治素质太差等原因，在这个时期尚未形成正常的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在议会内，只有一些基于个人和地区关系而结成的排他性极强的小集团。历届政府全是由少数政界要人的追随者组成，不代表任何明确的政治倾向。所以，这时期的意大利被人们称之为“典型的无政党的国家”。

德国在统一过程中已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党和进步党。1869 年，又诞生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由于德国实现了普选制，不但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工人的政党都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帝国议会。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的选举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到 1890 年，该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已达 35 个。但是，在德国，一个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再多，即使超过半数，也不能对国家行政元首的人选、去留以及国家的施政方针发生多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帝国宪法确立了“议行分立”的政治结构，世袭的皇帝高高在上，享有行政、军事大权，可以任免首相，首相对皇帝负责，而不向帝国议会负责。第二，帝国议会享有的立法权也很有限，既受联邦议会的抑制，又受皇帝的限制。

上述政党政治的三个变态反映了法、意、德等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

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扩散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趋向，那就是资产阶级代议制度开始从西欧和美国扩散到亚洲的日本，这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例证。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同当时的俄国一样，既无宪法，也无议会，天皇的专制权力由于地方割据势力被摧毁而进一步加强。出身于西南诸藩的武士占据了政府的要津，形成“藩阀专权”的局面。为数众多的一般士族和豪农豪商完全被排斥在仕途大门之外，因而极为不满。其中，一部分士族知识分子，在滚滚而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下，醉心于西方民主制度，有强烈的参政要求。他们

于70—80年代领导了旨在革除藩阀官僚专制、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度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在“征韩”问题上被排挤下野的参议坂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联名上书天皇，建议设立民选议院，从而拉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帷幕。不久，“自由民权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声势大振。天皇政府一方面加强对民权派政治宣传活动的限制，另一方面试图作些微小让步，以缓和事态发展。1879年，明治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了初步改革，设立了由选举产生的府县会议。府县会议享有地方立法权以及决定地方税收和财政预算的权力，不过，它们通过的法案，包括财政预算案，必须经府县知事同意才能生效。另外，府县知事在奏请内务大臣批准后，有权命令府县会议休会、闭会或解散。这些地方政府改革虽带有极大的保守性，但毕竟建立了地方代议机构，奠定了地方自治的基础，为将来在中央建立代议制作了准备。

初步的民主成果鼓舞了民权派和人民群众，“自由民权运动”出现进一步的发展。1881—1882年，民权派建立了“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在政党组织的领导下，运动迅速达到高潮。天皇政府为了瓦解“自由民权运动”，不惜采用卑鄙的阴谋手段，收买党魁，挑拨离间，致使民权派陷入分裂。到80年代中期，“自由民权运动”以失败告终。

“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终于把天皇政府推上了立宪道路。经过近10年的准备。明治天皇于1889年2月颁布了“御赐”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这部宪法是以德国宪法为蓝本制定的，它规定：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召开和解散议会、批准法令、任免官吏、对外宣战与媾和、统帅陆海军等。国家立法权属于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帝国议会。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敕选议员”组成，众议院由选举产生。根据宪法，只有缴纳直接国税（地税和所得税）15日元以上、年满25岁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在1890年第一次选举时，选民仅占全国人口的1.24%。议会的立法必须经天皇批准方能生效。财政预算案由内阁提出，如果被议会否决，政府可按上一年预算行事。由国务大臣组成的内阁对天皇负责，对议会只负有“道德上”的责任。其中，陆海军大臣有权直接上奏天皇。天皇身边还设有一个枢密院，它由天皇敕选的“元老”、“重臣”组成，名义上它是天皇的咨询机构，实际上是最高决策机关。宪法还规定了“臣民”在“法律范围内”的一些基本人权，包括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信教、迁徙等自由，以及担任公职和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处罚等权利。

显而易见，明治宪法带有浓重的保守色彩。但是，它毕竟是近代亚洲的第一部宪法。它规定了人民的某些基本权利，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确立了日本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宪法缺乏西方那种比较健全的民主宪政精神，因而在实施后，权力重心仍握在官僚寡头手中。众议院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和改进党虽占

多数,但他们争取建立政党内阁的斗争屡次失败,众议院多次被蛮横地解散。1898 年,由上述两党合并而成的宪政党占了议会绝大多数,天皇命其组阁,但未出数月,这届内阁就因内讧而瓦解了。这一政党政治的“闪光”消失后,议会各政党的领袖们便投入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的怀抱,把争取实行政党责任内阁制的斗争搁置一边,长达 20 年之久。但是,不管怎样,到 19 世纪末期,日本总算迈进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门槛。

这时,惟有偏处欧洲东北一隅的沙皇专制俄国,与资产阶级民主潮流背道而驰。

诚然,在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在国际潮流的冲击下,不得不摆出改革的姿态。1864 年,俄国实行了地方行政改革,在各省、县分别成立自治局,负责管理地方经济、卫生、教育等事务。自治局由每年召开一次的地方代表会议任命,除贵族外,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有权参加代表会议的选举。同一年,对司法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旧的等级法院,建立了从高等司法厅、区法院(省)到县治安裁判所等一套自上而下的司法机构;实行统一的法律和审判程序,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审判制、陪审制和律师制;允许成立律师事务所;允许诉讼当事人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法官任职终身,禁止行政当局随意任免司法人员。对原有刑法典也作了部分修改,废除了鞭刑、脸上刺字等最残酷的肉刑。1870 年通过市政改革,在各城市召开了市杜马,由市杜马推选一名市长和数名职员组成市执行局,负责市政管理。在市杜马选举中,取消了封建贵族特权,实行统一的财产资格标准,即缴纳城市地方税的人都有选举权。1874 年又进行了军事改革,废除了募兵制,打破了贵族对军队领导权的垄断;实行全民兵役制,即凡年满 20 岁的男性居民,不分等级,皆有服兵役的义务。

但是,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俄国政治体制的要害,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未变。在以后的 30 年内,沙皇政府不但没有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而且残酷地镇压“民粹派运动”和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对自由主义者(主要是平民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宪政改革要求,即使是十分温和的要求,也顽固地加以拒绝。到 19 世纪 90 年代,沙皇政府甚至掀起一股“反改革”逆流,妄图取消或削弱 60—70 年代的改革成果,致使国内各种矛盾一步一步地激化,终于在 1905 年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说,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欧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呈现相对稳定的局势,应归因于这些国家实行民主和社会立法(后面要详细叙述)的话,那么俄国在 1905 年爆发革命,则是由于始终把政治民主拒之于大门之外,顽固地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的结果。

二、社会立法

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作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调整

的同时,在社会领域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这也是时代的需要。首先,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及"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社会不公更加严重。物质财富急剧增长,但是分配极不公平。富人绫罗着身,美食满腹,穷人则为一日三餐,奔走操劳。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大大恶化,他们的不满与日俱增,这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来说是一个"隐患"。为了防患于未然,只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调整和弥缝,才能使资本主义继续生存下去。同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也迫使统治集团不得不从事这种调整。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觉悟更加提高,他们组织起来为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各国几乎都成立了工人的政党和工会,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压力。其次,工业化及与其同步的城市化,使社会生活愈益复杂化,因而产生了过去意想不到的各式各样的新问题,这些都需要积极地加以解决。另外,这时实行这种调整也有了可能。第一,当时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一支强大的科学家队伍成长起来了,他们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为政府出谋划策,协助政府在社会许多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需要。第二,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为实行社会调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这期间,在社会领域内实行的各种调整,主要采取了社会立法的形式,这意味着国家从过去的自由放任政策,过渡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与此相联系,国家的职能扩大了,也多样化了。

德国

在欧洲大陆,德国在社会调整方面走在最前面。德国工人阶级的地位远比英国工人阶级低下,在统一后仍挣扎在贫困之中。资本家为了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尽量压低工资以便降低生产成本。1874—1879 年工人的工资下降了 17.5%。这一时期,工人的劳动时间虽然缩短,但劳动强度很大,因而职业病急剧增加,意外工伤事故频频发生。而且工人一到老年就陷于贫病交加的境地。但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在德国统一过程中已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德国工人政党最初为两派,一派是 1863 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另一派是 1869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埃森纳赫派)。这两派在 1875 年合并,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成长迅速,在工人中间威信很高,影响很大,因之成为俾斯麦的眼中钉,务必除之而后快。1878 年他向帝国议会提交一项旨在取缔"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并且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法,迫使帝国议会通过了它。接着便开始了雷厉风行的镇压:大批党员被捕或被放逐,党的刊物也遭到查禁。但是,俾斯麦处事深谋,他认识到光靠镇压解决不了问题,还需要采取一些福利措施,诱使工人群众背弃社会民主党而向帝国政府靠拢。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消灭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他决定实行工人福利措施还有军事上的考虑。当时一个调查报告颇使德国统治集团不安:服兵役的工人多半心怀不满,这种情况对于

德国对外扩张不利，俾斯麦感到，实行福利政策，可以推动服兵役的工人为帝国的战争政策效力。

1881 年，俾斯麦在一项帝国文告中，公开表明了他要对工人实行福利措施的意图。1883 年，德国政府颁布了《疾病保险法》，该法为德国 300 万工人及其家属提供了医疗上的保障，费用由工人和雇主双方负担。1884 年颁布的《意外工伤保险法案》规定：因工伤亡的工人可以得到医疗及丧葬费，费用完全由资本家负担。1886 年又将工伤及疾病保险法扩大到 700 万名农业工人。1889 年的《老年及残疾保险法》规定：工人到 70 岁时可以领取养老金，残疾工人也可以领取津贴。这笔钱由工人、雇主和政府三方共同负担。

这些福利措施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施舍给工人的、富人餐桌上的残羹剩饭，并且清楚地看出这种措施有利于德国的专制统治，会使工人离开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反对俾斯麦用小恩小惠来哄骗工人，要求政府认真改善工人的状况。他们提出如下具体要求：制定劳工保护法，建立劳资纠纷仲裁法庭，在劳动时间、女工童工问题上切实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在这一场俾斯麦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俾斯麦并未达到预想的目的。工人阶级并未放弃社会民主党，他们在帝国议会的选举中，照旧踊跃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因而使俾斯麦大失所望。工人之所以没有被俾斯麦争取过去，是因为：第一，俾斯麦在实行工人福利措施时，照旧利用警察，到处追逐迫害社会民主党领袖，这就使工人怀疑政府实行福利措施的诚意。第二，俾斯麦反对进一步改善工人状况，他反对通过立法去限制劳动时间，限制女工、童工及实行星期天休息制度等。他公然表示：雇主是自己工厂的主人，国家不能干涉工厂内部的事务。

但是，1890 年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年，帝国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继续延长《非常法》的法案。这是因为他们看出这个《非常法》收效甚微，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实施期间，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在 1890 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得票 100 余万张，在帝国议会中得到 35 席。《非常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俾斯麦，这是他辞官归里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1888 年即位）热心于社会事业，他在俾斯麦去职之前（1890 年 2 月）曾发布一个文告，答应要实行新的福利措施，并且表示要召集一个国际会议，来讨论社会问题。

继任首相卡普里维执政期间（1890—1894），在皇帝威廉二世的支持下，颁布了《青工保护法》。该法禁止工厂雇佣未满 13 岁的童工，13 岁以上的少年工人每天劳动不能超过 10 小时，女工不得超过 11 小时，还建立劳资仲裁法庭，来处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纠纷。

俾斯麦之下台，《非常法》的废除，以及 1890 年以后实行新的工人福利措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缓和了德国工人及其政党对于帝国政府的敌对态度，并

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民主党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转变。到1900年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倾向于支持德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了。

英国

在此时期，英国在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调整。到1870年为止，英国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工厂、矿山、铁路及商店都为私人资本家所有，他们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工人阶级备受压迫剥削，他们养家糊口的收入微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他们的一生是不断地与饥饿、疾病作斗争的一生。地主对土地的垄断是社会不公正的另一个源泉。为数不过几千人的大地主，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他们坐享其成，平均每人每年享有上百万美元的地租收入，而在农场上劳动的农业工人，却过着悲惨的生活。

针对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人们提出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方案。凯尔·哈第等社会主义者认为：土地、工厂、矿山和铁路等关系到国计民生，极其重要，不应该由私人资本家垄断；只要这些公用事业继续为个人所有和控制，普通劳动人民的苦难就无法消除。所以他们主张把这些公用事业划归社会集体所有。自由党人，甚至某些工党人士则反对公用事业国有化。他们主张渐进的改革，并且提出以下改革纲领：(1)保护穷人，使其免除疾病、过分劳累、贫困及意外工伤的折磨。(2)发展教育及工会，作为工人自助的手段。(3)向"膨胀的"、不劳而获的财产征收重税，以便缓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

这些自由党人及工党人士看得较远，认识到工人受苦受难，生活得不到保障，是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对于维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利；减少工人的苦难，保障他们在食、衣、住方面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其掌握一定文化知识，从长远看还是值得的，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提高工人工资固然不利于资本家，但是后者却可以从前者提高效率、认真工作中得到补偿，而且是更大的补偿。他们还懂得：减少社会财富的巨大不平等，还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先后上台的自由党和工党分子，按照自己的纲领推行了一系列社会立法。1874年英国政府颁布法律，禁止10岁以下的儿童在纺织厂中工作。1878年的《整顿法》确立了工厂卫生的检查制度。1901年法律禁止12岁以下的童工在工厂中从事劳动，并且对劳动条件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定期进行检查，以保证工人的健康。1872年政府又对采矿制定了法规：禁止让妇女、12岁以下的少女及儿童到井下工作，要求矿主为工人的安全采取合理的防备设施。工党上台后，把改革重点放在提高工人工资上面。1909年颁布的一项法律，授权成立工资管理处（由劳资双方选出数目相等的代表组成），由它负责确定在"流汗的行业"中的工人的最低工资。所谓"流汗行业"指的是裁缝工作、硬纸板箱的制造、用机器制造及修整花边的工作及女衬衫的缝制等。

1912年，100万煤矿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自由党政府害怕了，赶紧劝

议会制定一项工资法案,它规定:由每个地区的有关机构分别确定最低工资。这说明自由党人政府并不关心使每个人都得到恰如其分的工资,他们关心的是使工人得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及生活的工资。

但是,当时英国社会上还有不少因工伤、生病、年老而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和众多的失业者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自由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首先是保障工伤工人的法律。每个月有 400 名工人因意外死亡,有7 000人受工伤。造成工人死伤的原因有时是工人自己不慎,但主要是由于资本家未能建立安全设施,特别是在矿井中。1897 年的法律规定,少数工种可以实行工伤赔偿原则;1900 年这个原则又扩大到农业工人;1906 年自由党议会把赔偿原则扩大到所有的企业。1906 年的法律规定:如果工人因意外事件而残废,可以从雇主那里领取每周不超过 5 美元的赔偿费,如果工人受到致命的工伤,他的家人总共可以领取 750 ~ 1 500美元的钱。在 1884—1907 年间,另外有 20 个国家对因工致残的工人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自由党政府也试图保护儿童和老人。据学校教师反映:许多贫困家庭子女食不果腹上学。1906 年的教育法,为这样的孩子提供免费伙食。后来又通过法律,为孩子们提供游戏场地及免费检查身体,并且也努力为婴儿提供正当的医药照顾。1908 年的儿童法为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方便,从防止婴儿烧伤、矫正幼年犯罪直到禁止儿童吸烟。

老年人及病弱者的问题也基本获得解决。过去,年老体弱、生活不能维持者,通常按 1834 年的《济贫法》处置,即被从家中带走,送到可怕的劳动营中去,这是穷人的最后归宿。劳动营与其说是慈善机构,毋宁说是监狱。1906 年,议会中的工党议员要求国家为收入太少不能养活自己的一切老人提供津贴。内阁赞许这个建议,于是在 1908 年提出一个法案,对于每年收入不超过 105 美元的 70 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每周 1.25 美元的津贴。到 1913 年,大约有 100 万老人领取了这种津贴。

接着议会又处理失业问题。当时失业大军充斥着伦敦及其他城市,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1909 年的一项法案授权成立一个失业管理局,其任务是为失业者提供就业的信息,而且必要时,向失业者提供寻找职业所需要的车费。

1911 年,自由党人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提出《国家保险法》,内容有二:其一是工人每周应支付 2.5 便士,国家和雇主也出一部分钱,作为失业保险金,到失业时,失业者可以领取每周 6 ~ 7 先令。但是,这个办法只适用于土木工程及建筑行业,而失业工人当时达到 230 万人。该法的另一个内容是对于失去健康的人和生病者提供了保险。这直接涉及大约1 500万工人,间接涉及另外几百万人。该法要求工资劳动者每周支付 1 ~ 4 便士,雇主支付 3 便士,国家支付 2 便士。在这个保险法下,工人可以得到免费医疗,免费住院,而且在生病期间每周

领取补助金。

自由党政府也向不劳而获的财产进攻。当时英国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现象：10个大地主拥有伦敦市1/4的土地；在乡村，往往地主拥有全村的土地；地主可以任意拆毁茅屋，或者剥夺佃农的财产，或者把农田变为狩猎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农村人口减少600万人，而在过去60年内，猎场看守人从9 000人增加到2.3万人；农村工人中有60%每周领取的工资还不足18先令，而地租却不断上涨；大地主一般也兼房主，他们向贫穷的房客索取高额房租，而房客所住的房屋却十分肮脏、狭小，卫生条件极差。劳埃德·乔治决定改革这种不合理现象。1884年他成立一个委员会，责成它去调查研究这个问题。在给议会的报告中，该委员会证明：在城市及乡村普遍存在酗酒、生病、犯罪及死亡率高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贫民都拥挤在极不卫生的、阴暗潮湿的小屋里。根据这个报告，议会在1890年通过一项关于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法律。1909年又通过一个更为重要的法律：《住房与城市规划法》。这两项法律责成地方政府（郡议会）关闭潮湿的地下室，拆毁不透气的房屋，并且从地主手中购买土地，在其上为穷人建造光线充足的、干净和通风良好的住房。结果，到1914年为止，有56 318所房子被宣布不适于人居住；郡和城市议会购买20万英亩的土地；在伦敦有10万个租户住在由国家建造的清洁卫生的住室里。有几十个市镇制定了规划：美化城市，建造公园及游乐场。

英国的社会立法也涉及工会的权利。英国工会早在1825年就已合法化，但是它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1871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为了争取工人的支持，取消对工会的限制。可是，在企业主的要求下，又禁止工人在罢工时设置纠察队。很明显，这一规定对罢工斗争十分不利，因此工人为取消这项规定而继续斗争。1874年保守党在工会支持下竞选获胜，狄斯累利上台。1875年，保守党政府取消设置纠察队的禁令，但只允许和平纠察，对违反规定采取恫吓手段者处以罚款。

此后，英国工会大为活跃，它们一再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工会的活跃吓坏了统治集团，上院在1901年作出一个决议：雇主可以向工会索取赔偿，以弥补他们在工人罢工中所蒙受的损失。结果，罢工次数锐减。愤怒的工会便积极支持工党。为了绥靖工会，自由党政府在1906年通过《工会争议法》，取消了工会因工人罢工而向雇主赔偿损失的规定，并且容许工会“纠察队”使用“和平的说服”的办法，劝说同辈工人和他们一道参加罢工。

法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实行了如下社会立法：(1)1892年的法律对于工厂使用女工进行了管理，禁止工厂雇佣13岁以下的儿童；为所有工人确定了最大限度的工作时间——10小时；禁止在星期日从事体力劳动；对于在矿井中工作的工人的劳动作了详细的规定。(2)1893年又颁

布法律(1903 年又作了修改),为工厂中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卫生作了充分的规定。(3)1893 年的另一项法律保障了工人及其家属的免费医疗。(4)1900 年的法律要求工厂主为一切女工及童工提供座位,并且把许多工厂法扩大到零售商店。(5)1905 年的法律为矿工规定了 9 小时的最大限度的工作时间,1907 年的法律又把它缩短至 8 小时。(6)1884 年的法律承认工会为合法的组织,保护工会的活动。(7)1892 年的法律为劳资纠纷建立一个仲裁机构。(8)1898 年的法律要求雇主对于工伤的工人进行赔偿。(9)1911 年实行工人老年津贴制,包括家庭仆役和农场工人,费用由个人、雇主及国家三方面负担。法国当政的共和党人实行这些劳工立法,其动机是复杂的:第一,在共和党心中,一种正义感与功利主义交织在一起,他们认为实行有利于工人的立法,可以保障工人身体健康及心情愉快,这对于国家前途大有好处。第二,害怕社会主义,认为向工人阶级作出某些让步,可以防止工人倾向社会主义。第三,在与保王党人及天主教势力作斗争中,实行劳工立法可以得到工人的支持。

但是必须看到:欧洲诸国实行的劳工立法,局限性很大,劳动时间仍很长,工资仍很低,而且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突飞猛进、国民财富急剧增长的情况下,社会上仍有许多人过着赤贫的生活。

除了劳工立法外,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国家还对社会其他一系列领域进行了干预。

英国政府在 1860—1875 年间;颁布和执行一连串关于食品饮料标准、环境卫生、健康和居住条件的法令。在此期间,整个西欧及澳大利亚也都跟在英国后面颁行了类似的法令。在城市,这些社会立法的效果是惊人的。早在 1880 年,为消灭瘟疫、斑疹伤寒、伤寒、天花、霍乱、猩红热而开展的活动就获得成功,城市的卫生环境大大改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在 1870 年为 22‰,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下降为 18.1‰,到 20 世纪最初 10 年更下降到 15.2‰。在同一时期,平均寿命增长 10 年以上。相比之下,在落后的俄国,1890 年的死亡率为 35‰。

但是,欧洲诸国的这些社会立法只是零星地、断断续续地进行的。与此不同,在美国却形成一个改革运动——“进步运动”。

美国

到 19 世纪末,美国已经取得惊人的进步。西部开发已经接近完成,往日野兽出没、荆棘遍地的西部荒野,现在已经阡陌纵横、烟囱林立了。人口在过去 75 年,已由 500 万增加到7 600万;在 1850 到 1900 年的半个世纪内,国民财富从 70 亿增加到 880 亿美元。然而,国家的兴旺发达掩盖不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阴暗面:垄断资本在吞噬中小企业时,采取了血腥的手段;大资本家为了发财,不惜作出各种伤天害理的事;垄断资本贿买政府官员,盗窃国家资源。国家的开发也伴随着自然资源的浪费:森林遭到肆意砍伐,水利资源遭到任意破坏。美国虽然成为工业大国,但却仍然容许剥削妇女儿

童的现象存在，仍然忽视老弱病残者的困难处境。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占全国人口12%的人占有全国财富的九成。城市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问题：犯罪增加了，出现了贫民窟，环境卫生处理困难。奴隶制度虽然废除了，但黑人的低下地位成为美国文明的耻辱。贪污已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它毒化了整个社会政治的肌体。

针对这一大堆问题以及大量的丑恶现象，19世纪末和20世纪之交，在美国兴起了一个声势浩大、有声有色的“黑幕揭发运动”。这个运动的先驱者是亨利·乔治，他在1879年出版了《进步与贫困》一书。他在书中呼吁人们注意当代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在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情况下，贫穷却继续存在。他肯定资本主义的竞争原则，但是他反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贫困。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但是没有必要没收土地。他提出如下的消灭贫困的措施：对土地价值课税，以代替其他一切形式的税收。在他看来，征收这种单一税，就可以将劳动和技术所造成的土地价值的增长部分转交给国库，使政府成为“仅仅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管理公共财产的机构”。

继亨利·乔治之后，莱斯特·华德在1885年出版《动态社会学》一书。他将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区别开来，认为人类理智应该控制社会，不应该屈从于社会上各种不合理的力量。

但是，“黑幕揭发运动”正式展开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参加运动的主要是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报纸杂志，揭露出许多臭不可闻的丑恶现象，特别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各种犯罪行为。这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对垄断组织的罪恶行为的不满。

与“黑幕揭发运动”几乎并行的是“进步运动”，这个运动包括三个内容：第一，城市的改革运动。这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对垄断弊端的不满和改革的愿望。通过城市改革运动，实现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动的社会立法。到1916年以前，已经有30个州实行了关于工人工伤的赔偿的法律。1900年有4个州通过法律，禁止雇佣妇女作夜工。1907年俄勒冈州实行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的法律。1916年威尔逊总统批准了一项关于童工的法律，该法把雇佣14岁以下儿童作工的任何工厂的产品（或14～16岁的儿童每日工作8小时以上的工厂的产品）统统排除在州际商务流通之外，还禁止矿山雇佣16岁以下的儿童做工。马萨诸塞州在1912年制定《最低工资法》，该法授权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女工、童工的工资率。第二，拉福莱特在任威斯康星州州长时发动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反映了富裕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对垄断的不满。1905年威斯康星州议会在拉福莱特推动下，通过了《铁路委员会法》，控制铁路垄断的发展，强制铁路公司缴纳税款。1908年拉福莱特在州内征收累进所得税和累进继承税。他还在州内禁用童工，限制使用女工。由于他锐意改革，威斯康星成为全美的模范

州。第三，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推行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的改革愿望。罗斯福和威尔逊都不反对托拉斯本身，只反对托拉斯的不法行为及犯罪活动。他们把托拉斯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种，主张限制托拉斯“坏的”方面，而保存其“好的”方面。

罗斯福在其总统任期内做出的政绩，主要有三：一是反对托拉斯的不法行为。1901 年，摩根、洛克菲勒、希尔和哈里曼等垄断巨头联合成立北方证券公司，其目的是垄断铁路事业，抬高运费，制造社会混乱。1902 年 2 月 19 日，司法部长根据罗斯福的指示，以北方证券公司违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理由，对北方证券公司进行起诉。① 1903 年 4 月 9 日，明尼苏达地方法院判决解散北方证券公司。垄断巨头们不服从判决，又上诉到最高法院。1904 年 3 月，最高法院以 5∶4 票维护地方法院的裁决。这大大提高了罗斯福的威信，赢得了“托拉斯大克星”的称号。在他任内起诉的反托拉斯案件共有 43 起，但只是惩罚了少数行为恶劣的托拉斯。

1903 年 2 月，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成立商业劳工部，下设公司管理局，其任务是调查各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且有责任公布和提供有关公司的情报。该管理局调查了石油、包装、烟草、钢铁等企业，为反托拉斯的起诉提供了材料。这表明罗斯福和联邦政府有干预企业的决心。同年 2 月国会通过《埃尔金斯法》，禁止铁路擅自规定价格，对大托拉斯给予优惠待遇。国会还拨款 50 万美元作为推行反托拉斯立法的经费。

1904 年 12 月以后，罗斯福在数次发言中，一再强调加强政府监督所有企业、特别是铁路的必要性。1906 年在罗斯福的授意下，国会通过了《赫伯恩法》，授权州际商务委员会确定铁路最高运费。这个措施效果显著，到 1911 年，铁路运费减少一半。然而该法案未能抓住要害，因为它未授权委员会去估价铁路的财产及服务成本，而这正是确定合理运费的依据。只有到 1913 年才开始估价，而且只有 10 年后，才以估价为依据确定运费的数目。然而该法案的作用之大是不可否认的。无怪乎有人认为：《赫伯恩法》是联邦控制私人工业进程中的里程碑。

罗斯福反托拉斯的斗争，其目的并不是消灭托拉斯本身，而是整顿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因此他之反对托拉斯的斗争，对于整个托拉斯是有利的，而且对于中小资产阶级也起了安抚的作用。归根结底，有助于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罗斯福的第二个政绩是保护自然资源。早在 1873 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就

---

①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国会在 1890 年通过的，它规定：每一个采取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组织，而且目的在于控制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者，均是非法的；任何人，如果他独占或企图独占……州际或对外贸易的任何部分，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吁请国人注意森林资源的耗竭问题,但是只有到1891年国会才授权总统划定森林保护地。然而收效不大,砍伐的速度比植树的速度更快。所以罗斯福上台时,他仍面临严重的森林保护问题。他本人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对于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颇有认识。所以,他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保护森林而奋斗。他首先从国有森林中划定1.5亿英亩未出卖的森林,作为国家森林保留地,并且采纳参议员拉福莱特的建议,在阿拉斯加及西北地区划定8 500万英亩的森林作为森林保留地。由于发现几个庞大的盗窃集团,即铁路、木材公司及牧场主掠劫国家森林保留地的林木,总统在国会的授权下,把国家森林移交给农业部,在该部下面成立森林局,按科学方法进行管理。

罗斯福认识到,上述措施只不过是治标的办法,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提高广大公众的认识和觉悟,使保护森林的重要性家喻户晓。1908年5月,罗斯福主持召开政界、学界知名人士会议,讨论资源保护问题。会议还发表一个宣言,宣称:"保护我国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问题。"宣言还建议对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自然资源综合利用和保护。会后成立了一个全国保护自然资源委员会,参加者中,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各占1/3。

罗斯福还制订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灌溉规划,目的是向西部干旱不毛地区注入新的生命。1902年国会通过《新地开垦法》,它规定:从出卖国有土地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兴办灌溉工程,并且为此而成立一个开垦局。罗斯福也采取措施,制止私人购买水力资源地,并且创设5个国家公园、4个野生动物保留地、50个以上的野鸟保护地。

罗斯福的第三个政绩是在维护全国人民的卫生方面:加强管理食品和药品卫生。农业部的化学总工程师哈维·威利博士揭露,在罐头及加工的食品里面普遍使用防腐剂及搀杂物。《妇女家庭杂志》又揭露有毒的成药。1905年罗斯福要求国会采取行动。翌年国会通过《纯洁食品及医药法》,禁止食品公司及医药公司危害人民健康的行为。国会还在1906年制定《检查肉类法》,规定由联邦政府负责该项工作。

威尔逊和罗斯福一样,也举起了反托拉斯的旗帜。1914年1月20日,威尔逊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以监督托拉斯的活动。10月15日他签署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该法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补充,它禁止商业活动中的垄断行为,禁止大公司互兼董事,禁止在资产超过500万美元以上的银行中兼职等等。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共收到申诉案件2 000件以上,但是只处理了379件。政府解散了国际联合收割公司和玉米产品的精制公司,并且限制了斯威夫特、阿尔摩等5家大肉类包装公司的经营范围。这说明威尔逊并没有认真反对托拉斯,他只是反对少数有劣迹的大托拉斯而已。因之,他的反托拉斯的行为并未能阻止托拉斯的发展。

教育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社会调整也涉及教育。这是因为教育现状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要求。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特别重视教育,大力发展教育,而这正是这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成功的关键。

在英国,早期办教育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行政管理人才,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他们一般都在私立学校或教会学校就读。穷人子弟只能进慈善机构兴办的学校,而这类学校为数极少。因此,文盲充斥着英国社会。1870 年,入学儿童只为全部学龄儿童的一半。

到 19 世纪后期,英国开始丧失工业垄断地位,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美国、德国的挑战。这就迫使英国提高工业技术及工业管理水平,为此,就不能不发展教育以培养有文化有知识的工人、技术人才及工业管理人才。1870 年英国政府颁布《初等教育法》。它要求各地积极创办公立小学校,其经费来源有三:双亲的捐助,地方税收和政府补助金。在 1870 年以后,学校数目与经费逐年增加,到 1913 年,地方税收及政府补助金之用于教育者,超过3 000万英镑。1876 年,英国政府又对 1870 年法令作出补充,规定:送子女入初等学校是家长的义务,如家长未履行这项义务,必须受到处罚。生活贫困的家庭,可以从贫民保障机关领取补助金交纳学费。1880 年,议会颁布法令,正式规定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1893 年又规定,凡 11 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入学,等等。至此,英国义务教育制度形成。为弥补国家教育经费的不足,政府还鼓励教会和私人团体继续办学。

英国政府发展初级教育的政策到 20 世纪初大见成效。1913 年英国入学儿童已达到 650 万人。

与初等教育相比,英国的技术教育发展缓慢。1864 年,议会组织一个“中学调查委员会”对中等学校进行调查。1868 年,该委员会向议会提交调查报告,指出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建议广泛建立中等学校。这项报告在议会中未被通过,但推动了中等技术教育的改革。1872 年以后,政府对凡能开设 3 年自然科学课程的中等学校给予特别补助,以鼓励培养科技人才。这项措施促进了中等技术教育的发展。1889 年议会制定《技术教育法》,向郡议会提供基金,用于科学和技术教育。到 19 世纪末,英国的国民教育通过改革,基本上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法国,教育发展几起几落。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公社的教育改革措施随之被废除。1879 年以后,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为缓和国内矛盾,开始进行社会改革。1882 年的《教育法》规定,初等教育为免费的义务教育。同时宣布,由国家监督上层社会的家庭教育和中学预备教育。这项法令为法国以后百余年的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自独立以来,政府就特别关心教育。教育领导权属于

各州,由州教育委员会依照本州法律制定教育政策。《联邦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成为美国国民教育摆脱教会控制,朝着普及、世俗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根据。当然,美国早期的教育也带有贵族化倾向。可是,从19世纪50年代起,在德国教育制度的影响下,也走上了实行义务教育的道路。1852年,马萨诸塞州第一个制定《义务教育法》。内战后,义务教育发展尤为迅速。到20世纪初,各州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

为了培养高级科技人才,1862年林肯政府时期的国会制定《莫里尔土地法》,帮助各州发展高等教育。这项法令规定,联邦政府赠与各州大量国有土地,以便用出卖土地所得的收入,发展农业学院和工业学院。到19世纪末,联邦政府用于发展教育的土地,累计高达1.5亿英亩。《莫里尔法》公布前,州立大学很少,法令公布后迅速增加,对推动美国工农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1890年到1900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对教育增加补助。

美国的教育改革,成绩斐然。据统计,1870年至1900年,小学生人数由690万增加到1 500万。1900年,美国每1万人口中平均有大学生31.4人,把欧洲主要国家远远甩到后面。按照同一比例,德国有8.3人,法国有7.6人,英国只有6人。美国的教育不仅为经济建设及时准备了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而且也及时提供了大批科技人才,促使经济获得高速度的发展。

日本在发展教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明治维新的元老重臣都重视教育,把教育看做是立国之本。他们特别看重普及教育。1872年,文部省颁布了一个《小学义务教育计划》,规定儿童6岁入学,居民每600人就设立一所小学。当时日本经济落后、财政困难,但是当政者能克服一切困难去发展普及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年限最初只有16个月,到1880年增至3年,1886年又增至4年。1896年,全国受小学教育的儿童占学龄儿童的61%,10年后上升到95%。

普及教育及技术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对于工业化、现代化起了非常积极的、有益的作用。

综上所述,到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通过国家干预(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进行了社会调整。调整的范围甚为广泛,涉及劳工福利、社会全面福利,经济问题以及教育等领域。不容否认,这些社会调整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第一,劳工状况有了某些改善,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相比,在生活上得到了某些保障。第二,社会各阶层的居民在生活、环境、健康、教育等方面都得到一定的保障。但是必须看到,这些社会调整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的,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基础。这便是它的最大的局限性。而且,这些调整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享受小恩小惠的工人阶级满足于现状,失去了革命的远大理想,工人政党愈益倾向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妥协。

这种社会调整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造成社会不公

正及财产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而社会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是对低收入者的一种经济上的补偿，他们在得到补偿后，购买力提高了，社会需求增大了，这就刺激了生产，导致经济繁荣。市场经济所强调的是钱，而社会立法所强调的是人，实行社会立法就是对于市场机制的调节和补偿，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大有裨益。而且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社会立法有助于保障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减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归根结底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换言之，资产阶级国家通过社会立法对社会所作的调整，为资本主义注入了某些活力，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

此外，在美国，由大资本家、大富翁兴办的私人社会慈善事业，也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起到了与社会立法、社会改革相似的作用。垄断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惟利是图，损人利己，但是，他们中有一些人在发了大财之后，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兴办医院、大学、图书馆、公园以及各种文化学术基金会。这类例子很多。比如，美国钢铁大王安得鲁·卡内基在退休后，捐献巨额财产用于慈善事业，数额高达2.5亿美元，其中包括卡内基音乐厅和遍布全美的2 800个图书馆。还有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1901年，他捐款5亿美元，兴建“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1913年创建“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奖励科学文化事业。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关“福特基金会”，该基金会到1974年拥有20亿美元的资金。

这种私人慈善事业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资本主义统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

在19世纪最后30年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科学领域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政治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原来支配资产阶级思想界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流派，虽然还具有一定的势力，但它们的影响正日渐衰微，逐渐让位给一些新的思想流派。在这些新的思想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及以“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根据时代的变迁，提出一系列新的国家学说、价值观念及道德准则。虽然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学说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他们的思想都反映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

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在国际竞争中遇到美国和德国的有力挑战，因而从世界工业垄断地位上跌落下来。随着英国的这一变化，英国政治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反映自由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主义学说，这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以格林为代表的新唯心主义发展起来。新唯心主义大力强调扩大国家职能的重要性，反对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主张。格

林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社会,居于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之上,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新唯心主义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加强国家的职能,加强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愿望。

新唯心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其影响日益扩大。与新唯心主义不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向垄断过渡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要求。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出身于一个中学教师家庭,由于幼年体弱多病,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掌握了渊博的知识。1850年,他发表《社会静力学》一书,引起英国学术界的瞩目。他积30余年的精力,完成了多卷本的《综合哲学》。这部著作不仅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而且也使他一举成为英国当时最负盛名的大思想家。

斯宾塞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及行为准则,从而创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从生物学的角度,把人类社会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而不是像社会契约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许多单个个人的联合体。这个有机体凭借内在的生命,不断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向前发展,最终目标是一种理想的静止状态。一旦达到这种状态,社会进化停止了,人便会自动地做他应该做的事,而政府就会变成多余的东西而自行消失,人将得到最大的幸福。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这种理想境界,只有通过自然选择才能实现,即社会发展的规律同生物进化的规律一样,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他解释说,人们的素质不同,强者富有竞争力,善于适应环境,因而能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和有产者。弱者由于无能及懒惰而丧失竞争力,不能适应环境,只能变成贫穷的劳动者。强者荣华富贵、弱者贫贱枯槁都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这是"自然的严厉惩罚"。在这里,斯宾塞所阐明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道德原则。他说:"最大的善就是让社会进步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下去。"所以他主张,国家的社会政策必须承认和采纳生物学的"普遍真理",决不能"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他也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反对英国政府制定《济贫法》。斯宾塞的道德观,正像英国的一位批判者戴·里奇所指出的:"照自然选择来讲,道德无非就是'一事成则万事成'"。

斯宾塞又认为,人类社会是个有组织的社会,为了确保人类自然选择的顺利进行,政府应保障人们的政治自由。因为在他看来,政治自由能使人们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适应周围的环境。他提出:"每一个成熟的人自由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如果他不侵犯别人同等的自由。"这也就是斯宾塞鼓吹的"平等的自由法则"。在他看来,只有当人们在这一法则下充分享有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环境的最适应者。他认为,这不仅是维持社会进化的手段,也是社会进

化的最终目的。斯宾塞从维护个人自由的命题出发,又进一步论证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必需品,其职能就是对外保障其社会成员不受侵略,对内防止其社会成员互相侵犯,执行平等的自由法则。对自然选择的严酷性,国家无需干预,否则就是违反正义。他由此认为,包揽一切的国家职能是低级社会的特征,而自由放任、保障个人自由是向高级社会进化的标志。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新唯心主义更适合于资产阶级的需要。因为斯宾塞鼓吹的以自然选择为外衣的自由主义,只能有利于强者,即有利于向垄断阶段过渡的资产阶级。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他们可以自由地垄断生产和市场,自由地控制价格,自由地发展垄断组织而不受国家的干预。按照斯宾塞的学说,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吞并中小企业及掠夺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一点也不违反社会的道德准则。所以,斯宾塞的社会政治思想在英美等国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从斯宾塞的社会政治思想中,为自己的垄断行为找到了理论根据。无怪乎,美国钢铁业巨头卡内基写道:当他读过斯宾塞的著作后,就好像见到了"无限光明","不仅摆脱了神学与超自然的力量,而且还找到了进化的真理。"斯宾塞由此而名噪一时。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缺陷是很明显的。第一,他把自然科学的进化论不加变通地应用于人类社会,未免荒诞无稽了。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迥然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连资产阶级学者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华德曾批评说:不能简单地把生物学的真理搬到社会科学中来,自然界的规律并不就是人类的规律。第二,他把人类社会的未来说成是一种静止状态,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臆测。以这种毫无根据的假说为前提来论证社会进化,是难以站住脚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及文化知识的不断扩大,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非科学性就更加明显了,到 20 世纪初就逐渐衰落下去。

如果说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还能领略到一丝一毫的自由主义说教的话,那么在尼采的唯意志论中则只能看到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和侵略哲学了。

尼采的唯意志论

弗里德里希·威·尼采(1844—1900)是德国思想家,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他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传教士家庭。1864 年进波恩大学学习神学,不久,改攻古典语言学。1869 年还差一年毕业就被瑞士巴塞尔大学聘为教授,讲授古典语言学。1879 年因患精神分裂症辞职,专门从事于写作。他一生出版大量著作,其作品多以文学形式寄寓他的思想。最能反映他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等以及死后由其妹伊丽莎白整理出版的《强力意志》。

尼采在青年时代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影响。阿图尔·叔本华

(1788—1860)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生命意志说”。他认为,“意志就是宇宙人生的本质”。叔本华所说的意志,不是心理学中人为了达到预定目的而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盲目的、求生存的生命冲动。因为在他看来,意志的基本特点是求生,即维持生存,延续生命,所以他把意志称为“生命意志”。他认为,世界处于一种由意志缘起的互相争斗的悲苦状态。人类意志的本性造成人生的痛苦和灾难。因为在叔本华看来,人是性恶的动物,是残酷而怯懦的利己主义者。人的盲目的意志具体表现为欲望。欲望得到满足前是痛苦,得到满足后又陷入空虚和烦恼,这也是痛苦。欲望无穷无尽,痛苦也无止无终,人的一生就是在痛苦中挣扎。他认为,人若要摆脱痛苦,根本的途径是否定意志,因此他主张“忘我”。叔本华的“人生痛苦论”,是受佛教的影响,也反映了遭受封建势力打击的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废情绪。

尼采虽然十分崇拜叔本华,但不满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主义倾向。因为在他看来,“生命意志”不是盲目的欲求,而是生生不息的创造。所以,他抛弃“生命意志”说,创立了“强力意志”说。但是,他与叔本华一样,也是从生物学角度阐述强力意志是世界本质思想的。他认为,强力意志是生命本能的冲动。在生物界表现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人类则“分化为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听命者)和主子的意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意志到意志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因果关系。”他把意志看作世界上决定一切的力量。

他提出“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对一切传统观念都提出挑战,并展开猛烈的批判,而其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基督教道德。他集中火力抨击怜悯和“原罪”说。他认为,怜悯压抑活力,阻碍人们奋发。他说:“当我们感到可怜的时候,我们的力量便被剥夺了。”而“原罪”说宣扬人人有罪,使教徒们处于郁闷的负罪感中,变成谦卑、顺从的羊群,从而使生命本能衰落。所以,他称基督教道德为奴隶道德。为了彻底摧毁奴隶道德,他公开宣称:“上帝死了!”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奴隶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传统价值赖以存在的基础。只有推翻上帝,基督教奴隶道德价值才会崩溃,新的道德价值观才会产生。他从否定基督教道德出发,进而否定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他反对民主自由,攻击社会主义思想。他机械地、绝对地否定一切,其性质比被否定的东西更加落后。尼采否定上帝与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否定上帝不同。他是站在利己主义立场上,根据他的生命意志论的要求去否定上帝的。

尼采否定旧道德的同时,积极鼓吹新道德,即所谓“自主道德”。在他看来,自主道德与奴隶道德贬抑人性相反,而是肯定人生,激励人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但是,尼采又认为,旧道德崩溃后不会自然地产生新道德,只有等肩负这一

历史使命的超人出现后，才能实现。他认为，一般人都是凡夫俗子，生命本能普遍衰落，仅是“系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只有超人才能体现强力意志，创造一切。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超人呢？尼采说：“人有高低之分，一个个人可以使千年历史生辉——这就是说，一位充实、丰富、伟大而完全的人，要胜过无数残缺不全的、鸡毛蒜皮的芸芸众生。”尼采又指出，超人不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是当人具备超越的潜能，完全掌握自我，创造自身价值时出现的。古今都有，像古罗马的凯撒、法国的拿破仑。尼采的所谓“超人”，实际上就是那种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残暴的统治者。他主张“超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强力意志，可以使用强暴、说谎、诽谤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尼采还提出“超人”应具备的品格：不畏强暴，不受道德原则的约束，独来独往，傲视一切。“超人学说”是尼采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相比，尼采的“超人学说”的确具有独创性，但它仍没有越出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

尼采的“唯意志论”赢得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热烈喝彩。这是因为：第一，德意志统一的成功，推动着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到19世纪末，民族主义狂热与容克资产阶级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渴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浓烈的扩张侵略欲望。尼采的思想正好表达和激励了容克资产阶级的这种欲望。第二，尼采的著作充满着格言警句，议论放逸迈俗，大部分作品又是在患精神分裂症之后完成的，态度狂傲，言辞激烈，因而吸引了众多读者。1890年，尼采精神完全失常后，声誉大振。其学说广为传播，成为欧洲当时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主义在德国崛起后，又把尼采的唯意志论奉为德国的官方理论，作为煽动民族复仇情绪，鼓吹对外侵略的思想武器。其结果为人类带来浩劫，可见尼采思想的流毒之大。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流派
德国的历史学派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发生的变化更为深刻。许多新流派相继出现，它们标新立异，提出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和奥国的“奥地利学派”。

到19世纪中叶，在经济学界居支配地位的仍旧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和斯密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他认为，经济自由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因此主张让资产阶级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他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斯密的这一学说经过李嘉图的阐释及发展，在英法等国广为流行。

德国的经济学家曾试图把“古典学派”的理论应用于德国，以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德国经济落后的面貌。但是，这一努力失败了。这是因为德国

是后起的国家,它所面对的是经济先进的英法国家,如果采纳古典学说,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在自由竞争中,德国的经济必然要被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扼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出现了"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1817—1894)。1843 年,罗雪尔出版《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一书,这部著作被德国经济学界称为"历史学派"的纲领。1854—1894 年,他出版了 5 卷《国民经济体系》。这部巨著是罗雪尔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 19 世纪后半期和 20 世纪初期在德国经济学领域里影响最大的一部书。罗雪尔在该书的第一卷中建立了"历史学派"的基本理论体系。

罗雪尔否认"古典学派"关于经济发展存在着普遍规律的观点,也反对他们的方法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一门论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诸规律的科学,或它的国民经济生活的科学。"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只有密切地结合政治史、法学史、经济学史和文明史,才能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发展的特点。他说:"只有从历史的类比中获知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线索。"换言之,他根本否认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而把政治经济学仅仅归结为对经济发展过程作经验主义的观察和描述。所以,他称政治经济学为"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的方法"。

除罗雪尔之外,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还有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和卡尔·克尼斯(1821—1898)。"历史学派"的经济理论是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一目标服务的。他们从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状况出发,竭力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认为国家应当干预经济生活。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积极主张,德国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反对自由贸易;积极鼓吹,用国家的力量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由于"历史学派"着重于经济现象,所以他们的经济著作都是大量历史资料和历史文献的堆砌。他们力图通过记述历史现象,追踪经济发展的轨迹,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不容否认,这些著作搜集的丰富资料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由于他们未能科学地分析这些资料,因此不可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罗雪尔就曾经荒谬地认为,在亚当时代就存在资本,原始森林中就有无产者。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阶级关系也出现新的变动。德国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继承和阐发"历史学派"的理论观点及研究方法,他们更注重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这样,旧"历史学派"发展为"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有古斯塔夫·施莫勒(1838—1917)、路德维希·布伦坦诺(1844—1931)和阿多夫·瓦格纳(1835—1919)。他们针对当时德国严重的劳资关系问题,特别强调了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他们

认为，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伦理道德因素。生产、分配、分工及交换不仅是经济范畴，也是道德范畴；经济组织和制度只不过是伦理道德规律所制约的一种秩序。他们甚至认为，工资也属于道德范畴，因此在他们看来，经济问题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不是基于社会经济关系，而是基于道德关系。所以他们提出，劳资关系问题可以根据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标准，通过改良加以解决。

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特别强调了国家的决定性作用。施莫勒说："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瓦格纳也认为：国家是集体经济的最高形式。凡是依靠个人达不到的目标，理应由国家承担。但是，他们强调的国家不是具体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是抽象的、超阶级的国家。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一种在人们之间比经济关系更为基本的道义的结合。由于国家拥有这种超越的地位，应该发挥它干涉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主张由国家制定各种社会政策，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并缓和紧张的阶级关系。他们的社会政策包括：制定工厂立法，颁布劳动保险、工厂监督、孤寡救济等法令；实行河流、森林、矿产、铁路及银行等资源和企业的国有化；限制城市土地私有制；改革财政赋税制度等。为了实现他们的社会经济主张，"新历史学派"于 1873 年发起成立"社会政治学会"，通过这个学会，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由于他们大多是教授，经常利用大学讲坛宣传他们的社会经济主张，并给他们的主张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因此他们的学说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因为"新历史学派"的主张中含有要求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赞成工人成立工会的具体内容，又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最初曾引起德国统治阶级的怀疑和反对。但是，德国统治阶级很快认识到"新历史学派"的学说对巩固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于是转而接受了他们的理论主张，并从 80 年代起付诸实施。俾斯麦就曾亲自对施莫勒说过，他自己实际上是个社会主义者，只是没有时间从事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而已。

由于"新历史学派"积极地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并获得容克资产阶级的支持，所以他们的理论在德国经济学界占居支配地位达数十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的失败，"新历史学派"才由盛而衰。但是，他们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它在美国演变为"制度学派"；在德国，则成为纳粹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奥地利学派

70 年代初，正当"历史学派"的学说从德国向外扩散之际，以卡尔·门格尔（1840—1921）为首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起来捍卫"古典学派"的学说。他们指责"历史学派"轻蔑地抛弃了"古典学

派”的基本原理，降低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他们自诩为“古典学派”的继承者，反对“历史学派”用经济史、统计资料及经济政策取代理论经济学，主张建立纯粹的经济学。他们在与“历史学派”的论战中，形成了独立的“奥地利学派”，又因为他们先后都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

“奥地利学派”反对“历史学派”的学说是必然的。因为奥地利的情况不同于德国，奥地利是个统一的帝国，国内不存在关税壁垒和市场分散等问题，横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以半封建大地产为主要形式的封建残余。因此，奥地利经济学界易于接受“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的思想，排斥“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主张。

但是，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古典学派”的理论已不能全面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因为他们侧重于生产，仅强调了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奥地利学派”则根据新的经济形势，把重点放在市场方面，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是门格尔在其《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而在庞巴维克的《资本与资本利息》和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等著作中进一步完善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英国、瑞士的经济学派几乎与“奥地利学派”同时提出了这一理论。但是，他们的阐述不及“奥地利学派”完整，其影响也比“奥地利学派”小得多。

“奥地利学派”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普遍的规律，主张用抽象的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概括。但是，他们的方法论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个人的心理动机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起点，认为社会经济生活就是人对物的欲望以及满足这一欲望的活动。他们抓住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分析物品的价值以及价值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转化的全过程。他们认为，物品的价值起源于效用。但是，他们所指的效用不是物品本身的客观属性，而是指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人对物品最后亦最小的欲望为边际欲望，物品满足边际欲望的能力就是它的“边际效用”。他们认为物品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该物品边际效用的大小。他们还把稀少与效用结合起来，认为边际效用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随着物品数量的减少而上升。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限量提供的水没有什么价值，稀少的钻石则具有很高的价值。稀少和效用成为决定物品价值的前提条件。

“奥地利学派”利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来说明生产、分配及消费领域里的经济现象，并且藉以论证经济生活中价值转移的规律，都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所说的欲望和效用都是心理因素，是无法衡量的。他们的谬误在于把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当作判定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割断了价值与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价值由经济范畴变成心理范畴，也抹煞了价值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尽管“奥地利学派”一再声称自己是“古典学派”的继承者，但二者之间存在

着重大的原则区别。“古典学派”的学说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并进而揭示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因此它具有科学的性质。“奥地利学派”则只强调纯理论研究,企图用人与物的关系掩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这就充分暴露了它的庸俗性。由于“奥地利学派”不仅公开表明它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而且还以比较通俗的方式阐述他们的理论,所以他们的学说在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 世纪末前后 40 年中,他们的学说一直支配着奥地利的经济学界,同时也为英美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接受,构成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基础。

四、欧美工人运动·第二国际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

19 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飞速发展也伴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人人数猛增。美国产业工人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只有 150 万,19 世纪末已达到 750 万;德国 1882 年有工人 730 万,到 1895 年达到 1 020 万;19 世纪末英国有工人 1 430 万,法国为 380 万,俄国近 200 万。在日本,1888 年只有产业工人 13.6 万人,1899 年增至 142.6 万人。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成为人数最多的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已从追求绝对剩余价值,转为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明显改善。这一时期,工人大批集中在大企业里,在现代化管理下进行生产劳动,所以组织性更强了。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由于各国实行了自由主义的改革,使工人阶级获得了长期以来所努力追求的许多最基本的政治和民主权利,从而有利于各国无产阶级开展各种合法的斗争。第二,罢工运动的次数增加了,规模扩大了。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一度处于低潮。但是各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克服了暂时的困难。从 70 年代起,各国的工人运动又重新恢复起来,80 年代后期达到了高潮。工会运动普遍兴起,1889 年,欧美有 13 个国家建立了全国性或地区性的行业工会,仅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会联合会就拥有近 24 万人,英国全国矿工联合会、美国劳联也是影响很大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的建立有效地领导了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德国在 70 年代发生了 840 次工人罢工,80 年代达 1 862 次,德国在《非常法》时期有 15 万工人参加罢工。美国在 1882—1887 年间发生了5 237次罢工,罢工人数为 80.1 万人。规模最大的是 1886 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罢工,发展为全国总罢工,共有 35 万工人参加。这次罢工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俄国在 1881—1886 年间发生了 348 次罢工。在第二国际领导下,世界各国工人每年都组织纪念“五一”的示威,“五一”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节日。许多地方的罢工工人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而且有的罢工运动获得丰硕成果。如美国 1886 年

大罢工中，一部分工人争取到8小时工作日。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及各国工人政党的普遍建立。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为在工人队伍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工作。当时《共产党宣言》已有12种文字出版，他们为《共产党宣言》的各种文本写了序言，努力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还根据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状况从理论上予以指导，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及制定纲领和斗争策略，德法等国工人党的建立是与他们的活动分不开的。

德国在统一运动中出现的两个工人政党——拉萨尔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到1875年合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它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尽管有拉萨尔派的倾向。合并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年之内党员数目就从2.5万人增至3.8万人。党积极参加竞选，获得大量选票，1884年得票54.9万张，在帝国议会中取得24个席位。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吓坏了德国统治集团。1878年颁布的《非常法》，旨在取缔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此后，工人的一切自由权利都被剥夺，大批党员遭到逮捕或放逐。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惊慌失措，他们甚至宣布解散党。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逐步纠正了错误，采取了把地下活动与合法斗争结合在一起的策略，并且一方面照旧参加议会选举，另一方面积极领导罢工。结果，党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大。由于感到《非常法》无任何效果，议会在1890年否决了俾斯麦提出的延长《非常法》的法案。

但是在《非常法》废除、党取得合法地位后，党内改良主义倾向增长了。1891年夏，在爱尔福特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即《爱尔福特纲领》。该纲领虽然也以社会主义作为斗争目标，但是在方法上主张走和平道路。

在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其他国家也纷纷成立了工人政党。

法国工人党是1879年成立的，党纲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制定的。但是在建党后不久，党内出现了两派：以盖德和拉法格为首的“正统派”和以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前者坚持原来的纲领路线，后者幻想和平过渡。1882年二者分道扬镳，正统派维持原来的工人党名称，可能派另组“社会革命党”。工人党声势越来越大，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1893年在众议院中得到12个席位。胜利冲昏了盖德等人的头脑，工人党不久就蜕化为改良主义政党。

英国在1884年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名曰“费边社”，这是一群知名学者和作家创建起来的，其中有著名剧作家肖伯纳、工会活动家韦伯夫妇。这个团体主张采取“社会主义浸润自由主义”的办法，缓慢地进入社会主义。“费边社”是一个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团体。参加费边社的也有工人。1893年英国工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独立工党”，其纲领把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作为

斗争的最终目标，并且把争取8小时工作制作为最近的斗争任务。在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改良主义政党。

美国也产生了工人组织和工人政党。"劳动骑士团"创建于1869年，它是由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的，它强调工人队伍的团结一致，并且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斗争的最终目标。但是它也倾向于采用和平手段达到这个目标。因此，到80年代后，它的威信愈益低落。70年代罢工斗争的发展，也促成了工人政党的成立。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一些国际会员在费城集会，决定成立美国工党，后来又更名为"社会主义工党"。最初，它在左尔格和魏德迈等人的领导下，把第一国际的原则写进纲领中去。但是一方面，由于拉萨尔主义者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党内终于占了优势；另一方面，党只在德国移民的小圈子内活动，所以这个党逐渐远离了工人运动。在80年代后期，"美国劳工联合会"成为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881年，是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它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在其存在初期曾对美国工人的团结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后来在龚伯斯的领导下失去战斗性，主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

19世纪后期，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工人政党和工人社会主义团体。荷兰在1870年、丹麦在1871年、捷克在1878年、西班牙在1879年、波兰和意大利在1882年、比利时在1885年、挪威在1887年、奥地利与瑞士和瑞典在1889年，都相继建立了工人政党。俄国在1883年成立"劳动解放社"，领导人是普列汉诺夫。"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总之，当时在欧洲，"到处都在形成就其主要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构，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挑选和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的过程，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①

正当各国纷纷建立工人政党、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马克思积劳成疾，于1883年3月14日溘然长逝。马克思的逝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巨大损失。噩耗传出后，各国工人无不以悲痛的心情哀悼这位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其未竟事业。恩格斯为了从理论上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做了大量工作：1885年和1894年，他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三卷；1884年，他写出了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写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光辉著作。除了进行理论工作外，恩格斯还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889年他组织建立了著名的第二国际，使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7页。

如上所述,19世纪后期,欧美工人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欧美各国当中,只有德国工人运动最为发展,德国党最为活跃。因为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最为发展,主要是因为:第一,德国在统一后,无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工人人数占总人口的1/4,他们深受普鲁士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因此革命觉悟很高。第二,德国工人党不断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帮助。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走在最后面的是美国工人运动,这是由美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美国内战后,工业资本主义有了蓬勃的发展,这就为工人就业提供了很多的机会。美国工人的工资也比欧洲更高,因此容易满足于现状,缺乏远大的革命理想。这就决定了美国工人政治和组织均缺乏战斗精神。同样重要的是美国西部开发吸引了东部的不满的工人,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但是,即使在工人运动最为发展的德国,工人运动也没有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迷信普选制,迷信议会斗争,幻想在容克统治下的德国实现社会主义。因此,19世纪后期欧美工人运动整个说来处在低潮。这主要与时代特点有关系。如前所述,在这个时期最发达的欧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一些对工人作出让步的社会立法,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起了"安全阀"的作用。

第二国际的成立

进入80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各国工人及其政党都有加强国际工人团结的愿望。188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圣加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要求在近期内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法国工人党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是恩格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他特别反对在这一问题上操之过急。他认为新的国际必须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必须经过努力和斗争,使马克思主义者能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划清界限,以便使新的国际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仍集中精力帮助各国党批判机会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使新国际的建立刻不容缓了。1888年,法国的可能派、英国工联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及美国的劳动骑士团等组织,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世界工人代表大会"。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成立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希望藉此来夺取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他们决定翌年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新国际。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此认识不清,对"可能派"的倡议感兴趣,停止了正进行筹建新国际的工作,而同"可能派"谈判,主张参加他们召开的代表大会。而法国的盖德派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行动迟缓。为了使他们的这一做法落空,使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正确路线发展,恩格斯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及法国盖德派进行了批评。恩格斯指出:

"可能派奔走张罗，而我们的人却在睡大觉。"①恩格斯敦促法国的盖德派发起召开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恩格斯满腔热诚地投入到大会的筹备工作。

1889年2月，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蔡特金及法国的盖德、拉法格等人在荷兰的海牙开会，决定于7月在巴黎与可能派同时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18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这天在巴黎同时召开了两个对立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出席可能派召开的大会人数达550人，但其中法国代表就占了477人。相比之下，出席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大会代表393人，来自22个国家，其中包括许多国际著名的工人领袖和活动家，如德国党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伯恩施坦、蔡特金，法国的瓦扬、盖德、拉法格，奥地利的阿德勒，英国的艾威林、凯尔·哈弟，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德，荷兰的纽文胡斯和匈牙利的弗兰克尔等。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代表中有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大会进行得十分隆重，气氛热烈，讨论了许多问题，并且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国家的代表主张同可能派召开的大会"不惜任何代价地"合并。但因种种原因，两个大会的合并未能实现，这不能不使国际工人运动蒙受巨大损失。因为可能派和英国工联各自拥有人数众多的工人，合并的失败影响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分散了工人队伍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巴黎大会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靠劳工的经济组织（工联和工会）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决不与其他政党妥协的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只有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共同努力，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之后，劳动和人类才能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在有选举权的国家里，应当"利用自己的投票权竭力在现存制度下夺取政权"。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在1890年5月1日组织游行。

第二国际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活动形式上都可以说是第一国际的继续和发展。第二国际的中坚力量都是第一国际的骨干，活动形式也是以召开代表大会为主。但是在组织形式上，两者却有显著的区别：第一国际实行了较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第二国际则是一个没有中央领导机构的松散的联合组织，一切国家的任何工会、工人党及社会主义团体都可以参加代表大会。第二国际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正式章程、机关报，也没有统一的纪律。1900年成立了社会党国际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8页。

局，选举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王德威尔德任国际局主席。但国际局也只是各国党的通讯联络和统计中心，对各国党没有组织上的约束力。第二国际的这种组织特点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造成的。这时期各国工人阶级均先后成立了自己的政党或组织，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各国党需要根据本国情况，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和策略。马克思主义此时也已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许多国家的党的领导人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党的战略策略。这些情况就使第二国际在组织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自愿联合、共同讨论、自由协商、独立自主。

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二国际在成立大会后到 1900 年共召开了 4 次代表大会，即：1891 年的布鲁塞尔大会、1893 年的苏黎世大会、1896 年的伦敦大会及 1900 年的巴黎大会。这些大会讨论了与欧洲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劳工立法问题、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问题、军国主义问题、斗争的目标和策略问题、民族殖民地问题以及土地问题等等。这几次大会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并且为实现劳工立法而斗争等等。

但是，几次大会的基调都是通过议会斗争以实现工人阶级的统治及社会主义，而忽略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倾向的明显表现。在 1891 年布鲁塞尔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用经济总罢工代替政治斗争。这种错误主张在大会上竟无人从原则上予以反驳。在 1893 年苏黎世大会上，机会主义倾向也很严重。在讨论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时，德国代表李卜克内西等人竟拒绝在士兵中进行工作，他们还反对军事罢工。在讨论关于“五一节”问题的决议时，倍倍尔还建议把决议中的“社会革命”改为“社会改革”。大会虽然在决议中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是没有把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

第二国际创立后，恩格斯继续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以便指明工人运动的方向。1891 年他在发表了马克思的遗著《哥达纲领批判》之后，又写了《法德农民问题》、《〈法兰西内战〉导言》和《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等三篇重要文章，对于工人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进一步阐述了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

恩格斯出席了苏黎世大会，当时他已是 72 岁高龄，但是他仍精神饱满地在大会上致辞。他警告：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不能对议会主义及政治改革做过高的估价。恩格斯在这些年里坚持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工人阶级如果没有独立的政党，如果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就在为工人事业而进行的长期不懈斗争中，恩格斯不幸在 1895 年 8 月 5 日因病与世长辞。

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越来越公开大胆地宣扬他的观点。从1896年起，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他又把这些文章合成一书，在1899年夏出版。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他认为：在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有了蓬勃的发展，与他的生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当代的重大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予以“修正”。他的观点有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社会不是愈益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而是出现了新的中间阶层，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复杂化了，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本身包含了缓和阶级对立的因素，因而不可能出现革命形势。由于托拉斯、卡特尔垄断组织的出现，由于信用制度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适应性”，有了“更长的寿命和弹性”。

第二，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他说：“100年以前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胁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只有用暴力才能打破，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在政治上实行民主，“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特权将逐步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的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少。”“各种自由制度，正是在它们具有伸缩能力和进化能力这一点上同封建时代的制度绝对不同，因此这些制度不应加以破坏，而应使之继续进化。”他还说：“实行普选制就意味着议会制度的民主，”社会民主党只要“以普选权和民主为基础”，争取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还说什么在当代军事技术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武装起义已不可能取得成功。他反对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即恢复封建专制制度）。

第三，幻想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伦理上的”理想，只是人们无法实现的幻想。他提出一个口号：“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其实他的真实思想是：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中一点一滴地生长出来。他认为：只要坚持渐进的、和平改革的策略，就可以促使资本主义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修正”。他说纯粹的唯物主义和纯粹的唯心主义都是“宿命论”。他主张回到康德的哲学以代替唯物主义。他提出社会发展的“二元论”：社会发展不仅取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且也取决于“人本身的性质”、“人的精神素质”等“非经济因素”。他也反对辩证法，说它是认识真理的道路上的“陷阱”，是“马克思学说的最致命之点”。他企图证明

“社会只有缓慢的进化”，而没有“飞跃”。

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日益占统治地位，许多国家的工人党注重于合法斗争，尤其是迷恋议会斗争，忽视了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少数人（主要是党和工会的官僚）更热衷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当官或当议员。

机会主义的泛滥固然与恩格斯的逝世有关，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应该到19世纪后期的社会生活中去找。

主要原因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及社会立法，对于工人阶级有较大的诱惑力。各国党在长期的合法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党内许多人认为通过和平改良途径和议会斗争，无产阶级也能夺取政权。其次是无产阶级队伍本身发生了变化，许多小生产者在这期间大批破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传统习惯和思想等影响了工人群众，思想呈现了“多元化”，而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占统治地位，因此导致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队伍中泛滥。

修正主义思想的出现，引起了工人队伍中间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引起国际内部的激烈斗争。德国党内围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右派有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德国右倾机会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及英国工党分子等等。他们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考茨基和英国的麦克唐纳等人。左派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首。他们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时，左派依靠群众运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并积极为之准备，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左派在理论上还不成熟，不能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从理论上阐明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纲领和路线，斗争策略也不灵活，因此在工人群众中影响不大。

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这一事件，引起国际工人运动处于混乱和分裂的边缘。法国党分裂成以盖德和瓦扬为首的“反入阁派”和以饶勒斯为首的“入阁派”。在1900年巴黎大会上，第二国际内部展开激烈的争论。由于国际领导人考茨基起草了所谓的“橡皮决议案”，即国际代表大会不对此发表意见，才暂时防止国际分裂。但裂痕已深深存在于各党内部，分裂和解体只是迟早的事了。

第二国际的成就

尽管存在上述严重问题，但总的来说，第二国际这个时期的活动成绩仍是主要的，是其短短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其成就主要有：

第一，促进了更多的国家建立工人政党。在国际影响下，匈牙利（1890年）、俄国（1898年）以及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均先后建立了政党。仅

1896 年就有 30 个国家建立了工人党，拥有党员 30 万人。英国工党也是在第二国际的强大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第二，推动了议会斗争。在第二国际的号召下，各国党大多数能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揭露资产阶级，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各国党利用普选权展开竞选斗争，使众多的工人代表被选入议会。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0 年得票 142.7 万张，在议会获得 35 席；1893 年达到 179 万票，44 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法国，1893 年社会主义各派力量得票 50 至 65 万张，其中工人党得票 25 万张，当选议员 50 人。在 1896 年市政选举中，社会主义各派在 150 个市获胜，在 75 个市初次当选。比利时工人党 1894 年得票 35.5 万张及 28 个议席。意大利社会党 1897 年有 20 人当选为议员，1900 年增至 33 人。其他欧洲国家均有工人代表选入议会。仅 1894 年，欧洲各党就获选票 282.7 万张，仅 7 个主要欧洲国家就有 134 人当选为议员。由于各国党在选举中表现出的强大力量，迫使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作出让步，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如：德国议会 1891 年颁布实行劳动保护的《工商业法规补充条例》；1899 年废除《苦役监禁法》，并废除限制罢工的法令。德国党最大的成就是 1890 年迫使议会废除了《非常法》及 1895 年否决了《反颠覆法》。其他国家也通过了许多改善人民经济状况的立法。除此之外，各国社会党还利用议会进行反对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投票反对延长兵役期、扩大军事预算及其他扩军备战的措施。

总之，第二国际各党在议会的活动，对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以及促进这些国家政治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并为 20 世纪初工人运动取得更大成就铺平了道路。

第三，推动了各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各国工会有了新的发展。德国工会会员人数从 1890 年的 28 万人增至 1900 年的 68 万人，1893 年意大利工会已拥有 30 万成员，英国工会会员到 1900 年达到 197.2 万人，美国为 80 万人。苏黎世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决议，于是国际性工会组织陆续建立，到 1896 年为止，共成立了 134 个行业性国际工会。在此基础上，1901 年 8 月 21 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国际工会代表大会，1902 年正式宣告成立“国际工会”。其次，合作社有了发展。除工会外，各国还建立了许多合作社。1895 年，比利时建立了 500 多个合作社，向工人提供福利服务。在比利时的带动下，法国各地也纷纷建立工人合作社。1895 年成立的“社会主义消费合作社交易所”，就拥有 942 个合作社和 30 万个会员。合作社用部分利润为工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低价药品，还为社会主义宣传提供资金。英国合作社到 1900 年已发展到 2 000 个，会员 170 万人。在 90 年代中期，合作社运动开始向国际联合方向发展，1895 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拥有 10 个国家作为成员。再就是工人罢

工规模更大，水平提高。在第二国际的号召下，各国无产阶级每年都在5月1日举行游行和罢工。1890年5月1日，欧洲北美（甚至还包括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的工人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一天，恩格斯兴奋地写道："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①1891年"五一大游行"声势更加浩大，仅伦敦就有50万人上街游行。以后每年5月1日，都有大规模工人游行发生，遂成为惯例。"五一游行"是世界无产阶级统一的联合行动，千百万工人卷入游行示威，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五一国际劳动节"从此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共同节日。

各国工人90年代的罢工规模也很大。德国1890年发生了128次罢工，2.1万人参加；1900年有852次罢工，11.6万人参加。法国1890—1895年有9.2万工人罢工，1900年达到22万人，1898年仅巴黎便有10万人罢工。比利时仅1893年就有25万人罢工，几乎席卷了主要矿区和城市。英国1890—1896年共发生罢工5 801次，参加者246万人，仅1893年煤矿大罢工就有20万人参加。美国1890—1896年发生了10 142次罢工，参加者257.6万人。

第四，社会主义运动冲出了欧美。在第二国际的影响下，国际工人运动向宽广方向发展，已冲出了欧美地区，广泛渗入到拉丁美洲、大洋洲和亚洲。在这些地区，工人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

在拉丁美洲诸国，19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大工业纷纷建立，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到19世纪末，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扩大，工人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组织。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出席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890年阿根廷工人响应国际号召，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拉美历史上第一次五一示威游行。1896年阿根廷社会党成立并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智利1897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协会，1897年底建立了智利社会党（1900年改名为民主党）。巴西在1895年也举行了五一游行。乌拉圭、巴西还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古巴则在民族独立斗争中成立了社会主义小组。

在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开始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尤其是1890年剪羊毛工人与海员的大罢工之后，社会主义影响开始扩大，一些工会组织参加了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联盟。1892年各地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在悉尼成立了澳大利亚社会党，参加了第二国际。

在亚洲，日本在90年代的工人罢工中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工会联合会和社会主义小组，并同第二国际建立了联系，酒井雄三郎还代表日本社会主义者参加了布鲁塞尔大会。1898年片山潜在日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巨大努力。后来他参加了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成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第二国际与中国也发生了联系和交往。1889—1890 年中国上海的《万国公报》及 1896 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均报道过第二国际的活动情况及欧美工人运动的新闻,还翻译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梁启超和孙中山还曾赴美英等国访问,考察了解当地的工运情况,开阔了眼界。孙中山还同英、法、俄、日等国的工人党领导人有过交往,这些交往对孙中山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从第二国际文献及活动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用社会主义理论充实、完善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为中国革命争取到了第二国际的宝贵支持。同时,第二国际对中国革命也十分关注。国际局及各国党多次发表宣言或决议,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如:德国党领导人在议会及各种集会上,都猛烈抨击德国侵占胶州湾及参加八国联军的侵略行径,声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李卜克内西还曾富有远见地指出:亚洲将会迅速觉醒,中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的转折"。总之,在此期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志士仁人和革命家在第二国际的影响下,开始从一个新的高度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

五、1871—1900 年的国际关系

三皇同盟

普法战争后,欧洲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一方面,法国的惨败使它失去了在西欧和中欧大陆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德意志帝国崛起,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从而打破了原先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建立起来的欧洲均势,使大国之间的不信任和猜疑加深。俾斯麦对当时欧洲国际关系作过一个比喻,说欧洲大国像挤乘在同一辆马车里的陌生旅客,面面相觑又满怀狐疑地互相戒备着,如有人将手摸向口袋里的手枪,其邻座则已做好了先扣动枪机的准备。尽管这个时期没有出现大国间的战争,可是欧洲却处在一种受压抑的恐惧感之中。

欧洲一些国家对德国的优势地位和潜在力量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法国一直要报战败之仇,但是单靠它自身力量,是绝对不能战胜德国的,只有在找到其他大国做同盟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德国打败了法国,但无法将其消灭,再说它还需要巩固自身的统一,也不愿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俾斯麦曾担心,如果再次发生欧洲战争,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可能被分割成几块,所以在他担任首相期间,对外一直奉行"和平"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只能以孤立法国,防止欧洲大国与法国结盟作为它的外交方针。

为了孤立法国,俾斯麦力图以一个联合起来的王朝欧洲,来包围一个不稳定的法兰西共和国,使其成为"孤岛"。他极力反对驻法大使阿尼姆用干涉手段恢复法国帝制的主张,而坚持法国保持共和制。1872 年他在一次对皇帝的奏章中

说:"对一个联合的王朝欧洲来说,巴黎的火山(指不稳定的法国共和政权)一点也不危险,它将自燃自灭。"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当时英国格莱斯顿内阁对欧洲大陆抱孤立主义的情况下,关键问题是处理好德国对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关系。

面对欧洲局势的大变动,日益削弱的奥匈帝国一直担心德国会侵占它境内日耳曼人居住的省份;担心俄国泛斯拉夫主义势力在巴尔干半岛的活动,会引起它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反抗斗争,并且害怕德俄两国可能在近东和巴尔干半岛方面形成对它的联合压力。奥匈帝国已不能再忍受一次像在意大利和中欧方面遭到过的沉重打击。正如它的外交大臣安德拉西所说,奥匈帝国已是一个不能从事领土扩张的"防御性国家",这个国家已经"超重","不能再载上点什么,不管泥土还是黄金,都将倾覆。"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对德国的强大心存畏惧,大势所趋,不容他不向德国讨好,因而在外交上转向采取与德国和好的政策。这正符合俾斯麦孤立法国的要求。1871 年 8 月至 9 月间,奥德两国君主在伊舍尔、萨尔茨堡等地举行会见,大大消除 1866 年"兄弟阋墙"战争以来的两国对立情绪。奥匈帝国对德国和好政策的背后,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心情:既想通过与德国联合来抑制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又害怕德国会侵占其领土和德俄结成联盟来对付它,因而准备在可能情况下与俄国达成某种妥协,以改善自己的境遇。

俄国和德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王朝友谊。如果没有俄国 1870 年的"善意中立",普法战争很难保证只在两个交战国范围内进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德国的斡旋和支持,俄国未必能如此顺利地在 1871 年伦敦会议上,取消 1856 年巴黎条约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可是,强大的德国出现在俄国的西边,无疑是对俄国的一种威胁,使它不得不调动一部分军队守卫西部边界。俄国不甘心德国充当欧洲的新主人。然而俄德友谊仍有实际价值,除了在波兰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外,当时俄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在中亚和近东与英国的争夺。俄国需要与德国保持友好以保护其西部边疆的安全。而在近东,俄国可能面对英国和奥匈两个对手,这样德国态度的向背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俄国既在中亚、近东需要德国的支持,却又在欧洲需要遏制德国的优势,这使它在对德国政策上左右为难,这制约着俄国的外交变化。德奥日益接近,引起俄国不安。如果德奥关系导致结盟,势必加强俾斯麦对欧洲事务的控制力,使它在与俄国打交道时占有更多的主动权,并使奥匈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加强,俄国将处于被孤立的困境。俄国感到如果继续与奥匈在巴尔干半岛处于对抗状态,那只会促使它加快投靠德国的步伐,不如转而谋求某种妥协,以牵制德奥关系的发展。

普法战争后德、奥、俄三国的复杂外交关系,构成了它们走向"同盟"的背景。1872 年 9 月,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去柏林访问威廉一世,这标志着德奥关系转趋接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知道这个消息后感到不安,要求参加

会见。9月6日至12日三皇会于柏林，这是德奥俄亲善的第一步。三国外交大臣俾斯麦、安德拉西和哥尔查科夫交换了意见，但他们只是两两单独地会谈，没有在一起开会，没有订立任何协定。然而，奥俄两国外交大臣利用这个场合，达成了若干口头谅解，其中包括双方同意致力维持巴尔干现状，这些谅解是奥俄第二年订立兴勃隆协定的前奏。

1873年初，俄国为了巩固与德国的友谊，以便对付英国，便向德国建议订立军事同盟。德国考虑到法国提前偿清战争赔款，即将从法国撤回占领军队，这时同俄国签订军事协定将显示德国有不可抗拒的威力，因而在同年5月6日威廉一世访问圣彼得堡期间，德国参谋总长毛奇和俄国元帅贝尔格签订了一项简单的军事协定。规定"如果两帝国之一遭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攻击，另一帝国应立即以精锐军队20万人予以援助。"不言而喻，它是针对英国和法国的，双方表示坚持严守秘密，以免泄露给英国和法国。

1873年6月，亚历山大二世到维也纳参观博览会时，要求奥匈加入刚刚成立的德俄军事协定。奥国无意引起与英国的矛盾，又担心自己卷入可能发生的对英战争中去，便以宪法程序为辞，推说不便参加。但是奥俄两国都不愿失去签订一个保障自身安全协定的机会，于是它们撇开德俄军事协定，6月6日两国皇帝在维也纳郊区兴勃隆宫签订了一项政治协定，即兴勃隆协定。双方同意"遇有第三国的侵略危及欧洲的和平时，两国皇帝陛下互相约定不寻求或缔结新的同盟，他们之间应立即进行商谈，以便议定他们所应遵循的共同行动的方针"；"如果由于本项协议而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两国皇帝陛下应缔结特殊协定予以规定。"从内容上看，这是一个意义含混的协定，反映了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处于对立的地位，对可能发生的事很难预料。两国都希望通过这个协定彼此约束，以保证不致使缔约国的对方与德国结成联合阵线。

对于兴勃隆协定的签订，德国表示欢迎并要求加入，因为这样的联合符合俾斯麦关于加强欧洲王朝团结，孤立法国的设想，同时也是为了控制俄奥关系的发展方向。俄奥关系变得过分亲密或者发生冲突，都将贻害德国在欧洲的地位，特别是它不愿使法国从中得到一个盟国。1873年10月威廉一世来到维也纳，于23日加入兴勃隆协定，从而结成了"三皇同盟"。

三皇同盟是一个旧式王朝外交的产物，兴勃隆协定是由皇帝们签字的，它所维护的是君主之间的协作原则。通过同盟，德国实现了孤立和削弱法国的目标。俄国加强了在中亚地区对付英国的力量和西部边疆安全的保证，使俄奥当时在巴尔干的矛盾有所缓和。俄国有意维系俄奥关系，以防德奥合作损害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但俄奥两国都没有放弃它们在巴尔干方面的敌对意图。奥匈则想依靠德国的支持，来压制奥匈境内斯拉夫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三皇同盟是一个松散同盟，内部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反映了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大国的复杂关系。

这一情况在同盟以后的活动中，特别是在1875年4月至5月的德法危机中充分地暴露出来。

德法危机

普法战争结束后的和约规定，法国应把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必须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没有偿清前，法国必须担负德国占领军的费用。然而俾斯麦未能控制法国未来的发展，法兰克福条约既没有限制它的军事力量，也没有约束它的外交政策，法国仍然是一个大国，如果它想要复仇的话，道路是畅通无阻的。战后的二三年间，法国国内经济得到复兴，仿照德国的模式推行普遍兵役制，并改组了军队，复仇意识在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表现非常强烈。1873年法国提前偿清赔款，德国占领军于同年9月撤离法国。1873年5月梯也尔下台，主张复仇战争的保皇党执政，各地天主教教会由于袒护受迫害的德国天主教徒而发表反普鲁士的言论。8月，地处德法边境的南锡市主教，号召教徒为阿尔萨斯—洛林回归法国而祈祷，接着巴黎大主教也发表了类似的号召。俾斯麦以此为借口，企图先发制人，以战争恫吓政策震慑住法国，使其抛弃任何复仇打算。从军事方面看，德国占绝对优势，三皇同盟已使法国在欧洲陷于孤立。可是这并不能保证俄奥两国支持德国又一次向法国开战，无论俄国、奥匈和英国怎样对德表示友好，没有一个大国愿意看到德国继续扩张。

1875年初，法国拟在德国购买1万匹马。3月，法国议会通过扩军法案，把团一级编制由3个营扩充到4个营。俾斯麦抓住这些事大做文章，立即公布德国禁运马匹出口的命令，并授意报刊对法国的扩军法案予以抨击。4月8日，柏林《邮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战争在望》的社论，指责法国在国际天主教阴谋活动的支持下，准备复仇战争。俾斯麦还宣称要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参谋总长毛奇也表示："如果法国不限制自己军备，那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德国进行了战争动员。俾斯麦的目的在于恫吓法国，使之屈从德国的意志，并非想立即发动战争，可是在欧洲却造成了"战争迫在眉睫"的紧张局势。

法国外长德卡兹利用了当时其他大国担心德国扩张的心理状态，大胆地与俾斯麦展开斗争。他利用一切可以证明德国要侵略法国的消息，装作法国大难临头，将又一次受到德国欺侮，向其他大国寻求保护。德卡兹通过英国记者布洛兹在《泰晤士报》披露德国的战备消息，以争取英国舆论支持。4月12日，刚返回圣彼得堡的法国大使勒夫洛在求见俄国外交大臣时，哥尔查科夫当即向他保证："俄国将竭尽全力来抑制柏林的急躁情绪，并使和平与温和的想法得以在那里占到上风。"4月15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接见勒夫洛时也重申：如果德国发动战争，那么"它就得负起全部责任来。"4月21日，刚从俄国返回柏林的俾斯麦特使拉多维兹在英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上，无意中谈到一些德国政党领袖的看法："从政治哲学、甚至基督教方面来说，一次预防性的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法国将

复仇作为其政策的固定目标，德国与其坐待侵略，不如将选择进攻的机会留给自己。"这给德卡兹提供了新的口实。他把法国驻德大使冈多-别朗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制成复本，分寄法国驻英俄等国的大使，要他们提请所在国政府注意德国的这种战略思想，极力把法德两国争端说成具有欧洲国际争端的性质，以便说服这些国家对德国的侵略行动加以遏制。一些大国果然起来响应。

英国力求维持欧洲均势，很快地照会欧洲各国，要求采取一致立场，用外交手段来平息德法危机。5 月 9 日，英国驻德大使拉塞尔奉外交大臣之命，劝告德国消除对法国的所谓准备复仇战争的误解。作为三皇同盟成员的奥国态度暧昧，不敢得罪德国，害怕引火烧身，没有公开响应英国的建议，可是又秘密地向俄国表示，奥匈有"与俄国同样维持和平的愿望。"它既想保护自己，又不愿德国制服法国的企图得逞。三皇同盟另一个成员俄国态度就强硬得多，决心要阻止德国的侵略行为。5 月 10 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偕同首相来到柏林。哥尔查科夫几乎是以整个欧洲代表的资格向德方发出诘难，表示不能容忍德国将要发动的新战争。俾斯麦假装惊讶，矢口否认有进攻法国的意图，并把这种消息归咎于法国交易所经纪人，特别是与交易所有关系的德卡兹的阴谋诡计。危机终于过去。可是俄国皇帝在离开柏林时，哥尔查科夫向俄国所有驻外使节发的电文内容给人的印象是：德国是有进攻法国的意图，只有在沙皇来到柏林以后，欧洲的和平才能得到保障，并把自己宣扬成一个和平使者。俾斯麦对此深表不满，他挖苦哥尔查科夫是想博得"法国救星"的美名，哥尔查科夫这种做法是在他背后踢了一脚。

1875 年德法争端引起的战争危机过去了，法国外交取得一定的胜利。英俄等国起来保护法国，使俾斯麦蒙受一次屈辱。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把这时期俾斯麦的表现说成是："恰如欧洲曾不得不联合起来将其按倒的拿破仑一世"，她这句话反映了这些大国不愿意欧洲均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转化的普遍心理状态。不过，英俄等国维护的欧洲和平只是在法兰克福条约基础上的和平，它们都不打算扭转色当战役造成的局面，而只是保证这种局面不致重演。它们反对德国进攻法国，同样也不支持法国向德国复仇，而是要维护当时业已形成的新的均势。

近东危机

普法战争后，在近东地区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这主要表现在：(1)法国暂时从东方政治舞台上退出，德国立刻填补了它的空位。尽管德国在这个地区还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它利用列强间的冲突来提高它在土耳其的地位，并企图把俄奥两国的注意力引到近东去，不让它们过问中欧的事情。(2)俄国由于在 1871 年伦敦会议上取消了 1856 年巴黎条约中有关黑海条款对其海军活动的限制，恢复了黑海舰队，从而增强要求控制黑海海峡和对巴尔干扩张的野心，这样就与一直觊觎巴尔干霸权的奥匈帝国之间的矛

盾加剧。(3)英国自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竭力想在欧洲经过奥斯曼帝国境内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占据优势。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于1875年11月从埃及方面购买运河公司大部分股票，充分地表明了英国的这一目的。因此，英国力图控制黑海海峡，来阻止它的主要劲敌俄国势力南下，以排除它通往印度航路上的潜在威胁。(4)奥斯曼帝国进一步衰落，加剧了列强对其领土瓜分的争夺。(5)德意志民族和意大利民族的统一，都增强了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再加上在俄国支持下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展开，要求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兴起。上述诸因素使近东地区的政治更加不稳定，终于导致危机的爆发。

19世纪70年代初，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其中斯拉夫人居多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东鲁米利亚、马其顿及阿尔巴尼亚受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罗已获得自治地位，但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统治。

1875年夏，在奥斯曼帝国最西北部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两省，先后爆发了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民反抗土耳其素丹统治的起义，于是开始了持续3年之久的近东危机。这次起义深得在其毗邻的斯拉夫人国家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两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斯拉夫民族情绪再度高涨。这两个具有自治地位的国家希望联合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摆脱土耳其素丹的统治，建立南斯拉夫国家。土耳其政府则把大批军队集结在这两国边界，局势十分危险，很快地引起了列强的干涉和外交活动。

南方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奥斯曼帝国，但是它也威胁着奥匈帝国，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有几百万南方斯拉夫人。南方斯拉夫民族解放事业势必动摇奥匈帝国的统治，因此奥匈帝国政府对于奥斯曼帝国内的斯拉夫人起义持反对态度，而且特别担心俄国以基督教徒保护者的身份出兵干涉，因此采取了维护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立场。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态度一样，为了防止俄国占领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为了防止俄国势力通过巴尔干进入地中海，也主张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狄斯累利鼓励土耳其素丹采用一切手段镇压波、黑两省的起义，避免国际武装干涉的行动。俄国则积极支持波、黑两省起义，但是其真实目的在于干涉巴尔干事务，打击奥斯曼帝国，取得对黑海海峡的控制。但是俄国在支持斯拉夫人起义时，并不希望同奥匈帝国发生严重冲突。所以在波、黑两省起义后，俄国就和奥匈帝国保持接触，出现了两国共同出面保护斯拉夫人的“合作”。这种合作，表面上看是遵循三皇同盟的原则，实质上每一方都不让对方单独行动。

1875年8月哥尔查科夫在维也纳提出，给予波、黑两省以类似罗马尼亚所享有的那种广泛自治权，奥匈帝国没有同意。随后，安德拉西提出一项解决办法，由签署1865年巴黎和约的各国要求土耳其政府对波、黑两省实行改革：宣布

宗教信仰自由,取消包税制度,利用省区税收改进农业等,这就是所谓"安德拉西照会"。各有关国家同意这项办法,并于1876年1月分别以照会方式通知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政府也表示接受,但为波、黑两省起义领导人所拒绝,他们认为土耳其政府早已失去信用,空言改革无济于事,安德拉西照会受阻。5月,在哥尔查科夫的建议下,三皇同盟国家的外交大臣在柏林开会协商,通过了《柏林备忘录》,要求对波、黑两省"改善居民命运而不破坏政治现状",实际上是安德拉西照会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备忘录有下述内容:三国政府"认为有必要达成关于采取具体措施的协议……以防止战祸进一步发展。"可是当德国政府征求英国意见时,遭到英国拒绝。英国之所以拒绝,不仅是因为没有被邀请参加近东问题的讨论,更主要的原因是英国不愿见到俄国势力伸入巴尔干半岛。

当三皇同盟"推销"柏林备忘录时,保加利亚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素丹的起义。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契尔克斯人和巴希祖克人残酷地镇压起义人民,杀害了大约1.5万人,破坏的村镇有79个,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保加利亚惨案"。可是英国政府却为土耳其的暴行辩护,支持土耳其拒绝接受柏林备忘录,并为防止俄国在海峡立足,借口保护侨民安全,派遣军舰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

1876年6月30日,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为了支持保加利亚起义,向土耳其宣战,事态进一步扩大。俄国支持塞尔维亚,但担心由此与奥匈发生冲突,为了寻求解决办法,沙皇与奥皇于7月8日在捷克的赖希斯塔特会谈,结果两国达成如下协议:如果土耳其获胜,将坚决要求土耳其根据安德拉西照会和柏林备忘录内容作出安排;如果塞尔维亚获胜,对成立大斯拉夫国家一事将不予以协助;伊斯坦布尔成为自由市。显然俄国作出了让步。但会谈后没有签署公约或议定书,达成的协议是由双方根据自己的记录单独加以说明,因而在不少要点上出现了相互矛盾。

9月,土耳其击败塞尔维亚,俄国准备派兵援助。但是为了避免重蹈克里米亚战争的覆辙,为了避免因同土耳其交战而引起列强出兵反对俄国,俄国不得不事先探询一下德、英和奥匈三国的意见。结果不但未得到德国和奥匈的支持,而且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俄国与英国的多次协商,决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由巴黎和约签署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来迫使土耳其实行改革。12月11日,各国代表在预备性谈判中,达成了协议:必须给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以奥斯曼帝国自治省的地位;由列强委任的欧洲委员会来监督三地实行自治体制。可是在12月23日国际会议正式开幕的那天,土耳其公布了宪法,声称一切改革由议会来决定,实际上拒绝接受国际会议作出的决定。俄国主张用武力迫使土耳其接受国际会议的决议。但没有得到其他大国的积极支持,而英国则坚决反对对土耳其施加任何压力。于是俄国决定单独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

为了使奥匈帝国在未来的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1877 年 1 月 15 日,俄奥签订《布达佩斯条约》,规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为奥国占有;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等地作为俄奥两国军队的缓冲区域;不许在巴尔干建立大斯拉夫国家;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独立;伊斯坦布尔成为自由市等。尽管当时奥匈帝国并无足够的军事力量同俄国对抗,但俄国急于趁机向巴尔干扩张,不得不尽量满足奥匈的要求。

1877 年 4 月 24 日,俄国向土耳其宣战。奥匈根据条约坚守中立,德国对俄国表示友好,法国正在争取俄国的友谊,因之这三个大国都没有对俄军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只有英国与俄国处于对立地位。可是英国如果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同盟国家,要想战胜俄国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表示强烈反对。6 月 23 日俄军渡过多瑙河,7 月 19 日占领息普卡隘口。随后,俄军在普列文要塞受阻,遇到帕夏(统帅)所率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几次进攻均遭失败,不得不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直到 12 月 21 日才占领该要塞。1878 年 1 月,俄军攻占亚德里雅那堡。俄军向伊斯坦布尔方向的推进引起英国的惊慌,国内反俄舆论蜂起,沙文主义者高唱,“我们不愿作战……如果我们要打,我们有船,我们有人,我们还有钱……俄国人不会得到伊斯坦布尔。”英国女王不断对内阁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有力措施。英国舰队奉命进入黑海海峡,以保护英国侨民安全为名,驻泊于离伊斯坦布尔南面的穆达尼亚湾。海峡地区风云骤起,英俄两国剑拔弩张。这时,尽管土耳其军队已溃不成军,但俄军也无力给予最后一击,直到谣传英国舰队开来而且真的开到伊斯坦布尔时,战争才告结束。在土耳其的要求下,俄土双方在亚德里雅那堡签署了停战协定。

1878 年 3 月 3 日,土耳其被迫接受俄国提出的议和条件,双方在离伊斯坦布尔只有 12 公里的俄军驻地圣斯蒂法诺签订和约。和约规定:土耳其承认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完全独立,并且向前两个国家让出大量领土;俄国获得比萨拉比亚西南部分;土耳其保证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改革;保加利亚成为隶属土耳其素丹的公国,由俄军占领两年,并且在俄国监督下“创设和实施新制度”,其疆域包括保加利亚、东鲁米利亚全部及马其顿大部分,东起黑海,西至塞尔维亚边界,北至多瑙河,南至爱琴海。因而保加利亚不仅成了俄国控制两个海峡的桥头堡,而且俄国还可以通过保加利亚直达爱琴海,亦即地中海。俄国应获得 14.1 亿卢布的赔款,其中大部分以土耳其割让卡尔斯、巴统、阿尔达汉、巴亚济特为抵偿。这样,圣斯蒂法诺和约使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了。

但是,俄国并不能安稳地享受这些“赃物”,因为英、奥两国极力反对。圣斯蒂法诺和约签订后 3 天,安德拉西就正式提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这个和约。英国为了逼迫俄国让步,仍把舰队继续停泊在伊斯坦布尔,而且从印度调遣军队

进驻马耳他。实际上，俄国财政与军事方面的情况已不允许它再经受一次大国间的战争。虽然取得了俄土战争的胜利，但它的财政却回到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的状况。新任俄军前线总司令图托尔本将军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指出：俄军不可能阻挡英舰对黑海的威胁，土耳其又重新调集8万军队守卫伊斯坦布尔。财政与军事形势的窘迫，再加上国内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俄国无法使圣斯蒂法诺条约生效。这时德国又公开放弃对俄国的支持，俾斯麦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并劝告俄国为了和平接受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俄国处于孤立无援地位，不得不同意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

在国际会议召开前夕，英、俄、奥三国分别举行双边谈判，来保障自己在近东事务最后安排中的地位。根据1878年5月20日签订的《英俄密约》，俄国同意取消大保加利亚计划，把原拟该公国的南方边界从伊斯坦布尔退缩到巴尔干山脉防线以外。6月4日缔结的《英土同盟条约》，迫使土耳其将塞浦路斯让给英国。在6月6日签订的《英奥协定》中，双方赞同分割大保加利亚的计划，英国支持奥国对波斯尼亚的要求。这些条约和协定为柏林会议铺平了道路。

柏林会议于1878年6月13日开幕，与会者有德国、英国和俄国的首相，欧洲各大国的外长和土耳其的代表。东道主俾斯麦担任会议主席。会上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保加利亚问题。狄斯累利不遵循国际会议使用法语的惯例，而用英语发言，表现了不妥协的姿态，并以离会返国要挟俄国让步。由于俾斯麦的调解，英俄间才停息争论，参加国终于在7月13日签署了《柏林条约》。根据该条约，保加利亚公国的领土大大缩小，俄军占领期间也缩短至9个月。东鲁米利亚和马其顿仍归土耳其统治；波、黑两省划归奥国管辖，并由奥军占领，尽管这两省在名义上仍属土耳其。俄国则获得比萨拉比亚、巴统、阿尔达汉和卡尔斯等地。

从柏林会议的结果不难看出，它所提供的解决近东危机的最后方案，实质上是在修改圣斯蒂法诺和约基础上的势力范围的再分配，英奥俄三个大国在土耳其瓜分到各自的势力范围，造成一种新的均势。大国战争冲突的危险暂时得以避免，近东危机暂时得到解决。可是，在东方问题上大国的对峙局面仍然存在，一次危机的结束只是新一轮矛盾与斗争的开始。到20世纪初，巴尔干问题终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俄国在柏林会议上受到挫折，柏林会议使它在欧洲面前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这使沙皇异常不满。因此，柏林会议后，俄德、俄奥的关系恶化了。1878年“三皇同盟”条约到期，但没有续订，这意味着它的瓦解。

三国同盟的形成

柏林会议后德俄关系十分紧张。俄国把它在柏林会议上的外交失败归罪于俾斯麦，亚历山大二世把柏林会议说成是“俾斯麦领导下的反俄大联合”。俾斯麦尽力为自己辩护，说他

在柏林会议上曾多次帮助俄国讲话，德国也掀起宣传运动进行反击。两国报刊相互诋毁了好几个月。1879 年 1 月，俾斯麦以俄国出现鼠疫，需要实行检疫为借口，禁止俄国牲畜的输入，紧接着又实行粮食进口税，给俄国的经济以沉重打击，导致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俾斯麦深恐俄国组织反德集团和俄法结盟，决定加强德奥关系。他考虑到素来亲德的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即将为亲俄派人物所代替，决定抢先行动。1879 年 8 月 27 日，俾斯麦与安德拉西在加施泰因会谈，谋求缔结反俄同盟。双方一致认为，德奥同盟是法俄同盟的“平衡器”，尽管法俄同盟还未出现。德奥缔结反俄同盟，遭到威廉一世的反对。9 月 3 日至 4 日，威廉一世与他外甥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边境城市亚历山大罗夫会谈颇为融洽，使他感到没有联奥反俄的必要。俾斯麦以德国面临战争来威吓皇帝，并且通过皇帝的亲信去向他进言。最后俾斯麦以内阁总辞职要挟皇帝，威廉一世才让步。10 月 7 日，《德奥同盟条约》在维也纳签订。其主要内容是：如两帝国之一遭到俄国进攻，两缔约国应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实行互助；如缔约国一方遭到另一国家进攻，缔约国另一方应对其盟国采取善意的中立，但是如果进攻的国家得到俄国的支持，缔约国双方应共同作战直到共同议和为止。这个条约具有鲜明的反俄性质。在俾斯麦的外交方针中，孤立法国是主要目的之一，他过去拉拢俄国，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建立以反俄为目的的德奥联盟，意味着孤立法国政策的失败，并且也推动了法俄同盟的建立。

俄德关系的恶化，对俄国来说，由于失去德国的支持，它与英奥在海峡、巴尔干的斗争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为了在巴尔干的斗争中谋求德国的援助，也为了避免因两国不和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防止德英联合，沙俄迫切希望改善与德国的关系。1880 年 1 月，俄国向德国提出恢复三皇同盟。俾斯麦为防止俄法接近，避免因对俄战争发生而使德国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表示同意。当时奥匈也想与英国结盟，以便在英国支持下夺取土耳其的欧洲领土，而以土耳其亚洲属地让给英国作为交换条件。同年 4 月英国自由党上台，转而采取与俄国合作的政策，这才使奥匈转变态度。1881 年 6 月 8 日，又一次的《三皇同盟条约》签订于柏林。三皇同盟被恢复，但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松散的政治结构，而是受条约义务的束缚。三皇互相承诺保守中立，并宣称对黑海海峡的控制具有“欧洲的和相互约束的性质”，这就保证德奥两国不能帮助英国进攻俄国，俄国也不能在法德交战中站在法国一边。英国不至于不顾所有欧洲国家的反对，在黑海海峡采取单独行动，因此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1881 年法国侵占突尼斯。俾斯麦鼓励法国去“摘取突尼斯这一成熟果实”，同时又怂恿意大利在北非与法国竞争。意大利在同法国争夺突尼斯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迫使它去投靠与法国对立的德国。与此同时，“罗马问题”即梵蒂冈的

地位问题十分尖锐，而德国当局和国内天主教政党停止斗争，达成妥协，意大利担心德国帮助教皇来干涉意大利内政，也感到有加强同德国联系的必要。于是，意大利向德国表述了与德结盟的愿望。俾斯麦也想拉拢意大利对抗法国，壮大自己一方的力量，但他以意大利和奥匈就双方利益取得谅解为条件，并且说："从罗马到柏林的道路是要通过维也纳的。"意大利与奥匈有矛盾，奥匈帝国仍保有意大利领土(的里雅斯特和特兰提诺)，但为了求助德国，不得不与奥匈接近。1881 年 7 月意大利国王访问维也纳，提议当意大利受到法国威胁时，奥匈给予它安全保证。奥匈没有响应。次年 2 月，俾斯麦看到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流行和俄法接近的迹象，担心俄国不信守三皇同盟，因而劝告奥匈同意大利进行谈判。奥匈考虑到和意大利接近，可使它一旦发生对俄战争时免除后顾之忧，终于同意和意大利结盟。

1882 年 5 月 20 日，《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在维也纳签订。条约规定：如意大利未有直接挑衅行为而遭到法国进攻，德、奥必须以它们的全部军队援助意大利；如德国未有直接挑衅行为而遭到法国侵略，意大利也担负同样的义务；缔约国之一在同其他任何一个大国(法国除外)发生战争时，缔约国另外两方必须对它们的盟国采取善意中立，这意味着如果俄奥发生战争，意大利恪守中立。三国还各自发表声明，这项条约不是针对英国的。德奥意结成的同盟，史称"三国同盟"。它与同时存在的三皇同盟、德奥同盟一起，构成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

法俄同盟

80 年代初，德俄关系一度出现缓和，三皇同盟在 1884 年又续订过一次。但在德奥俄三角关系中，德国支持奥匈对付俄国，而俄奥在巴尔干的争夺是无法调和的，因此随着俄奥间的矛盾加深，势必引起德俄关系的疏远。

1885 年 9 月，东鲁米利亚首府发生革命，赶走了土耳其委派的总督，宣布东鲁米利亚合并于保加利亚公国。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经过一番犹豫，接受了这一要求。他是由沙皇扶持而登上大公宝座的。这时，俄国因亚历山大不愿听从它的摆布，以违反柏林条约为由，坚决反对保加利亚统一，并欲废黜这位大公。塞尔维亚和希腊因保加利亚统一破坏了巴尔干均势，也对保加利亚表示不满。塞保两国曾一度交战。英国企图利用俄、保关系恶化，赞同保加利亚统一，来阻挠俄国势力伸向地中海。德国则出于孤立法国、拉拢俄国的需要，支持俄国对保加利亚的政策。土耳其也将出兵东鲁米利亚，进行镇压。7 年前，即柏林会议在讨论保加利亚统一时，俄国竭力赞同，而英国坚决反对，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两国却站到与它们原先相反的立场上去了。保加利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由此可见。1886 年 2 月，土、保根据由英国提出的方案签订协定，规定东鲁米利亚名义上仍是土耳其的一个省，由素丹任命保加利亚大公为这一省的总督，这样保全了

各方的体面，以妥协方式承认了保加利亚的统一。可是问题仍未解决，8 月，亚历山大大公被亲俄的保加利亚军官绑架，过后虽经释放，但因不能取得沙皇谅解弃位出走，保加利亚议会推举亲德奥的斐迪南为大公。俄国极为不满，扬言要出兵占领保加利亚。奥英则声明，不允许俄国单独干涉保加利亚事务。俄国与奥英关系更加恶化。

这期间，德法关系又趋紧张。以鼓吹复仇主义闻名的布朗热出任法国陆军部长，采取措施加强军事力量。俄国一些报刊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发表亲法言论。俾斯麦为了稳住俄国，使它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除了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积极支持俄国外，还加强了和俄国的联系。同时，俄国在海峡和保加利亚问题上需要得到德国帮助，也十分看重与德国的关系。1887 年 1 月，俄国使者彼得·舒瓦洛夫前往柏林，商谈关于阻止原亚历山大大公复辟问题，曾提出为保持两国密切关系签订德俄双边条约，在他拟定的条约草案中保证俄国在德法战争中严守中立。俾斯麦因得到俄国这一保证，立即以布朗热复仇运动为借口，对法进行战争恫吓。他说："一旦布朗热当上内阁总理或共和国总统，就会发生战争"，并把军队向法国边境集结，于是出现了 1887 年的德法危机。当法国面临德国战争威胁，要求俄国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时，沙皇给了肯定的答复。这样俾斯麦便不敢轻易开衅，危机也就平息下去。俄国的这个态度，引起了德国的愤怒，它拒绝了舒瓦洛夫的条约草案。但是俾斯麦仍旧没有放弃与俄国达成协议的希望，多次向俄国提议，用德俄双边条约代替已经过期的三皇同盟条约。这一年 4 月，俄国同意重开谈判。6 月 18 日德俄签订条约，双方互相保证："如果缔约国一方与第三个大国作战，缔约国另一方应对缔约国这一方保持善意中立"，但"此项规定不适于对奥或对法战争，如果这一战争是缔约国一方对以上两国之一实行进攻的结果。"德国还将在保加利亚和海峡问题上给俄国以外交上的支持。对德国来说，由于德奥同盟条约中已保证奥匈在发生德法战争时中立，而这个条约又再次保证了俄国的中立，因而被称为《再保险条约》。

可是再保险条约仍未能完全保证俄国在德法战争中严守中立，因为如果俄国认为德国是进攻者，它就没有遵守中立的义务。为了把俄国引导到德国所需要的外交轨道上来，俾斯麦只得不断地对俄国施加压力。他拒绝帮助俄国阻止保加利亚议会选举斐迪南为大公，鼓励英奥意三国在 1887 年 12 月订立以反俄为主的地中海协定，下令禁止帝国银行接受俄国有价证券作为借款抵押等，但是这一切压力都没有使俄国俯首就范，反而逼迫它去同法国接近。

1890 年，俾斯麦被迫辞职。威廉二世和新任首相卡普里维抛弃俾斯麦坚持的拉拢俄国的外交方针，转而全力支持奥匈，对俄国采取较强硬的态度，拒绝了俄国关于续订再保险条约的提议。为了追求英国的友谊，德国与英国在东非问题上达成妥协。1890 年 7 月两国签订了《赫耳果兰条约》，德国承认英国对桑给

巴尔的保护权，并把乌干达等地区让给英国；英国承认德国占有坦噶尼喀沿海地带，把位于北海的赫耳果兰岛让给德国。德英的接近，使德俄更加疏远，加速了法俄结盟。

处境孤立的法国一直把俄国作为自己结盟的主要对象，而俄国对俄法联合不甚积极。这是因为：在俄国的心目中，法国是一个战败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不大；而且俄法联合本身也存在不少障碍：不但法国共和政体与俄国君主政体难以相容，而且两国在对外利害关系上也很不一致。俄国并不同情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的愿望，法国对俄国在近东的扩张有反感，它主张保持土耳其的独立地位。法国主张把英国赶出埃及，俄国则希望英国留在埃及，使英法纠纷继续下去。俄国对德国没有严重的恶感，它心目中的主要敌人是英国，然而法国希望最终与英国和解，以加强自己反德国的地位。

但是，到80年代后期，德俄矛盾加深，为法俄接近提供了条件。1887年12月，俄国在德国拒绝借款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了第一次借款协定，借款5亿法郎。1888—1889年，俄国又在法国发行总数达19亿法郎的公债。1888年俄国还向法国定购50万支步枪。随后几年法国资本源源不断地向俄国输出，使资金匮乏的俄国在经济上加深了对法国的依赖。在这期间，欧洲国际政治形势对俄法两国异常不利。1887年英意奥三国两次订立以反法反俄为主的地中海协定，1891年三国同盟续订，德英两国的密切交往，说明德奥意英互相支持，形势逼人。法俄要打破各自的孤立状态，不得不加强合作。

俄国加快了与法国结盟的步伐。1891年7月，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和法国前任大使拉布拉伊的谈话中，提出了两国“应该在走向协商的道路上迈进一步”后，法国迅速作出反应。同月，法国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要塞，沙皇亲自来到旗舰上，在俄国一向严禁演奏的《马赛曲》的乐曲声中脱帽致敬，这无异于宣布俄法两国携起手来了。8月，俄法就订立了《政治协定》。这个协定是通过俄国驻法大使莫伦海姆与法国外交部长利鲍之间来往信件达成的。这些信件阐述了两国一致的目标：“如果和平真正遭到威胁，特别是两国之一方有被侵略的危险，双方约定应就两国因发生此种情况而必须立即同时采取的措施的问题获致谅解。”尽管协定的内容并不十分明确，它实际上已经奠定了法俄同盟的基础。

1892年8月初，法国总参谋长布亚德斐尔以观察俄军秋季演习的名义前往彼得堡，开始和俄国军方秘密谈判。8月17日，他和俄军总参谋长奥勃鲁契夫签订了法俄军事协定。军事协定规定：“如果德国或意大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法国，俄国应用它的所有军队进攻德国；如果德国或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俄国，法国应用它的所有军队与德国作战。”“法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130万人；俄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70万至80万人。这些军队应尽速全部参加战斗，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同时还规定双方不得单独媾和，应严

守协定秘密，有效期和三国同盟条约相同。1893 年 12 月 15 日和 1894 年 1 月 4 日，法俄两国政府的来往信函正式通知对方：军事协定已获批准，法俄正式结成同盟。

法俄同盟的建立意味着另一个军事集团的出现。从此，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初步形成了两大营垒的对峙：一方是法国和俄国，另一方是德国、奥匈和意大利。大国中只有英国还暂时置身于两大营垒之外，保持着行动自由。因此，它的动向，对欧洲均势的改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六、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

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在其短短的几百年的历史中，创造了超过人类历史几千年所创造的财富，这就为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前提。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是极其不合理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日益恶化，特别是在资本原始积累开始加速的 17 世纪以后。以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最早的英国为例：1688 年时，占英国家庭总数 1.2% 的贵族和士绅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 14.4%；1803 年时，上层社会家庭占家庭总数的 1.4%，收入占 15.7%。与此同时，社会下层的所谓劳动阶层（不包括熟练工人和工匠）的家庭，1688 年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收入仅占 20.7%；1803 年时，这样的家庭占总数的 1/3 以上，而收入只占 16.5%。据估计，这样的家庭中平均每人年收入只有 3.35 英镑，而平均花费是 3.76 英镑，这和上层社会人均年收入成千上万英镑相比，实在是天悬地隔。就整个欧洲而言，情况也大致如此。17 世纪，欧洲的大多数行业工资在下降。1700 年，妇女的工资比 300 年前下降了 60%。1770 年，在巴黎，一个壮男工一天可以挣 50 个苏，而一磅面包要卖到 13 个苏，女工只能挣到男工的一半或更少。从 1750 年起，抢食品的风潮经常发生，所以面包房都要由士兵守卫。就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到 19 世纪上半叶，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没有多大的改善。工人家庭的收入，从表面上看可能是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是以工人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甚至更多、妇女和儿童都参加工作为代价的。只有在 19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完成以后到 20 世纪初这段时间，随着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长，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工资才有了稳步的增长，工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几乎增长了两倍。但具体到各类工人，又有比较大的差别。1900 年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中，工人贵族（熟练工人）占大约 15%。在英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每周是 10 英镑（一年 500 英镑），这虽然只相当于低层中产阶级收入的 2/3，却是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两倍。而且，就整个社会来说，贫富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当时占英国人口 5% 的最富有者的收入占了全民总收入的 1/3，占人口 20% 的富有者的收入占了全民

总收入的50% ~ 60%，而占人口 30% 的最贫穷者的收入只占全民总收入的10%，而且当时富人几乎没有所得税。穷人家庭参加工作的人比较多，而富人家庭参加工作的人少，所以就个人的工作收入而言，收入差别更大，至少不小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差距。总的说来，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但却没有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过以上只是相对而言。就工人阶级本身来说，19 世纪最后 30 年，他们的物质生活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改善。

财富和社会地位变化比较大的一个阶层是资产阶级中所谓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上层除了在财产方面的差别外，主要是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商务和工作上，而上层富豪则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所谓的文化（闲暇）生活上。中产阶级一般都参加工作，大多数是从事经营管理、脑力劳动和技术工作；而上层阶级不劳动就可以过着舒适的生活。中产阶级都积聚了一定的财产，有的已经相当富有。随着科学技术对生产的影响和管理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日益增强，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也在不断上升，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仆人的多少是中产阶级财富的标志，一般说，中产阶级家庭至少有一个全日帮助清洗和做饭的女仆人，这是区别中产阶级和工人家庭的标志。而真正拥有财富的第一个标志是有一个男仆，如果有二三个男仆则是很富有的了。1900 年时，一个年收入超过 1 万英镑的家庭，要花掉大约 1/4 的收入来雇佣 10 个仆人，因此，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支庞大的仆人大军。1911 年时，英国的雇佣工人中每 7 个人就有一个是仆人，而 15 ~20 岁的女孩中每 3 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女仆。在英国，男管家（地位最高的男仆）要求身材很高，他们的收入也很高。中产阶级的底层是白领工人，他们的工资可能仅相当于熟练工人，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巴尔干地区，白领职员们都留着很长的指甲，以便使自己区别于干体力劳动的工人。领带、西装和细嫩的手大概比工资更能区别社会地位。

社会观念

随着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的变化，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是由法律来维系的。资本主义制度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实现了“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但是社会地位实际上的不平等不但存在，而且仍然是社会的基石。英国全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等级观念更进一步加强：家庭祈祷时，都是按等级地位安排位置的，家庭成员之后依次是管家、厨师、女仆、脚力和帮厨等，仆人们都是面对墙壁跪着祈祷；在农村，农场主的妻子见了牧师的妻子要行屈膝礼。宗教仪式上都是按地位的尊卑安排顺序的：首先是乡绅，然后依次是农场主、商人、店主、工匠，最后是农业工人。欧美各国情况大致如此，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但与封建社会不同的是，由于社会等级不再是建立在法律上面，而是建立在不断变动的财富上面，社会已经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的地位在各阶级阶层之间不断变动。追

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心理基础。然而，和封建社会一样，不同的社会地位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起居饮食、服饰举止以及娱乐、体育等方面都反映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封建阶级的世界观认为，财富只有靠土地和身份而不是靠亲自劳作和操心来获得才是光荣的，一个人身份的高低就在于有多少这样的财富供其挥霍。而新生的资产阶级崇尚的德行是：褒扬生产性工作、勤勉、增加资本，与封建阶级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聚积财富而不是挥霍，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尤其是这样。这样的社会观念也反映在日常的服饰、娱乐和举止等方面。不过一般说来，社会观念的变化远远落后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也落后于其他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化。不劳而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被当作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例如，英国16、17世纪时，医生的地位还很低，尽管主要的宫廷医生有很高的经济收入，但医生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业。直到17世纪中叶，一位绅士还拒绝同一位有钱的医生的女儿结婚。律师职业虽然不被视为低等，但也不受人尊重。原因是因为他们要靠自己的工作取得收入。只有在北美殖民地及独立后的美国，由于封建社会观念的残余比较少，依靠自己劳动获得财产的人才容易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服饰

服饰不仅能遮体御寒，也是表明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标志。在封建社会，法律一般都对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下层人民越级穿着上层等级的服装，甚至连马的装饰也有贵贱之分。在工业革命以前，服装的装饰和象征作用远远超过其御寒遮体的功能作用。固然，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审美观对服饰也有很大的影响。一般说来，上流社会的华贵的服饰深受欧洲各宫廷的影响：扑粉的假发，男子的发辫（19世纪初开始不再流行），以及用料考究、做工精美和缀有华而不实的装饰的服装代表了一个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到了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服装的装饰作用越来越同其功能作用相结合，因为中产阶级都要亲自参加工作，过分装饰的服装显然不利于他们的工作。所以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产阶级领导了服装变革的潮流，男子的服装变得十分简洁：典型的男装是西装外套和马甲，黑色、灰色或深蓝色的裤子，穿浅色的衬衣，系深色领带或领结；而工人或农民则多穿着结实而又不妨碍工作的服装。然而妇女的服装则没有根本的变化，特别是上层社会。这是因为20世纪以前，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附属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的地位更进一步下降。妇女的服装主要是为了显示其丈夫、家庭的地位，而不是考虑妇女本身的舒适和适用。妇女的服装仍然是各式的拖地或不裸露腿部的长裙，还有各种各样的衣帽装饰，里面还要穿束胸束腰等限制身体自然发育的装置，穿着十分繁琐和沉重，上下车以及上下楼都需要男人协助，不但使妇女的行动不便，而且也对她们的身体健康不利。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就提出了改革妇女服装的倡议，并身体力行，设计并

试穿了短裙和女式长裤,却受到了舆论的责难。尽管由于妇女参加工作者越来越多,工作妇女的服装有所简化,但仍然没有摆脱长裙和束胸。19 世纪末,由于体育运动的普及,妇女在健身和运动时穿着裤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只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妇女加入到劳动大军之后,妇女的裤装和短裙才开始流行。

饮食

19 世纪以前,欧洲人普遍的主食是谷物和肉类。由于缺乏现代营养学的知识,人们对于饮食有不正确的看法。例如,人们普遍认为蔬菜能导致发热,不宜多吃;奶只适宜于老人和儿童;水是致病的主要根源,能不喝就不喝,身体中的水分主要靠喝酒、特别是淡啤酒来补充(后来上层社会流行喝咖啡和茶)。19 世纪以后,这些不正确的认识才得到逐步纠正。当然,由于各阶级和各阶层收入相差很大,饮食习惯也有很大不同。

一直到 18 世纪末,上层阶级的饮食都是以肉为主,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似乎是以吃肉多少来衡量的。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的宴会是由一道道的丰盛肉食组成:鸡排、羊腿、烤牛排,然后是各种鱼以及甜食等。蔬菜和水果很少上富人的宴席,因为根据当时流行的盖伦的医学理论,蔬菜能够导致发烧,而水果也只能少量地吃,否则是危险的。大量地饮酒也是富人的嗜好。奶喝得很少,主要用于制成奶酪和黄油食用。上层社会的这种饮食习惯导致痛风、便秘和坏血病。特别是在冬季,由于只食腌制的肉,更容易生这些病。只有到了 19 世纪初,随着医学的进步,上层社会的饮食习惯才稍有改善。

中产阶级注重饮食。英国人典型的早餐是腊肉、鸡蛋、黄油面包、水果、鱼等。欧洲中产阶级吃肉很多,生活好的家庭收入的 10% 用来买肉。他们喜欢开宴会,作为一种社交活动。好一点的家庭每周一次(一般 8 ~ 12 人),差一点的每月一次。在整个欧洲,中产阶级的这种宴会都是以法国方式进行的:8 ~ 9 道菜,开始有开胃菜,最后是咖啡和烈性酒。到了夏天则是野餐,也是相当丰盛的。家庭的日常饭菜一般有 4 道:汤、鱼、肉和甜食。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一个年收入 1 万美元的家庭,要在吃喝上花掉 1/4。

一般下层人民的饮食则以谷物为主。18 世纪法国布威地区的农民每天大约吃两磅黑面包,喝淡酒和啤酒佐餐,幸运的时候可能喝上一点奶。而穷人则只能用谷物熬粥充饥。在山区,如苏格兰,则主要以燕麦为食,而且常常做得半熟,以便使其在胃里膨胀充饥。后来马铃薯从美洲传入,成了许多地方的主食,特别是在人口增长比较快而地主对农民剥削又比较重的地区,如爱尔兰、中欧等。1 英亩地种植马铃薯可以养活一个 6 口之家,而种谷物则至少需要 2 ~ 4 英亩土地。在德国第一次种植马铃薯是 1621 年,此后产量不断增长。在普鲁士,从 1815 到 1860 年,马铃薯的年产量从 100 万吨增加到1 100万吨。与此同时,面包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成了奢侈品。以吃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因 19 世纪 40 年

代和50年代初马铃薯歉收,至少饿死了150万人,还有200万人移居国外。1840年拥有800万人口的爱尔兰,到1911年只有440万人了。由此可见下层人民对马铃薯的依赖程度。当时,蔬菜被认为是"穷人的食物",特别是各种豆类(鲜吃),以及卷心菜、胡萝卜和各种野菜。肉蛋是一般老百姓日常所不敢问津的食品。18世纪欧洲最富的国家是英国,即使在英国,一般老百姓也只能在节日吃上肉。

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给首先进入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各国带来了丰富的新食物。18世纪时已有大量的热带水果和蔬菜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的果菜园艺开始发展起来。17世纪上半叶,茶叶和咖啡等饮料进入欧美,饮茶和喝咖啡成了上层社会的时尚。到40—50年代,欧洲各城市的咖啡馆成了富有人士重要的社交场所。这些新的饮食改善了欧洲人的食物结构和营养成分,加之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到了19世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饮食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但是广大的下层人民所关心的主要还是能否吃饱的问题。

卫生与健康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人们对卫生与健康的关系还很不了解,特别是在城市中,卫生很差,人们对遍地垃圾污水毫不在乎,普通人把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家庭卫生也很差,实际上直到1660年,用水冲刷的厕所才由巴黎传入英国上层人士的家庭,而一般家庭则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一直使用公用厕所,其卫生状况可想而知。19世纪初一位英国矿工告诉调查人员说:"我认为(矿区的)姑娘很少洗澡",至于男子,"他们的身子和脚就像你(指调查人员)的帽子一样黑。"当穷人被召入工厂干活时,他们经常抵制洗澡;有个人这样抗议说:洗澡如同"剥去他穿了许多年的一件大衣一样。"上层社会的人士也不例外。虽然清洁卫生同文明举止早已建立了联系,但这仅限于洗手洗脸及服饰的整洁,全身的清洁卫生还没有成为人们的习惯。17世纪中叶,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建了100个浴室,到了18世纪反而拆除了30个。1798年,一位富有的商人在费城自己家的后院装了一套淋浴设施,一年以后,他的65岁的妻子伊丽莎白第一次进去洗了澡。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比预想的要好。过去28年来我没有全身洗过一次澡。"而这位伊丽莎白女士被认为是"举止文雅、受人爱戴"的人。上层社会个人卫生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之前,男人们都到自然水域去洗澡,而这些地方是不准许妇女去的。18世纪末,英国上层开始注意个人卫生,并逐渐传至欧洲和北美。18世纪90年代,人们到公共浴室去洗澡,公共浴室偶尔也对妇女开放。1792年纽约才有了一个比较卫生的公共浴室。在英国,直到1844年才在利物浦开设了第一家公共浴室,普通人民才有了经常洗澡的机会。至于家庭洗澡间要到20世纪初才在欧美国家的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中普及。公共卫生,特别是城市中的公共卫生状况更加糟糕:道路泥泞,污水垃圾遍地,厕所很原始,数量也不足,例如在曼彻斯特

的一些地方,200 多人才有一个厕所。英国人查德威克通过调查,认为疾病同不卫生有密切的联系,并在 1842 年发表了一个经过 3 年调查写成的报告,提出建立干净的自来水系统,保证个人和公共用水卫生,建立地下排污系统,清扫街道等建议。他的这个报告成为英国第一个《公共卫生法》(1848 年)的基础。1855 年伦敦开始了下水道现代化工程,到 1875 年全部完工。在 40 年代,公共卫生运动在美、法、德等国获得支持,到了 60 年代,自来水和地下排污系统已经在欧洲各城市初步形成。1868 年,巴斯德的细菌理论获得证实,更大大促进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随着社会总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学的进步,人们的健康状况开始得到改善。1890 年以后,城市中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1910 年,城市人口的死亡率接近乡村中的水平。1815 年,西方国家人们的期望寿命是 25～30 岁,而到了 1914 年则已达到 50 岁。

城市生活

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化,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在英国,生活在 2 万人以上城市中的人口(英格兰和威尔士)在 1801 年是 150 万,占人口总数的 17%;1851 年是 630 万,占人口总数的 35%;1891 年是1 560万,占人口总数的 54%。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城市人口的剧增给城市住房、交通等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早期城市住房拥挤,道路狭窄。18 世纪时许多城市的富人居住区和商业区是用油灯照明,到 19 世纪初才有了煤气灯作公共照明(1786 年最早在德国和英国试用煤气点灯,但是直到 1807 年伦敦才开始用煤气灯照明,1822 年美国波士顿使用煤气灯照明)。下层人民在住房和交通方面遇到的困难就更大。1842 年,一位住在苏格兰的医生说:“一个房间住 6～8 个人甚至 10 个人的事是极普通的。”交通也是早期城市的一个大问题。富有的人靠自己的马车,再差一点的靠出租马车,至于比较贫穷的人只能靠步行。直到 19 世纪初,大众化交通工具才开始出现。1825 年伦敦出现了马拉的公共客车。但是由于当时城市街道狭窄,特别是在贫民区,大众交通工具不能普及。虽然当时曾有人提出过城市的规划改造,但是没有付诸实施。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工作是 19 世纪 50 年代在巴黎开始的。1850 年巴黎的道路狭窄、阴暗,建筑非常拥挤,到处都是贫民窟,公共卫生条件也很差,人口的死亡率很高。整个市区只有两个公园,公共交通设施很少。巴黎的改建工程推倒了许多旧的建筑,特别是铲除了许多贫民窟,拓宽展直了街道,街道两旁种植了树木,以凯旋门和巴黎歌剧院为中心,形成了横贯市区和郊区的林荫大道,大大改善了城市的交通条件和居住条件。城市中到处建立了小的公园和公共广场,城市两边各建了一个很大的公园,能够容纳各式各样的大型节日庆祝活动。城市的供水系统也进行了改建,巴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1870 年开始,欧洲各城市纷纷效仿巴黎进行了改建。随着城市改建工作的完成,大众交通工具开始普及。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在美国出现了马拉

的轨道公共客车,70年代欧洲各城市都建立了这种公共交通系统。到90年代,美国又出现了城市有轨电车,并很快在欧美各城市普及。1886年,马拉轨道客车在奥匈帝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共载运了大约9亿人次,而到1910年,有轨电车在这4国共运送了67亿人次。城市交通的改善同时促进了住房的改善,有了便宜的交通工具便可以在比较远的地方找到更便宜更好的住房。欧洲的一些城市在市郊建立了工人住宅区,下层人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到1901年,按英格兰的官方标准,两个人以上住在一个房间里属"过度拥挤",而这样的人在城市中占人口的9%,这说明住房条件已经有所改善。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已经开始在郊区和风景胜地购买房地产,建造别墅。

人口

欧洲17世纪人口增长比较慢,每年大约增长0.5%~1%之间。在土地比较辽阔的地方,如北美的新英格兰和俄国,人口增长率要超过1%,但人口已经比较密集的地方,如在法国,则低于0.5%。有的年份,死亡率超过出生率,造成了人口大幅度下降,比如遇有战争、瘟疫和饥荒的年代。三十年战争曾使人口大减,在德国许多地区人口减少2/3,大部分地区至少减少1/3,德国总人口减少了40%以上。1750年以后,人口开始稳定地增长,特别像英、法、北美、爱尔兰、意大利、俄国等国。促使欧洲人口稳定增长的因素很多,包括诸如生活的改善、医学的进步,甚至还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1600年以后,鼠疫在欧洲开始得到控制,主要原因是在欧洲出现了一种灰色的亚洲鼠,取代了传播鼠疫最厉害的黑鼠,使鼠疫的发病率大大降低。欧洲人口在1750年时有1.4亿,到1800年时达1.88亿,1850年达到2.66亿,几乎每半个世纪增加约40%。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民开始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从1840年到1910年,法国的出生率从28‰下降到20‰;瑞典从31‰下降到25.5‰;德国从36.5‰下降到29‰;英国从32‰下降到25.5‰。19世纪60年代结婚的妇女平均有6个孩子,而到了90年代则平均只有4个孩子。在英法等国,已经普遍采用了民间避孕方法来减少生育。控制生育的原因主要有:物质生活的改善和医学的进步减少了婴儿死亡率,人们不再需要靠多生育来保证传宗接代;妇女更多地走出了家庭,特别是下层妇女,为了工作糊口,不得不少生育;资本主义社会使个人的才干得到了较大的发挥,许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人士,不愿意子女过多而影响事业;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中下层人民,希望通过少生育而使子女得到更好的养育和更高的教育,改善家庭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正如一位年轻的德国技工回答他为什么少要孩子时所说:"我们要取得更好的社会地位,我们的女儿应当比我妻子和姐妹生活得更好。"但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特别是还没有工业化的地区,如爱尔兰、俄国中部、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在19世纪中叶以后,人口仍然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结果是更加贫困化和大量地向外移民,特别是向北美移民。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人口流动和各

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因素。

家庭 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核心家庭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形式。例如,英国的宗族和家族从1500年开始衰落,到17世纪中叶,家庭成员的平均数目降到了5人左右,核心家庭已占统治地位。法律和传统的习惯使子女一结婚就离开父母自立家庭,虽然仍有很多人同父母住在一起,但都是父母投靠子女而非子女婚后留在父母家中。对子女的自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婚姻的模式。一般说来,在核心家庭中,男女为了经济上的自立不得不晚婚,特别是当土地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时,儿子要等到父亲死后才能继承土地来支持自己的家庭;同样,女方的家庭要为女儿积聚一笔嫁妆以帮助女儿建立家庭。17世纪以及18世纪初,在欧洲,15～40岁的育龄妇女中,2/5～3/5的人没有结婚。根据对英国当时一个村庄的研究发现,男女结婚年龄平均在27岁或以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妇女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是30岁。18世纪早期,法国男女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30岁,还有相当多的一些人从来没有结过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也造成了结婚年龄的推迟。例如在奥地利和德国,一直到19世纪,法律对穷人结婚还有限制,穷人结婚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批准;这些官员认为穷人结婚,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贫儿和弃儿需要政府照顾,要花费更多的救济金。例外的情况是在北美殖民地,由于土地比较容易获得,年轻人结婚比较早,特别是在南方各殖民地。

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由于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开始,晚婚的模式被打破了。工业的发展使收入的来源不再局限于土地,使更多的人离开土地也能够在经济上自立,不再需要等待继承土地。当时一位瑞士人说:“工场手工业与农业结合,使结婚的速度加快,数量猛增,……造成了房舍和村庄膨胀。”1750年以后,特别是在手工工场工人中间,婚姻更加自由,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加强了。许多穷人在“仅有两架纺车,甚至还没有一张床的情况下”就结了婚。一直到1850年止,欧洲的平均结婚年龄在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非婚生子女也在增加,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城市中。在18世纪初,法兰克福的非婚生子女占2%左右,到60年代上升到5%;1800年达10%,1850年达到高峰,为25%左右。在法国的波尔多,1840年的非婚生子女达33%。小城镇比例稍低,1750年平均在1%～3%,1850年达10%～20%。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青年人进入工场和工厂,更少受到家庭和村社的限制;对带有阶级歧视性规定(如不准穷人结婚)的反抗;对宗教的反抗(法国大革命后私生子的数量激增),等等。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一时期工人生活困苦,经济上没有能力建立家庭,结果把子女抛向了社会。

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人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家庭比18世纪末19世纪初稳定,婚姻和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850年,在工人

中间,恋爱婚姻已经取代工业化前的那种长期求婚过程和买卖婚姻。当时一位法国人说:“现在的年轻人经常让有很多嫁妆的姑娘求婚不成,因为他们结婚一般是因为相爱而不是为了财产”。婚姻双方更多地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城市,年龄也更加接近,富有的老头和少女结婚的情况少了,说明爱情的位置更加重要。不过,婚前的性行为并没有减少。1900 年在欧洲的许多城市中,大约有 1/3 的妇女结婚时已经怀孕,但私生子减少了,这说明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使他们最终能与自己相爱的人建立家庭。在工人阶级中,婚后的亲戚关系比较密切,他们虽然不同父母住在一起,但相距比较近,一个大的家族通常都住在一个社区之内,因为他们更需要亲戚在疾病、失业、生死事故和衰老时加以关照。亲密的关系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星期天的聚餐和家访、调剂衣物、互通有用的消息等。

对中产阶级来说,经济考虑在婚姻中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女儿按父母安排结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法国,索取嫁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通常作法。对许多家庭来说,婚姻是一生中最大的一笔买卖。当时一位作者告诉年轻的法国人:“结婚一般说来是增加一个人的地位和财富的手段,是保证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途径”。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中产阶级的男子结婚比较晚,而且挑选比较年轻的伴侣。这种年龄上的差别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很低,妻子被认为是从属于丈夫的。除美国外,欧洲各国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妻子还没有独立的地位,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像卢梭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认为妇女天生低劣。妻子的义务是为丈夫生养孩子和“提高丈夫的心境”,成为丈夫的装饰品,特别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中情况更是如此。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双重的家庭道德观念。男子可以在外寻花问柳,而女子则必须严守贞操。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女子受到母亲严格的监管。母亲为女儿挑选配偶,像保卫家庭财产一样保卫她的贞操。对男孩的管教比较松,中产阶级的男子在青少年时期调戏女佣和在外面宿娼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欧洲各城市中都有妓院,从 1871 年到 1903 年,仅巴黎一地就有注册的妓女 15.5 万人,还有 75 万人被怀疑是妓女。妓院的主要顾客是上层阶级的人士。

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儿童在家庭中受到严格的管教,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比较淡漠,打骂儿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像斯威夫特这样的作家都赞成“节省了棍子则惯坏了孩子”的说法。1660 年以前英国出身高贵的人是不受体罚的,但儿童和少年则被视为例外。卫斯理教派的创始人卫斯理的母亲说,父母对子女的首要任务是“征服他们的意志,使他们顺从。”1756 年一位法国人观察到,“一想到要爱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就会感到脸红。”据说同时代的英国绅士“对自己马的疾病要比对自己的孩子更关心。”弃婴和溺婴现象也很普遍。18 世纪 70

年代，巴黎所有婴儿中有1/3被遗弃，而其中又有1/3是被已婚父母遗弃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如贫困、传统观念等，而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很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医学还很落后，很多名医都认为儿童生了病没法治疗，父母并不期望每一个子女都能长大成人，上层社会也是如此。安娜女王生的19个孩子没有一个成活；历史学家吉本的父亲为5个孩子都取了与自己同样的名字，希望能有一个活下来，把他的名字传下去，结果只有吉本一人活了下来，可见父亲的顾虑不是多余的。此外，当时在中上层社会还流行雇奶妈喂养婴儿的习俗，她们认为亲自喂乳婴儿是一件粗野的事情，有失她们的身份，甚至连工匠家庭的妇女如果可能也雇奶妈哺乳婴儿。这也使母亲与子女间的感情淡薄。到18世纪末，社会对儿童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这与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倡导以及育儿科学知识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包裹婴儿限制其手脚活动的习俗开始消失，越来越多的母亲亲自为孩子哺乳，婴儿死亡率下降，生育的数目开始减少，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更加集中，特别在劳动人民的家庭。19世纪社会对子女关系的普遍看法是：母亲和子女的关系要融洽，而父亲对子女则应严肃甚至严厉，爱只给予取得成功的子女，中上层社会的看法也是如此。

教育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大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上层社会把有文化看成本阶级的一种标志，上层的佛罗伦萨人在孩子5～6岁时就送他们去上学。资产阶级也以读书为荣，业余时间阅读文学作品被当作一种美德，为了阅读文学作品，识字成了一个人必需的能力。人文主义者强调通过阅读古典作品而形成好的道德品质（而经院派则主张通过阅读来积累知识），其教育的目标是雄辩和品行，而不是经院派主张的推理能力的培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对妇女教育的态度。上层社会要求本阶级的女性能知书达礼，学习音乐绘画，尽管其目的是为了装饰上层阶级的家庭，但客观上促进了妇女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文艺复兴的中心城市，工匠中能读书认字的也很普及。如果说文艺复兴对教育的贡献仅限于中上层社会的话，那么新教的兴起则在广大群众中起了一种普及教育的作用。新教要求教徒能阅读圣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得救，所以识字教育也就成了新教各派的目标，新教国家的教育也比较普及。从17世纪中叶开始，长老会派控制的苏格兰建立了教区学校网，为各阶级的儿童提供学会读写和取得宗教知识的基本场所。1682年法国建立了基督教学校，教儿童教义问答和基本读写知识。英国圣公会以及其他新教各派也都建立起了“慈善学校”，教育贫苦儿童。1717年，普鲁士法律规定强制儿童入小学学习。1600—1800年间西方的文盲率大大下降，特别是1700年以后。在17世纪以前，学校还是各种年龄的人合在一起学习的地方。17世纪以后出现了专为儿童开设的学校，识字教育已经成为西欧各国的普遍现象。1600年，在法国和苏格兰，每6个成年人中仅有一个略微识字，在英国每4

个人有一个。到了1800年，苏格兰90%以上成年人识字，法国有2/3的成年人识字（在诺曼底则达90%），英国有一半多的人识字。妇女的识字率要低一些。1840年（这一年开始有了统计），新婚男子中有2/3的人识字，而新婚女子只有1/2。到1850年，西方主要国家中，60%以上的成年人能够读书写字（如果不把妇女包括在内，百分比还要高）。

高层文化

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人文主义兴起的时代，文学取代了逻辑成为首要的学问，文法、修辞、伦理和历史在学术领域占了统治地位。人文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向往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挖掘它们的文化遗产。学者们游历意大利各地去欣赏古建筑和古迹，搜集古代手稿，连王宫贵族也附庸风雅。威尼斯人找到了一段他们认为是历史学家李维的臂骨，送给了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他把它同基督圣徒的遗骨放在一起。有人甚至卖了一个农场去买一部李维的手稿。社会对古希腊罗马发生兴趣，就是重新肯定了古希腊罗马的价值观和美学观，最后形成了统治欧洲上层文化几个世纪之久的古典主义思潮。早期文艺复兴的巨匠借助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追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像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伟大的艺术家。后来，古希腊罗马的美学原则逐渐变成了僵死的教条，特别是在欧洲各国宫廷纷纷赞助艺术，艺术和宫廷的文化需要相结合之后形成了所谓的学院派。古典主义者认为古希腊罗马人发现了永恒的美学规律，当代艺术家的任务就是模仿他们。古典主义注重艺术的外在形式，表现题材多为古代神话、宗教故事、重大历史事件和伟大人物，表现手法细腻、注意细节。当然，古典主义时期艺术家中也不乏伟人和创新者，像康乃依、博马舍、画家戈雅、大卫、音乐家巴赫等。古典主义在17、18世纪的欧洲占有统治地位，对这一时期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如在建筑方面，讲究的是对称和仿古，内部装饰华丽。凡尔赛宫就是古典主义影响的产物：它讲究外观的对称、黄金分割律①和仿效古希腊罗马风格。在服饰上，戴假发、涂粉成为上层社会的风尚，而拉丁语和希腊语成了知识界、法律界和上流社会必学的语言。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古典主义时期的结束。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激进运动相对应的是文化领域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初达到高峰，对欧洲的文学艺术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浪漫主义的思想先驱是卢梭，他在启蒙思想家中首先对理性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认为感情比理性更可靠，主张自由创造和效法自然。他的学说影响很大。18世纪90年代，浪漫主义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层文化的主流，首

---

① 工艺美术品的长和宽在设计中的一种比例，从古希腊到19世纪都有人认为，这种比例在造型艺术中有美学价值。

先是在英国和德国，后来在法国得到发展。浪漫主义艺术家以感情指导艺术和生活。狂热、自杀、决斗是这一时期艺术家中常见的现象。他们一般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留着长发，不修边幅，不像古典派那样戴着涂粉的假发。他们厌弃物质生活而追求精神崇高，把人性的充分发展和发挥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他们一般对工业化持反对态度，向往自然，把自然看成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东西。他们重视历史，认为历史不是为了解释哲学理论的，它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本身具有的美和激动人心的特点。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中，文学家有德国的歌德和"狂飙突起运动"的其他人物，英国的渥兹华斯、科勒律芝、斯科特、拜伦、雪莱和济兹，俄国的普希金，法国的拉马丁、雨果、大仲马、乔治桑；历史学家有英国的卡莱尔，法国的密芝勒；艺术家中最伟大的代表是法国的德勒克洛瓦；音乐家有肖邦、舒曼、李斯特和贝多芬。浪漫主义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反映了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也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们的装束、语言、闲暇文化生活，等等。

工业革命完成以后，现实主义开始取代浪漫主义，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潮，从 19 世纪 40—90 年代一直统治着西方文化界。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用客观的眼光来观察和重现世界的本来面目，反对浪漫主义对不寻常的事件、光辉的业绩和崇高的追求，而注意表现下层普通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大胆地描写过去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的暴力、罢工、酗酒、性欲等内容。其代表作家有法国的左拉、巴尔扎克、福楼拜，英国的乔治·艾略特、哈代，俄国的托尔斯泰，美国的德莱塞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代表有俄国的列宾，英国的密莱司，法国的杜米埃、库尔贝、米勒以及后来的印象派画家，他们的特点是放弃浪漫主义时代伟大事件和英雄人物的主题，而以普通人特别是下层人民的生活为主题，在画法上不像前人那样精雕细琢和追求形式上的完美。现实主义思潮使社会注意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它对 19 世纪下半叶欧美各国的社会改良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低层文化娱乐和体育等

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的娱乐方式，许多娱乐是体现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各种娱乐方式都有一种民主化的倾向，即为各阶级人民普遍接受。这种倾向反映了社会总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和总的社会闲暇时间的增多，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经济能力和时间，来从事以前不可能参加的娱乐活动。但就某一具体时期来说，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娱乐有着很大区别。

在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下层人民的闲暇时间很少，他们主要的娱乐是去小酒店喝酒。18 世纪以前，大量饮用的是淡啤酒。18 世纪初，劣质的烈性酒开始出现。社会各阶层都酗酒。另外看斗鸡、斗牛也很盛行，甚至行刑也总要引来一大批围观者。吸烟于 18 世纪初已经流行于各个阶层，都是用长烟斗吸，有些地方

（如英国西南部）男女甚至儿童都在晚上吸烟斗，吸鼻烟也越来越普遍。上层人士的消遣有打猎、体育运动（高尔夫球、板球等）、赛马、社会舞会、戏剧等；他们也时常去玩一些下层人民的娱乐活动，如斗鸡、斗牛等活动。赌博是各阶层都普遍参加的活动。1702 年英国女王安娜首次同意以赛马开赌，赛马和赌博就成了同义词，很快传到欧美各地。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各种体育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垒球、足球、羽毛球、网球、溜冰、田径运动纷纷诞生，特别是足球和田径比赛不但吸引了许多参加者，而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成了各阶层人士所喜爱的消遣，对体育比赛下赌注也是很普遍的作法。斗鸡、斗牛等活动到这时已经不很流行了。除了体育以外，19 世纪下半叶欧洲还流行音乐间和大篷剧场，这都是下层人民常去的地方。音乐间类似酒吧，人们可以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唱，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粗俗的情歌和流行歌曲，并且也是传播社会新闻的主要场所。1900 年，仅伦敦就有 50 多个这样的音乐间。大篷剧场可以容纳很多观众，价格便宜，是进不起剧院的下层人民看戏的地方。

总之，随着资本主义工农业的高度发展，在近代西方世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当然，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存在着重大差别，但是人们（包括下层人民）生活不同程度的提高则是事实。

第三节　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亚非拉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一、亚洲诸国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大量向中国倾销，这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作物商品化程度加深了，一批商业城市出现了。自然经济的破坏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

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一场低层次的近代化运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也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它是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性质的工业。民用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的产品进入市场，追逐利润，雇佣工人，有劳资关系，对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70 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出现。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商人投资于近代机器工业；一些旧式手工工场、手工作坊采用了外国机器进行生产，使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厂企业。从 1872 年至 1894 年，资本在 1 万元以上

的企业有54家,总资本约480万元。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缫丝业、轧花业、纺织业、面粉业、印刷业和火柴业等轻工业部门,在重工业方面显得比较薄弱。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一般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大部分企业集中在通商口岸地区。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处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对立又依赖、既矛盾又联系的复杂关系之中。外国侵略者为了保持在华的权益,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采用各种手段破坏中国的民族工业。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各种特权,在价格、市场、原料等方面千方百计挤垮或吞并中国民间资本企业。中国封建势力又极力阻挠和破坏民间资本企业的发展,他们利用政权的力量,在捐税、厘金等方面对民间企业敲诈勒索。顽固派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禁止开办民间工业。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排挤和限制私人工矿企业。因此,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发展道路上遇到了重重困难,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已经无力继续垄断近代新式企业,准许私人投资设厂。据统计,1895—1898年,民间创办的较大厂矿有62家,资本额在1 240万元以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这是因为:第一,一部分爱国士大夫和民族工商业者抵制洋商洋厂,纷纷要求“设厂自救”;第二,在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刺激下,许多华商“眼红”洋商在中国牟取的暴利,纷纷投资创办新式企业。但是,在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下,民间资本企业仍是一些孤立的岛屿。由于外国资本的排挤和封建势力的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十分艰难。

但是,民族资本所面临的更大威胁,来自资本主义列强。

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如前所述(见第五章第四节、二),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产生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结局,即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侵略势力不仅在越南建立殖民统治,而且渐渐伸入我国西南地区。

19世纪晚期,中国除了西方列强的威胁外,还面临一个新的威胁——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势力。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产生了侵略中国的野心,到70年代就把它确定为一个国策。日本统治阶级决定以邻邦中国为牺牲品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甲午战争”。双方先后在黄海海面、辽东半岛、威海卫进行海陆作战。李鸿章全力经营的北洋舰队,终于败于日本海军,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

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束了“甲午战争”,它的主要内容是:(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

此外，日本还取得在中国的其他特权。但是后来在俄、法、德三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但中国需向日本交纳3 000万两白银作为代价。《马关条约》扩大并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压迫，从此，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1896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廷应俄国邀请，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祝贺。沙俄借机对李鸿章威逼利诱，于 6 月 3 日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其中规定，俄国军舰可驶入中国任何口岸，允许俄国修建通过中国黑、吉两省到达海参崴的铁路，等等。1898 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将整个东北地区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

此后，列强接踵而来。德国以“迫日还辽”有功，并以曹州教案为借口，于 1898 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将山东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法国、英国因受到俄、德的刺激，也提出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要求。法国在俄国支持下，早在 1895 年就强占了云南边境一些地区，进而迫使清政府增开了口岸，取得在云南、两广优先开矿的权益。1898 年 4 月，法国又逼清政府不得将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让予他国，并取得中国邮政管理，修筑滇越铁路等特权。1899 年 11 月，清政府和法国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规定广州湾(今湛江)及附近海面租借给法国，租期 99 年。从此，云南、两广大部地区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以法国租借广州湾，威胁香港安全为借口，要求扩展香港界址。1898 年 6 月，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了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线街以北及其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租期 99 年。同时，英国又为了防止俄国南下，于 1898 年 7 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强租了威海卫。1898 年 2 月，英国还要求清政府保证，不得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借给他国。从此，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看到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不满足从《马关条约》攫取的特权，1898 年 4 月，日本向中国提出，福建省内之地，不得割让或租借给他国。清政府很快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本将福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与西班牙进行战争，并且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及附近地区，无暇顾及中国。美西战争结束后，1899 年 9 月，美国立即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不仅避免了美国在华利益从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内被排挤出去的危险，而且使美国的触角伸入到别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并享受与各国同等的侵华特权。“门户开放”政策实质上是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妥协方案，反映了列强在政治上共管中国的野心。

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增设银行，影响并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列强还向清政府提供政治性贷款，在华开办各类工矿企业、争夺在中国的铁

路投资权。总之，“甲午战争”以后，英、法、俄、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成一块块势力范围，标志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也是向瓜分中国迈出的第一步。

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豆剖迫在眉睫，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震惊了一批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社会各阶层人士也都从各自的社会地位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救亡图存的方案。此后不久的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就是在这种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中国的变法理论与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

“西学东渐”的第二个浪潮

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局面，一度中断的“西学东渐”浪潮再次兴起。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相比，这次来势更为迅猛，“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它包括了西方工业社会的整个文明，既包括科学技术的物质器用文明，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制度和科学、民主等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文明。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魏源、林则徐等人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物质器用方面的反应。从哪里失足，就从哪里起步。面对被西方坚船利炮战败的现实，先进的中国人就致力于获得发展民族的物质力量，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后来洋务派大官僚们沿此思路，集中发展实业，从军事工业、养兵练兵之道到一般工业的发展，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拉开了帷幕。

在这次“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下，洋务派大官僚们一反过去所恪守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冲破了“夷夏之防”和“闭关自守”的观念，接受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盲目优越感而未触及文化思想的深层，但毕竟为“西学”在中国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它使中国人切实地看到了另一个陌生世界的文化，并在 19 世纪 60—90 年代探索中西文化可能结合的形式。“西学东渐”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某些新鲜东西：在引进技术过程中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造成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它导致一些社会机构发生变化，如旧式书院逐渐向新式学堂过渡；在汲取声光电化科技中产生了一批科技人员。这些封建文化的“异军”，用以新卫旧的“中体西用”的形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大转折。此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的特点，在于它使中国逐渐有了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文化。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的严复，代表先进的知识分子，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议会民主政治。1898 年，他的《天演论》译本用进化论敲响了中国救亡图存的警钟，激发了

人们的爱国热情。他用卢梭等启蒙学者的“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大胆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否定至高无上的天子的价值，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他提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原则，用天赋人权的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应当强调的是，他突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新命题，认为“体”与“用”二者浑为一体，不可分割。“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他指出，民主并非西方之体，而是用，自由才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质所在。这一命题把先进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准备。

严复还介绍了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并在《救亡决论》中比较了中西文化在世界观、认识论、逻辑方法论和道德等方面的对立。由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使世界开始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

康梁的变法理论

随着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形成。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独立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以挽救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们从小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后来，又从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在 1885—1898 年间，康有为先后著成《人类公理》（后改名为《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广泛吸收并糅和了儒家“大同”、“小康”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学说以及佛学等各种思想学说，熔铸成他的大同思想。他向人们描绘的是一个在他看来是“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大同社会”。这个社会实行高度的民主、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具有高度的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物质十分丰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虽然他在描述“大同”社会时使用一些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语言，但他所憧憬的理想其实是个资产阶级王国。因为他所谓的“无有阶级”，其实是指废除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他所谓的“人人平等”，仅仅是“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意义上的平等，这属于资产阶级的平等概念。他理想中的“大同”之世，是有国家和政府的，即经他美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写道：“凡扫尽阶级而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原来美国成了他的“大同社会”的标本。

《新学伪经考》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

的传统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有力地打击了守旧派“恪守祖训”的思想，给维新变法在思想上开拓了道路。《孔子改制考》几乎把孔子打扮成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倡导者，尊孔子为“托古改制”的教主，并附会公羊学派的“张三世”说，即社会历史是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由低级向高级阶段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打击了泥古不化、万世不变的观点，为维新变法制造了理论根据。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助手，他以犀利流畅的文笔宣传了变法的思想理论。他的变法理论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为依据，以救亡图存为急务，以“育人才、开民智、变官制”为核心。梁启超变法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他主张以君主立宪政体代替君主专制政体，促进社会的进化。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是封建社会急剧崩溃和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现实的反映，表现出与封建阶级还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初兴的资产阶级，面对这种现实而急欲寻求出路。

在从 1888 年到 1898 年的 10 年中，康有为 7 次向清朝皇帝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力陈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指出变则强，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的道理，从而逐步坚定了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决心。在这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创刊了一些报纸，成立了学会，宣传变法理论，争取官僚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君主专制政体进行猛烈攻击，要求仿照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他们倡议民权，争取政治上获得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实行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他们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以此为武器，同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康、梁的变法理论和实践，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远征中，突破了近代半个世纪以来思想界只学西方皮毛，不学其根本的局限，提出了改造国民深层文化土壤的启蒙主张，达到了体制变革的高度，使民主主义思想在知识界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为以后的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更加深重。1901 年 9 月，11 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列强向中国勒索 4.5 亿两白银，几乎控制了中国的重要税收；派兵驻扎在中国境内的战略要地，控制了京、津地区；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操纵中国的对外机构。通过《辛丑条约》，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在华权益，在严重破坏中国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以及干涉中国内政的前提下，维持了清朝的统治。因此，《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完全确立。

20世纪初，在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推动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1900年以后，民主革命派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孙中山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伟大旗帜。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人。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暴行，使孙中山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甲午战争以后，孙中山看到腐败的清王朝已无可挽救，便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孙中山发起在日本东京创立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它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核心。

民族主义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抗满洲贵族的压迫，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但不是种族复仇；第二，国内各民族平等平权，实现"五族共和"；第三，改变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状况，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孙中山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是"异种残之，外邦逼之"，解决民族压迫问题，就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了清朝，对外既可以打击帝国主义列强，对内又可以实现各族一律平等。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广泛的号召力。它在动员人民群众与清朝政府作斗争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它的基本内容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权利。孙中山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只有"民主立宪"才是"最为相宜的"政治制度。因此，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刻不容缓。他论证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说，民族主义是要扫尽"现在的恶劣政治"；民权主义是要彻底挖掘"那恶劣政治的根本"，这两个主义是一个完整体系的两个内容；这两种革命是一次行动的两个方面。孙中山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学说，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的国情，第一次提出了在中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宪法方案。"五权分立"还包括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其基本精神是直接民权，其中选举权和创制权体现了人民的主权，罢免权和复决权是人民保留期间的收回权。五权分立和直接民权思想反映出孙中山对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精神，闪耀着革命民主主义的光辉，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不过，究竟怎样才能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孙中山没能作出完满的答复。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它的主要内容，一是平均地权，二

是节制资本。辛亥革命时期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孙中山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土地为少数人垄断、贫富悬殊的状况,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第二次革命,他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列宁对孙中山这种主张作过评论:"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列宁又指出,孙中山的主张"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空想。但列宁同时也指出孙中山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内核",①因为这是反封建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的纲领。由资产阶级实行土地国有,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恰恰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总之,民生主义的实质是涂上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

三民主义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如民族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希望帝国主义能够赞助中国革命;民权主义没有提出发动人民群众的具体措施,对封建势力有很大的妥协性;民生主义反对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等等。但是,三民主义是当时亚洲最完整的具有民主思想体系的革命理论,它的本质是进步的、革命的,它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在侵略朝鲜的列强中,日本走在最前面。日本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集团处心积虑,企图征服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为了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朝鲜,用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在明治维新后还不到 10 年,日本就向朝鲜进犯了。

1875 年 5—6 月,日本出动云扬号等三艘军舰,在釜山港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9 月,云扬号逼近江华岛,企图占领草芝镇炮台,被朝鲜海岸炮兵击退。此后,日本便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不断侵扰釜山,并于 1876 年 1 月派舰队侵入江华岛一带,提出侵犯朝鲜主权的要求。2 月,闵氏外戚派在江华府同日本缔结了《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共 20 条,其要点是:开放釜山等通商口岸;在指定港口内设领事馆,赋予日本领事裁判权;日本有权自由测量朝鲜沿海岛屿和绘制海图。条约没有规定朝鲜人民在日本应享受的权利,也没有日本对朝鲜承担的义务。这是朝

---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1～296 页。

鲜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7月，日本又强迫朝鲜缔结《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进而取得了日货免纳关税等特权。1880年和1882年，元山和仁川先后向日本开放，闭关自守局面结束。

通商口岸开放后，封建官僚和地主在源源流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刺激下，卖官行贿、侈糜风盛，腐败不堪。1882年7月，爆发了反对封建虐政和反对日本侵略的"壬午兵变"。闵氏外戚派在镇压兵变后，于8月同日本又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增加了日本在朝鲜驻军等特权。

继日本之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奥匈帝国，都同朝鲜缔结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封建统治阶级使朝鲜与世隔绝的政策破产了。马克思在1853年论及中国问题时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 朝鲜在"壬午兵变"前后，也和中国一样，由封闭走向开放，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封建朝鲜的解体和半殖民地化进程加快了。

面对开港后的危机，吴庆锡、刘鸿基等受到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的影响，主张开化改革；并培养了开化派骨干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开化派深受实学派启蒙，并为资本主义所吸引，但由于对日本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便企图借助日本势力，改革朝政。1882年2月至1883年4月期间，金玉均三次去日本考察借款。1884年10月，日驻朝公使竹添进一返任。11月4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会见日使馆秘书岛村，请求日本军队帮助政变。日本为扩大对朝侵略，便给以肯定答复。

1884年(甲申)12月4日，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开化派夺取政权，建立了新政府。5日，以国王谕旨形式颁布新政纲。政纲的要点是：闭止门阀，以制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事；革改通国地租之法；革罢冗官；革罢庇护官商的惠商局；统一财政管理；削弱王权，改革行政机构。6日下午，闵妃外戚派依靠清朝军队，打败日军，并于晚上攻下日本使馆。金玉均等人随日本公使逃到仁川，后亡命日本和美国。甲申政变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政府在政变失败后，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赔款的《汉城条约》，又同清朝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两国军队撤出朝鲜。

1884年5月朝俄通商条约签订，朝俄两国在汉城举行关于俄国租借松田湾和派俄军事教官的谈判，使英俄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激化。1885年3月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由于俄国抗议，1887年2月撤离。美国利用英俄矛盾，插手朝鲜，美国人迈立尔、德尼和李仙德控制了海关和外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日本在朝鲜政治上依然处于劣势，闵氏派掌握着实权。但日本在经济上却处于绝对优势。日本对朝鲜的输出，1892 年比 1885 年增加将近 2 倍。日本垄断了朝鲜的海运，它的船只约占朝鲜口岸外国船只总吨位的 80%。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屈服于外国压力，勾结外国势力，对人民加紧盘剥，激起了农民日益频繁的反抗。

东学教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旗帜。它的第一代教主崔济愚于 1860 年创教，宣传东学天道的思想，1864 年被李朝镇压。1892、1893 年，第二代教主崔月海举行了 3 次为教主申冤的群众运动。"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1894 年全琫准（1854—1895）领导古阜农民起义，提出"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5 月 31 日攻下全州，声威大振。到 6 月初，农民起义扩大到朝鲜大半部。

6 月 11 日，全琫准同全罗道观察使谈判，缔结了全州协议 12 条，规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自治机构。全州协议后，全罗道各郡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执纲所"。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清朝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派军于 6 月 9 日到达全州。日本政府以保护使馆、帮助改革为借口，出兵朝鲜、占领王宫，强迫朝鲜政府宣布同清朝废约。25 日，日本海军袭击中国舰艇，中日战争爆发。8 月末，清军败退朝鲜。

全琫准于 9 月底在全罗道参礼讨论了"起众击日之事"，号召北上惩倭，得到了全州、清州等地农民、官吏、军队的响应。10 月 15 日，农民军在忠清南部论山，打败官军。16 日，全琫准在致宣抚使信中，明确宣布起义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惩处朝奸。23 日，5 万多农民军聚集公州地区，同日军和官军激战。11 月 8 日，农民军经敬川分两路进攻。日军从背后炮轰，农民军败退论山。11 月 25 日，全琫准率农民军到达金沟泰仁地区，占领城煌山、问加山，遭到日军和官军两面夹击，农民军从此溃散。全琫准被叛徒告密，于 12 月 30 日被捕，次年 3 月 17 日在汉城英勇就义。

这次朝鲜农民战争，史称"甲午农民战争"，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论，它是朝鲜旧式农民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这次农民战争进一步动摇了朝鲜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提高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觉悟，在朝鲜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印度的革命运动

在镇压 1857—1859 年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为了巩固在印度的统治，一方面加强了同印度封建主阶级的联盟，改组了英印军队；另一方面扩大市场，掠夺原料，加紧对印度的资本输出，加速铁路建设。1860 年印度铁路线为 1 300 公里，1870 年为 7 700 公里，到 1900 年增至 43 100 公里。20 世纪初，英国在印度的投资总额达 4.5 亿英镑。

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在轻纺工业中发展起来。到 70 年

代,全国有61家印度人经营的棉纺织厂,80年代增至156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无产阶级也发展起来,1894年产业工人已达35万人。

英国的教育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文化也热心于复兴印度文化的民族主义者。兰姆·摩罕·罗易(1772—1833)是最早的民族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博学多才,通晓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英文。1828年,他在加尔各答创建了以改革印度教及其社会习惯为宗旨的梵社。梵社派为孟加拉失望的知识界提供了精神食粮。罗易急于建立的普遍性的宗教,并未成功。但他为印度教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的非宗教性启蒙贡献在于热心于印度的现代化教育事业,反对压迫农民的土地法和抗议对出版事业的限制。他还反对寡妇殉葬,曾著书论证维护妇女的平等地位,成为印度第一个女权运动者。维帷卡南达(1861—1902)是孟加拉民族主义启蒙运动另一个著名代表人物。他曾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加深了对印度社会价值的认识。他的名言:"我不相信一个不能拭去寡妇眼泪或带给孤儿食物的宗教"。就是他对西方文明的反应。他回国后毫不犹豫地宣称:"我认为忽视人民群众,是最大的民族罪恶,这是我们堕落的原因之一。"

19世纪后半期,在孟买出现了印度民族主义启蒙运动的另一派别,即印度国民经济学派。这个学派对英国殖民当局只征收捐税、维持秩序和保护边疆而未增加国民财富、提高人民物质和道德生活水平而从理论上提出了抗议。

"印度复兴之父"马哈捷瓦·戈文达·伦那德(1842—1901)是这个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熟悉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著作,也注意印度的经济问题。他在浦那德干学院的《论印度政治经济学》的讲演,被称为印度经济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他不但是系统经济理论家,而且在1872—1873年领导了第一次倡导国货的"自产"运动,1896年积极赞助在加尔各答第一次举办的"自产"展览会。他还编辑《印度之光》和创办《浦那人民协会季刊》,鼓吹印度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的改革与复兴。

达达拜·纳奥罗吉(1825—1917)是印度早期启蒙活动家中第一个深入剖析英国对印度剥削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统治》一书中,指出印度由于英国的变相商业和经济剥削而贫穷了,财富由于英国人垄断而外流是人民困苦的根源。由此出发,他要求降低税收、减少贡赋和行政、军事支出,在政治上加强印度人地位,让更多的印度人参加管理,扩大印度人在立法会议中的名额。他和伦那德一样,也参加了许多实践活动,早在50年代,就建立政治组织。他一生共建立了几十个这样的组织,为社会改革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80年代,一大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从事律师工作的苏·班纳吉、斐鲁兹沙·梅达等人,从事教师工作的苏任德兰纳特、高卡尔,行政家拉加·

马德哈夫·拉奥、杜德，以及新闻记者苏布拉曼尼雅·艾耶尔·高斯等人，都是这批人物中的佼佼者。下面的数字可以证实80年代初印度启蒙运动所达到的水平：当时有487种民族主义报刊，大部分是用印度各种文字出版的；其中《甘露市场报》、《印度教徒报》、《论坛报》和《印度镜刊》最为著名。

资产阶级争取改革的启蒙运动的开展，为成立印度民族统一组织奠定了基础。苏·班纳吉在《一个民族在形成中》一书中，提到他办的“印度协会”可以作为建立“全印运动的中心”的基础，反映了建立全国民族主义组织的趋势。英国激进自由主义者代表休谟，觉察到这种趋势，从维护英国利益出发，得到殖民当局同意，发起了组织印度全国性政治团体的活动。

1885年12月28日，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在孟买举行成立大会。来自印度的72个代表中，半数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半数是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在休谟的建议下，班纳吉被选举为主席。要求民族主权和自治是大会的主要议题。大会对英国政府表示忠诚，同时要求改革行政、司法和教育，增加参政院中的民选议员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国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只限于宣传鼓动、向英国议会呈递请愿书和每年12月召开例行年会。第二届年会在加尔各答举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占了上风。在第三届年会上，阿拉哈巴大学毕业生潘迪特·马当·莫罕·马拉维亚崭露头角。早期的国大党领袖在精神上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自觉的印度传统思想的代表者。但是到了第二代，印度民族主义转入了复兴印度文化运动，而不再属于自由主义。孟加拉，特别是马哈拉什特是这个印度教传统的中心。不曾屈服的马拉特精神，在学者和思想家马哈迪夫·高文特·拉纳德的有力鼓舞下，重新恢复起来。不久，这种精神在富有战斗精神的新派领袖包尔·甘加达尔·提拉克（1856—1920）身上充分体现出来。

提拉克是一位坚强的正统印度教徒，精通梵文，是著名的学者、政治战略家和组织家。1880年他创力《狮报》，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罪行，宣传民主主义，反对稳健派元老们的妥协媚英行为，主张同英国殖民当局做一切形式的斗争，包括武装的暴力斗争在内，以实现印度自主。提拉克试图以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来组织群众性的政治斗争。300年前马拉塔人抗击莫卧儿统治的领袖西瓦吉，是提拉克向人民宣传的民族英雄。他虽不乏民主主义思想，但注重复活慈祥的智慧神，把民族复兴的基础放在印度教精神的基础上，并且在《薄伽梵歌的秘密》一书中，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提拉克和拉吉巴特·雷易、莫铁拉尔·高斯等人成为国大党“极端派”的著名领袖。

国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尤其是以提拉克为代表的“极端派”的活动，把印度的启蒙运动推向了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阶段。提拉克作为国大党新一代领袖的特征是强调群众性的革命政治行动，而国大党正是以这个特征迎接20世

纪初的“亚洲觉醒”时代。

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后，越南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主要抗争的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和爱国“文绅”的勤王运动。

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心在越南北部。越南的农民游击队和中国的黑旗军并肩作战。他们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常常使法军震惊。他们运用游击战术，突然袭击法国占领军，然后又迅速撤回山中。他们熟悉地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致使法国殖民统治深感不安。在1897年以前，法国占领军利用9月到次年5月的有利季节，对游击队进行定期扫荡。数千名法国士兵在扫荡中死于游击队的枪下和热带疾病。

在农民游击战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领导者。贫农出身的梁文楠，是1884—1892年安世农民起义领袖，他在1892年被叛徒害死。黄花探是1892—1913年安世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他给地主放过牛，当过佃户。法国侵入北圻以后，他加入了游击队。他久经战斗，富有军事指挥和组织才能，而且创造了游击战争的战术。首先，他统一了安世地区的各支游击队，联合了骁勇善战的山区部族。其次，他建立了游击队的根据地。最重要的，是他在1889年以后的反扫荡战斗中，采取了“避锐击惰，以逸待劳，临变从容，刻机神速”的游击战术，推广了群众创造的“竹尖陷阱”等方法，取得一连串胜利。1892年3月，他领导的游击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粉碎了法军的扫荡。1894年，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河内和谅山，使敌人的交通运输陷于混乱。同年5月，游击队在友芮战役中，重创法军之后，安然转回根据地。同年9月，游击队截击火车，活捉法国大地主、《北圻未来报》主编色斯耐，震动法国。1894年10月，法国殖民当局被迫同游击队签订停战协定，承认鸦南、牧山、安礼、友当归黄花探管辖，法军撤出安世地区，并付款赎回色斯耐等人。黄花探知道法国的缓兵之计，因此在法军再次进攻时，运用“彼归则出，彼出则归”的战术，化整为零，进行了两年多的战斗，粉碎了围剿。1897年12月，法国再次同黄花探签订了停战协定。此后，殖民当局施展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动用优势兵力，逐渐使游击队处于不利地位。1909年10月的郎山战役中，游击队遭到惨重损失。1913年3月10日，黄花探在安世森林中被殖民当局派遣的内奸杀害。

在游击队的活动之外，在越南和柬埔寨都发生过反法起义。但是，规模最大的是越南的勤王运动。法国占领越南后，以咸宜帝为代表的一部分爱国封建主不甘心作亡国奴，依靠人民群众同占领者进行了斗争。阮朝大臣尊室说组织了爱国武装力量，1885年7月5日夜，突然向顺化的法国占领军发动进攻，包围了军营。法国从海防等地调来援军。起义军同法军进行了两天战斗，终因组织软弱、计划不周、缺乏坚强领导和装备极差而失败。咸宜帝出走顺化，向全国发出

了反法勤王檄文。

顺化起义失败后，封建上层发生了新分裂。一部分人投降了法国。但是，咸宜帝的号召得到了各地爱国文绅和官吏们的热烈响应，人民群众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从1885—1896年间，在北圻的兴安、清化，在中圻的广治、平定，勤王起义具有全民抗法民族战争的性质。咸宜帝已成为民族独立的象征。

在勤王队伍中，潘廷逢领导的起义军多由农民群众组成，许多将领也都来自下层人民，因而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这支起义军战斗在河静、义安、广平、清化4省的广大地区，坚持时间最久。勤王起义军和农民反法军一样，凭借山林险要地势，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同法国占领军战斗了11年之久。

北部人民的长期抗战，鼓舞了南圻人民的抗争。西贡市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和郊区农民也发动了反法起义。起义者曾试图占领城市，但在法军的镇压下遭到失败。

此外，在柬埔寨也发生了反法起义。

法国为了破坏勤王起义，殖民当局利用传教士和信仰基督教的越南人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争取民族独立的勤王阵营因此而被削弱了。1888年11月，法国殖民当局在密探的帮助下，探明了咸宜帝的兵营，并拘捕了他，最后把他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在殖民当局的军事围剿和政治诱降下，各地勤王起义先后失败。尊室说逃亡中国。

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

1565年，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9世纪初，随着西班牙势力的衰落，菲律宾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潮流中去。

菲律宾是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东方国家。许多菲律宾知识分子同西班牙文化界有直接联系。何塞·黎萨尔(1861—1896)这位在19岁时写出著名诗篇《献给菲律宾青年》的爱国者，就是1882年以优异成绩同时获取马德里大学医学和哲学学位的。马塞洛·赫·德尔彼拉尔和洛佩斯·哈恩纳也都同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关系密切。这些人在西班牙开展了宣传改革、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1883年，在西班牙成立了以前大臣、马德里大学历史学教授唐·米圭里·摩利塔为领导的“西班牙菲律宾协会”。许多西班牙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议员、著名学者和政治家都参加了协会，支持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协会设政治、文学和体育三个部，德尔彼拉尔任政治部部长。协会的宗旨是：菲律宾人与西班牙人一律平等，出版、结社和言论自由，西班牙议会中须有菲律宾代表，教会菲律宾化，发展菲律宾国内市场。哈恩纳在巴塞罗那创办《团结报》，秘密运回国内，以唤起菲律宾的民族意识。

1892年6月26日，黎萨尔从香港回到马尼拉。7月3日，建立了联合菲律宾人民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民族组织——“菲律宾联盟”。黎萨尔在他的小

说《不许犯我》(1887 年)和《起义者》(1891 年)中,发出了“爱国者的声音”和“复仇和反抗”的呼唤,在菲律宾享有巨大的声望。他规定“联盟”的任务是统一菲律宾群岛、反对一切暴力和不公正行为、发展教育和工农商业、互助和改革。殖民当局惧怕黎萨尔的影响,在 7 月 6 日即逮捕了他,不久把他流放到棉兰老岛。

但是参加“联盟”的另一位爱国者安得列斯·波尼法秀(1863—1897)在几天之后,便建立了“卡蒂普南”(“人民儿女高尚和尊贵的联合会”)。这个秘密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它的宗旨是人人一律平等和热爱祖国。直到 1895 年,该组织仍是“联盟”的一部分。1895 年底,它制订了武装起义计划。1896 年拥有会员 3 万人。同年 8 月 24 日,波尼法秀发出起义号召,人民群众热烈响应,起义迅速席卷全国。12 月 30 日,正当独立战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殖民当局以“煽动人民造反”和“组织非法团体”的罪名,处死了黎萨尔。他的诀别诗“方见天际晓,我即与世辞,朦胧夜色尽,光明白日至”,成为鼓舞人民战斗的号角。从吕宋岛到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卡蒂普南”在许多地方夺取了政权。

在独立战争蓬勃发展的时刻,“卡蒂普南”的另一领导者艾米利奥·阿奎那多挑起了分裂。阿奎那多在 1896 年底“卡蒂普南”总部迁到甲米地以后,纠集地方势力,篡夺了独立战争的领导权。1897 年 5 月 10 日,他捏造罪名,杀害了波尼法秀。11 月 1 日,他在比阿克纳巴多召开起义队伍代表会议,通过临时宪法,成立新政府,自任总统。12 月 14 日,同殖民当局签订投降条约后,他即逃亡香港。不久,他在香港成立“爱国委员会”。

1898 年 4 月,美国和西班牙战争爆发。5 月,阿奎那多在同美国政府多次密谈之后,乘美舰回国。6 月 12 日,他在甲米地发表独立宣言,成立革命政府。8 月底,革命军占领吕宋岛大部分,并包围马尼拉。9 月,菲律宾议会在马洛洛开幕,次年 1 月,颁布菲律宾共和国宪法。新成立的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为阿奎那多,马比尼为内阁主席。新政府把教团的大地产和其他不动产没收并转归国有,消除了教团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农民的压迫。新政府在外交上抗议美国和西班牙和约中把菲律宾“转让”给美国的条款,要求美国承认菲律宾独立。

1899 年 2 月 4 日,美国总统麦金莱拒绝了菲律宾政府的要求以后,出兵对马尼拉发动突然袭击。3 月 31 日,侵占首都马洛洛。共和国迁都圣费尔南多。菲律宾居民在困难的条件下,英勇顽强地抗击美 12.5 万名侵略军。正在决定共和国命运的紧要关头,政府内发生了分裂。安托尼奥·鲁纳(1868—1899)和马比尼为首的激进派主张坚持抗战,而彼德罗·巴特诺和布恩卡米为首的投降派则主张妥协。阿奎那多在 5 月 7 日任命后二人分别担任内阁主席和外交部长,把抗战派马比尼排斥在政府之外,并于 6 月 5 日杀害了鲁纳将军。抗战派力量的削弱,加上美军不断地增援,使抗美斗争连连受挫,共和国首都五次迁移,巴特

诺、阿奎那多等人相继被俘。1902 年 4 月，抗美战争失败，美国最后占领菲律宾。

1902 年美国政府同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在“菲律宾法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菲律宾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集中在美国人把持的“菲律宾委员会”手中。虽然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但美国国会有权改变、补充和取消立法会议所通过的任何法律。美国总统委任的菲律宾总督对立法会议的决议拥有否决权。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拥有审查、修正、补充、取消菲律宾各级法院的一切判决的全权。美国在菲律宾建立起殖民统治以后，通过掠夺土地、勒索苛捐杂税、强迫种植单一作物、侵占森林资源和垄断贸易等途径，把菲律宾变为自己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各种超经济收入的重要源泉。

菲律宾共和国虽然被颠覆了，菲律宾独立战争尽管失败了，但它毕竟结束了西班牙 300 多年的殖民统治，显示出亚洲各国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共同趋向，揭开了 20 世纪初被列宁誉为“亚洲觉醒”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

土耳其的改革运动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改革和立宪日益成为“西亚病夫”土耳其发展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特别是 1789 年法国革命对这个伊斯兰帝国在文化思想上影响的结果。法国革命的自由原则，被理解为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列强压迫的理论，平等原则被理解为世界各国平等。在伊斯兰教集体基础之上改铸西方的政治等级与组织，构成了土耳其多次改革与立宪运动的基本特征。

当过帝国驻法大使、外交大臣的雷希德，企图用立宪宣言使帝国跻身于自由国家行列，从而不受专制俄国的侵犯和博得英法两国的同情。素丹阿卜杜勒·麦吉特接受了他的建议，于 1839 年 11 月颁布了“花厅御诏”，允许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的安全。御诏用“旦齐马特”（卓越高尚的改革）称呼改革。根据御诏，第二年颁布了反映法国法律影响的刑法和允许成立欧洲式银行的敕令。1845 年 1 月，素丹颁布了要办好教育的诏书，为建立新式学校开辟了道路。

1856 年 2 月，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素丹颁布了新的改革御诏。御诏重申 1839 年花厅御诏中的各项原则，并对基督教徒开放学校和行政职务的大门，允许基督教徒服兵役和取消对他们的轻蔑称呼，而且给予他们在省和市镇议会中的代表权。御诏提出设立银行、修筑铁路、开通运河、发展商务和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御诏宣布：“利用欧洲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施之于改革事业”。阿利和富阿德取代了长期作为改革派领袖的雷希德，领导了此后 15 年的改革。这两个靠外语知识飞黄腾达的人，先后颁布了土地法、新刑法、商业法、海上法、省区行政法；特别是 1870—1876 年颁布的新民法，成为帝国法律制度的基础。

改革表明帝国面临西方挑战的严峻形势。1839年的花厅御诏是土耳其军队在尼济普惨败之后,正需要用西方援助来对付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挑战时颁布的。1856年的改革御诏也是紧接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帝国正需要西方支持,以便取得一项有利的和约时颁布的;而且御诏本身就作为巴黎条约序言一部分。70年代,帝国沦为列强奴役对象,国内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尤其是普法战争后,德国取代了法国在土耳其的地位,与俄、英、奥诸国展开角逐。这样,新的改革和立宪运动又提上历史日程。

这次改革和立宪是同新文学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19世纪中期兴起的土耳其新文学运动,其特征是以法兰西文学代替伊朗的经典著作。它的代表人物是伊卜拉欣·邢纳西(1826—1871)、齐亚(1825—1880)和纳米克·凯末尔(1840—1888)。他们被称为文学三杰。他们办报纸、成立奥斯曼教育社、读书社等文化团体、用政论文章、诗歌、戏剧等形式,揭露和批判素丹封建专制制度,传播欧洲资本主义文化,鼓吹改革和立宪。

1865年6月,纳米克·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与另外5人成立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受到意大利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它根据意大利烧炭党的原则,制定了自己的方案。它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大多数是作家、记者、军官、学生,他们都受过欧洲式教育,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自称奥斯曼青年党人。被素丹剥夺了埃及总督继承权的费萨尔王子,积极参加了奥斯曼青年党人的改革立宪运动。他从巴黎发出一封用法文写给致素丹的公开信,由于尖锐地揭露帝国严酷的现实并提出实行宪法及其他改革要求,引起了纳米克·凯末尔等人的积极支持。公开信被译为土耳其文,通过《舆论解说报》大量发行。1867年2月,政府逮捕了奥斯曼青年党的一些领导人,纳米克·凯末尔和齐亚及另外一些领导者逃亡欧洲,在国外进行立宪和改革的宣传活动。

1871年,马穆德·尼狄姆被任命为宰相。他听从"撒谎之父"俄国大使伊格那切夫的建议,宣布对国外的奥斯曼青年党人实行大赦,目的是把他们置于政治监视之下。奥斯曼青年党人纷纷回国,出版报纸,散发传单,活跃于军人与青年学生之中。1873年,纳米克·凯末尔的爱国戏剧《祖国或锡利斯特拉》上演。这是歌颂土耳其人抵抗俄国入侵锡利斯特拉要塞保卫战的戏剧,破天荒地宣传了同素丹个人无关的"祖国"的概念。剧本表现了火热的爱国热情,它的演出使首都群情若狂。素丹政府认为是对自己的示威,第二次上演后即下令禁演,纳米克·凯末尔被流放到塞浦路斯,其他人也被迫转入地下。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方面因军费庞大、素丹腐化、大臣贪污成风,人民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因农业歉收,人民生活恶化,再加上存在着民族和宗教矛盾,1875年波斯尼亚爆发了起义,继而波及保加利亚和欧洲其他各地,1876年5月,萨洛尼卡发生了反法、德事件。同时,伊斯坦布尔4万名学生、手工业者、

商人和下级官吏，举行了反对素丹专制独裁统治的示威游行。素丹被迫接受示威者的要求，撤换宰相尼狄姆和总法典官费赫米的职务。但奥斯曼青年党人并未就此罢休，支持他们的改革派领袖米德哈特利用这个形势，于5月31日发动政变，另立素丹穆拉德五世。但是，穆拉德五世登基时已经因长期压抑而患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症因受前素丹和内阁会议上的大臣们被杀的刺激而无法理事。宰相拉斯第征得米德哈特同意，于8月31日废黜穆拉德五世，另立他的弟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为素丹。

12月19日，米德哈特取代拉斯第为宰相，完成了他从5月份开始的宪法起草计划。素丹哈米德二世改动了草案，扩大了素丹的权力，于12月23日以卡奴尼诏书的名义公布。这个宪法以比利时宪法为基础，吸取了普鲁士1850年宪法敕令的内容。它规定奥斯曼帝国为君主立宪国家。国会由两院组成，上院议员由素丹委任为终身制议员，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它宣布帝国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土耳其语被定为国语。素丹被赋予专制君主的一切权力：有权任免大臣，握有海陆军最高指挥权、对外宣战和媾和权、召集和解散议会权、宣布戒严和停止民法权。其他有关保护一切得到承认的宗教自由、一切臣民的人身自由、在法律范围内的新闻自由以及初级义务教育等条款，则反映了一定的民主气息。

米德哈特促成宪法的颁布不仅是为了争取英国的支持，而且也希望奥斯曼青年党人10年来的自由主义改革理论得以实现。然而，他没有察觉到利用宪法和奥斯曼青年党人的哈米德二世，对于自由主义或民主是毫不同情的。哈米德二世排斥奥斯曼青年党人的行动，得到了俄国大使伊格那切夫的别有用心的支持。俄国把土耳其的立宪和改革视为它扩张的巨大障碍。哈米德二世终于摊牌了。他放逐了齐亚、纳米克·凯末尔、阿里·苏亚维等奥斯曼青年党领导人。在1877年2月5日，又罢免了米德哈特的宰相职务，并勒令其离开本国，后来(1883年)又把他秘密绞死。被砍下来的米德哈特的头颅，装在精制的匣子里，送给了哈米德二世，上面写着："象牙。日本工艺的玲珑小品，献给素丹陛下。"

1877年3月19日，第一届奥斯曼国会开幕。25名由素丹指定的上议院议员和120名下议院议员出席了会议。尽管素丹限制了奥斯曼青年党人的投票权，但议会里仍然不时发出了对大臣们滥用职权、接受贿赂的腐败行径的控诉声，而且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具体。本来想给自己装上自由与民主门面的素丹，气急败坏地解散了议会。12月13日，素丹经过策划之后，召开了第二届国会。他正高兴于1878年1月31日对俄战争的结束，希望本届国会为新的国际谈判提供有利条件，可是议员们却不知趣地要求三位被指责的大臣到议会接受质询。2月13日，素丹解散议会，下令议员们返回他们的选区。这两届国会，总共用了5个月时间。素丹深知自由和民主使他难以为所欲为，于是此后30年不再召开

此种会议。

为了反对素丹解散国会和向俄国投降，奥斯曼青年党人阿里·苏亚维于5月领导了护宪和争取独立的起义。许多涌向首都的难民，成为起义的主力。一部分神学院的学生和士兵也参加了起义。起义者包围了前任素丹穆拉德五世的住所，阿里·苏维亚陪着穆拉德五世向起义群众说："这就是你们的素丹"。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了。哈米德二世统治的30年(1878—1908)被称为"朱隆"(意为专制残暴)时代而列入奥斯曼帝国的史册。但是，素丹的专制统治力量非常虚弱，到20世纪初，它终于被来势猛烈的革命所埋葬。

二、非洲

北非

埃及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其经济、政治地位更加重要，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19世纪70年代，埃及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有着很大自治权。伊斯迈尔总督(1863—1879)执政时，为了修筑运河、铁路和港口，以及满足统治阶级的大量挥霍，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同时又向英法等国大量借款。英、法银行乘机用高利率贷款，并实行提前交息的办法实行盘剥。到1876年时，埃及外债达6 849万英镑。英国利用埃及的财政困难，用低价收购了埃及政府的苏伊士运河股票。1876年埃及政府宣布财政破产，停止偿还债务。英法联合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组成整理埃及债务的委员会直接干预埃及内政。该委员会宣布埃及的债务为9 100万英镑，进而又对埃及财政实行双重控制，国家的收入受英国人管辖，支出由法国人管理。1878年，英、法派人参加埃及内阁，前者任财政部长，后者任公共工程部长，握有实权。伊斯迈尔组织的内阁因此被称作"欧洲人内阁"。

"欧洲人内阁"在城市和农村实行不断增税的政策。农民生活赤贫化，地主也因提高地税而不满。随着经济的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得到些发展，但遭到英法殖民势力的阻碍，新兴的资产阶级强烈反对外国的控制。"欧洲人内阁"由于解除埃及2 500名军官的职位，诱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斗争，要求罢免外国人部长，权力归埃及人所有。1879年出现了以爱国军官、知识分子为骨干力量的埃及第一个政党——祖国党。该党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口号，致力于"把祖国从屈辱、贫困、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并通过机关报《埃及报》和《商业报》宣传捍卫民族独立，加强防卫力量，实施宪法改革等主张。艾哈迈德·阿拉比任该党主席。阿拉比1841年生于下埃及的一个地主家庭。13岁弃学从军。6年间成为埃及第一个获得中校军衔的土著埃及人。他忠勇廉洁，富有爱国心，深得士兵和广大群众的拥戴。

此时，英国以"震慑叛逆不力"为罪名，通过土耳其废黜伊斯迈尔的总督职务，由其子杜菲克继任(1879—1892)。杜菲克极力维护英法在埃及的利益，继

续裁减军队，压制人民的活动。阿拉比深知军队作为埃及当时唯一有组织力量的重要性。1881 年 9 月，当杜菲克企图将具有爱国精神的军队调离开罗时，阿拉比立即率领开罗卫戍部队起义，包围阿比丁宫，迫使杜菲克同意改组内阁，任命谢里夫组阁，巴鲁底接着出任陆军大臣。

埃及于同年 12 月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祖国党人在国会中占多数。1882 年 2 月，再次进行内阁改组，由巴鲁底组阁，阿拉比接任陆军大臣。1882 年 5 月后的 1 个多月时间里，英法采取武力威胁和欺骗分化的两手策略，妄图消除埃及人民的反抗，迫使阿拉比屈服。但是事与愿违，于是英国决定发动征服埃及的战争。

1882 年 7 月 10 日，英国向埃及提出最后通牒，限 24 小时内交出亚历山大港炮台。11 日清晨，英国舰队开始炮轰亚历山大城，历时 10 多个小时的连续轰炸，造成惨重损失。阿拉比在战前也采取了一些应战措施，战争爆发后爱国军民浴血奋战，但终究抵挡不住英军的猛烈炮火。全城军民有组织地迅速撤离。7 月 13 日，英军占领了空城亚历山大。杜菲克赶往亚历山大城，乞求英军保护。

在阿拉比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合力保卫祖国，抗击英国侵略者。掀起了参军高潮，成千上万的农牧民、城市居民志愿报名，群众协助士兵挖掘战壕、修筑工事。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聚集开罗，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授予阿拉比“埃及保卫者”的光荣称号。他成了全民族的领袖。

但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阿拉比在战略上指挥失误。亚历山大城失陷后，他将防御力量集中在北部，防备英军南下开罗，却轻信东线是运河中立区，英军不敢闯入，从而使运河地区完全处于无防守的状态。8 月 19 日，英军佯攻西线的阿布基尔港。阿拉比信以为真，急忙调主力军前往迎战。不料当晚英军主力部队闯入运河区，连下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三城，威胁开罗。阿拉比急忙从西线调军援助东线，在离开罗只有数十公里的泰勒凯比尔建立新防线，与英军决战。但埃及的兵力多半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和纪律松弛的游牧民。9 月 13 日，英军攻占泰勒凯比尔。第二天，开罗失陷，阿拉比和战友们被迫投降。英国将他放逐到锡兰。英军占领下的埃及，由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巴林统治埃及达 25 年(1883—1907)，他在埃及以其专横、诡诈、残暴著称，历史上称其为“东方暴君”。英军占领下的埃及，名义上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事实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苏丹是英国以占领后的埃及为基地向非洲内陆实行武力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早在 19 世纪前半期，苏丹处在埃及穆罕默德 · 阿里统治下的时候，英国殖民势力就积极进行渗透活动。50 年代后，英国依仗着英土商约，对苏丹加紧经济侵略。英国殖民者以埃及政府驻苏丹官员的名义，在苏丹实行政治控制。苏丹人民不屈不挠地进行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穆罕默德 · 艾哈默德(自称“马

赫迪"①)于1881年发动了以恢复原始伊斯兰教为目的的"圣战",史称马赫迪起义。英国用了20年时间(1881—1890)才把马赫迪起义镇压下去。接着,英国和埃及签订协定,苏丹为英埃共管。埃及不仅负担了征服苏丹战争费用的2/3,而且长期负担管理苏丹的绝大部分行政费用。苏丹成为英国的棉花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英国统治苏丹危害着苏丹的民族利益,也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沉重负担。

北非马格里布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三国,很早就遭受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1830年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从法国人侵起,阿尔及利亚人民奋起反抗,在东部有以君士坦丁为中心的阿赫默德领导的抵抗运动,在西部是阿卜杜勒·卡德尔领导的反抗斗争。前者失败后,卡德尔领导的起义继续坚持长达17年之久。1847年后,小规模的起义持续不断。法国殖民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全面的军事控制,总督和各省长官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各省设立阿拉伯局管理当地土著。1871年后,在名义上虽然废止了军事统治,但是总督仍由现役军人担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同化政策",规定只有法国人才能享有公民权利,土著则是法国的臣民,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

法国从30年代起,开始向阿尔及利亚移民,建立了欧洲人在非洲大陆上的第二个居留地。1833年欧洲人为7 812人。以后不断增加。1876年达到34.4万人,1891年增加到53万人。法国移民在殖民当局的帮助下,从阿尔及利亚人手里夺取了大量的肥沃土地,他们组织公司,也经营农场。法国殖民者夺取土地的速度是惊人的。1850年为15万公顷,1870年高达76.5万公顷,已超过阿尔及利亚耕地面积的1/10,而且这些土地都是交通方便、水源最好的沃土。法国公司和大地主大量利用已经丧失土地的阿尔及利亚农民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封建式的剥削。被奴役的农民沦为农奴。牧民们原来经营的牧场,被殖民当局宣布为"空而无主地",没收给欧洲人土地公司经营。他们对牧民也实行封建式的盘剥。

法国的殖民统治引起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激烈反抗,其中以1871年的起义规模最大。起义是3月初在君士坦丁省爆发的,由封建主莫克拉尼领导,后同哈达德领导的拉马尼亚教派实行联合,提出了驱逐法国殖民者的要求。有20多万农牧民参加了起义,起义扩及阿尔及利亚全境,战士们不断袭击敌人,先后发生300多次战斗,狠狠地打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法国资产阶级在血腥镇压巴黎公社后,便集中兵力来对付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起义。到1872年初,法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又没收阿尔及利亚人最好的土地44.6万公顷,索取赔款3 600万法郎。

---

① 意即"救世主",全意为真主派到人间的救世主。

70年代后，法国的高利贷垄断资本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其活动方式一是搞土地投机，兼并法国移民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土地，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当地农民，农民用农产品交付地租。二是通过运输和销售来控制农产品，攫取超额利润。在政治上为了加强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一度缩小总督的权力，把阿尔及利亚的行政事务分属于巴黎各部管辖，后来又归属于法国内政部统一管理。

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震惊了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封建统治阶级。30年代，突尼斯也遭到法国的直接威胁。突尼斯贝伊为挽救民族危亡，从1840年起推行一系列改革以求富国强兵，废除奴隶制度，颁布宪法，进行军事改革和经济建设。但改革和建设却又依靠英、法、意大利诸国，结果外债日增，1863年借款达3 500万法郎。法国成为突尼斯最大债主。"国际财政调查团"控制了突尼斯的财政。意、法在争夺突尼斯问题上发生尖锐的矛盾。法国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以支持英国对塞浦路斯的侵略，换取英国对法国在突尼斯利益的谅解。德国为了转移法国在欧洲的注意力也支持后者在突尼斯的行动。意大利受到了孤立。

1881年4月24日，法国借口突尼斯援助阿尔及利亚的"反叛"，大举入侵突尼斯。法军3万人从阿尔及利亚分兵两路进袭，海军陆战队8 000人在比塞大登陆。5月12日，突尼斯贝伊被迫在接受法国保护的条约(著名的"巴尔杜条约")上签字。1883年6月8日，法国又同突尼斯签订新约(因签订于马尔萨，又称"马尔萨条约")，英国等欧洲列强很快承认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突尼斯正式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保留了一个完全受法国当局控制的突尼斯人政权。这样既可节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又免得许多麻烦。事实上，当时法国驻突尼斯的使节卢斯坦掌握着内政外交大权，军事大权也控制在法国人手中。法国高利贷资本通过贝伊政府颁布土地法令，实行土地登记，用宣布"空而无主地"的名义，吞并突尼斯人的土地，分配给来自欧洲的移民，奴役当地农民。在多数情况下，用封建分成制形式，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使他们沦为农奴；在少数情况下，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法国资本在突尼斯的工业和商业方面也加紧进行投资，谋取最大的利润。尤其在磷酸盐、铅、锌等采矿业方面的投资最集中，因之突尼斯成为法国在海外的主要原料供应地。

摩洛哥在19世纪中叶后，中央集权统治日趋衰落。素丹穆莱·哈桑执政时期(1873—1894)，积极推行改革措施，以维护国家独立。他着重于建设一支新式海陆军，发展军火工业，修造工厂，还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聘请外国专家办教育等。但其改革因受国内封建势力的激烈反对而失败。哈桑在1880年5月终于促成了欧洲列强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国际会议，西、英等14个国家签订的条约"保证"了摩洛哥的独立和主权，推迟了西方国家侵略摩洛哥的进程。但在20

世纪初,列强最后瓜分非洲时,摩洛哥终于也处在帝国主义的宰割之下。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19 世纪 70 年代中叶起,西方列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加快了侵略的步伐。1876 年以前,它们占领的领土面积是十分有限的,多半是沿海地区。英国占领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尼日利亚的沿海地区和南非殖民地。法国占有塞内加尔、几内亚、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和达荷美(今贝宁)的沿海地区。葡萄牙据有安哥拉、莫桑比克。西班牙拥有以后称为西属撒哈拉的地方。1876 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际地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比利时、英、法、德、俄和奥匈帝国等 6 个国家。会上成立了“国际非洲协会”,要在各国成立分会,其宗旨是要打开非洲这块“地球上唯一文明尚未进入的地区”。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掠夺非洲的土地。

在西非,英国加紧在黄金海岸(今加纳)和尼日利亚的领土扩张。在黄金海岸内地早已存在着强大的阿散蒂国家。70 年代以前,英国为征服阿散蒂先后发动过 6 次战争,均被击败。此时,英国派遣重兵发动第 7 次征服战争。英军攻占其都城库马西,大肆劫掠,企图迫使当地人民屈服。在尼日利亚,英国以拉各斯为基地积极向腹地扩展,取得了大块领土。法国以塞内加尔为根据地由西向东扩张,打算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印度洋,横跨西、东苏丹的强大殖民帝国。它在塞内加尔、达荷美取得进展。德国在西非也开始建立殖民据点,派遣“地理考察队”、“探险家”深入多哥、喀麦隆内地,同当地酋长订约。1884 年 7 月,德国正式宣布这两地为德国保护国。

在东非,英国早已在桑给巴尔同素丹签订条约,享有特权,并把东非海岸视作英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也在东非积极进行活动,1885 年建立德国东非公司,在内陆地区从当地酋长那里骗取许多“条约”,获得了从鲁伍马河到温巴河之间的大片土地。

在中非和南部非洲,列强激烈争夺领土,矛盾尖锐化起来。1884 年 4 月,德国宣布从奥兰治河出海口到葡属安哥拉边界的地区为其保护地。然后向内地推进,侵占酋长们的土地,迫使他们接受保护,建立了德属非洲殖民地。英国为了阻止德国势力的东进,防止它同布尔人接近,1885 年宣布贝专纳(今博茨瓦纳)为自己的保护国。中非的刚果河流域是列强夺取领土的主要目标。利奥波德二世利用“国际非洲协会”比利时分会(后称“国际刚果协会”)的名义,派遣“探险家”斯坦利继续在刚果河流域进行殖民扩张活动。他在 1879 年以后的 5 年时间里,诱使刚果河南岸的酋长们签订了 450 多个“条约”,代表利奥波德二世建立起 22 个“商站”。法国很早据有加蓬,从 1875 年起派遣布拉柴经加蓬向内地“考察”,历 5 年之久,占有了刚果河西北部的大块土地(后被称为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法国的势力抵达刚果河北岸。斯坦利向刚果河北岸的扩张计划遭到

了抵制。葡萄牙从自己在安哥拉的殖民利益出发，在英国的支持下激烈反对斯坦利在刚果河流域的活动。

1884 年 11 月 15 日起，历时 90 多天的柏林会议，有英、法、德、比、葡、意、俄、西、美等 15 个国家参加。会议承认了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的统治权，也规定任何国家今后在非洲取得领土必须通知其他国家，必须实行“有效占领”。

柏林会议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国家的进程大大加快了。它们在非洲殖民地建立起严密的殖民统治。在西非，英国在黄金海岸于 1897 年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迫使阿散帝国家变为英国的保护国。90 年代，英军攻进尼日尔河河口地区，炮轰和劫掠了贝宁城，摧毁了著名的贝宁王国。至此，尼日利亚沿海地区已经沦为英国的占领地。法国在达荷美又经过 6 年的征服战争，于 1894 年使其成为殖民地。在西非内地，1898 年法军击败阿赫马督领导的抗法战争。1898 年在击溃萨摩利·杜尔领导的反法斗争后，法国占据了西非广大的土地，发展为法属非洲殖民地，其面积约为法国本土的 10 倍。19 世纪末，西非的领土已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

东非领土的瓜分是在 90 年代完成的。柏林会议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解决列强瓜分非洲领土的矛盾。英、德、法在东非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经过 1886 年、1890 年、1894 年 3 次取得协议，才最后将各自霸占殖民地的疆界确定下来。德国取得坦噶尼喀（后称德属东非），英国获得肯尼亚（当时称英属东非）和乌干达，法国则得到在马达加斯加的“权益”。1896 年法国宣布吞并马达加斯加岛。

在南部非洲，英国利用它所占领的南非为根据地，向北扩张，企图将其占领的南北非洲殖民地联结在一起，实现它的“开普敦—开罗计划”。英国通过新成立的南非公司进行活动。1889 年，该公司同尼亚萨兰当地酋长签订“保护”条约，两年后，英国正式宣布这一地区为“保护国”。同年，南非公司还同贝专纳以北、统治马塔贝莱人和绍纳人土地的国王洛本古拉签订欺骗性的“友好条约”，获得了莫桑比克以西大片土地的行政、立法、分配土地、驻军等无限制的权利。1894 年后，这里被称之为“罗得西亚”殖民地。到 1900 年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已被西方列强分割完毕。

1900 年前，帝国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也建立了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制度。英国同法、葡、比等帝国主义国家采用不同的殖民统治方法。英国在殖民地一般采用“间接统治”的办法，即保存殖民地原有的制度和习惯，对忠于英国的上层统治者委以重任，代表英国实施统治，由殖民当局向他们提供薪金。法、葡、比诸国大致都采取“直接统治”，摧毁原有的部落组织，剥夺酋长的权力，由殖民当局委派总督和行政官吏管理，还有的直接进行军事统治。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根据非洲国家和地区原先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掠夺办法。有的利用当地本来比较发展的小农经济，发展单一作物制，如在西非，大

力发展可可、花生、棉花、棕榈产品等，由殖民者组织的公司低价收购。有的实行租让制，如在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和比属殖民地，殖民政府把从非洲人手里夺取来的土地，租给白人公司经营。这些公司在辖区内有行政机构和军队，强迫农民生产，交纳税收。葡属殖民地因经济比较落后，殖民当局靠向英属殖民地出口非洲人劳工来榨取高额利润。有的实行保留地经济，在英属殖民地最为突出，即把非洲农民从肥沃的土地上赶到地处边远、土地贫瘠的地方劳动和居住，这里被称作非洲人的"保留地"。生产仅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由于土地不足，人口拥挤，无以为生的非洲人被迫离开保留地到白人的矿山和农场充当廉价劳动力。但当黑人劳工被压榨得失去劳动力时又可回到保留地。

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特点 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30年时间里，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瓜分非洲领土。据统计，1876年时，西方殖民列强只占领非洲土地的10.8%，到1900年时，已经占领了90.4%。它们主要是依靠发动野蛮的殖民战争来抢占殖民地，促使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时期的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具有显著的新特点。

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主要形式，其范围和水平已经不再是孤立的、自发的部落起义或地区斗争，而是发展成有组织的、规模很大的、持久的武装反抗，甚至有的发展成为全民性的卫国战争。这是一大特点。这时期的主要斗争，北非有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法武装起义（1871—1872）、阿拉比领导的埃及人民反英斗争（1881—1882）、苏丹马赫迪起义（1881—1890）；东非有埃塞俄比亚抗意卫国战争（1894—1896）；西非有阿散蒂人反对英国侵略的第七次战争（1873—1874）、几内亚萨摩里·杜尔领导的抗法战争（1882—1900）、阿赫马督领导的图库列尔人反法武装斗争（1887—1898）、达荷美贝汉津领导的抗法战争（1890—1894）；南部非洲有南非祖鲁人的武装起义（1879年）、洛本古拉领导的马塔贝莱人武装斗争（1893年）等。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几乎都是由封建统治阶级或传统社会的统治者领导的。外来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反对侵略和殖民奴役这一点上，广大人民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统治阶级愈能认清这种形势，就愈有可能团结人民进行长期的抗战，甚至有的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的胜利是最好的说明。

1894年7月，正当意大利发动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时，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发表告人民书，号召人民奋起抗击意大利的入侵，保卫国家的独立。经过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艰苦奋战，终于迫使意大利签订了"亚的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是独立国家，并交付大量赔款。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领土时，往往利用非洲人的善良愿望和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不清，采取欺诈的手段，诱骗他们上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一旦他

们觉醒,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抗争时,也能给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如英国在南部非洲德兰士瓦以北、莫桑比克以西的广大地区霸占领土时,曾劝说当地马塔贝莱人国王洛本古拉,允许少数白人到他的辖区内采掘金矿,声称只是挖一个“洞”而已。当洛本古拉在英国人准备好的“友好条约”上画押后,英国政府就立即宣布该地区已经接受英国的“保护”,成为其“保护地”。洛本古拉发觉受骗后,就号召辖区内的群众行动起来,组织志愿队伍狠狠打击敌人,对英军先后发动了两次战役,有力地挫败了敌人的进攻。最后虽因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而失败了,但以后马塔贝莱人地区还是不断地爆发反英武装起义。

19 世纪 70 年代后,不少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还是前一时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不过在斗争的规模和水平上比过去有所扩大和提高。例如,南非祖鲁人的反英斗争在 70 年代以前的基础上迅猛发展。其首领开芝瓦约继承了恰卡和丁刚的治国方略,但又坚持革新,建立了一支 4 万人的强大队伍,从莫桑比克的葡萄牙商人那里购买大批武器弹药,全部更换了祖鲁士兵的传统武器——刺矛和盾牌,提高了作战能力。在作战方法上也一改过去的固定一套,运用灵活机动的方法杀伤敌人。当时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也不得不承认“祖鲁人确实是了不起的人民,他们打败了我们的将军。”由于祖鲁人的英勇斗争,直到 1887 年英国才正式吞并祖鲁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广大农村发展起来的自发宗教运动,既是 19 世纪下半叶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伊斯兰教起了很大的号召作用。从 19 世纪起,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很快,整个部落、有时整个地区皈依伊斯兰教。非洲人统治阶级最早是想利用伊斯兰教来巩固其统治,但在客观上伊斯兰教却起了团结非洲人,推动他们进行反帝斗争的作用。如苏丹的马赫迪起义,其首领名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1844—1885),他宣称:“废除不堪负担的苛捐杂税,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号召苏丹人民对异教徒(英国统治者)进行“圣战”,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国土。在马赫迪起义过程中始终以“圣战”为号召,坚持了 20 年之久。英国对苏丹的侵占也被推迟了 20 年。再如,西非的萨摩里·杜尔和阿赫马督、中非的拉巴赫领导的斗争也是如此。

殖民主义者本来是想利用基督教来麻痹非洲人,使他们驯服地忍受奴役,但是遭受压迫和剥削的许多非洲人,在接受基督教后,自然会从基督教教义中寻求他们要求摆脱殖民奴役的根据。他们憧憬着“平等”的未来,迫切要求解放,首先在教会中摆脱白人神职人员的控制,建立独立的黑人教会。于是“土著教会”应运而生。19 世纪 80 年代,在南非产生了“埃塞俄比亚运动”。1884 年成立了第一个非洲人基督教会“滕博人民族教会”,后又成立了纳塔尔非洲基督教联盟。19 世纪末,在南非普遍产生“土著教会”,有的称为“埃塞俄比亚教会”。后

来，建立土著教会的运动扩展到罗得西亚、尼亚萨兰等殖民地。在西非和东非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土著教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它具有明显的反殖民主义色彩，逐渐领导人民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这不是单纯的宗教运动，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城市反帝运动的兴起，是19世纪末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另一个特点。城市反帝运动的产生，是由于在西方资本入侵的刺激下，非洲民族经济多少得到了一些发展，正在诞生中的新的阶级和阶层又不堪忍受殖民压迫的结果。非洲城市的斗争，以工人、市民的斗争和知识分子的反帝运动为主要内容。工人和市民的斗争在北非、西非、南部非洲最为重要。1899年，埃及开罗几家卷烟厂工人联合举行罢工斗争，参加人数约900人，斗争坚持了两个月，迫使英国资本家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这是埃及工人的第一次罢工。同年，阿斯旺水库工人、亚历山大港煤炭装卸工和电车工人都举行过罢工。西非塞内加尔的铁路工人、南非的黑人矿工在19世纪末也都进行过罢工斗争。城市居民的斗争，在西非尤为突出。1895年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发生了抗征房捐和地产税的群众示威运动，参加者达5 000人。1898年，塞拉利昂城市的非洲人为反对殖民当局施行的征收房捐法令，掀起了持续3个月的暴力斗争。

非洲民族知识分子的出现，使非洲人的反殖民统治斗争开始走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道路。西非黄金海岸的知识分子联合酋长和商人反对英国当局剥夺非洲人土地的《土地法案》，成立了“保护土著协会”。协会有章程和纲领，后来在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成立分会。西非的民族知识分子为揭露殖民压迫、呼吁进行反帝斗争，创办了第一批报纸，如《拉各斯日报》、《阿克拉先驱报》、《塞拉利昂时报》等。埃及的爱国知识分子在英国的高压政策下坚持斗争，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成立了“团结会”，创办《团结报》，强烈谴责殖民压迫，号召进行不懈的斗争。北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知识分子也开展了类似的斗争。

三、拉丁美洲

美国势力在拉丁美洲的加强

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扩张。美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对外更加积极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而拉丁美洲在地理上首当其冲。但是，英国在拉丁美洲已居优势，使美国遇到了阻碍。因此，美国既要在拉丁美洲扩张自己势力，又要排挤英国，这就是19世纪后期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指导方针。

为了孤立和打击英国，扩大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势力，美国除了仍打着“门罗主义”旗号外，又提出了“泛美主义”口号。1889年10月，由美国发起在华盛顿召开的18个国家出席的美洲国家会议上，美国提出“美洲人民利益一致”的欺

骗性口号，鼓吹建立泛美组织，以“巩固南北美洲各国经济文化联系”。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命名为“美洲共和国国家联盟”（1901 年改称泛美联盟）的组织，并以设在华盛顿的、由美国国务卿领导的“美洲各国商务局”作为常设机构。美国通过这一组织，笼络、勾结拉丁美洲各国反动统治者，为其霸占西半球创造条件。

在对拉丁美洲经济侵略方面，美国比英国落后一步。但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美国急起直追，并日益威胁和排挤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利益。1822 年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贸易总额只有 2 600 万英镑，这比英国为少。可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超过英国，跃居首位。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投资到 1889 年已超过 3 亿美元。美国投入古巴的资金达 5 000 多万美元，垄断了古巴的制糖工业。

1895 年，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发生边界纠纷，英国军舰封锁了委内瑞拉港口，美国趁机插手，出面干涉。美国国务卿奥尔尼趾高气扬地声称：“今天，美国在这块大陆上实际拥有最高权力，凡是它管辖范围内的人民，都应当把它的意旨当作法律。”美国照会英国政府，要求英国接受第三者，也就是美国的仲裁，英国被迫让步。1897 年美国与委内瑞拉签订协定，双方同意成立有美国人参加的仲裁法庭，确定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双方的国界。在这一事件中，英国蒙受了很大的屈辱。以后，美国逐步取代英国在拉丁美洲的优势地位。

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19 世纪 70 年代后，由于拉丁美洲各国政治生活从原先的动荡趋向相对的稳定，对外联系的扩大以及外国投资的增加，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尽管经济发展在各国表现不平衡，但它改变着整个拉丁美洲的面貌。

阿根廷的经济增长最为显著。它在 19 世纪初是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中最不发达、人口最少的地区之一。但到 19 世纪最后的 30 年中，它在人口增长速度、移民数量、修建铁路的里程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方面都超过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在这期间有 220 万移民进入阿根廷。1870 年投入使用的铁路只有 458 英里，但在 1880 年增加到1 500英里，1900 年达到 1 万英里。1880 年到 1900 年，仅英国的投资就从 2 000 万英镑上升到 2 亿英镑以上。1900 年，阿根廷的工业企业总数已经有 2 700 家。农业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 1870 年的 150 万英亩增加到 1901 年的 1 700 万英亩以上。阿根廷在 30 年内从一个进口谷物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出口 1 亿蒲式耳小麦和玉米的国家。1877 年第一艘冷藏船载着冰冻牛羊肉开到欧洲。到 1900 年，英国与阿根廷之间已有 278 艘冷藏船往返不断地行驶。出口值从 1870 年的 3 000 万金比索增加到 1900 年的 1.5 亿金比索，增长了 4 倍。这一惊人的经济繁荣，使阿根廷成为拉丁美洲最先进的国家。

智利在硝石工业方面有着非凡的进展。1870 年前还不生产硝石，但到 1880 年生产了 25 万吨，1900 年增加到 140 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3/4。这就大大

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推动了公用事业、铁路建设和工业的成长。墨西哥独立后，矿业生产不断下降，到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振兴。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低质矿石能够开采和提炼，虽然采银仍占重要地位，但过去不受重视的煤、铜和其他金属也大规模地生产了。1890 年起，石油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到 1900 年外贸总值比 1870 年增加了 3 倍。

巴西在铁路建设方面不比阿根廷落后多少，1889 年已达 6 000 多英里，到 1904 年达到 1 万英里。咖啡出口在 1870—1875 年期间平均每年 4 亿镑，到 19 世纪最后的 5 年里平均每年达到 11.3 亿镑。此外，纺织业也得到发展，1905 年扩大到有 100 多家工厂，雇佣约 4 万工人，生产了将近 25 万米棉布。古巴糖的年产量，19 世纪 60 年代还只有 50 万吨，到 19 世纪末已超过 100 万吨。

乌拉圭虽是个小国，到 1900 年只有约 100 万居民，然而人口却是在稳步增长，因为在 1870 年才有约 60 万居民。这个国家牛羊数目的增加非常快，羊从 19 世纪中期不足 100 万只增加到 1900 年的1 800万只；牛在同时期从不到 200 万头增加到近 700 万头。1900 年，投入使用的铁路有 1 000 多英里。对外贸易额从 1870—1900 年间翻了一番。

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不足的方面主要是，各国都依靠一种或两种供出口的作物或矿物，而这些物资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并不稳定，这就使各国的经济发展难以取得稳步的进展。这种单一作物的、畸形的经济，加深了各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扩大了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例如，墨西哥采矿业虽得到发展，而农业没有进展，以致 19 世纪末农民的生活处境比 1870 年还有所下降；有些国家从经济发展中得来的好处，却被政府的浪费和使用不当，或被战争所抵消，没有取得使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效果。此外，在发展经济中外国资本起了重要作用，不少利益也就被外国资本家占去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相对稳定，拉丁美洲各国的外来移民也开始大量增加。1870 年到 1900 年的 30 年中，有 400 万人移居拉丁美洲，其中以来到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等国居多数。移民中绝大部分是意大利人，其次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此外还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欧洲移民定居的地方，他们的人数往往压倒了当地的克列奥人（土生白人）。在巴西圣保罗以南地区、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及其周围和阿根廷的很多地区，欧洲移民占据绝对优势。外来移民对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但使拉丁美洲各国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和技术人员，而且还带来了一定的资金。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成长，并引起了拉丁美洲各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最显著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由于各国民族资本

力量较为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软弱。但是它受到外国资本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制，所以在人民运动的推动下，也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主要来自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移民，受到外国资本、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重重剥削，他们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恶劣处境。

19 世纪 70 年代，拉丁美洲出现了第一批工人组织，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1872 年，阿根廷成立了第一国际支部，并派代表出席了海牙代表大会。90 年代，相继成立阿根廷社会党、智利社会党以及乌拉圭和巴西的社会主义小组。这些组织都曾创办刊物，翻译和出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曾领导工人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巴西的废奴运动·共和国的建立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胜利后，各国相继宣布废除奴隶制，只有巴西仍原封不动地把奴隶制保留下来。巴西种植园主不仅丝毫不想触动奴隶制度，反而因咖啡种植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奴隶制。独立后差不多每年都有2～3万黑奴贩入巴西。1846 年后每年上升到 5 万人。据统计，1820—1850 年运到巴西的黑奴达 100 万人。

但是，巴西的奴隶制度不久就出现了危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自由雇佣劳动的要求，与种植园奴隶制度发生了冲突。因此，废奴思想开始在白人的民主阶层中逐渐传播开来。同时，黑奴的反抗斗争不断增加。从 1826 年开始，巴伊亚省每年都爆发黑奴起义。1830 年萨尔瓦多市发生黑人与警察的武装冲突。为了保障英属西印度殖民地种植园主的利润，英国反对巴西奴隶贸易。1845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亚伯丁法案”，授权英国海军扣留任何巴西贩奴船只，这对巴西奴隶贸易造成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西政府曾于 1850 年 9 月 14 日宣布禁止奴隶贸易。

但是，巴西政府为了保护奴隶主的特权，采取一切手段来延缓奴隶制的崩溃，为此不惜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1864—1870 年巴西参加“巴拉圭战争”。在战争期间，因兵源不足，不得不把数千奴隶变为自由民充当士兵。这些奴隶出身的士兵和穷苦的自由民士兵到已经废除奴隶制的巴拉圭作战，对接受和传播废奴思想起了重要作用。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奴隶制被废除，也大大加强了巴西人民和黑人奴隶为废除奴隶制而奋斗的决心。

19 世纪 60 年代末，巴西各地先后出现废奴协会，广泛展开援救黑奴的活动。1883 年，各地的废奴协会联合成立了巴西废奴主义同盟。一些废奴主义者著书立说，大造舆论，把废奴思想变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时，废奴运动带动了共和运动的兴起，并使两者逐渐合流。许多废奴主义者同时又是共和运动的参加者。他们认识到，要废除奴隶制，必须摧毁君主制；要建立共和制，必须铲除奴隶制。废奴思想也在军队中传播开来。1887 年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俱乐部

发表声明，军队不参加任何镇压逃亡奴隶的行动。军队拒绝为保护奴隶制效劳，这是废奴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1887 年，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赴欧洲就医，使废奴运动趋向高潮。1888 年初，废奴主义者在各大城市组织了群众性示威游行。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下，5 月 3 日议会通过了立即无条件废除奴隶制的法令。5 月 13 日，摄政伊莎贝拉公主（佩德罗二世的女儿）签署了这项法令。公主在签字时使用的是废奴主义者送给她的一支金笔，故这项法令在巴西历史上称为“金法律”。当时巴西的 72 万奴隶全部获得解放。如果不把个别地区尚存的宗法式奴隶制算在内的话，巴西对奴隶制的废除宣告了世界性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彻底灭亡。

废奴运动的胜利为共和政体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后资产阶级联合自由派地主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势力展开斗争。1889 年 7 月，首都和其他的一些城市组织了要求推翻帝制的示威游行，并同警察发生冲突。11 月初，一些地方的军队宣布不再听命于政府，并且向首都进发。11 月 15 日陆军首脑曼努埃尔·德奥多罗·丰塞卡元帅倒向共和派一边，率领军队逮捕了政府所有内阁成员。当天宣布巴西共和国诞生。两天后佩德罗二世被放逐到欧洲。

废奴运动的胜利和共和国的建立，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完成了独立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摧毁了奴隶制度和君主政体，消除了巴西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巴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古巴独立战争

古巴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以盛产蔗糖驰名于世。1511 年古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王室在古巴设置都督府，委派都督和检审法院进行直接统治，属于新西班牙总督区管辖。

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对古巴原有的居民印第安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几乎把他们消灭殆尽。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一面以种种优惠条件鼓励向古巴移民，一面从非洲输入大批黑奴，强迫他们从事畜牧、烟草和蔗糖生产。

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古巴人民掀起了连续不断的斗争。1792—1793 年，在哈瓦那和太子港等地的种植园发生了黑奴暴动。1795 年在巴亚莫发生了黑人和贫苦白人联合的起义。1812 年在奥连特省和卡马圭省等地爆发了当时规模最大的起义。1823 年，古巴的一些爱国人士曾与玻利瓦尔联系，准备发动争取古巴独立的起义。但是古巴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的主要军事基地和供应地，比其他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防守更严，控制更紧。再加上古巴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奴隶制度占优势，土生白人地主极端反动，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奴隶解放的革命运动。因此，这些起义在残酷的镇压下都失败了。古巴继续处在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

1868 年 9 月，西班牙发生革命，推翻伊萨贝拉二世的统治，建立共和国。宗主国的政局剧变，给古巴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时机。10 月 10 日，以卡洛斯·曼努

埃尔·德·塞斯佩德斯为首的爱国人士在奥连特省发动武装起义。一月后，起义的烽火蔓延到卡马圭省。1869年2月，拉斯维利亚省也爆发了起义。起义席卷了整个东部地区，大批农民和奴隶投入革命斗争。同年，起义者召开代表大会，制订了古巴第一部宪法，宣布解放奴隶，成立古巴共和国。选举塞斯佩德斯为总统。

西班牙政府先后调集20万军队前来镇压，并严密封锁了整个古巴岛屿。只有2万多人的古巴起义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沉重地打击了西班牙殖民军。但毕竟双方力量对比悬殊。1873年塞斯佩德斯被俘就义。此后，由于起义军内部分歧和部分领导人的动摇，起义军遭到失败。1878年2月，起义者的代表与西班牙殖民者在卡马圭省西南的桑洪举行谈判，双方签订了《桑洪条约》。起义者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西班牙答应改革古巴行政制度，实行大赦，并给参加起义斗争的黑人奴隶以自由。《桑洪条约》的签订曾受到马塞奥等起义将领的反对。

这次争取独立的战争迫使西班牙政府在古巴作了一些“改革”。西班牙政府同意古巴有权派代表进入西班牙议会。实际上这些代表均由西班牙政府指派，在议会中并不能解决古巴的任何问题。1881年4月西班牙政府在古巴公布《西班牙1876年宪法》，允许古巴人民享有公民权利，但古巴人民能否享有公民权都由古巴都督决定。《桑洪条约》规定废除奴隶制，可是西班牙政府又规定在8年内逐步解放奴隶，并由每个奴隶向主人缴纳30至50美元作为补偿，这样就使大批奴隶拖欠永远偿还不清的债务，变成地主的隶农。

《桑洪条约》签订后，古巴人民的境况没有得到改善，反抗斗争的烽火延绵不断。独立战争的将领马塞奥和戈麦斯一直为古巴独立而奔走呼号，并于1879至1880年在奥连特省等地发动起义，不久遭到镇压。1895年，马塞奥和戈麦斯与古巴人民杰出爱国领袖马蒂一起，发动了第二次独立战争。

何塞·马蒂(1853—1895)出生于哈瓦那一个贫苦家庭。15岁参加革命，曾创办《自由祖国》杂志，号召古巴人民为祖国独立而斗争。独立战争中他被殖民当局逮捕，获释后继续从事爱国宣传活动。他坚决反对《桑洪条约》，指出“权利只能争取而不能恳求，只能夺得不能乞求。”1880年他流亡美国。1892年4月，马蒂在纽约主持召开古巴侨民各爱国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古巴革命党”。党纲的宗旨是“团结所有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的力量，实现古巴的完全独立。”大会选举马蒂为党代表，负责协调和指导工作。

古巴革命党成立后，马蒂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并代表革命党任命戈麦斯为古巴解放军总司令。1895年1月28日，马蒂向国内党组织下达总起义的命令。4月，马蒂和戈麦斯率领在国外组织的远征军在古巴登陆，与马塞奥等率领的起义军会合。马蒂身先士卒，亲临战场指挥战斗。5月19日在多斯里约斯的一次战

斗中壮烈牺牲。

戈麦斯和马塞奥领导古巴人民继续战斗，革命烈火燃遍全国。1895 年 9 月，起义军和人民召开代表会议，制定临时宪法，宣布古巴独立，选举萨尔瓦多·西斯内罗斯·贝当古为古巴共和国总统，戈麦斯和马塞奥担任革命军正副总司令。在共和国政府领导下，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到 1898 年，革命军解放了全国近 2/3 的土地，控制了广大农村和交通要道，并包围了哈瓦那。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已经日暮途穷，濒临绝境。

正当古巴独立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美国进行了武装干涉。1898 年 4 月，美国借口“缅因号”军舰突然爆炸事件，向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军队在古巴革命军全力支持下，很快打败西班牙军队，占领了圣地亚哥。12 月，美西签订《巴黎和约》，其中规定：西班牙放弃在古巴的一切权利，古巴由美军占领。为了牢固控制古巴，美国当局宣布解散古巴革命军，并笼络古巴地主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让他们进入傀儡政府。

美国的侵略行径曾激起古巴人民的极端不满，酝酿着一场反美斗争的风暴。美国为缓和古巴人民的反美情绪，宣布美国将撤出军队，给古巴独立。1901 年 2 月，古巴召开了制宪议会，以美国宪法为蓝本，制订了宪法。3 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普拉特提出了关于古巴宪法问题的修正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古巴进行干涉”；古巴应给美国煤站和海军基地所需要的土地；未经美国同意，古巴不得与任何外国签订条约，不得把领土转让给其他任何国家等。在美国的压力下，古巴制宪议会被迫接受这一修正案作为古巴宪法的附件。1902 年 5 月，美军撤出古巴，古巴取得“独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古巴人民仍需继续完成争取民族解放的艰巨任务。

结束语　世界连结成为一个整体

到1900年,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下面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上:到1914年以前铺成的海底电缆长达51.6万公里,因而加强了大陆与大陆之间的电报联系,加速了信息的交流。这个时期有3万艘商船,总吨数为5 000万吨,往来运货于世界各地。通航的运河缩短了世界航程。1869年通航的苏伊士运河缩短了西欧与印度之间的航程达4 000英里;1914年完成的巴拿马运河缩短了纽约与旧金山之间的航程达8 000英里。各大洲也建成横贯大陆的铁路:美国建成于1869年,加拿大建成于188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于1905年。

由于世界各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便出现了人类过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产品可以行销于全球,一个地区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很快波及或影响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可以迅速传遍全球各地。一个国家举行的博览会,可以有世界"万国"参加。欧洲市场的萧条,可以引起大西洋彼岸的工人失业。亚洲人可以在家里享用一个美国人的发明成果。中国读者可以读到英国哲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或代议制可以对东方国家的变法运动或改革发生影响。

这样,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打破世界各地区的封闭状态后,随着海上商路的开拓,各地区各国之间的联系一步一步地加强,到1900年左右,世界终于形成一个牵一发则动全身的有机的整体。世界史到此时才真正具有世界性。

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的历程中,世界经济的增长与生产力的上升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1860—1913年世界工业生产的增长超过了6倍,1851—1913年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12倍。

为什么在16世纪以来的400年间会产生这样的奇迹?简言之,是由于资本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文明世界的经济都是以农为本。以农为本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其本身带有封闭性,因而成为各地区、各国间横向联系的障碍。商业是打破封闭性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因素,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以农为本的奴隶制、封建制时代,商业总是处于农业经济的附庸地位,它不能从根本上突破封闭性,突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隔阂。只有资本主义,才打破了这种封闭性,而把世界各地区连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有这样大的威力?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

和扩张的本性。它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是无法发展起来的。它必然以暴力或和平的方式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各地的廉价原料，这一切必然导致世界地区联系的加强。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后，它的胃口更大了，不但要求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及原料供应地，而且也要求把过剩资本输向海外，因而推动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到19世纪末终于把世界瓜分完毕，亚、非、拉美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变成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当然，资本主义在一步一步加强世界地区间的联系并且最后把世界连成整体时，也借助于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铁路、轮船、电报等。然而这些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和新技术也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

但是，世界之形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它的真实内容是什么呢？它的真实内容便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世界其余地区、国家的统治。世界地区联系的加强，不外是西方列强对于世界上其余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控制。资本主义势力伸向全世界，可以说是“无远弗届”。

首先，世界广大领土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仅亚洲有不少于944.3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变成列强的殖民地。其中有649.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在俄国的殖民统治下，199.8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58.7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在荷兰的殖民统治下，24.8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11.4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在美国的殖民统治下。

此外，欧洲列强还控制了许多半殖民地国家，其中有中国、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及尼泊尔等。这些国家只是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它们在经济、文化上，甚至在政治上处于列强的控制之下。一般说来，主要是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才使这些国家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断言：世界各地区之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固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也是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世界上其余地区、国家的宰割、奴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公正、很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个矛盾。因此，1900年以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解决这个矛盾，消灭这种不公正的现象，逐步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

后　记

参加本卷编写和修订的分工情况如下(以章节先后为序):

第四章

第一节	王觉非
第二节	程汉大
第三节	王觉非
第四节	马家骏

第五章

第一节	
一	王觉非
二	程汉大
三	邓红风
四	张定河
五	王孝洵　刘祚昌
第二节	刘宗绪
第三节	马家骏　刘祚昌
第四节	
一	彭树智
二	彭树智
三	彭树智
四	彭树智
五	彭树智
六	陆庭恩
七	陆庭恩
八	瞿季木　王觉非

第六章

第一节	马家骏
第二节	

一	程汉大	刘祚昌
二	张定河	刘祚昌
三		张定河
四		陈海宏
五	瞿季木	王觉非
六		邓红凤
第三节		
一		彭树智
二		陆庭恩
三	瞿季木	王觉非

结束语 刘祚昌

受总主编齐世荣教授委托，侯振彤审阅了本书日本史部分（原编者因故未参加修订），提出了修改意见，订正了一些失准的年代和史实。

本卷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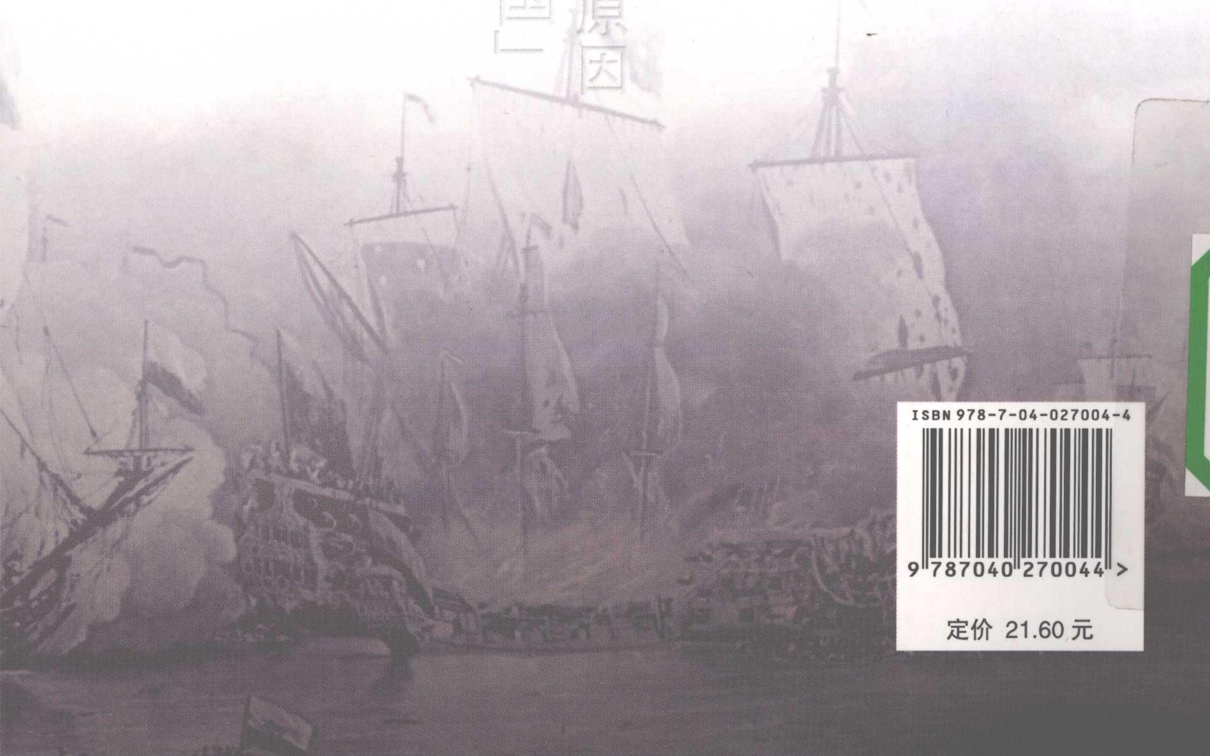
世界史

近代史编　下卷

责任编辑　王方宪

封面设计　刘晓翔





ISBN 978-7-04-027004-4

9 787040 270044 >

定价 21.60 元